

列寧工作室 ■ 精選文庫

改變中國

【美】史景遷 著



К.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РЕВОЛЮЦИЯ В ХРАМ
ВСЕХ ЕМ
И НАЗАД
ЩИХСЯ



改

变

中

国

TO
CHANGE
CHINA

〔美〕詹姆斯·斯通著 曹德毅等译

三联书店



TO CHANGE CHINA

改变中国

[美] 乔纳森·斯潘塞 著

曹德骏 竺一葶 周定国 朱子文译

三 联 书 店



责任编辑：新建国

封面设计：宁成春

Jonathan Spenser

To Change China

Penguin Books

改变中国

GAIBLAN ZHONGGUO

〔美〕乔纳森·斯潘塞著

曹德骏、竺一莘、周定国、朱子文译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7213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8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108—00392—9

K·51 定价：4.80元

内 容 提 要

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甚至从人种和灵魂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口号，潜藏着发了霉的阴谋：一个国家试图统治另一个国家，一种主义试图征服另一种主义，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

这是一段惨不忍睹的过程，流着黑色的血，横七竖八地躺着残破的躯体。在宗教与科学、文明与愚昧的缝隙中，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入中国上层，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派顾问和专家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施加影响，并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上的渗透。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以恢宏的笔触详述了西方各国争相改变中国的史实。情节惊心动魄，材料翔实可靠，多为首次披露或鲜为人知的秘闻。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不要上帝.....	(1)
第二章	医学救人,救不了民族的灵魂.....	(33)
第三章	用武力闯开中国大门	(54)
第四章	打入中国上层	(91)
第五章	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	(128)
第六章	被砍头的美国人和“耶鲁中国计划”.....	(160)
第七章	对中国最高当局产生过影响的人.....	(183)
第八章	用科学改变中国.....	(203)
第九章	美国人的雄心.....	(225)
第十章	美、苏在中国	(282)
第十一章	结论.....	(291)

第一章

中国人不要上帝

1644年6月29日，寓居北京城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正式表奏中国皇帝：“臣启奏陛下，”汤若望写道，“以西方历法预推之日月交食，将于西历1644年9月1日显现。日食既现，则亏圆之数可分。京城及其它省域仰而观之，可见太阳复原。日食亏圆之时各地有异，早迟不一。臣今呈预测日食之详情，奏请御览，乞敕礼部公开占验，庶几新法之密可定。”汤若望还主动提出修复前一年5月宫中大火焚毁的观天仪器。皇帝诏谕汤若望9月初报上测试结果并制修仪器。

中国官员在报告中详尽描述了那年九月的冲突戏剧。中国官员上疏道：“1644年9月1日，大学士范谦率西洋人汤若望，置望远镜等观天仪器于观象台，会历局、钦天监官员及天文生等修葺观象台，以备观测日食。西洋新法所

测之日食，其相交、食既、交后、亏圆、地点诸项，均推算准确。而以中国历法预测之日食，有时间及分数之误。”汤若望的成功得到承认，他被擢升为钦天监监正。这一职位为五品，在中国官僚的九品制梯队中，恰好属于中段。汤若望征求了耶稣会上司的意见，接受了这一职务。上帝的仆人变成了中国的士大夫。

这次任命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当时两股历史潮流砰然相撞，其深邃含义，恰好构成我们故事的主题。在此之前，中国因自身的先进性而自豪，决没想到西方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中华帝国无可争议地为万邦之首，中国皇帝膺天宝命，“是上界和人间的中介，居于金銮宝殿之上，高不可及，尊贵无比。”这个国家的无数先贤圣哲，给后代留下了无穷的智慧。凭着一个小小的、然而神通广大的官僚体制，便统治了1亿5千万臣民。她有着极其完美和成就辉煌的文学、艺术传统，探骊素隐，使海洋、大地，乃至上天的诸多奥秘真相大白。既然如此，还需什么别的新技术？内战、饥馑，甚至外族——例如蒙古人或满族人——入侵，到头来都无关宏旨，固有的秩序总会恢复，征服者无一不被中国文化的文明力量所同化。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国度是“中央之国”，他们的领土内“礼乐教化，尧天舜日”。领土之外则为“蛮夷之邦，不识礼义”。

汤若望的到来是不祥之兆。若说中国人在当时便认清了这点是虚妄之谈，但这个含义还是在两百年后表露无遗。汤若望是在欧洲信仰、知识和科学技术革命风云激荡的岁

月，踏入中国国门的。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哥白尼和伽利略对天体的认识，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球探险，改变了人类旧有的地球观念，也确定了地球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从17世纪起，中国人对地球的认识，便不断受到质疑，此时的欧洲人已不再象其“蛮夷”祖先，任由中国驯化，吸取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中国，使之成为欧洲人能接受的国家，让中国人分享欧洲人的价值观。

汤若望被任命为中国官员，便具有这一层意义。在中国当官决非他的全部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的的手段。他企图将中国人转化为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汤若望在其耶稣会上司的鼓励下，以其学术之长，一跃变成中国人的顾问，接着跻身中国士大夫之列。他的观点是，科学只能服务于上帝增添光彩之鹤的。而中国人启用汤若望，全因他们觉得；此人是一个对他们有用的技术人才，如此而已。十分明显，总有一方的愿望不会实现。

汤若望能住进北京，尤其是他能施展独特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耶稣会先驱利玛窦。利玛窦于16世纪末来到中国，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致力于在中国的贫苦人民中发展教徒，结果收效甚微。他最终明白，争取中国士大夫或朝臣的支持，才是现实的道路。换句话说，他决定自上而下地开展传教。他开始努力学习古汉语，以便能用中文与中国的学者交流，显示他的数学、天文学、制图学以及机械学诸方面的造诣。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他的技艺

唤起了中国人的好奇，有的好奇者当上了他的后台，他们代表他行使影响力。1601年，利玛窦获得居住北京的殊荣。利玛窦与中国的学者讨论天主教教义，暗示它与孔子的儒家学说宗旨相同。由于他的博学和诚实，终于使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皈依基督，皇帝恩准他介绍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利玛窦是1610年去世的。他在中国写的日记被金尼阁神父带回欧洲，很快用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在此之前也曾有一些介绍中国的书籍问世——孟多拉根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见闻而著的《历史》一书，即为一例。不过，以翔实材料，理性的笔调介绍地球另一面的那个文明的成就，利玛窦乃为始作俑者。从他的书中，读者不光知道这个中国与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中国一模一样，而且还知道这个异国领土的生活情景丰富多彩。人们用象牙筷子夹食进餐，喝茶叶汁水，穿缀有花朵的缎面鞋，在最冷的时节士大夫也纸扇不离手。此外，读者还看到了作者对这个文明国家的分析，尽管这个国家力量强大，但对来自西方的影响异常敏感。“我便持这个观点，”利玛窦写道，“中国人的喜好表现十分坦率单纯，一旦他们知道‘洋货’原来有这么好的质量，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喜欢它。他们目前的骄傲，在于他们只知周围有一群未曾开化的‘蛮夷’，他们还不了解世界原来还存在着更高级的‘奇技淫巧’！”

利玛窦所称的“洋货”，指的是钟表、地图、钢琴这一

类玩意儿。利玛窦将其送给了朝廷。“洋货”实际上是基督教精神的化身，但试图以此说服中国人，外国的宗教竟有如此先进，仍是难事一桩。利玛窦描述了他们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微妙处境：

为防止新宗教引起中国人疑心，神父们在公开场合对宗教事务缄口不言。除了向中国朝廷表示敬仰和谨慎地接待来访者，他们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汉语、书法和了解中国的习俗。他们努力以身教感化异教国民，就是说，他们是用自己的榜样力量和生活的圣洁赢得人心。这样，他们获得了人们的友情，他们坚持不懈地，一点一点地让中国人接受靠语言所不能说服的东西，并且避免危及他们目前已获得的成功。

当时的欧洲人大都习惯听取宗教法庭和反宗教改革的严厉言辞，上述话肯定令他们大吃一惊。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兴趣盎然。

汤若望便对此深以为然。汤若望出身于德国科隆的一家富有的贵族家庭。1611年他刚19岁，便成为耶稣会牧师。当他在罗马学习期间，适逢金尼阁前来传教。两人会面，汤若望对利玛窦遗著中传达的信息深信不疑，认清了自己的真正职业。他申请去远东为上帝效劳，得到批准。修道院院长在1616年的名单上，在汤若望的名字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可去中国。”金尼阁也为汤若望的才干和热情所感动，请求允许汤若望陪伴他作一次全欧布道收徒旅行，未得批准。修道院院长认为，汤若望抓紧时间完成

学业乃当务之急。1617年，汤若望离罗马赴里斯本，去中国的船队在那儿停泊上货。

汤若望在里斯本与选派去中国的21名耶稣会士会合。这艘船还载有另外的614名乘客，上万只牲畜。1618年4月，轮船起锚。尽管他们象罐头鲱鱼一样挤在“货物、行李和粮食中间”，但船一驶入公海，训练便开始了。根据金尼阁的指示，他们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学数字，星期三和星期六学汉语。汤若望还加入了学天文的那个小组，因为修道院长采纳了利玛窦以前提出的建议；利玛窦说，倘若耶稣会传教士掌握了修订中国历法的必要知识，“就会提高我们的知名度，使我们更容易进入中国，保证我们的安全和自由”。

1618年10月4日，汤若望一行驶抵西印度海港果阿，五个半月的航行损失惨重。45名乘客死于热病，其中有5名传教士。到了果阿，又有2名修士因身体衰弱不治身亡。就在此地，死里逃生的乘客们第一次听说，早在1616年，中国明朝政府逮捕了早先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永远驱逐出境。传教士在南京的教堂和住宅被夷为平地，基督教被视为异端遭禁。幸运的是这一命令并未贯彻到底，好几个传教士还滞留中国，由他们的皈依者掩护在家。北京和其它地方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汤若望等人毅然决定继续前进。1619年7月15日，他们来到葡属澳门。到了澳门，汤若望再次投身学习汉语。他的辅导教师，便是被中国赶出来的范礼安神父。1622年6

月，当荷兰人进攻葡萄牙租界时，汤若望还呆在澳门。这次进攻被击退，部分功劳归于耶稣会传教士们寓所中架设的大炮的准确轰击。就在那年深秋的某一天，汤若望与另外3名传教士偷偷溜进中国北上。汤若望将随行者扔在杭州，找到了一直躲藏在中国的龙华民神父。1623年1月25日，两人结伴抵达北京。他们在京西南城门找了一间小屋栖身，此屋曾是利玛窦的住所。

汤若望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形的：“我那时年纪尚轻。我陪着年迈的龙华民神父进入北京。他和另一位神父向中国皇帝呈上奏章，请求允准他们在京城研究铜炮。”汤若望补充道，从技术上讲，神父们仍处于被驱逐的境地，当然不可能立即得到答复。但他们借口等待圣旨，便赖在北京不走。实际上，在这个奇怪的举动后面，却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舞台上正经历一个重要变化，它将间接给传教士带来好处。力主发动1616年驱逐运动的士大夫沈惟宪失宠；1621年，长城以北的满族部落接连几次打败明朝军队。这就使得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朝臣，有机会向准备作战的皇帝进言，阐述利用西方技术的好处。这批官员中，就有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建议从澳门运来大炮，用它们在北边攻打满族人。他们还提议请传教士作顾问。大炮倒是运来了，不幸得很，有两门炮在试验时发生爆炸，炸死了几名围观者。沈惟利用这一事件再度攻击基督教徒，但未达到将他们驱逐出境，或不准他们在其它省份布道的目的。

正当明廷为自己的生存在边境苦战之时，宫廷内的一个大太监，率领阉党与朝臣中的改革派，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汤若望吸取利玛窦的教训，一门心思地搞天文研究。在中国，天文与历法具有极强的政治——宗教色彩，由于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地之中介，以他的名义颁行天下的年历，将由中国及其属国严格执行。在辽阔的中华帝国国土上，春耕秋收，红白喜事，政治决定，司法审判，几乎所有生活层面都须与阴历和北京记载的黄道吉日的要求相适应。历象推算之误非同小可，在皇朝危机之秋，甚至会导致皇帝本身是否有权充任“天子”的质疑。如果某个耶稣会传教士能检查出中国历象之误，他将倍受宠爱。为使不了解这个背景的欧洲人不再指责他们为何花那么多的时间进行历象推算，汤若望复信道：“传教士们把大量精力用于改革历象并不奇怪，因为如不完成这件纯科学的当务之急，则传教士们将无地自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把全部精力放在天文研究上看似令人不解，实则是他们让中国人信奉上帝的唯一途径。只有当传教士显示出学术专长，才有指望进入中国官场，才能获得中国学者的友谊，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异教皈依工作。

汤若望因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日食，而名声鹊起，更因1625年9月的日食预测名震朝野。他为此完成了第一部用中文写的天文历书。为了消除别人的怀疑，他写道：“这不过是有关日食的一篇小小的论文，我将其分为两个部分，意在使自己在京城居留期间，能学会中国的

作文法。”1626年，他用汉语完成了论述望远镜的论文，强调了 this 仪器对天文研究的作用，同时还指出，这个仪器也具有军事用途。

汤若望以其渊博学识，成功地与北京官场要人建立了紧密联系。然而1627年，他的耶稣会上司，还是把他派到中国西北的陕西。此时，汤若望已经比较习惯在北京做天文研究工作，一到陕西，他便意识到要在充满敌意的京城以外的人民中发展教徒困难重重。或许他的上司认为，让这个年轻人离开城市，放弃科学工作，而去野外接受锻炼大有好处。龙华民神父在给罗马传教团首脑的秘密报告中评价汤若望道：“此人才华出众，判断力强，但不是太谨慎。经验有限。文字工作进步极快。脾气尚可，自信、愉快。尚未完全成熟。他懂得如何与人民打交道，不过提拔他当院长还为时过早。”

虽然汤若望经验不足，但仍以其惯有的充沛精力诱导点化。及至1629年，他已与不少当地官员结成朋友，给为数众多的皈依者施行洗礼。他还顺利地在全省西安修建了一座教堂，房顶高耸一付金光闪闪的十字架。然而汤若望却无法继续沿这条成功之路走下去。1630年，他忽然被召回北京。

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些日子，基督教徒、耶稣会的热情支持者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这一职位已接近朝廷大臣的最高官衔。1629年，他成功地证明西洋历法比中国历法和朝廷沿用的“回回历”更精密。皇上敕谕徐光启主持

新设立的历局，挑选他喜欢的职员。他启用了他的朋友、同是基督教徒的李之藻，还任命了两个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耶稣教教士们翘首以盼进入中国官场的机会终于来临。邓玉函曾与伽利略一道，同在塞西学院做院士。1616年，教皇下诏禁止他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因伽利略曾拒绝给耶稣教预测日食。邓玉函对教皇大为不满。他还与当时欧洲的另一位伟大的天文家开普勒（德国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显然有资格综合已有的知识，领导耶稣会传教士把持中国的学术机构。

邓玉函在1630年猝死，耶稣会教士们大功告成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汤若望在数学上的造诣远不及邓玉函，但他的天文学知识，大大超过了那些信奉中国历法和“回回历”的反对派。他手中掌握着最新技术，即欧洲科学革命的成果：它们是日食预测新法；天体运动的几何分析；球面地球以及用经纬线划分地球表面的概念；高级代数；还包括能增强精确度的望远镜以及测微计等等。这样，尽管教会严禁耶稣会教士将日心说理论引进中国，但他们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人。

汤若望接过邓玉函丢下的工作，开始检测中国的天文历书。他发现了不少疏漏之处：在中国的星历表（他们笼统称之为历书）中；他写道，“我们发现每一天的旁边，都注有一个替换日，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在用于揭示天体运动的另外一部历书中，我们立即注意到许多因演算不精而带来的失误。”汤若望自告奋勇，要为朝廷献上一部“完备

之历书”。他为之花费了5年心血，方才告竣。这部著作分三个部分，分别为天体理论论述、恒星解析和计算表格。不幸的是，他的上司和保护者徐光启于1633年逝世。光禄卿李天经走马上任。汤若望历来不许人犯错误，他对李天经的领导深感不安。“李天经是个好人，”汤若望在一篇文笔简洁的笔记中写道，“可是太爱当好好先生，在应该斗争的地方往往不战而降。”这些“地方”指的是历法计算和天体观测，在李天经的指导下，历局各派时常争吵不休，汤若望不得不经常为捍卫自己的预测方法的正确性而卷入其间，还必须保持独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只要中国数学家加入了我的计划，那么全部计划反倒会功败垂成。”此外，他还须寻找时间处理水力和光学方面的难题，甚至去修理利玛窦很久以前送给万历皇帝的钢琴。为使钢琴能奏出悦耳动听的音乐，他还用中文撰写了一部钢琴演奏法。

汤若望利用进宫修钢琴的机会，赠送了两件礼品给皇上。这两件礼物是1618年从欧洲携来的，一直找不到机会上贡。一件礼物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画册，画在上等羊皮纸上，图案和笔法堪称精美。他在画卷上留下了中文题跋。另一件礼物是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大博士的彩色蜡像。皇上接受了礼品，据说“深得帝眷”，珍爱无比。汤若望过去从未亲睹龙颜——只是1644年他被封为中国官员时，才有幸了却夙愿。当然，在就历书形式而举行的若干次廷议中，他遇见了一些太监，并把他们发展成了基督教徒。在汤若望的吩咐下，这些太监将有关基督教的信息带入皇帝

的后宫禁苑。后宫禁苑居住着皇帝娘娘和嫔妃，只有皇帝和阉人太监才可入内。虽然禁苑中的女人们无缘聆听新近信奉上帝的太监们讲授高深的基督教教义，但她们事实上已皈依基督，汤若望对自己的迂回战术深感满意，因为他无法探知哪位娘娘最受皇帝宠幸，不知谁会给皇帝施加影响。他向极可能信疑参半的欧洲听众指出，上帝的优雅鲜明地体现在这种交易里：凡受过洗礼的中国皇妃，容颜越发动人，从此倍受恩泽，而讥讽上帝的女人则会变得丑陋不堪，马上失宠。

汤若望的位置从此难以界明。他自信技术比中国学者略高一筹，但又必须随时证明这一点。他坚信自己信奉的宗教包含真理，但也清楚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觉得，他们的文明远比西方文明更先进。他希望能劝诫皇帝信奉基督教，然而皇帝却不愿屈尊与之见面。他只好求助于太监，让他们充任精神媒介，对他们取得的任何微小成就都夸大其辞地渲染褒扬。有的时候，生气勃勃的传教士还被中国人当作匠人与听差，中国人特别精于此道。汤若望急于想把中国的士大夫发展成基督徒，然而他们却聪明地利用了他的日益膨胀的但并无力量的影响。

汤若望从利玛窦的书中得知，中国的士大夫官绅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对自己的“玄虚”颇为自得。他本人的经历也证实了一点。在野蛮的拉丁美洲或东南亚地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招徒方法，在中国断断行不通。因此，尽管汤若望是个急性子，仍为两位方济各会行乞修道

士的莽撞行事方式深感吃惊。这两位行乞修道士于1637年擅自来到北京传教，结果被中国官兵强行赶走。汤若望给自己的朋友写信叙述了经过：“这两个闯入中国京城的行乞士，可谓志比天高，他们若不把中国皇帝和全国臣民都变成基督教徒，就决心杀身成仁。但他们连汉语都不会讲……。这两个人教袍罩身。……手中拿着十字架，就想开始劝诫布道。谁知官兵们一围而上，”汤若望以挖苦的笔调继续写道，“他们再也不敢当烈士了。他们连稍稍的反抗都没有，便乖乖地交出十字架。他们双手作揖打恭，嘴里连声告饶：‘老爷！老爷！’最后，他们保证：‘再也不进城来’，才未被拿下。……似这样的‘烈士’，还不如横尸床上！”

汤若望完全不象这两个急于求成的行乞士，他尽可能不去得罪中国的士大夫，更不想攻讦他们笃信不疑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最捷近信仰改变之路，是转变上层。为了成功，他必须替皇上效尽犬马之劳，赢得那些权高位重的中国人的青睐。因此，汤若望竭力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拼命学汉语，钻研古文，穿中国学者常穿的长袍，尽量显得体面堂皇。他甚至把“上帝”译成中国人能接受的“圣贤”、“天主”这类词，以便与中国人熟知的典籍中的有关称谓保持一致。他还向远在欧洲的批评家们保证，孔子的学说中也有类似旨意，因而他的改译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他接受了这种观点：中国人向祖先或孔子表示敬意而遵循的那些“礼节”，具有纯粹的世俗意义，中国的皈依者

在向基督表示尊敬时，可以沿袭这套礼仪，不会被视为异端。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汤若望以及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得到了中国大人物的信任。及至1640年，他使几千人改信基督教，其中包括50名宫女，40名太监，还有几百个皇帝的左右侍从。看起来，汤若望似乎马上就要在皇帝身上取得成功了。他的礼物被皇上接受，他的天文历法深得赞许，他一再被加官晋爵。但是，中国北部的满族部落，此时已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充满敌意的政权。源于他们的战争威胁，迫使皇上不得不在1642年下诏，谕令汤若望全力以赴铸造大炮，用于攻打满人。

汤若望对此表示异议。他说，他对制造大炮只会纸上谈兵。但朝廷还是划给他一片空地，供给物质，调拨劳力，叫他着手研制。汤若望终于发觉，浇铸大炮并不困难，他不无得意地说：“一些欧洲人觉得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人竟觉得难，看来中国人缺乏经验。”这项工作给了他控制下属的相当权力，他借机命令下属在开工前，须向设在铸造车间内的祭坛跪拜行礼，20门大炮按期竣工，皇上敕令汤若望再造500门。每门大炮的重量不超过60磅，用于武装步兵参战。汤若望忧心忡忡地指出，官军失利，士兵们就会丢弃大炮，让满人垂手可得。他很可能未敢将自己的忧虑张扬扩散，因为朝廷在军事上越来越倚重他。1643年，皇帝又下诏，令他立即设计巩固北京城防。1644年，他被钦派北线，视察防御，他向朝廷奏报，形势无法挽救。

形势的确无法挽救。1644年4月，汤若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自成的起义军攻下北京，看着明朝皇帝在宫中自杀。这对汤若望来说，意味着他的毕生心血伴随燃烧的城市一道灰飞烟灭。21年来，他对明朝皇帝俯首贴耳，竭力拉拢讨好中国官吏。现在，王朝一朝覆灭，他和他的耶稣会同伴们只能另起炉灶。但是，汤若望不是那种轻易屈服的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保护自己的家产不受满城劫掠的强人的侵犯。“我知道，中国人的胆子并不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但不知道怒火将把他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激发了眼前这场骚乱。于是，我手持一把倭刀，立在大厅门前，准备抵抗冲击。一切都与我设想的一样，那些站在房顶上的人，看见我杀气腾腾，只求死战，又看见我一脸虬须，模样可怕，便开始道歉。他们大喊道，他们是来清剿劫匪的，既然我的宅第平安无事，他们决定立即撤退。”

第二件大事是马上与李自成取得联系，那怕他是“流寇”，但终归是胜利之师的领袖，而且有若干迹象表明，他很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王朝的君主。于是，汤若望进入起义军领袖的宫殿报到，与李自成长谈。他极可能向李自成表示他愿效劳，但他未透露详情，只是说晤谈甚欢，李自成设酒款待。

谁料李自成很快被南侵的满族军队赶走，汤若望也第一次对耶稣会士用学术手段开展传教是否有效产生了怀疑。“我已决定，”他写道，“放弃历书和天文研究计划，把

全部精力投入传教。”他一定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上帝对他个人发出的警告。但是，当被满人打败的李自成的士兵，在溃逃中放火烧了他居住的那一片地区时，他存放数学书的房间居然皮毛未伤，而周围地方包括树叶，全都成了一片火海。汤若望又将这一现象，视为上帝在暗中保护他。“我无法排遣这种想法，大火为何未将这些干燥之物化为灰烬？”于是在6月份，当满族人彻底控制了北京城后，汤若望立即向他们表示，他愿为他们出力。

汤若望的地位变得异常奇特。满族人建立了清王朝，急于想表明他们才是天意的代表、明朝的真正承袭者。为达此目的，他们就必须编出历书，预测来年，以证明他们决非是北方的“蛮夷”。汤若望在历局的成就尽人皆知，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明朝掌管“回回历”的那批天文学者，他们在学术上略输一筹已被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西方人，他是自由的，不一定非要效忠战败的王朝。汤若望深明此理，甚至轻率地上书清廷，请求给他居住北京的特权。他自称“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外族人。”结果他的请求获得批准。在这个时节，他向不同学派的竞争者发出挑战，逼迫他们与他直接比试。清廷皇帝接受了汤若望技高一筹的说法，封他为钦天监监正。

既然汤若望已成了清廷的正式官吏，他自然会有效地利用这个新职位。他的确在好几个方面这样做了。他只花了很少的钱，便在历象测算和机械工程上大出风头，一时间名闻遐迩。他用正式的历象观测报告以及据此运演推算

出来的有关道德行为规范，匡正年轻皇帝耽于淫乐和判断失误。由于他声誉日隆，其他的传教士也大沾其光。“在整个帝国的版图内，我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给住在外埠的同事们带来了极大益处，他们只须自称是我的朋友或兄弟便可逢凶化吉。”他经常给来中国京城“觐见天子”的外国使节充当翻译，甚至他的意识形态敌人荷兰人前来时，他也一视同仁。“经常的情形是，”汤若望写道，“如有某种别人碍难料理的事，朝臣们总是说：‘汤若望神父可司其事’。”

然而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企图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在清王朝的早期阶段，汤若望与清廷诸多文臣武将、皇亲国戚、后宫佳丽，包括太后本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正如以往一样，他传播福音的事业进展缓慢，令人不安。他在1651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鞑子’的看法——他们对杀人越货、奸人妻女之类的事还未厌腻，还未停止用极端下流、无耻的手段虐待俘虏。我身跻其间，每天都同他们打交道，我经常向他们灌输拯救灵魂之道，但我深知，这是明珠暗投，对牛弹琴；我还要补充的是，不仅那些向我表示敌意的人对我的劝诫充耳不闻，就连那些我觉得会接受我的看法的人也不知我所云。总而言之，我一事无成。”直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汤若望才开始有机会，接近最大、最难以捉摸的目标——皇帝本人。

1650年，一直严厉管束幼帝的真正统治者摄政王多尔

袞去世。1651年，年仅13岁的顺治皇帝上朝亲政，他一开始便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君侧”运动，贬黜了多尔袞的全部心腹。他似乎对汤若望倍加厚爱，把他称为“祖父”，经常破格免礼接见。汤若望不但无需向皇帝三拜九叩行大礼，还被降旨恩准收养义子（顺治皇帝因汤若望独身无后颇为忧虑）。他可以直接向皇帝面呈疏奏章表，皇帝还把北京的一块土地赐予他，准其在上面修建教堂。他甚至还享有御前议政的特权，赐一品花翎顶戴，跻身于清王朝官阶之首的行列。连他的先人也溢封贵族。汤若望这样宣称，1656~1657年是他最“隆以恩宠”的时期，顺治帝可在24小时内的任何一时刻不打招呼面驾临他的府第。两人不以君臣之仪，每每晤谈至深夜，尽欢乃散。他们的话题除天文、政治、基督教外，旁涉甚广。皇帝的聪慧以及好学态度，令汤若望大为惊讶。汤若望觉得，皇帝和他的关系基础是相互尊重。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说服皇帝改信天主教。汤若望伤感地写道：“大多数人，尤其是东方人，深藏不露，连信仰上帝都无动于衷。”顺治皇帝皈依的最大障碍是贞洁，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一夫一妻制。他无法回答汤若提出的这个微妙的问题：为什么一夫一妻制的一个欧洲人，比妻妾成群的一个中国人生孩子更多？皇帝并未表示他有摈弃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的意图，他仍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宿命论者，以为他的命运，全靠星宿运行决定。

也许，汤若望的固执惹恼了顺治帝，总之，到了1658年，他逐渐疏远汤若望，而与一群和尚往来甚密。显然，这

群和尚更善于取悦帝心。年老体衰的汤若望万念俱灰，往日荣华，不过过眼烟云，他再度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不由感慨万端。这时，他的敌人借机下手。

敌人有两类：中国天文学者和其它天主教派传教士。他固然败在中国天文学者手下，但最先向他发难的，却是外国传教士。他与传教士不合的根源，肇始于他的文化适应方略。问题不只是他采取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17世纪50年代来访中国的一位西方人将他描绘成“照鞑子的样式剃头、穿衣；出门坐四乘大轿，骑马扈从甚多。”问题更在于，在许多人眼中，他的思维方式也归化为中国式，对中国繁文缛节表现出逾常的忍耐，他的作法不但为神学原则所不齿，即便与他最亲近的耶稣会传教士，也认为他让步太多。更麻烦的是，汤若望随时乱发脾气，一味任性胡来。“他完全是典型的德国人，面目狰狞，性情粗暴，乖僻难处。”

中国还活跃着一大批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道士。他们刻意苦修，皈依穷人，对耶稣会传教士拥有的广泛影响眼馋嫉妒，于是猛烈抨击耶稣会传教士的宗教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方式。他们接连不断参劾对手，使得吕宋主教于1635年谴责耶稣会传教士“行为不端”，1645年，教皇颁敕禁令。1655年，罗马神学院的5人委员会，也严厉批评了耶稣会士。耶稣会传教士的反击是在1656年吁请教皇收回成命，这种做法进一步激发了多明我会教士的愤怒，他们抨击越发尖锐激烈。

这一系列的相互参劾，把汤若望推入万分尴尬的境地。

敌对的修道士们还攻讦他在历局的工作无非是散布迷信。一个与汤若望同住北京的多明我教士说：“身为数学馆长的汤若望神父所受的指责是，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事务，不管是否黄道吉日，都必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有人作证说，这个神父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总结说，汤若望的主要职责就是，“除了吃喝和犯罪，就是为做其它任何事情选择日期和钟点。”另一位多明我教士的批评面更加广泛：“耶稣会士用于布道而选择的手段，与我主耶稣基督倡导的、由耶稣教使徒所采用的方式完全背道而驰。别的教士们都遵循这种方式宣传天国神政，只有他例外。东方传教团的耶稣会教士们，利用他们自己的那一套方法，以富人和要人甚至是权贵的面貌立于异教之前。从此之后，他们便阻止其它教派的传教士进入他们传播福音的国度，他们惟恐异教徒看见了那些恭顺的、贫苦的和谦卑的人民，会转而反对他们这些耶稣教士。他们注定该蒙受羞辱和挫折。”

汤若望素来胆识过人，完全可以对付这些纠缠，但他却无法抵抗天文学者杨光先持续不断的参劾。杨光先以反基督教的士大夫的急先锋自居，在顺治皇帝 1661 年驾崩后，攻讦之火日炽。汤若望的这批中国敌人最后指控他谋反。他们在 1664 年奏本道：

西洋人汤若望，乃故耶稣基督之信徒，以党徒之首自居，阴行在中土建立天主之教国。彼等于明朝间，藉精历法而偷入京城，广传邪教，妖言惑众。窃朝廷机密，欲谋不轨。若彼等西洋人无取我天下之心，何

以在京城及外省要害之地遍立教堂？二十年间，收徒愈百万，棋布中国，其意欲何为乎？彼等意欲谋反之心久矣，且证据凿凿。若不速察伏戒于莽，则大清国卧榻之侧有虎鼾声，万一窃发，后患无穷。

杨光先揭发汤若望等阴谋造反的疏奏一上，清廷立即明令调查。虽然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能说清在天文历象学术方面的讹谈，却无法洗雪别人的指控。汤若望论罪拟磔。只因年老，改为鞭挞放逐。但这一刑罚亦未执行，原因是朝廷认为他素有前勋。汤若望忽患中风，半身不遂，口不能言，最后被软禁在北京的寓所里。1666年，他在寓所内安然逝世，享年75岁。不过，天主教被明令禁止，教堂被关闭，其它的传教士被驱至广州和澳门。对于汤若望的失势和死亡，许多人喜形于色。当时在澳门流传甚广的两则笑话，足可证明这些人的心情：“一个亚当把我们赶入天堂，另一个亚当（注：汤若望之西名为Adam）又把我们逐出中国。”“利玛窦用数学把我们请进中国，汤若望却因数学使我们被撵出中国。”

汤若望可以原谅他的中国敌人的迫害，他这样解释他的对手的性格：“这些中国人的报复欲望，达到了失控地步，那怕他们也身处灾难，一旦他们认定哪个人冒犯侮辱了他们，他们就决不会忘记对这个仇敌的积怨，他们会置自己的灾难于不顾，千方百计地把痛苦加诸于敌于身上。”他难以原谅的是与他信仰一致、背景相似的同仁。他觉得这些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根本弄不懂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的

深远意义。“我回顾了自己 20 年来孜孜不倦地改革天文历法的工作，但愿我的努力不付之东流。对于天文学，我可以说问心无愧，也希望后来者获得跟我一样的丰硕成果。我所气愤的是，这项工作本可以获得更大成就，但一批理应扶植它成功的人却梗在中间横加阻拦。”作为中国天文官的汤若望，把作为上帝使者的汤若望排斥到一边，没有比这个更能恰如其份地概括他的一生的结论了。

× × × ×

汤若望倭刀在手，立于北京寓所院内，以决死之勇毅吓退了抢劫团伙。他的继承者，后居中国耶稣会传教士领导之职的南怀仁，则以其机敏，避开了第一批敌人对他的危害。1656 年，南怀仁乘坐的轮船在驶向中国途中，在离开地中海之前，忽遭海盗袭击。海盗们剥去了耶稣会传教士及乘客的衣衫，让他们只穿衬衣，搜走了他们身上全部值钱之物——连十字架和每日祈祷书也不放过，然后将俘虏赶到船尾。南怀仁警觉地注视着劫掠过程，正确地判断形势，决定采取规避之法。“当我看见同行的神父们宽衣解带，扒鞋退袜，脑子里刹时有了注意：我也应主动解开衣服，免得海盗强行下手。我取下围巾，敞开颈脖，解开衣扣，做得跟那些遭劫的人一模一样。海盗们误以为我也被搜查过了，便让我站到了船尾甲板，我就这样躲过了他们的抢劫。”

由此可见，这位步汤若望之后尘，且成就斐然的传教士，是何等的机智和小心。南怀仁生于1623年，其父为比利时西佛兰德的一座大庄园的管事。他在库尔台和布鲁日的耶稣教会学校受教育，1641年获得牧师职。他在布鲁塞尔教了几年文法、希腊文和修辞学后，被送往塞维利和罗马进修神学。由于他天性聪明，深得修道院长的喜欢。他可望在天主教的欧洲，在社会最上层圈子过一辈子的优裕生活。然而，他很早就反复向耶稣会会长提出请求，要求去外国传教，但每次都被否定。直至1655年，他才如愿以偿。“我满足您那值得赞许的愿望”，耶稣会主教戈斯文·尼克尔写道，“希望它们得以实现。您去中国传教，势必会拯救无数人民的灵魂。”

初次远航，便遭到海盗的暴力骚扰。南怀仁折道里斯本，于1657年春驶向远东。秋抵果阿，次年夏抵澳门。1659年初，始得中国当局允准进入中国。他先在陕西西安布道。30年前，汤若望也在此地工作。尽管南怀仁当时的汉语程度很低，但他仍勉力工作，8个月就取得了长足进展。接着，在1660年2月，顺治皇帝召他到北京，协助汤若望开展天文历象研究。从此，南怀仁在中国一呆28年，但不再是纯粹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如汤若望一样，他把主要精力投进科学研究，为中国皇帝效劳。发生在1664年的迫害事件，是对南怀仁天文学术知识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南怀仁成功地证明自己无罪。朝廷命令各派天文学家预测即将来临的日食的准确时辰。杨光先推算2：15分日月交

会，执掌“回回历”制的吴时恂则推算为2：30分，而南怀仁在疾病缠身的汤若望的帮助下，却宣称日食将于3：00出现。人们架起透镜，让太阳投影射入墨屋。结果杨、吴的推算被证明不准，日食第一线黑斑果然在3点准时出现。可是，他们这次预测成功，并未推翻对他们的指控。南怀仁仍被处以流放。不过，他的惩罚和汤若望的死刑都未执行，两人同被软禁在北京寓所，削职不用。他们的敌人杨光先被封为钦天监监正。

1666年汤若望死时，南怀仁仍被羁押家中。他看到汤若望历经挫折，终于走上了正确轨道。他把强行加在他身上的闲暇，用于天文学研究。在1668年4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传授天意，而非尘世音讯。”他静候政治局势改变，一旦来临，他便积极开始行动。

1668年末，顺治之子，时年14岁的康熙皇帝亲政。他废了权重压君的摄政王及其同伙。与此同时，钦天监杨光先、吴明燠的历推，已被证明时常出错。是年12月，南怀仁上书康熙，要求与杨、吴二人在日食出现的那一时刻，比试谁能精确地计算出日食阴影投射在特定物体上的长度。杨吴二人计穷，未能完成此项试验，而南怀仁的计算却精确无误。12月28日，康熙诏谕南怀仁检测他的竞争对手制作的历书。1669年1月底，南怀仁复命，指出这两个天文学家在历书推算中犯的几个重大错误。他的疏奏，对中国历书的作用夸大其辞。他的用辞，使人相信只会出自于中国官员，而非比利时人之口。“陛下皇恩浩荡，柔怀绥远，

万邦输诚向化，贡进方物，而尊中华历书之国，诚不知逖迤几千万里也。天朝声教，源于京师而达四海，岂可以一历书之误，无以测昼夜之长短，日月之交食焉？”

皇帝遂令王公辅臣查明南怀仁一案，并向他奏报。报告称：南怀仁已蒙冤狱，吴明煊似有舛误。康熙见这份报告结论模棱两可，龙颜大怒，下决心一次性解决天文学家们的齟齬。语云：

昔者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王公辅臣尚能明光先之是，纳其善言，断若望之非，令其辍算。尔等既不深究前者何以废西洋之法，又不盘诘杨光先、吴明煊、南怀仁以辨奸忠，未清谕令，西历遂复，此乃大不妥！特谕重议！

结果，南怀仁和吴明煊受命再进行一次公开试验，内容为当太阳在某一时间出现时，计算其高度与角度。所有的测量仪器，均于两周前置放妥当，由天文官们固定入位。机器的可移动部件都覆以封条，加盖私人印章，避免作弊。南怀仁的计算又一次精确无误。1669年2月末，他被封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和吴明煊则下狱问罪。

南怀仁信心百倍进行历象改革。他查验出前任的疏误，当时历书已付梓，但仍坚持立即纠错。大臣们对此众说纷纭，然而康熙皇帝同意南怀仁的观点。与此同时，南怀仁上书皇帝，称杨光先在5年前对汤若望的指控纯属诬陷。汤若望及其同伴遂得昭雪，恢复名誉，而杨光先则被处以死刑。

这个胜利，对南怀仁来讲，就如当年汤若望一样，感到难以适从。日益增长的学术工作重压，使得他再也无暇从事精神劝化。他不仅不可能布道异教，甚至不得不放弃这个爱好。他在1670年8月给挚友柏应理的信中说：“去年，我一直以为随着时间推移，我的任务会逐步减少。谁知恰恰相反，我更忙得不可开交，事情多到会长都要免除我每月祈祷的地步了——这种情形决非偶尔有之。”

南怀仁修撰历书，还指挥下属为观象台制作一些大型的、复杂的观天仪器。然而南怀仁所称的“忙得不可开交”，并非全是观天象，修历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另有他用。奉康熙皇帝圣旨，他花了几周时间制作日晷、漏刻，还在御花园修建泵站，提高水位。他还制作“万花筒”，供皇帝后妃们观赏娱乐。他曾描述过制作的一个玩雪物件。他在多棱镜筒内置入一个小风景画片，前景为马群和鸟儿，从本身看，仿佛是一幅图画，“但从多棱镜望去，人们则能看见一个人头和腰部以上的身子，还带着凉帽。观者无不以为乐趣无穷。”他对自己的这些杰作颇为自豪，不厌其烦地在信中详加描述。当然，倘若这些“奇技淫巧”能服务于更高目标——让皇帝转信基督教——那就决非小事一桩。南怀仁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一旦康熙皇帝为他的天文学知识折服，被他发明的小玩意儿搞得心情舒畅，是肯定会相信“存在于科学后而的那个宗教的”。“天意会使我们日益得宠，登上快乐的峰巅。但我们决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等到合适时机，一步一步地达到那个最困难，也是最

重要的目标。”汤若望也曾这样希望和期待皇帝皈依的机会。

但是，就跟汤若望的遭遇一样，南怀仁也树敌众多。敌人包括那些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年长资深，对南怀仁颇受青睞悻悻不平。在争取欧洲耶稣会会长拨来更多款项，用于制作仪器、贿赂廷臣等事上，南怀仁也只敢用佛兰芒语写请求报告，免得敌对的教士们深知其详。他自信方向正确，同事们无法设置障碍：“至今所获之宠幸，均为皇上对我们天文历象算学诸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之犒劳，我无意半途而废，而有足够理由申请资助。”

南怀仁的汉语进步极快，足以胜任来华访问的外国使臣的翻译。康熙帝诏南怀仁进宫讲学，南怀仁趁机研习满文，以便能与皇帝随便交谈。最后，他竟写了一部有关满文的语法书，帮助其他传教士学习这门语言。在南怀仁辅导下，康熙皇帝钻研天文学原理，演算《几何原本》（利玛窦撰，授徐光启译），还攻读球面三角，最后竟能亲自进行天文观测实验和地球测绘。

这对君臣关系有多密切？康熙皇帝对新科学知识的理解有多深？是个扯不清的问题。据南怀仁所述，康熙皇帝聪明过人，两人感情十分融洽，但另外的传教士们则坚持说皇帝决不可能对他表示亲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人的个人接触决不会少，因为南怀仁不断得到嘉许，不停地领取圣命。1674年，康熙又下诏南怀仁，令其“浇铸轻便火炮，威力宜大，便于运输”，用于中国南方戡乱。南怀

仁铸成重炮 132 门，在战场上取得成功。皇帝敕谕再铸轻炮 320 门。1682 年，官军大获全胜，南怀仁被封为工部侍郎，因“他所铸之炮慑敌胆魂，屡建奇功”。佛兰德领地的管家之子，终成清朝的高级官员。

得宠和职责，自然形成交搭迭盖之势。于是，当康熙皇帝要南怀仁陪同他巡幸满洲时，南怀仁这样描绘自己担任的角色：“我随时伺立皇帝左右，观察天象，测定北极星高度，合地坡度，用我携带的算学仪器测量山川地形。一旦皇帝问起流星等其它物理和数学问题时，俾能随时侍讲。”皇帝拨给南怀仁 10 匹马驮运仪器。入夜，他的帐篷也搭在皇帝御帐附近。“每天，队伍行进扬起的冲天灰尘，呛得我透不过气，骑马赶路使人精疲力尽，因而一至宿营地，当我走进帐篷时，几乎站立不稳。”特别的宠幸使南怀仁无法休息，“我好几次都想暂时离开御前，但朋友们劝阻了我，如果我不侍立左右，皇帝会生气。”

南怀仁的坚韧不拔，终于收获到小小的回报。一天夜晚，当巡幸队伍驻扎山区时，康熙皇帝挑选了一批内侍，来到一条小溪边席地而坐。南怀仁这样描述了当时情形：“夜色壮美，夜空晴朗。皇帝要我将闪烁在地平线上方的每一颗星星的中、西文名称都讲出来。他首先把自己知道的星星名字说出来，接着，他取出我几年前送给他的那张小幅星图，根据星位计算夜晚时辰。他向左右显示他的渊博学识，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南怀仁庶务缠身，但觉得向皇帝传播福音是完全可能

的。他奉康熙圣旨继续修撰天文历书，准备编绘“两千年后预测历象表”，他还将满洲城市的纬度列成图表。为此康熙下令，今后凡绘制中国地图，须将此图表内容悉数纳入。南怀仁作为中国教区的副教长，还得操心其他传教士的事。例如方济各会修道士，就对南怀仁的无私援助称叹不已。由于南怀仁的影响，才使他们免遭迫害。他力主发展中国本地的神职人员，支持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甚至为此得罪葡萄牙人。他竭力主张开辟一条经俄国到中国的陆路。他的活动规模显然超过了汤若望。他的多才多艺使他确信胜券在握，然而1687年，正当他步向成功顶巅之时，却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成严重内伤，次年病逝。康熙特诏厚葬，并以他的名义祭祀逝者。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堂皇隆重的祭奠仪式中找到安息：

25英尺长、4英尺宽的旌旗开道。旗帜流苏锦穗飘拂，底部为一幅红绸，正楷金字书写南怀仁的名讳及官职。接着是乐队和掌旗手。随后一个大型十字架，置于龕中，照样装饰着绸缎旒花。走在十字架后面的基督教徒，有的举旗，有的擎烛。接踵而至的是圣母玛丽亚和婴儿耶稣像，耶稣手中抱着地球。簇拥守护神像的则为更多的旗幡和烛火，而画像中的南怀仁神父朝服翎顶，皇上赐封的各种头衔无一遗漏，十分招人注目。我们（耶稣会教士们）素服执紼，还依照中国人送殡习惯，不时大放悲声，以示哀恸。神父遗体就在我们身后。皇帝指派了不少官员列队送葬，向这

位著名的传教士表示哀悼。在官员的马队中，还有皇上的附马爷和宫廷禁卫首脑。送殡队伍之尾，有 50 名骑兵护卫。

南怀仁虽死犹生，因为耶稣会在中国的成功活动并未因他去世而中断。他的继承者可谓踵事增华，一帆风顺。当中俄签订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时，耶稣会士作为调解人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1692 年，耶稣会士用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皇上特下“准耶教旨”，朝廷拨土地给耶稣会传教士，让其在京城内开堂。康熙帝还委托教士们测绘大量清帝国的全国版图。康熙帝对他们礼遇甚厚，举凡康熙出巡，每到一地，总要先选几个教士御前慰勉。不少耶稣会教士被遴选入钦天监，他们在中国士大夫层中占据有影响力的技术人才的地位，似乎是肯定无疑的。

可是，这些充满希望的迹象，到头来仍不过是美梦一场，当年曾把汤若望搞得苦不堪言的教派内争再度激化，且程度日炽，终于导致罗马教皇于 1705 年派特使来华，分裂了在华的耶稣会教士，疏远了 中国皇帝。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排教情绪猛烈抬头，各省普遍发生教案。在华欧洲人中，无一人再具有阻止这些事件发生的能力（中国官员当然无意阻止）。乃至 18 世纪，康熙的儿子和孙子谕旨禁止传教，天主教被称为异端邪说。传教士们只准撰历书，造喷水池和修复古董，还有的人充当画师和匠人。1770 年，邪恶而又不值得信赖的耶稣会在欧洲被禁，中国掀起的反教新浪潮，给滞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带来驱逐和躲藏的厄运。精心

策划的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媒介，争取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图谋，毫无疑问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但西方人对中国可能提供的机会仍持乐观态度。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皇帝，仍是可以转化的。他们坚持认为，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已走上寻求真理的道路，每一迫害事件，无非是取得更大胜利的前奏。诸如伏尔泰和亚当·斯密这类理论家，正在以中国作为事例，加强对他们自己社会的批判；更有人以轻松的心情认为，奢侈铺派的“中国建筑风格”，影响了英国人在花园中修建宝塔，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中国瓷餐具，摆上了西方的餐桌，英王乔治三世和乔治·华盛顿脑后垂的那条大辫子，学的就是满族人的样。

其实，西方人分析中国时，总是爱感情用事，很不真实。他们自以为在学术上高人一筹，中国肯定需要他们。第一代“洋”顾问夸大中国的需求，意在自圆其说。他们没看懂中国儒家学说中道德结构的力量和不可渗透性，总是把他们经常遭到的抵制视为暂时的逾常现象。

即便承认我们地位优越，倘若回顾汤若望和南怀仁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场交易中获利的其实是中国人。当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便拿来利用，他们付款公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给予别的东西；大凡他们不关心的，一概嗤之以鼻。在19世纪初叶，西方宗教充其量是一些模糊的记忆，正如众人所知的大学者和高级官员林则徐于1840年所述：“利玛窦所宣扬之耶稣教，可称为

基督教。天中、基督二词，显然表明某种差异。”

然而西方人并不如此轻率地看待这个问题，以汤若望被封为高官为象征的这一趋同现象，成了西方思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乃是希望之海，技术可作舟。“导致三位皇帝崇拜真正的上帝的，正是许多年前的那颗星辰。”南怀仁在1674年曾这样写道，“有关星象的科学将引导东方的统治者，逐步了解并崇拜他们的主。”正因为这一奇特的预言太乐观，因而勿需抛弃计划。的确勿需抛弃计划，那怕有人试图以另外的科学，把中国人带到另外的神灵前。

第二章

医学救人，救不了民族的灵魂

耶稣会传教士利用天文学让中国人信奉上帝的计划，可谓洋洋大观。但与 19 世纪基督教福音派的强有力行动相比；又相形见绌。新的进步前景，博爱主义与商业贸易的拓展，使工业革命中培养出来的预言家们，一方面寻找新辩术，同时着眼于征服更广阔的天地。“当我思索这个问题时，”美国新教传教团的伯驾，在首次逗留中国后写道，“越发感到这个伟大事业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忍不住想大声呼叫——啊，将有志之士悉心组织引导，培养兴趣，把伟大的事业推向成功的顶点！……让人从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桎梏中解脱吧！让科学与基督教的福音在全球广为流传，是才智之士和乐善好施者的当今大任。”

伯驾按照耶稣会教士的方略、依自己的形式接近中国人。他把星象学换成了现代医学。1841 年伯驾在英格兰所

做的一次讲演，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一位前去采访的英国报社记者写道：“他预定的目标首先是，用医学对中华帝国启蒙；其次，通过上述手段打开门户，在那个国家的众多人口中传播基督教福音。他接着指出了那个国家的医学的缺陷和疏误，引证的是他经手的若干病例。他向中国人表明了医院的巨大价值，这不但因为各国的科学都在突飞猛进，而且治病救人的实际工作也急需如此。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为引进基督教原则扫清了障碍。”

伯驾脚下通往中国的道路漫长，一如当年耶稣会教士面临的情形一样。他是凭着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才踏上征途的。伯驾诞生于1804年6月18日，其父为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一个贫穷农夫，他是那家的唯一儿子。他在一个严格的新教徒环境中长大，总觉自己灵性不足。直到16岁，他才找到某种安宁。当时，他正处于皈依上帝的过程，第一次觉得“愿意根据上帝的旨意履行职责。”但他仍脱离不了农场，他的父亲半瘫，债台高筑。后来，他的姐姐出嫁，时常资助家庭，他才得以清醒的认识离开家庭。于1827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读了3年，就坐卧不安。哈佛大学对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后来他听说“这所学校对敬神的学生并无益处，”方才转入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和纽黑文令他着迷。“这是美国的伊甸园，”他对母亲说。当地的慈善机构免费给他提供书籍和住宿。他只需每天付50美分便可舒舒服服地住下来。同学对他也十

分友善。缺钱是个问题，他不愿在相当阔绰的同学面前“显得寒伧、失去影响”。不过在餐厅当侍者，可使他有足够的收入支付伙食费。

快满 20 岁时，伯驾急切地盼望能把基督教信息传递海外，送到“基督徒尚未涉足之地，那里的人还未听说过福音。”在他攻读耶鲁大学期间，当地的宗教机构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增强了他当传教士的信心。“如果我未被欺压，我就应该说没有那个话题比异教徒的生活更能吸引我的兴趣。愿上帝有意将此慈善重任托付于我。”他描述了自己的资质，表明了当传教士的动机。结果令人振奋。他自称吃苦耐劳、身体健康、忠心不二，不存在对家庭无法脱开的义务，相反，对异教国民的恶劣处境非常关心。1831 年 9 月，传教区域的选择缩小至两个：中国和斯米尔纳。他从教师处获悉，这两个地方都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同时，他也考虑当一名医生。他后来得知，象他这种情况可免费学习，其它费用也“酌收”。他遂开始学医。他经过适当的反省和祈祷，又进了耶鲁神学院。母亲和姊妹虽然痛哭流涕，却对他的雄心壮志大加赞赏。

他向美国“外国传道部”表示了当传教士的热切愿望。当时这个组织起着新教教徒寻求海外传教工作的情报站作用，他礼貌地说，拒绝他的请求有悖于上帝旨意。这个组织在答复中鼓励他把眼光集中在中国，他愉快地接受了。

伯驾是 1832 年首次认识他选择的那个目的地的。那时，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美国百科全书》中一篇

介绍中国的文章。他掌握了中国的历史梗概，知道中国人“缺乏独创性，但十分勤劳，注重实际。”这个国家的农业正在变化，“处于兴盛阶段。”中国拥有一支为数众多，但衰弱无力的军队。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长期暮气沉沉”。同时，中国经常为“内乱所苦”。他进一步了解到，天主教徒因为“不适当的热情，”已在中国失去了先前获得的特权。“尽管中国视一切外国为‘蛮夷’，然而国际贸易十分活跃。中国进口大米、布匹、玻璃、皮毛、檀香，出口茶叶、食糖、丝绸、矿产、漆器、大黄和麝香”。最后他发现，虽然中国的语文奇特，但人们仍能“很好地彼此交流沟通”。马礼逊编纂了字典和语法书，希图学习这门奇特语言的人，便无需借助其它“辅助工具”。

这篇文章未告诉他的是，人口压力已把中国农民推到造反边缘。发生在19世纪末的乾隆皇帝的宠臣和坤的令人震惊的腐败，已使这个国家濒于破产：皇权衰微、无官不贪。清军无力弹压越来越频繁的农民起义，外国政府对于继续当“蛮夷”早已怒火难抑。文章的作者显然还隐瞒了一个他本人熟知的事实：英国与美国为了贸易平衡，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仅以1829年为例，英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2千万美元的货物，单鸦片一项便占贸易额的1/4。如果伯驾当时就清楚这一点，他对中国将要面临的问题，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他继续苦读，在不知情中求得愉快。他那里知道，就在此时，远在中国海岸的鸦片商人们都在大声叫喊：“雇人卸货都来不及，那有时间读圣经、写日记？”

1833年9月，伯驾来到费城，参加“美国外国传道部”成立周年典礼。他的医学和神学研究名列前茅，已被奉为“中国教区专家”。他在抵达费城的那个星期天，就布道3次。他一周都快乐无比。在一次布道会上，听众为他的热情所感染，当即捐了250美元，“送给即将去华传教的伯驾神父用作盘缠。”这似乎是伯驾的第一笔意外横财，他朝中国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他忙不迭地说：“不应夸奖我们，不应夸奖我们，上帝才应受到赞美！”他觉得这个活跃的新世界魅力无穷，机遇甚多。如果移居费城，他假设道，“我就要广交朋友，在我永远离开故乡后，还能留下影响。”“引导异教皈依上帝，具有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殊荣，但它需要新的策略。”谁知回到纽黑文，他便染疾、高烧不止，痛苦异常。他视此为上帝的审判。“我相信，我必须活下去，战胜死亡，那怕在最沮丧的时候，我也应保持幸福的快感。我已进入我将为之努力的天地。我不知道我是否应长期在里面耕耘，但有人劝我说，我必须去看看这个天地，至少在中国干一段时间”。“幸福的预感”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实现。病愈后3周，伯驾遇见了富有的、专在中国做生意的O. W. C. 奥立芬，此公答应伯驾免费搭乘“马礼逊”号船去中国。1834年，该船从纽约扬帆启锚。

伯驾把此行视作命中注定，尤其在病体初愈的情况下，他更认为从此一去不返。他在给姐姐哈里埃特的信中戏剧性地写道：“考验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就要分别——长久地直至我们在遥远的他乡相会。别送我，我们不应悲泪流

满，不觉肝胆俱裂，因为分别也是快乐，请相信我。为了上帝的事业你送走你的唯一兄弟，他会把你的救世主的爱，带给亿万中国人……，他将把伟大的上帝的灿烂的福音之光，洒遍地球的另一边。”

他同时着手进行一些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布道，一方面收拾行装，还抽出时间参加在纽黑文举行的考试。他于1834年3月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两个月后，他又在费城被任命为长老会牧师。

在纽约布里克尔大街长老会教堂举行的欢送仪式上，“美国外国传道部”就他去中国传教事宜予以了明确指示。听起来，这个指令犹如警告：伯驾不得按汤若望、南怀仁的方式工作，不得让技术工作干扰精神目标的实现。“你具有内科和外科知识，只要机会允许，可以用来减轻人们的病痛，但你更应注意，只要可能，更应向他们宣传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你务必牢记，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他们确实有可能被培养成上帝的仆人时，才应下功夫。医生或科学家是极受尊重的，甚至有助于中国宣传福音。但你决不能以此来代替或干扰你作为宗教宣传者的职责。”他还被要求花两、三年时间“认真和不懈地”研习汉语，熟悉中国习俗，规划未来行动，选择“资质甚佳的当地人作助手”。

在答词中，伯驾万分感谢给他这次机会，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极可能抛命他乡。他描述了他的真正意图，回击对他的批评。他说：“我希望成为有用之人，决不象某些人含沙射影攻击的那样轻易抛弃生命。他们不清楚我的动机，

不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我决心竭尽上帝赋予我之所能，乐善好施，千古流芳。”他以洋溢爱国热情的语言，结束了答词：“在此领域内，美国必须大有所为。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先跨出一步，这是无尚荣光的。这是一个曾被人鄙视的基督教徒的后代特有的荣耀，但我更想说，我更为我来自美国而骄傲。”

1834年6月4日，他乘坐的船从纽约启航，那一天阳光灿烂，船上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当船驶向公海时，他们情不自禁地咏吟起一位友人给伯驾的送别诗：

天堂轻风欢畅，
伴君横渡大洋。
肩负上帝重托，
志在中国解放。
上帝恩泽普被，
虽死犹自荣光。
传播教世福音，
黑暗从此光亮。

在欧洲耶稣会教士失败的地方，美国的长老会不一定重蹈覆辙。伯驾深知：“我的主在掌舵，耶稣基督是希望之光，是我的灵魂支柱。”

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一旦陆地退出视野，船只进入通往梦寐以求的目的地的航道，便开始了准备工作，这是为完成未来重任之必须。一如216年前来华的汤若望，“马礼逊”号上的伯驾，一方面组织宗教活动，一方面认真

读书。他一头扎进李穆撒特（Remusat）所著汉语语法和外科学，欢愉之情难抑：“我跻身于脚踏世界顶峰者之列，千百万人，包括基督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注视这一奇观。”然而在这条神圣征途上发生的无数狂乱事件，却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10月26日，伯驾在广州上岸，受到城里西方人的热烈欢迎。这些“洋人”数量不多，仍被清政府严格限制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十三行”地区狭小，有一个1英里长、200码宽的住宅区，住有200多个传教士和商人。英国人居主体、美国人13个，剩下的就是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丹麦人。这些人吃得香、睡得好，但却处于令人发怒的限制之下：不许携眷、不得带枪、不准坐轿、不可划船，更不能容忍进广州。尽管每月有3天准许他们去河对岸的花园散步，也只准小股同行，且要由一名中国译员陪同。此人还必须保证外国人无越轨行为。很清楚，这决不是可以向中国人大规模传教的基地，但伯驾只有这个条件。

伯驾在广处结识了一批同行，包括1830年来广州的裨治文，他是美国派出的第一名传教士，另外就是卫三畏等人。他们常在奥立芬的屋子热烈聚会，并把聚会处称为“狮角”。伯驾尚未制订出传教计划便病倒在床，加之他急需学习汉语，便被送往新加坡，在学习和行医的同时恢复健康。伯驾对华人热情友好，他向纽约的朋友写信说，由于他医术娴熟而名声大振，他对生活产生了新感受：“虽然只身一人，我不觉孤单。我常有一位中文教师呆在身边，已

不觉得自己在用筷子与他们同锅舀饭。停留此处实为权宜之计，但我毕竟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令他兴奋。然而人们对他的技术的需求，使他很快背离了精神目标。“昨夜我又重温了传道部给我的训令，我不由痛苦地发现，我对因患病而濒临死亡的那些华人的兴趣更大。我已在某个程度上违反了训令。我竭尽全力学汉语，还以我无法摆脱的方式行医。”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到了1835年6月，他已感觉万分沮丧，“我在沉沦的湍流中上下翻浮，不时远离人群，找一个僻静之处日夜流泪。”他觉得自己已无法完成任务：“多年来，我祈祷、斋戒、努力，试图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谁知我依然准备不足。”更糟糕的是，客观情况阻止他关怀病人的精神需求，“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问题很清楚，“这是最易犯的错误，在我身上，世俗医生的精神太盛，而十字架下的传教士精神太少。”他寄希望于回广州，“相信有机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救世主，塑造他的形象。”

回到香港，伯驾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行医。1835年11月，有40间病床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业，由他负责管理。医院租用了一个“行”的房间。在首季报告中，伯驾就为何只选择这一种疾病作为治疗对象予以说明：“眼疾在中国极为普遍，当地医生对此竟无办法。可以设想，我们专治眼疾一定会大受欢迎。”

医院立即大获成功。头3个月就治疗900多病人，其

中妇女占 1/3。他做的第一例手术是摘除白内障。以后，他又开展了切除脓肿、瘤子和癌的手术。他作为外科医生的精湛操刀术是不容置疑的。那怕当代医生，也万分惊讶地注意到他当时的手术情形。以下例子即可窥见一斑。伯驾详细地描述他在广州做的一例手术：“病例第 446 号。12 月 27 日。阿齐，女，13 岁。肉瘤。”他接着讲病人入院情形。“当时我正打算下班，看见一位中国人牵着他的女儿，迟迟疑疑地走进医院门。乍一看去，他的女儿象长了两个脑袋。太阳穴上隆起一个巨大肉包，一直重挂到下颌。一张脸悲惨地变了形。”伯驾让病孩家长在同意手术书上签字画押，假如女儿在手术中猝死，院方不负任何责任。伯驾决定立即手术，他仅用了 8 分钟，就取出了这个直径 16 寸，重 1¹/₄ 磅的巨肉瘤。18 天后，病孩康复出院。

伯驾请工于丹青的罗福泰^①将他最感兴趣的病人画下来。阿齐那张可怜的脸，在西方人眼中恰是中国的象征。疾病损害了她的美貌，她的同胞对此爱莫能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然而一位西方外科医生的闪亮手术刀改变了她的命运。她从此可在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愉快地生活。有的西方人不由问到：中国人难道看不见这是何等简单的事吗？

伯驾清楚，他理应重视病人的灵魂而非肉体，但他无

^① 注：罗福泰 (Lamqua)，广州十八洋行之东昌洋行主。商名罗隆官。

暇这样做。1836年5月1日他写道：“我不得不拿出全部精力应付病人，根本无暇向他们布道，使之对我的使命，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务必警惕，否则我的敌人将使我忙乱不堪，让我无法把它从这些人的灵魂中驱赶出去。”随着他的杰出技术得到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放心了，他也更忙了。他在一份报告中详述了他的病人如何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介绍了他治病时发明的流水线作业法：

要使从未见过我的医院忙乱情形的人明白我的处境，从而得出公正的结论委实困难。他应在医院呆一天，亲自接待病人。他应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在大街上彻夜排队候诊的人，尤其是那些为求得到尽早治疗的妇女儿童。他还应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病人们得先排队候检，然后才能挂号，最后进入医院由医生诊治处方。急诊病人当然立即就医，慢性病人则只能视医院能力，推迟5~10天看病。我们每天只能从上千名病人中筛选出200个病人加以处理（大多数人都被劝走了，其中确有患不治之症者，然而更多的则是可以疗救的，只是我们医院人手有限）。各级官员，从县官直至省级司法官，也只能与其子民们同坐医生桌前，等待外国医生恩赐。

由于当天诊断、当天手术难以行通，我们只能每

周花一天时间专做外科手术。一般来说，截肢、切除乳腺癌、摘除肉瘤优先处治。至于白内障患者，则往往6~16个手术一起做。在另一间手术室内，20~30个睑内翻、睑下垂患者同坐一条长凳，由医生依次手术。中国护士端着手术针线和胶布绷带紧随其后，缝合包扎，流水作业。

这一切努力的结果至少是财政收入稳定。广州最大的外贸商人、怡和洋行的伍浩官，同意伯驾免费使用洋行空地。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捐赠也源源而来，连英国人也向美国医生慷慨解囊，而他们过去是“断然反对我的这一做法的。”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在一份报告中称赞伯驾：“以最安全、最聪明、最捷近的方式，在地球的这片广阔区域，大步推进文明和真理的事业。”义律认捐100美元，还许诺每年都认捐相同数额。

先兆良好。伯驾和在广州的其它西方医生，决计将医院制度化、永久化。“我们打算组建一个社团，取名‘中国医务传教会’，因为我们在中国行医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对这个前景特别感兴趣：它极可能给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带来友好的社交关系，有利于传播欧洲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导致救世主的福音深入人心，消除笼罩他们思想的可怜的迷信。”1838年，传教会正式成立，还在澳门办了一所姊妹医院。伯驾为了更好地行医，又增加了教育内容，亲自收了3个中国青年为徒，教他们医学和英语。他是无可争议的医生，但他仍未教化异教徒。

鸦片战争把伯驾扯了进去，他暂时中断了行医。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敌意，自 1834 年便公开化了。当时老东印度公司破产，西方商人更加起劲地推动贸易开展，中国海岸商贾如云。出产于印度的鸦片，是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的最赚钱商品，商人们把大量鸦片运入中国倾销。随着鸦片需求量激增，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中国当局大为震惊，决定采取措施。英国商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结束了封闭性的“广州系统”和商行，根据他们国家发展自由贸易的原则，提出了关税合理、外交平等和扩大贸易机会的要求。最后，到了 1839 年，清帝封林则徐为钦差，到广州销禁鸦片。

1839 年 3 月，林钦差将所有外国商人全都关进“十三行”，命令他们交出鸦片。伯驾也被押在里面。他一直保持镇静，直至中、英当局的不妥协态度，将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阻断，他爱之甚深的医院大受其害。伯驾 4 月 14 日写给妹妹的信，便深切地表示了他的遗憾：“当他们告诉我医院必须关门时，我几乎悲痛欲绝。伍浩官说我对他的同胞之好，远远超过了他孝敬自己父母的程度。由于害怕，他不敢再把商行租给我了。当然，他也可能改变主意。”不过，伯驾仍然继续为和平努力，他向林钦差表示，他愿为中国和西方列强缔结“体面的条约”尽绵薄之力。当时，所有英国人和大多数美国人都撤退到了香港和澳门，伯驾仍然坚持在广州。他利用精湛的医术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在其它医生缺席的情况下，伯驾的普通外科手术

量激增。他在治疗一位高级司法官的公子的癫痫症的同时，收到林则徐的邀请，叫他给鸦片瘾民开戒烟处方。最后，林则徐请他诊治疝气。

凭借治疗疝气来妄推中西关系未免荒唐可笑，但这位年轻的美国医生与这位言重九鼎的中国官员的谈判，却在两个国家引起了巨大轰动。西方人希望技术的力量能弥合双方的分歧。鉴于形势以及林则徐的病的个人性质，他不好直接接触伯驾，伯驾也不敢贸然行事，担心造成担当不起的错误。伯驾在一份报告中，描绘了这幕精彩的芭蕾舞。“病例 6565 号。疝气。[病人]林则徐，钦差大臣。”7 月份，林则徐通过大商人伍浩官转来一封信，请求“开具治疝处方”。伯驾用中文客气地回信，附上一份解剖图示，建议病人绑扎疝气带。林则徐不敢亲自前来治疗，便假装对这一方法是否有效表示怀疑。他派了一个已扎有托带的朋友前来向伯驾再讨一付。伯驾拒绝，声称疝气带只能由医生给病人亲自绑扎。林则徐思忖再三，又遣一位患疝气的随将前来就诊。伯驾满足了他的要求，那人顿觉舒适。最后来了一人，自称为林则徐的“兄弟”，身材与钦差大人一模一样，“凡他适合的托带，必然适合其兄。”面对这种独出心裁的设计，伯驾不得不答应。疝气带终于扎上了。

伯驾在报告中说，“疝气带送给林大人阁下后，对方的回答是好极了。”林则徐甚至公开赞扬了医院。这个愉快的结局“使医院每天都有他的随员登门拜访。”此后，林则徐致信维多利亚 皂，请她协助结束鸦片贸易。信文竟由伯

驾修改。他还请伯驾翻译瓦特（瑞士人）的《万国公法》的某些篇章。伯驾的疝气带之所以能起到汤若望的望远镜作用纯属机遇，但伯驾毕竟在中国真正发挥了影响，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亲爱的医生，请在孤独中振奋精神，你占据着极佳的位置。”

伯驾的汉语听、写能力给他带来了极大好处。当中、英于1839年11月正式开战时，他还是保持中国人的国际法和医学顾问的特殊身份。“我不知道其它外国人都撤走后我是否仍然安全。”

1840年，他的内心钟摆再次晃到另一个极端。回首往事，他从纽约来中国已逾6年，“我的基督教精神较之开初已大为淡漠。”他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对那些把身体绝对放心地交给我治疗的人，我无法相信我能接触到他们的灵魂。我感到绝望。我已不再奢望有本事把这些人的灵魂，从他们的错误行为中拯救出来。”更恼火的是，不仅中国人的灵魂处于危机之中，他本人也产生了信仰危机。因为他曾设想过退出教会，这是非常可怕的。“在我习以为常的精神框架中，我已不那么虔诚，那么忠诚。啊，我的灵魂，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堕落？难道非要结束在变节之时？”怀着这种心态，当英军包围了广州后，伯驾于1840年7月5日离开中国，回到他以为不再谋面的美国。

然而他忘不了中国，这个国家已在他脑海中扎下根。就象其它长期留华的外国人一样，回到故乡反而不适应。“我坐卧不安，”伯驾回国后几天写道，“我的兴趣不在这里，而

在中国。”他在家只呆了几天，就赶到华盛顿，拜见了范比伦总统和福赛斯国务卿，请求美国政府速派全权公使去中国居中调停中英之战。1841年1月，他向国会发出呼吁，说上帝关怀广州的医院，“神佑医院，即使最漠不关心者，也看见了这点。”

在华盛顿的日子忙碌而富有成果。他逐渐淡忘了自己的忧虑。他参加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最高法院“为非洲人事业辩护”的听证会，聆听了哈里逊总统的就职演说，娶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位小姐”哈里埃特·韦伯斯特。以后的几个月更是春风得意，“这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与参议员、最高法官以及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富裕学者频频相会。为了让公众了解他的工作，伯驾四处募捐。他还到欧洲谒见苏塞克斯公爵和路易斯—菲利浦国王，晤谈甚欢。波士顿医学传教会专门通过一项表彰伯驾的决议，赞扬他“在传教会派往国外期间努力工作，公正地，勇于自我牺牲地为传教会赢得了声誉。”伯驾确实公正无私，中国人从这位弗雷明汉的贫穷农民儿子身上获益不少。

1842年11月伯驾重返中国。他如以往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生活的新纪元。新纪元的特点是更多的灵性、更专心致志的奉献，使中国人更好地熟悉圣经和基督教。”可是机会再次抛弃了他。此番的中国已大不同于往常的中国。战胜了英国人于1842年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5大通商口岸（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将向英国开放，英国将派领事进驻这5个城市。

广州的中国最老的外贸商行已被查禁，香港也已割让，中国还需支付大额赔金。对于进出口，也要实行统一的、有节制的关税。

战争留下了痛苦的后果。许多中国人拒不接受条约。广州地区的人民的愤怒尤其强烈。这个地区的深刻的排外情绪，在鸦片战争期间被当地士绅煽动起来了。他们坚信，广州人并未被英国人打败，而是被他们邪恶的统治者出卖了。他们到处宣传西方人是他们的经济和性的威胁者。“我们要砍、要杀，要把洋人一扫光。”1941年的一份招贴如斯说。“我们要竭尽所能剥你们的皮，吃你们的肉，我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们将毫不手软地杀掉你们。”尽管这是广州而非全中国对外国人的憎恨，但也够危险了。当时的形势如此难以逆料，外国人虽有条约作后盾，仍不敢进广州，包括“行医”也不安全。1842年12月，广州爆发了一场大骚乱。骚乱者四处纵火，抢劫商行。伯驾的夫人陪同伯驾进城，赶快跑入安全地带躲藏。骚乱伴随暴行，持续于整个40年代。

伯驾排除干扰，坚持在医院工作，但总归不如以前那样令人满意。“上帝仁慈地把我召回到我曾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我本来可在这里完成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工作。人们对我的技术服务的需求，现在比以往更迫切。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包括大官都需要我。我多么希望自己都直接拯救他们的灵魂呀！”他的奉献精神也大受挫折。“他忽视斋戒与祈祷”；他的心“冷漠无情”；他再次受到苛责。

作为名人的伯驾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他的汉语

能力为他召来了新的任务，他再无时间行医和拯救灵魂了。1844年，美国首任全权专使顾圣强聘请伯驾担任使团秘书和翻译。当时，伯驾的汉语水平不足以起草正式文件，他须得先念出译文，再由一点不懂英文的中国助手写成官样文字。伯驾不惧困难，接受了职务（这个职务的工资是1500美元，还不包括其它费用）。他只是对“暂时中断直接的传教工作”表示遗憾。他费尽心机与顾圣强和耆英一道，拟出了《望厦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不放一枪，便分享了英国1842年所获的全部利益。

谈判非常复杂，耗时费事。伯驾明白，“直接的传教工作”不得不长期搁置下来。即使如此，他仍对“美国传教部”1845年的决议感到吃惊。该决议说：“考虑到伯驾的工作性质，传教部决定不再支持他。”他向委员会复信，表明了自己的苦衷，“我以为，你们突然地、出人意料地永久中止了对我的支持，未免缺乏道理。我别无选择，只好请求你们彻底调查我的工作情况。”他的一位朋友警告他，“传教部”极可能派员调查，敦促他向治过病的人散发更多的传单，告诉他们福祉之源。“你们应对资助者衔恩报效，感谢支持这所医院的传教部。这样中国人就更能进一步看到他们的善行，从而促进事业发达。不过，我担心你的迟缓会阻碍这个绝妙主意的贯彻实施。”伯驾的其它朋友和崇拜者又匆忙为他辩护。有人说：“医生本人就是在传教，他把医院办成了教堂；”有人说，“过去的一、两次行动，只会让人怀疑作为教堂附属的医院的价值。”事情被这两批人弄

得复杂万分。

伯驾本人远远躲开了争论，一头扎进外交活动。随着贸易和传教从广州拓展至新的通商口岸，他的工作愈益繁重。1845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任命他为美国外交使团秘书，1846年升为美国公使代办。

上任伊始，他参与了镇压1846年的骚乱。他对中国人的容忍程度越来越低。他积极支持美国人为保证在华外国人的权利和安全而采取的强硬措施。地位上升也增大了他的财富和权力，他偿还了读书期间欠下的美国教育协会的贷款。他象每个地方的大人物那样，耳畔不时响彻下属的阿谀奉承之词。“我时常觉得，”一位下属这样写道，“从一个方面来讲，你在中国传教时，选择的是我们的救世主向我们这个世界传播爱心的相同之路。他也先救死扶伤，向传播福音的对象表明，他是他们的充满同情心的朋友。”很难说伯驾欣赏这种比喻，因为他常常为自己的宗教性不足而苦恼。伯驾是位勇敢的医学实验家，他1847年给中国引进麻醉剂，足见其远见卓识。他在庆祝50周岁生日时不无骄傲地宣布：他经管的医院共收治52500名中国人，他向更多的中国病人传播了救世主的福音。而那一天，他刚刚从一次多人罹难的沉船事件中死里逃生。平心而论，他本人并不满意这种传播福音的方式，他无非是向病人散发了一些讲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安慰了病人几句而已。

美国新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任命的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指定伯驾陪他去北京要求修改条约。谈判毫无结果，伯

驾精疲力竭，不得不到澳门去休假。他回想起 20 年前初来中国的情形：“啊，那时我精力多充沛，满怀希望。现在我多象强弩之末，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除了重新充气，安心疗养，我才可能重新恢复我想要的那种精力。我怀疑我已走到尽头。”1855 年他辞职回美。但美国仍需他服务。在皮尔斯总统的恳请下，他于 1856 年再度赴华，接任美国公使。他的具体任务是：为使美国外交代表能居住北京，“为无限制地扩展我们的贸易”向北京施加压力。伯驾的个人目标更是宏大：促使清廷“修改传统政策，组建一个能适应普遍要求、并与 19 世纪的进步合拍的政府。”这样，“当前的起义才会不战自败，才能建立与这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帝国的更广泛的社会、商业和政治友好关系。”伯驾急于想同英国、法国建立“三国联盟”，造成对中国的有效高压。谁知英国外交官包令爵士称伯驾的计划“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竭尽阻挠破坏之能事。他向英国外交部报告道：“我预见他会失败。他提议采取的措施，对推进共同目标毫无益处。”

伯驾未获支持。他的不妥协态度又招来更多人反目成仇。他的美国外交同事认为他太自负，还时常摇摆。中国官员说他“狡猾”，“易招人怨”，“冥顽不灵”。中国皇帝也说他“令人费解”。法国代办笔下的伯驾，则是如此形容：“块头高大、年约五十、步履沉重、身材肥胖、面容一般、思维敏捷、难以捉摸。”

挫折和孤立加深了伯驾对中国人的怨气。他写道：“中

国人逃避责任，谎报事实，臆测条约义务。这是多年来他们的钦差大臣办事的特点。”他敦促美国政府占据台湾，以便与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基地保持平衡。“美国政府应看到，由野蛮人占领的台湾，特别是台湾的东南地区，对于人道、文明、航行和商业利益息息相关，美国不应在行动上畏首畏脚。”他的态度引起了美国总统皮尔斯的关切，1857年4月将他召回。伯驾此后在美赋闲30年，1888年去世，终年84岁。那一年恰是“中国医学传教会”50岁生日。这个团体所属的各家医院，50年共治大约一百万中国病人。它的伟大业绩未被抹杀，它还培训了大批中国医生。也就在这个期间，英法与中国打了两仗，要求中国交出海岸线和内陆河道，结果激起了中国人掀起若干次排外浪潮。

1837年伯驾刚来中国时，曾批评过耶稣会先辈的失策和缺点，“如果先介绍纯正的基督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亲爱的救世主的福音，不但会广泛流传于中国和日本，还将得到整个东方世界的欢迎。然而眼下，我们不得不先消除对十字架的浓厚成见和彻底的敌意，方能使东方人聆听天堂使者带来的福音。”这无疑是个苛严的判断，同时又显得过余简单。跟耶稣会教士一样，伯驾必须明了，那怕用最精确的方式计算，也不一定在中国求出令人希望的结果。他虽然长期行医，认真攻读汉语，试图让中国“通过上帝的荣光”获得自由，到头来还是为自己的技术所限制，遭到他本意施爱的人民的绵无尽头的怨恨。

第三章

用武力闯开中国大门

并非每一位援华西方顾问，都出自宗教的冲动。有的人纯属偏爱旅行，喜欢寻求刺激。他们是一群冒险家，想看看世界究竟会给他们馈赠何物。弗里德里克·汤森·华尔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于1831年11月29日，诞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

当时，塞勒姆的环境不利于投机生涯。“那时的码头，”一位华尔的同代人回忆道，“为出售船用杂货的商人所把持，仓库、结帐房、帆篷制造商的作坊比比皆是。帆篷修补工的手掌中套着巨大的顶针，整个工场充满柏油和帆布的臭气。“古老的码头以及存放船帆的统楼层，是我儿时最好的游戏场所。我最大的快乐还在于允许我去码头观看装货卸船。举眼望去，船来帆去，好不热闹。”

孩提时代的华尔异常调皮捣蛋，到了十几岁也无一时

安静。他报考西点军校名落孙山，便私自离家参加墨西哥内战。15岁那年，他的父亲管束不住他，只好放他去“罕密尔顿”号船当二副。这条船的船长是他家的亲戚，航行的目的地是中国。

1847年秋，华尔从中国返回，考入设在弗芒特的那所军校。就是在这所军校，他学到了今后将用于实践的书本军事知识。但在那时，他家境贫寒，无力供他至毕业。1848年，华尔再次出海，升为大副。从1849年至1858年间，他在世界各地漂泊，八方寻求财富与冒险。正如他后来对驻华美国公使蒲安臣说的那样，他“出海时还是孩子，接着当大副，然后成为德克萨斯州的森林看护官，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者，墨西哥军队的教官，还与沃克尔（一道在中美洲作战）——为此美国政府视我为亡命之徒——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出生入死（当时在法军中任职）。”尽管这一自述既未按时间顺序，又不很准确，但毕竟说明华尔对他的所作所为，很少因道德原则而有所反悔，更不是为某种事业奋力拼搏。

经过10年流荡，华尔回到故乡，试图过一阵规规矩矩的生活。他在其父的纽约办公室内工作，担任船运中间商。然而他很快就嫌这些生意单调无味，再次出海航向中国，于1859年秋抵达上海。这一次，展现在他眼前的中国一派动荡，太平天国起义震撼朝野。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南方的广东和广西，从苗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客家人中招兵买马。秘密社团的人，包括被

保卫通商口岸的英国巡逻艇赶上岸的海盗，也投奔太平天国。广大贫困农民和矿工，还有在水上漂泊无定的船民，更是揭竿而起。参加太平军的，还有一些因鸦片生意失业而从广东转移到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人。由于清廷官员的无能和疏忽，给了起义者迅速壮大的机会。及至1850年，太平军人数猛增至3万。两年后，起义军向北进发，一路上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民加入造反洪流。太平军打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胜仗，很快攻下南京，北京政府惶惶不可终日。

在华尔抵达上海的日子，太平军主要在长江流域一带活动，清廷调集大批军队实行围攻。这支起义军，极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造反者，可谓中国历史的新现象。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从清教徒的小册子中学到了许多基督教教义，他生发出一种神秘的印象，觉得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建立“太平天国”，让人民认识真正的上帝。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洪秀全的军队表现了无比的忠诚，执行着铁一般的纪律。他们一路征伐，顺者昌，逆者亡。洪秀全的追随者都必须服从他的宗教旨意，这些旨意，实则是基督教十戒的翻版。男女必须分居，鸦片断断不能服食。分田分地，剩

余归公。他们实行文官招考制度，只是不考儒学，而考新教。

西方的观察家，一开始便为这支起义军具有的基督色彩所吸引，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太平天国推翻清朝，并非坏事一桩。1853年，一位英国新教徒指出：“基督教思想将在中国不受阻碍得到传播，偶像崇拜将被打倒，鸦片将被禁止，最后，中国将向我们的商业、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好奇，以及我们的文明影响敞开大门。”有位天主教传教士，尽管发现太平教的教义无非是“浓厚宗教色彩的狂热言辞，充其量是对别人传达的宗教的全盘接受，”但仍认为起义者“在为民族复仇”。他指出，“起义者对我很尊敬。”他国内的许多人，对此抱有同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指出：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国家的战争，这是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①

为了遏制太平军，清朝政府不再限制扩充地方军队。这些军队受中原地区势力强大的官员控制。士兵通常由农民

^① 译文引自《波斯和中国》，马恩全集第12卷第232页——译注。

充任，带有极强的区域联盟性质，只忠于自己的上司。这些部队不同于清廷官军，他们训练有素，如果他们的军官善于敛财，这些部队的薪俸还相当高。将领们擅自征税，不上缴中央财政。为了苟延残喘，清廷不得不给这些将领极大的权力。朝廷面临着不止一个危险。北部和西部的起义方兴未艾，西方列强又趁火打劫，先要求执行南京条约，次要求扩大条约给西方的特权。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促成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第二次中西之战。1860年，在一位英国代表被拘禁，一些随员被杀后，联军攻占了北京。额尔金勋爵下令焚毁颐和园，这座宫殿的部分建筑是由耶稣会教士设计的。清廷皇帝仓皇出逃。内忧外患交迫，清廷倒台似乎已成定局。

在纽约的办公室闷得要死的华尔，于1859年回到战乱纷纷的中国。中国是他梦寐以求的乐园，能给年轻冒险家带来极大的机会。当时，华尔年仅27岁，“他思维敏捷，易于激动，性情活泼。一头长发披肩，活像一个印地安人。”处在中国人当中，他的模样一定显得滑稽可笑。他毫不拖延地寻找雇主，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在长江中一艘从事地方贸易的轮船上当大副。1860年春，太平军逼近上海，他来到美国制造的炮舰“孔子”号当军官。这艘船由英国人郭富指挥，它是上海的商人们为应急面用大小船只构成的舰队之一艘。这支舰队规模可观。这些商人推举出来专与

中央政府打交道的代言人是“泰记”洋行^①，业主是一个富甲天下的中国银行家。

华尔决心利用当时形势。1860年5月，他向“泰记”献了如下计策：“财产与生命受到威胁的上海商人，应组织一支对抗太平天国的私家军队”，他愿担任这支军队的统帅。经过协商，“泰记”同意了这个新奇大胆的计划。根据合同，华尔招募的士兵，每月由中国商人付100美元，军官600美元作为薪水。凡打下一座城市，华尔的军队可得45000美元至133000美元的赏金，具体数额按城市的大小而定。此外，商人们还同意给这支军队提供粮食和购买武器的资金。

在部队组建之初，华尔只让中国人当向导和翻译，他打算从另外的地方添兵雇将。这一决定，得到了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的赞赏。这些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胆小，人格低人一等。一位驻扎在香港的年轻英国军官就这样说：“恐怕我们太欺负他们了。当你在大街行走，迎面有中国人挡道，习惯的做法是一掌扇掉他的帽子，不然就用伞尖戳他的肋骨。我认为这洋做是一种耻辱，还规劝过同行的伙计，他就是这样对待一位可怜的中国乞丐的。但他对我说，如果你谦让他们，他们就狂妄自大，有意冲着你来。”“法国兵收拾中国人比我们更狠。”西方人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在战场上一个人可以抵挡10~15名中国兵。至今，西方还

^① “泰记”洋行为杨坊所开，以贩卖鸦片致富。杨坊后任上海候补道——译注。

有人持这种看法。不过，华尔很快就明白事情并非如此。

华尔选择了两名中尉：法恩尔德（此人在中美作战时，便追随华尔）和白齐文（他是南方人，与华尔一样，以加速帆船的大副身份来到中国）。紧接着，华尔开始在上海的水面搜罗兵员。当时，码头上每天停泊着大约 300 艘外国船，要把失业水手、海军逃兵勾引进这支高薪俸的私家军队轻而易举。这支成份复杂的 200 人的军队经过 3 周训练，便开去攻打上海以南 30 英里处的松江。松江城墙环抱，被太平军占据。由于没有大炮轰开城墙，华尔决定用突袭战术。然而，正如华尔后来叙述的那样，进攻前，他的士兵喝了一夜的酒，“人声喧哗”，太平军早已察觉，给了他们迎头痛击。华尔仓皇败退，弃尸遍野。在中国建立自己军队的第一次尝试，在一片混乱中葬送殆尽。

华尔并不胆怯气馁，他很快回到上海，顶着外国人圈子发出的阵阵嘲笑，再次招兵买马。这一次，他的行动表现得相当有理性。他首先准许温森特·马坎纳亚入伍。这位年轻的菲律宾士兵，腰缠万贯，一抛万金，在上海码头上，颇得众多马尼拉人的拥戴。马坎纳亚能给华尔招集大约 200 名追随者入伍。为训练这批人，华尔征募了 6 名西方教官（多为英国海军逃兵），还添置了大炮。1860 年 6 月中旬，华尔率队又回到松江城墙下。在准确的炮火支援下，经过与太平军的激烈肉搏，松江终于被克。

攻下松江所获的令人眩目的巨额奖金，加上这支部队极可能提供劫掠财富的机会，使得上海地面的无业游民趋

之若鹜。华尔的队伍一下壮大，他的信心也百倍高涨。他决定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较大城市青浦。然而华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他在青浦遇到了装备精良的、隐身于坚固城墙后的太平军的猛烈抵抗。这支部队由一位欧洲的雇佣兵指挥，此人即是前英军中尉萨维奇。华尔的部队被对方的两次进攻打得丢盔弃甲，华尔本人身负重伤。他丢掉了大炮、炮艇、以及一列军火列车。这是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中遭到的最大失败。当他逃回上海重组军队时，遇到的全是敌意和臭骂。上海的《华北捷报》于1860年发文评论道：“第一条也是最好的一条消息是……华尔及其走卒们在青浦遭到惨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流氓给上海抹了黑。尽管此人未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命归黄泉，但其嘴巴、大腿和上身均受重伤。……他的臭皮囊脱了险，但那一群勇敢的黑人们则非死即伤。……不惩办华尔，已令人吃惊，但连一点惩办的暗示都没有，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华尔想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抱负，看起来寿终正寝。“泰记”再也不想支持他。英国海军司令詹姆士·何柏上将因华尔怂恿他的水兵开小差盛怒不已，在上海的外国人更是公开蔑视华尔。1861年5月19日，身边无一兵一卒、战伤尚未痊愈的华尔，被何柏上将以违犯不介入中国内战的中立宣言为由加以逮捕。在法庭上，华尔辩护说，清廷认为他是中立的。然而这是狡辩。何柏不予理睬，将他关在战舰“切萨斯比克”号上。1861年6月，《华北捷报》载文说：“（华尔的）军队已被解散，有的士兵被中国人斩首，

有的阵亡，有的则因违反我们的法律而被拘禁。也有人被开释。获释者宣称，他们再也不愿被招募进臭名昭著的中国外籍兵团，争取非法收入。”

然而，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对华尔表现的憎恶，并不能改变他们存在的实质。西方列强与华尔一样都是“冒险家”。他们乘船而来，靠玩弄阴谋诡计和高压手段，在中国沿海地区获得租界。他们的外交官和军事代表具有采取行动的巨大自由，因为从国内政府接收指示要花很长时间。他们经常为自己谋私利。即便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动，也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并不忠心于清廷，相反，如果中国的那一个集团给他们好处更大，他们就与这个集团勾搭。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不停的摩擦，使得西方列强在 30 年内就与清廷打了两仗。按照他们的说法，清朝政府“给了他们足够的钱”，但是，如果太平天国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从镇压转为支持。此外，早些时候的传教士对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性质”的描述，在许多西方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关他们军队的严密纪律以及维护秩序（秩序是开展贸易的必要条件）的正而报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公众舆论。

1859 年，太平天国的新领袖洪仁轩来到前线，这件事使西方人颇受鼓舞。洪仁轩试图使太平教接近传统的新教原则，与西方列强重建关系。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打算在太平军控制的地区引进铁路、邮局、银行和保险公司。可惜他在太平天国的权力斗争中失势。

1860年，太平天国的增援部队逼近上海，上海周围地区陷入混乱。鸦片贸易遭到禁止。西方舆论逐渐开始转向。这个变化，与1860年的天津条约得到批准并无直接联系。这个条约赋予了西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的权力，准许他们在长江沿线进行贸易（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控制）。有了这些权力，西方人逐渐觉得，阻止他们扩张，威胁西方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其实是太平天国。西方在中国内战时宣布的所谓“中立”政策，缓慢然而必然地变成了积极的、有利于清廷的“中立”。此时，清政府反倒不愿意合作。“朝廷不与夷人结盟，恐发逆就会与之勾结，流弊滋多”。新任内阁总理大臣恭亲王说。

关在“切萨斯比克”号军舰上的华尔，此时意识到了政策变化，他拼尽全力逃跑——他在半夜从舷窗跳入一艘接应小船，大叫“有人落水了！”——然后悄然溜走。他的唯一生路是躲进他在松江的残兵败卒的军营。1861年夏末，海军司令何柏，亲访太平天国营垒，企图从那里获得保证上海安全的承诺。太平天国的将领严辞拒绝。何柏改变了主意，邀请华尔和他的同伴去“切萨斯比克”号军舰开会，要他们放手大干。会上，华尔向海军司令提出了一条新建议。他从战场死里逃生的经历，使他在太平军身上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威力。只要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中国人就是最可怕的战士。因此他说：“不宜再从逃兵中招募战士，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招募中国人上。用欧洲人当军官，把中国人送到欧洲武备学堂耐心培训。”这个

计划，在上海的外国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然而却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作为交换，海军司令暗示说：“松江还有一些英国逃兵被雇为教官。”在华尔被拘押期间，法恩尔德和白齐文仍把华尔的老部下紧紧捏在手心。

华尔培训中国新兵的工作进展顺利。这些新兵主要来自江苏。“训练时间虽短，然而他们很快掌握全部技术，都成了神枪手，而且懂得怎样维护保养英国滑膛枪和普鲁士来福枪。给士兵们下命令全用英语，中国人学起来也很顺当。他们完全熟悉了号音。在训练用炮的开初，他们还有些害怕，通过指点，他们进步神速。尽管未上阵，但大多数人堪称神枪手。……整个部队装备精良，军容整齐。他们穿的军装颇似法国轻步兵或英国锡克军人的华丽制服。”那些最有能耐的中国士兵，被任命为军士。马尼拉人也重振威风，华尔让他们担任他的私人卫队。到了秋天，这支新军旗开得胜。欣喜若狂的何柏上将立即向华尔表示，他将源源不断提供枪支、弹药和大炮。1861年冬，华尔的部队扩充至3千人。他拥有足够的炮火、后勤运输船，还得到活动区域内的英国当局的积极配合。

他以前在上海听到的谩骂，此时烟消云散。“沃克尔将军记忆中的那位在尼加拉瓜的粗野伙计，现已改换门庭。”一位支持太平军的西方人辛辣地写道，“他当上了一群盎格鲁——撒克逊强盗的雇佣头领，捧起了满清的饭碗。英国海军开小差的逃兵，本应严加惩处，以免祸种流传，涣散军心，突然间成了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司令、陆军将领和领

事们的座上客。华尔令人惊奇之处还在于他应发现自己存在的性质可疑，追求的目的卑劣，庇护与效法的对象可憎。毫无疑问，他开始对擅自向外国开战能被人承认和变成备受尊敬的明星得意洋洋，惊奇无比。”

1861年12月，太平军攻下通商口岸宁波，何柏司令决计采取强硬措施。他访问了起义者的首都南京，要求不得再发生进攻其它通商口岸的事件，由于他拒绝保证清军也不得把通商口岸作为军事基地，太平天国断然驳回了他的要求。1862年1月，太平军再度兵临上海城下，准备切断供给线，策动城内暴动。何柏下令英、法海军与华尔合作，对上海城外30英里宽的地方实行清剿。为了表明他彻底放弃英国的“中立”政策有理有据，何柏宣布说：“太平军不单是反对皇帝的暴乱分子，而且还践踏人间与神灵的全部法律。将他们从通商口岸驱逐完全正确。”就在这片地区，华尔训练的中国军人开始上阵作战，它通常配合英、法和清廷官军向太平军反攻。清廷嘉奖了华尔的军队，钦封“长胜军”。

机遇使华尔着力表现他的英勇，显示他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官。江苏巡抚李鸿章奏道：“华尔拱卫松、青，战功卓著，实为洋人之佼佼者。此夷酋至今留长发，亦不来臣府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

华尔在作战时行动极为随便。他“不穿军服，不佩军阶标志。他在战场上的衣着打扮，十分引人注目。他不是穿阿尔伯特王子赐赠的紧身便装军大衣，便是穿热带居民

的那种蓝哔叽热带紧身短上衣。”他经常出入前沿阵地。有人观察道：“我从未看见华尔手中握刀或武器，他常穿便服——有时披一件厚厚的斗篷，头戴宽边帽，手提手杖，口里叼一支吕宋方头雪茄烟。”他用手杖（实则为马鞭）的目的，在于消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的形象，尽管他好几次受伤。”

更重要的是，华尔除了抓紧训练士兵，还尤其注意在上海周围作战应采取的战术。这片地区地形特别复杂，当时，有一位英国记者这样描述道：

要捉住狡猾、凶残的胆小鬼（太平军）实在不可能。在这个迷宫似的三角洲地带，他们四处安插奸细，打探我们的军情。虽然他们距我们的部队仅几百码，却能从容施展诡计，然后平安地沿着河沟壕壑落荒而逃，我们怎么也追不上他们。这些暴民们精于此道，尤其当外国士兵追赶他们时，情况更惨。笨重的装备使士兵寸步难行。在稻田中用捕狐犬猎狗抓捕这些草寇，远比派兵去港叉密布的乡村捉拿乘坐快船的太平军更艰难。

华尔费尽心机购置火轮和浮舟，增强其部队的机动性，并试图以此控制水道。另外，通过认真训练他的中国士兵，大规模利用能到手的大炮，他克服了自己部队的不少不利因素。以后，华尔的继承者戈登，也仿效华尔，让火轮和大炮发挥了更大效益。

参战双方在战斗中表现出空前的残酷性。华尔的助手

法恩尔德回忆了太平军攻下青浦的那一役。他在那一战役中被俘。“我一下意识到太平军占了上风，正在很快地消灭我的士兵。我的一些军官的头颅被挑在太平军的长矛尖上。他们打起仗来心狠手毒，活象恶魔。转瞬之间，我们的人几乎全被消灭了。”当然，这座城市后来还是被官军重新夺回，他补充道，李鸿章“听说俘虏中有不少太平军高级军官，不由欣喜万分。他派松江道台来慰劳，授权我‘斩杀俘虏’。紧接着的场面令人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人被斩首，大街上血流成河。然而我的一些欧洲军官们仍然认为，对于狂热的起义者，惨无人道大有必要。”

一位英国人描述了另一场战斗情景。他说：“起义军撤出堡垒，混入大街。……斯图尔特和理查森中尉指挥的野战炮，用葡萄弹和霰弹向他们轰击，一时间血肉横飞，尸骨累累。太平军的撤退变成了溃逃。一支由海军陆战队和中国官军组成的部队切断了太平军退路，太平军至少900~1000人阵亡。……战斗结束，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外国军队班师回上海。”另一位《中国邮报》的记者，则以轻松的笔调展现了另一场战斗：“搏杀场面异常生动别致。炮火把部分城区点燃，曙光喜洋洋地洒泄满畝稻谷。法国军乐队吹奏军乐，鼓舞士兵攀爬城墙。”

华尔和他的军人，本已获得官方对他们作用的承认，仍然本性难改，他们是一群打劫专家。抢劫同时也是英、法包括清军的当务之急。有一家报纸披露了华尔“常胜军”参与的联合清剿的情形：

房屋遭到搜查，价值连城的珠宝、金银、现金乃至华丽服饰露布眼前。有人在一件上衣中发现了1600元钱，几个军人将其均分。他们还揣走了金手镯、金耳环以及其它缀有宝石珍珠的饰物。对每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一辉煌的劫掠时代。我们听说，有一群士兵找到了太平军的金库，内中有好几千块钱。这些人抢的东西太多，不得不扔掉一些，减轻口袋重量。他们的口袋可称为百宝箱。起义者的马匹也相当多，许多步兵骑着缴获的战马凯旋回营。

战场胜利使华尔声誉日隆。但他还是明白，在一年前要将他扫地出门的外国人社区中，他依然势单力薄。他只好以极快的速度，巩固他在中国人中的地位。1862年2月，江苏巡抚上奏道：“华尔向道台和美国公使表示，他希望归化为中国臣民，穿大清官服。”3月，华尔娶了上海金融家“泰记”杨坊之女张梅（音译）为妻。婚礼按中国习惯操办。华尔骑马，身穿清朝官袍。然而新郎新娘无法交谈。杨坊只懂得一点“洋泾浜英语”，其女则对英文一窍不通；华尔充其量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汉话，完全认不得汉字。

燕尔新婚，华尔不恋床第之欢，匆匆赶回战场。他的婚姻，不可能是爱情的必然产物，而是华尔希望更紧地靠拢中国人、直接得到岳父的财政支援的实际步骤。翁婿果然联袂做生意。1862年春，华尔与“泰记”已是两艘美制军舰的共同拥有者，他们还包租了另外几艘炮艇。……华尔俨然一付中国海军司令的架式，在河流港汊打击水盗。

通过做出一系列鲜明姿态，华尔有意把自己抵押给了中国人。他懂得，要证明自己对中国雇主的忠诚，只有尽最大力量将自己溶入中国的体制中。1862年3月17日，他和白齐文加入中国籍，赐官四品。华尔还被恩准佩戴翎顶。9天后，两人官拜三品。由于华尔在上海附近打了一连串胜仗，还被授予了副将之职，也就在此时，圣谕封他的军队为“长胜军”。1862年5月，清廷皇帝钦命李鸿章，应与“求功名、图利禄的华尔及其他人修好”，为达到这一点，“不妨随时小有赏赐。”

当上了中国将军的华尔，本已心满意足，而“小有赏赐”则包含着成为一个“富翁”的希望。但他获得的最有益、也是最重要、最有形的东西，莫过于他在中国人包括在华的外国人中间的声望。在中国方面，以江苏巡抚李鸿章为代表，人人都高估了他对外国人所能产生的影响。李鸿章说：“上海夷人均以华尔马首是瞻。该夷与臣交谊甚笃……。华尔作战骁勇，火器繁多。近来，臣鸿章竭力与敦和好，以洽众列强之友情。”

华尔并不具备完全控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权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他成了“中国人”，在外国人当中的地位却直线上升。到了1862年夏天，这个不安分的前大副、淘金者、雇佣兵，不仅能和中国高级官僚相处融洽，而且也与外国领事、商人、传教士结伴搭帮。他得到的这种承认，在那些从国内流亡出来的人的眼中，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同时，华尔还挥金如土，改善自己的形象。美国驻

华公使蒲安臣向林肯报告道：

华尔将军极其富有。他在可能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愿捐献一万两银子给美国政府，援助美利坚合众国。在我尚未来得及就这封充满拳拳爱国之心的信作出答复之前，他已阵亡了。请把他的这个未竟之志，记入他在祖国的档案。它足以证明，无论自我流放、外国服役、还是充满惊涛骇浪的生活，都无法熄灭这位共和国的海外赤子心中燃烧的爱国热情。

1862年夏，华尔已有3千人可供调遣，还装备了迫击炮和大炮。他的事业进入峰巅。他开始构思更宏大的计划，准备把部队扩充到2万5千人，还打算进攻苏州这个太平军扼守的重镇。1862年8月14日，他晋见李鸿章，请求攻打被清军围困了几年的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李鸿章为此呈报曾国藩：“华尔今日见我，力陈情愿助剿发逆，以克金陵。华尔称他3天可至前线，3天修筑堡垒，3天攻下逆都，应手奏捷。但金陵克后，城内财宝，拟与我平分秋色。”曾国藩时任南京前线总指挥，发明了用地方军队逐步困死起义军的战术。谁知1862年9月21日，在攻打宁波西北10英里远的慈溪时，站在前沿的华尔，忽然用手捂住肚腹，大叫一声：“我中弹了！”他当夜死去，按中国将军的全部礼仪厚葬。几天后，他的爱犬，“一只毛绒绒的黑白色相间的动物”，也相随而去，葬在他的坟墓之侧。

华尔阵亡时刚刚30岁。他趁混乱时世平步青云，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功名、聚敛财富。用西方方式训练中国军人

作战，他开风气之先。他为李鸿章统率的清军树立了楷模，使之看到不依赖外国和外国军队，只需依西法，就能增强中国，是完全可行的。他还帮官军廓清了原为太平军控制的上海外围 30 英里宽的地带，为他的后任戈登更有效地作战奠定了基础。不过，总的来看，他所保卫的城市，与其说有利于清廷，不如说服务于西方利益。他吃了不少败仗，太平军也很快打回了他“廓清”的区域。他实际上并未改变这场内战的进程。战事是由南京城里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决定的，全然不受外国顾问的左右。他甚至还来不及享受他的成功，便一命呜呼。

“可怜的华尔！”一位英国青年军官在访问松江后，写信给他的母亲道：“他按中国礼仪永葬异乡。他的坟墓高隆，墓穴成了他的总部。他初到中国时不过是船上的一名大副，美国的一名歹徒，死时竟成了百万富翁。他作战负伤次数太多，以致于人们觉得，他是一个打不死的家伙！”

× × × ×

就在上海的商贾们乞求华尔保卫他们的城池之时，由 41 艘战舰、143 艘运兵船和 16800 名英、法、锡克族以及印度士兵组成的讨伐军，正在北犯北京，强令执行“天津条约”，实现在中国首都常驻公使。中国人俘虏了大约 20 名侵略军士兵，处以极刑。额尔金勋爵于 1860 年 10 月，下令烧毁北京西北的清朝皇帝的富丽堂皇的夏宫。

时任英军工兵上尉的查尔斯·乔治·戈登，参与了毁灭这座拥有 200 座宫殿的皇家大建筑群。他给母亲写信道：

（我们）肆意抢劫一番，然后跑出宫殿，点燃了整座建筑。这一野蛮的、摧毁文明的行径所损坏的财宝，至少价值为百万英镑。在我们出来前，每人得到了超过 48 英镑的赏钱。尽管我得到的东西比大多数人少，但也称得上丰富多彩。

中国的百姓性情平和，十分讲礼，但公王贵族仇视我们。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宫殿，他们怎么会对我们抱好感？你很难想象我们烧毁的宫殿有多么壮丽雄伟。我们点火时，都不免为之心痛。龙楼凤阁鳞次栉比，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因此完全没有机会仔细搜索。不知有多少金饰被当作黄铜付之一炬。这个神奇之地足可令千军万马刹时瓦解，每个人都象疯子一样投入抢劫。

一个月后，疲惫万分的戈登，又给他的妹妹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奥古斯塔：我们都厌倦了北京。这座肮脏的城市已不复存在。我相信，如果有人穿过污秽的街道，他的热情一定会消失。”唯一的安慰似乎是，戈登是在 9 月末才到中国的，他“未赶上享乐好时光”，他的母亲不至为此焦虑。

他的母亲生了 5 个孩子，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她独独为这个老四操碎了心。戈登的母亲出身于捕鲸商家庭，1833 年 1 月 28 日生下戈登，遵照父母意愿，戈登很小就投

身军界，他有点不服管束，好象不断在招惹麻烦。在军校，他曾把一位资深的上校撞下楼梯，毕业前，他又用梳子猛接过一位士官生的头，结果失掉了象父亲和祖父一样进入皇家炮兵团服役的资格。1855年，工兵戈登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他刚愎自用，目无长官。打仗时过多的暴露身体，结果被敌军子弹击中。更坏的是，他似乎喜欢战争，不想解甲归田，他为和平来临口出怨言。“总起来说，我们不愿意在另一场战役未完成之前就考虑和平。我决不回英格兰，希望在国外再呆三、四年。我宁愿把生命献给战争，而非和平事业。战争使人感到难以言喻的激动。”

戈登选择了最佳途径。他先到比萨拉比亚帮助绘制边防图，接着于1857年去亚美尼亚从事同样工作。他钦佩那些蔑视他绘制的国境线的人。“我们在路上遇见一群库尔德人，他们全是无法无天之徒，随意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驰骋往返。他们潇洒英俊，武器精良，而且人越来越多。他们从不睡屋子，喜欢露天扎营盘。”1858年，戈登回到英格兰，他发现自己也迷上了帐篷。他简直不想“在英格兰定居，更不想谋求固定职业。”于是，他又在1858年年底，与一群盎格鲁——俄罗斯人重返高加索山区，为他们界定边防，平息争端。他承认对此项工作“自然不特别热心”。1859年，他报名加入集结于上海，强制执行天津条约的英军。1859年6月22日，戈登离英赴华服役。

戈登一到北京，就参与了夏宫浩劫。很快，天津条约得到认可，中国皇帝御驾回京。北京政府为一群乐意与西

方打交道的内阁阁员们把持。侵略军开始后撤。但是，为了确保清廷赔款和执行条约，一支由 3 千人组成的英军部队，由士迪佛立率领驻扎天津。戈登被任命为工兵指挥，负责为军队修建营房、马厩，测量周围地形。他为此干了 8 个月。

虽然年轻的戈登上尉此时未曾领略战争的“不可言喻的激情”，但是他还是在海外的和平氛围中尝到了“难以言喻的快乐”。他在 1861 年 10 月给妹妹奥古斯塔的信中说：“我一点也不打算回到英国，这个计划别四处张扬。我热爱祖国，喜欢工作，喜欢自主。但是，我们在英国地位卑下，在中国却权高位重。这儿的气候条件也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坏。”此外，他还能在中国北方游览，经常踏上西方人未曾涉足之地。他告诉他的妹妹，“如果近期内我有时间，我就要去长城。我会仔细地描述它，还打算送你一块长城砖。”戈登就这样在天津而非泰晤士河，等待时来运转。他经常把一箱箱黑貂皮、花瓶、玉器、瓷器等贵重物品寄回家，分别写上“A 送父亲、B、C 和 D 在‘戈登’部落平均分配，E 和 F 送父亲，G 送艾米姨……P、Q 和 R 送母亲……Y 送亨利……”。

1862 年春天，戈登出差去上海。当时，上海的英军正遵循海军司令何柏之命，把太平军赶出上海周围 30 英里远的地方。据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此人是戈登的哥哥亨利的姻兄）的说法，“戈登上尉对我极其有用。……他侦察敌军阵地，指挥梯队跨越护城河，帮助巩固防御工事。我们需

要攻打的城池，座座壁垒森严，城墙坚实，护城沟壕宽深。没有他的协助，我们显然一事无成。不过，我经常为他提心吊胆，他在接近敌军阵地侦察情况时，往往不顾危险。”

1862年12月，戈登升为少校。他接受了测量整个30英里辐射地带的任务，为执行联合反攻作准备。把这项任务交给视工作为愉快的戈登十分恰当。他干得非常出色。经常带领助手，深入敌军防区。不到3个月，他便大功告成。他在这一年间历尽艰险，因而对太平军有所认识，他还对联合进攻太平军的那个战场的困难条件了如指掌。“那一天，太平军的小股武装偷袭了我们，他们逼近我们的驻地，烧毁了一些房屋，赶走了几千居民。我们实施反击，所获不大。他们轻易地打败我们，还占领了一些地盘。这个地区阡陌交错，沟溪纵横。”戈登看到了太平军的“残暴”，相比之下仿佛烧毁颐和园也是“善行”一桩。“这种局面令人沮丧。我国政府的确应该弹压造反。太平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擢发难数，更不用说他们已把这个富饶的省份搞得百业凋蔽、满目疮痍。”

与此同时，戈登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满族统治阶级的基本特点，也象其他欧洲人一样，持极端蔑视态度。

“长毛（太平军）令人发笑，”戈登评论道，“一打他们就跑。他们生性残忍，还建立了一套把小孩子培训成造反者的制度。……有个逃跑的小长毛掉进沟里，被我救起，谁知他的回报是用脏手把我的衣服涂满污泥。”如果说他瞧不起太平军，那么他对清廷更是不屑一顾，连这个国家也不

放在眼里。“我从不把我耳闻目睹的东西写下来，这一切太无意义。中国的一切都没劲，只需观察一个村庄，就可以认清整个国家。”当然，比较起他在比萨拉比亚和亚美尼亚看见的那些人，这儿的人民显得分外可怜。在亚美尼亚，他打交道的对象是库尔德人，而眼前则是中国农民。“你可用任何语言咒骂中国统治者，你却无法否认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安静、最勤劳的人。”

戈登的个人生活非常严谨，甚至可以说孤单。他在同辈人和女性面前显得拘促不安。“他在上海期间一直与我住在一起，他是个有教养的大方的家伙。”英国领事巴夏礼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戈登，“但是，他又是一个相当独特、敏感的人——性急冲动——精力充沛，确是一块好料。……我们常常见面，由于他很怕羞，我只好学会默默用餐，独自述说中国事态。”戈登的性格阻止了他与上下级融洽相处（或许他后来对手下的中国人要好些，他无法用汉语与之沟通）。由于他来中国的动机十分矛盾，因而不懂得自我怀疑，从而免受其苦。他交友反复无常，观点变化多端，思想前后相悖。他后来给妹妹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座大监牢，狱卒凶狠，典狱长严厉。我们孤苦伶仃地独守空牢，眼巴巴地盼望释放。”只有在非英国的领地，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才部分地获得自由。

“事实是，”几年后，他从苏丹返回，评论道，“如果有人分析人类光荣业绩，那么我说百分之百都是废话，或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然而他却在中国等待他通常只会

鄙视的光荣，1863年3月，他的机会终于来临。

自从华尔半年前在宁波附近阵亡后，“常胜军”气势江河日下。李鸿章在英、法和美国官员的督促下，任命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执掌“常胜军”帅印。白齐文在许多方面与华尔相似，也是冒险家，来中国时刚好也是大副。白齐文作战勇敢，几次负伤。他野心勃勃，企图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同的是，华尔自觉地接近中国人，而白齐文却不这样做。戈登认为他“言过其实”，仅在某一阶层内有号召力。此人“仗义疏财”，只要有东西，总与朋友共享。但他缺乏管理和打仗才能。他因伤口疼痛等原因，常常乱发脾气，凡与他意见相左者，都不免提心吊胆。他对自己的尊严极其敏感。

驻节上海的李鸿章，担心白齐文会在“常胜军”的美国人中间培植党羽，给清廷造成比太平军更大的危险，便攻击白齐文“狡诈多端，刚愎自用”。他说，吴、杨二位道台称白齐文不象华尔那样易于相处。李鸿章力主解散“常胜军”，但又害怕军官们叛逃太平军。上海的外国人都坚持保留“常胜军”拱卫上海。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决计用一位英国军官替换白齐文，条件是此人必须忠于清廷，并能督促军官们尽职尽责。李鸿章下令白齐文率队撤离松江基地，辅佐进攻南京，同时，他还命令“泰记”杨坊停发“常胜军”的饷银。白齐文梗命犒事，拒不移兵。“1月14日的上午9~11点，……他率领几十名滑膛枪手潜入上海，偷袭杨坊府第。杨坊的额头、鼻子和胸膛多处中弹，大口

吐血。4万块银元被强行抢走。”

李鸿章以此事件为借口，撤了白齐文的职，转而倚重英国人。事前，英国政府已表态支持清廷，他们的驻北京公使布鲁斯和驻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同意派英国军官接管“常胜军”，与官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和士迪佛立达成协议，主要三点为：

“常胜军”由英国军官和中国军官各一名共同节制。……英国军官应加入官军，暂定奥伦上尉为最高指挥。一旦戈登上尉拥有必要权力，立即接管指挥权。戈登上尉应被擢升镇台（相当于准将）。至于上海30英里范围外的清剿问题，有必要保持（英、法）以前的那种统一行动。清廷官军负责纠察、军需和军粮供应。如果海关收入出现逆差，则部队兵员应减少至3000人，甚至低于这个数目。……全军官兵均受制于抚台（李鸿章），并由他负责购置军火。

这种安排使双方都有利可图。李鸿章成功地撤换了独立不羁的军事冒险家白齐文。此人握有重兵，但对皇帝的忠诚却大值怀疑。李鸿章控制了这支部队的粮饷，英国官方保证这支部队受他指挥。此外，李鸿章还从这支部队精减了1500余人，然而它毕竟被允准继续存在，英国人终于放了心，他们在上海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不受侵犯。

1863年1月15日，奥伦上尉正式接管部队。但他指挥进攻太仓的第一仗竟以惨败而告终。情报有误，侦察不准，战术不当，撤退无方。是役190人阵亡，174人受伤，丢弃

了无数枪支大炮。部队退回松江解散，等待新司令走马上任。

1863年3月，完成了测量任务的戈登荣任“常胜军”总指挥。他在赴松江上任的前一天，受宠若惊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很担心你不喜欢我指挥松江部队和变成一个清朝官员。……我敢断言，要是我不任“常胜军”指挥，这支部队将各自星散。太平天国的叛乱当继续为患多年。……你别为这件事发愁，我做的是正经事。……我把你的照片时刻放在面前，请你和父亲放心，我决不鲁莽从事。一旦时机成熟，一旦胜利在望，我就解甲归乡。”无论戈登向母亲讲了多少含糊不清的话，他对自己的选择是非常满意的，他决不想马上打道回英国。

作为一名正规英军军官，他接手的队伍却无一点值得夸耀之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一伙人。”戈登在给一位军界朋友的信中大肆抱怨。尽管“常胜军”中的西方军官“作战英勇，视死如归，适应性强，行为可靠……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军营中又极爱胡闹，不守规矩，区区小事就可以老拳相向，大打出手。他们在上海爱叛乱支持者的气，加之国籍不同，半数以上的人养成了大吵大闹的习惯。当然，这对指挥官来讲，却是好事一桩。”这些军官统率的中国士兵，却不象他们的上司那样做事不顾后果。“我可以这样说，”戈登评论道，“由于这些军官的收入颇丰，想用低薪招募兵将已完全行不通，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我所见到的最危险的营生。他们老想上战场，总怀疑他们的手下人

不可靠”。1863年3月25日，戈登到达松江时，部队因太仓惨败而士气低下。军官们要求白齐文重返部队。他们还担心，队伍由正规英国军官管理，他们的日子将不好过。“常胜军”处于哗变边缘。

戈登未敢须臾耽搁，他向军官们宣布：无需担心清洗或任何可能损害他们前途的事发生。3月31日，戈登率队伍与太平军作战。从军事技能上讲，戈登无愧为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最佳选择。及至5月底，他已拿下好几个据点，连太仓也攻陷了。他的部队在昆山城下安营扎寨。

戈登依靠训练，做到了华尔靠直觉、靠经验做到的事。在昆山，戈登这样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

山头孤立，城墙围合，沟壕幽深。东门守卫森严。站在山头，可将我军兵力布置一览无遗，然后电告（太平军）指挥部。决定围城。北方的常熟已落入我手。太平军仅有一条路后撤至24英里外的苏州。5月30日侦察四周地形，发觉此退路可从正仪切断。此地距昆山8英里，距苏州16英里。若欲夺取太平军重兵把守的昆山，必须占领这个交通要地。方法是在太平军占领区迂回行进20英里，然后突袭。火轮极有用处。

戈登按照上述计划，攻下昆山，大肆追杀溃退的太平军。他总结道：“熟悉地形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地形。……太平军对火轮异常害怕，它一鸣叫，太平军士兵都惊呆了。”有人讲戈登用兵比华尔更精，其实他依然遵照华尔的路数。他重视火轮在三角洲地带的作用，大

架浮桥，不吝炮击。戈登甚至模仿华尔的战场风格。“戈登总是身先士卒，带队冲锋，他手上不握枪，只在衬衣里藏一把左轮。除了有一次用它对付叛兵，他没有在战场上用过这支枪。他手中捏着的是藤条，他的士兵们称此为‘胜利魔杖’”。

戈登深得李鸿章的欢心。“自戈登持掌帅印以来，”李鸿章向曾国藩禀报，“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尤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那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很快，李鸿章的夸奖暴露出溢美之嫌。“英官兵众口一词，谓戈登谋勇善战，为上海诸夷兵将最为妥慎可靠者。有人以为过誉，查自戈登督带以来，一扫昔日洋勇骄慢之习。该洋将剿逆之志弥坚。”在李鸿章看来，戈登的最大功绩是使“常胜军”有事可做，对朝廷忠心不二。当然，他对戈登取得的军事胜利也万分高兴。这些胜利大大地支持了曾国藩对南京的合围。

然而李鸿章未免把话说过头了。如果说戈登在军事策略上承袭了华尔那一套，那么他在对待部下时却另辟蹊径。华尔以及后来的白齐文都不愿意处分下属军官，他们毕竟是一群不同于正规军的冒险家。在收获季节，“常胜军”甚至允许华勇回乡帮忙。中、外方的指挥官，对军官们将抢劫当作弥补工资不足的行为撒手不管。但戈登却对这种行为感到吃惊，明令禁止（当然要求李鸿章从此按期发放饷银）。作战酗酒者斩首，贩卖鸦片，出售枪支者严惩。无论哪一级官佐，都必须参加训练。此外，为了表明他不同意

有些军官的做法，戈登吃住自理。他决意将这支部队训练成正规军。

戈登的计划很快遇到阻力。太仓得手后，军官们纷纷要求回到松江挥霍“赏钱”，然后再上前线。戈登屈服了。谁知一回到松江，他又面临新的哗变威胁。戈登述说道：“我的下属在战场上令人放心，但在闲时却百无禁忌，目无法纪。”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戈登移师昆山，在那里建立了新基地，与松江割断联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在昆山建立基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他们。在松江做不到这一点。有人煽动兵变。我在西门的一块墓碑前枪决了他，弹孔仍然留在碑碣上。还有人开小差，3900人的队伍只剩下1700人，军心涣散。华尔宠坏了他们。我决定从太平军的俘虏中招募新兵。他们的素质要优良得多。”

内部动荡已使戈登苦恼不已，他还得罪了作为上级的清廷官员。昆山打下后，戈登与一位清将大吵一架，这位将军的任务是率队支援“常胜军”。开小差屡禁不绝，中国人当面作对，上海的报纸又大肆攻讦戈登在昆山屠城，戈登内外交困，只好于1863年7月向李鸿章写信诉苦道：“阁下：每月薪俸，均难领取，大英帝国女王陛下政府支付租船费及其它军用物质之款项亦在未定之谱，目前处境实在有辱我作为英国军人之声誉。我不愿卑躬曲节，哀求阁下恩准维持部队生存之必要物质。鉴于此，我乐意交出帅印。”李鸿章赶紧下令“行赏”，然而戈登拒绝接受。

戈登无所适从。他不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再打一

仗”，只能意味着英国的“名誉”扫地。种种迹象表明白齐文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此人被革职后，跑到北京，在美国公使的帮助下，清政府又再度任命他为“常胜军”管带。他于4月份重新露面，李鸿章为此写道：“白齐文从京都返回上海，踌躇满志。胁迫我委他重任，我重拂其意，乘呈恭亲王详情。皇上和大清法度威加四海，明察秋毫，何以连辨别奸忠亦模棱两可，不予直言？戈登才是夷邦将兵之佼佼者，纵然无法革除‘常胜军’之诸种恶行，终未使情势百弊丛生。”8月初，万念俱灰的白齐文带了300名欧洲人投奔了太平军。这个人数，恰好等于华尔当年在上海滨水区募得的“常胜军”的首批洋勇人数。戈登担心他的部队也全随之散伙，赶紧开仗。

进攻苏州拉开序幕。戈登的“常胜军”会同大批官军投入战斗。苏州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城市，太平军重兵把守。先前在上海周围进行的一系列战役，目标都是针对夺取苏州。李鸿章再次与戈登达成和解。他谨慎地评述道：

“常胜军”之洋将华勇均难委以攻防重托，所依仗者无非英夷贷租戈登之大小榴炮及火药。为臣乐意与英夷官员修好关系，以弥补中国之不足。戈登参战自觉，迫成最后取胜，不会滋生事端。倘若惹事生非，为臣势必严加约束。

与此同时，在苏州的白齐文，发觉他很难在太平军中取得曾在清朝军队中拥有的势力。太平军方面也觉得，白齐文既不能提供西方军事装备，又无法拖来欧人组成的战

斗力强的军队，于是白齐文向戈登投降。1864年他再次倒戈太平军。白齐文的前任华尔来中国的动机与之相似，生前声名显赫，死时以大礼厚葬于孔庙附近，而白齐文却被断送在清军手上。他是在官军送他过河时“失足淹死”的。

在谈判白齐文投降事宜期间，戈登写道：“白齐文（在苏州）很安全，对方待他也不错。我想尽办法拉他出来。再则，如果我能找别人代替我，我也不想干了。我的目的已达到——就是说，我已向疑信参半的公众表明，有一群英国军官，指挥作战跟大副开船一样娴熟，也能把上海周围的海盗收拾干净。为了挣名声，我什么都可以置之不顾。”

这就清楚地表明，戈登兵临苏州城下，“常胜军”准备攻城时，也是戈登接近于递交辞呈之日。欧洲驻华记者（即戈登指的“公众”）经常对英国军官在中国人手下当兵表示质疑，戈登为此颇受刺激，这加深了他对清廷的不满。“我在这个国家的4年经历使我看到，双方都一样腐败。”他于1863年10月从苏州发出的信中说，“不过也得承认，与太平军站在一起，多少还有点新鲜感，是对毫无意义的、被人盲目崇拜的满清世俗的蔑视。虽然3个月的仔细观察，使我亲眼看见了太平天国的诸多不足，但朝廷方面更未表现出他们的任何长处。叛乱的中国人无一例外英勇无畏，义胆侠肝。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丰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苏州城下的战斗异常激烈，守城的太平军共有4万人。

1863年11月27日，戈登再次失利。然而城池终于还是在12月5日被攻下。原因在于太平军领导人之间意见不合，一批将领趁机向清廷投降。戈登不同意他的军队掳掠这座富饶的城市，决意撤回昆山。与此同时，李鸿章却根据清廷惯例下令处决太平军俘虏和降将。作为英国军官的戈登则认为，这些人的性命安全应予保证。在一封未发出的几近歇斯底里的信中，戈登叫道：“李（鸿章）应立即辞去江苏巡抚之职，交出关防。……如若不然，戈登将进攻官军，夺回‘常胜军’攻占的全部地方送给太平军。”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荒谬侵犯，然而戈登由于太激动，几乎未考虑他的言论是否合适。当李鸿章的西方秘书哈立德·马格里博士进入戈登的住所时，他看见戈登正在哭泣。他们还未讲一句话，戈登躬下身于，从床架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叫道：

“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中透进的光线太幽暗。”马格里起初完全没有认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戈登再次大声说道：

“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戈登说完，放声大哭。

大发一通火后，戈登仍不解恨。他把部队撤回昆山，打算不卷入任何进攻太平军的战斗。他的部下也与他持相似立场。从合法性讲，尽管戈登辞去了“常胜军”管带之职，不再对部队拥有指挥权。可是这支军队因受这个“右倾”的英国军官影响，比由以往的雇佣军首领统帅，更成心腹之

患。清廷决定，抚慰这伙“夷人”。1月4日，一位中国官员驾临昆山宣读圣旨，还带来一份厚礼，嘉奖戈登在进攻苏州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戈登拒不收礼，包括皇帝赏赐的1万两白银和李鸿章送来的缴获的太平军军旗。戈登在圣旨的背面写下了答词：“戈登少校虽肝脑涂地，亦难报答皇帝陛下之奖赏。鉴于夺取苏州后发生的不幸事件，戈登少校遗憾地表示，他对皇帝陛下的褒扬受之有愧。恭请陛下接受臣仆良好祝愿，恩准辞不收礼。”这无疑是对中国人的最大侮辱。

李鸿章既对戈登的做法茫然不解，又担心驻扎昆山的这支雇佣军犯上作乱。一时间力穷计拙。早在1863年12月27日，他就的一份奏章中建议：“臣奏请总理衙门和英夷公使就戈登退役达成协议。酌拟‘常胜军’中百余名外邦军官退伍，或准臣挑选合适之人行管带之职。”

然而戈登与英国官方，对于谁担任“常胜军”的统帅再次犹豫不决。屯结昆山无所动作的部队，又面临哗变可能。高级军官们为争夺指挥权发生争吵。两条道路摆在戈登面前：要么不顾英国人的面子重上战场，要么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从而结束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时光。戈登的英国上司，与李鸿章一样对戈登气愤不已。“我要求你务必冷静，千万不可干出任何蠢事。”布鲁斯在来信中警告说：“更重要的是，不能向报界公开你与中国当局的分歧。”他们敦促他再次出兵。戈登为了保全他“挣来的面子”，通过布鲁斯要求清政府训示李鸿章：“今后，凡有外邦军官参加的战斗，

应按外国普遍恪守的作战规矩行事。”满足要求后，戈登会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宣布对苏州事件负全部责任。戈登释然。几个月后，他用下述理由宣布重新活动：“在苏州处决（太平军）诸王的行为，背叛了人人赞同的信义。不过，抚台有众多理由为自己开脱，在清廷官员眼中，这件事并非不仁不义之举。我个人认为（我尚未聆听曾国藩的意见），李鸿章无疑是朝廷的栋梁，对自己的立场有正确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相当开明的。”

戈登心满意足了，李鸿章却不那么舒服。他看透了戈登，不再焦虑今后怎么办。“昨日，”李鸿章于1864年2月25日写道，“戈登跃跃请战，愿作前锋，攻打宜兴侧应郭松林诸将领。此人乃游击军官，不可视为正规将领……。此夷勇猛，然性躁急，易轻举。”3月底，即戈登重新上战场一个月左右，李鸿章又说：“一俟江南战事毕，‘常胜军’着即解散。戈登不会从中作梗。”实际上，战事并不顺利，“常胜军”接连吃了几个败仗。正如李鸿章于6月份说的那样，“戈登倍觉颓靡”。4月27日攻打常州，城墙虽已炸开，但仍无法入城，戈登因此看出，“常胜军”已无大用。

英国军事当局强烈反对解散“常胜军”。伯朗将军说：“我们决不同意解散部队，除非南京拿下，太平军撤退。我还赞成在上海再建立一支中国惩戒部队……。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应有正规军驻防。”然而戈登自有主张。李鸿章给他10万英磅作遣散部队之资他大喜过望。或许他厌倦了充当雇佣军头领的角色，或许他觉得南京指日可下，战

争已近尾声，或许他认为，他带领的军队，不是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榜样，就是给西方的方法打了一个坏广告。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这支军队的看法，与李鸿章不谋而合。“这支部队”，他在解散时写道，“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钻进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无知无识，未受教育，甚至听不懂命令。有的连支使部下的事都做不来。……我觉得，那怕这支部队由英国军官指挥，仍无法改变它作为一群危险分子的集合体的本质。这伙人不值得信赖。供养他们耗费巨大。我的主张是，干脆让中国军官率领的部队来取代他们，中国人的用处大得多。只要指挥得当，中国人更不怕死。……千万别再让外国人来带领中国部队，只让外国人充当教官，让中国人自己培养军官。”他对自己管理的军队看法恶劣，但审视自己时却感觉良好。“我十分满意。”他评述他在“常胜军”中度过的时光，“因为我知道，这次叛乱已快寿终正寝。如果我按兵不动，那么这次叛乱就会继续为患好几年。我不怕几年不提升我，也不在乎别人指责我。我知道我会两手空空离开中国，一如我来中国那样一贫如洗。但是，由于我的努力，至少使8~10万人免遭杀戮，还有比这更满意的事么？”

如果说他夸大了他协助取得小区域军事胜利的重要性，那么他肯定缩小了他的“满意程度”。年轻的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给他的信中说：“皇帝下诏赐你黄马褂和四套提督官服，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喜欢这些礼物，千万别拒收。”其实，赫德的担忧纯

属多余，戈登本人说：“中国人千方百计阻止我接受皇帝的赏赐，我对他们说，要么是黄马褂，要么什么都不给。他们终于让步。”他向母亲讲了黄马褂以及其它荣光之事：“我并不特别看重这些东西，只因你和父亲喜欢它们。我请F·布鲁斯勋爵捐回忠王的佩剑。他就是被这把剑杀死的，旗帜上还溅有他的血迹。”作为英军军官的戈登，否认他有追名逐利光宗耀祖的欲望，他只承认他是雇佣军首领，从欺压他的英格兰逃亡出来的流浪汉。但他还是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荣誉。

戈登把孝敬父母的礼物收掇整齐，并不急于衣锦还乡。相反，他接连5个月都默不作声地着手执行“培养中国军官的计划”。他取得了中国人的某种信任。这在19世纪的中国当属罕见。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迫使中国人进行急剧的改革，他们就会以最大的固执奋起反对。……如果我们只在前面引路，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乐意走出一段他们易于控制的距离。他们喜欢选择，但讨厌视他们为无能，自作主张为他们开道。”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并不喜欢西方和西方人，“那怕我们给他们援助，他们也没有理由热爱我们。因为中国发生的叛乱，其实是受我们间接的影响。”

由于报纸充满戏剧性的报道，戈登已成为着迷的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人”。他被誉为“单枪匹马镇压太平天国的英雄”。这显然是谎话，但对他并无妨碍，因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业已风平浪静。他的一位朋友说：“充任中国军队的教官，对于天性活跃、以流浪为业的戈登只意味着他谋求

了一个地位卑微、徒唤奈何的职业。”世界在呼唤戈登重新归队，他的精神由延宕而一蹶不振。1864年秋，他忆起了他圣诞节前返回英国的诺言。他怀着当年来中国时的那种急切心情打道回乡，他向甚感慰藉的母亲报信说：“天涯游子踏上归途。”

第四章

打入中国上层

19世纪中叶，一浪接一浪的外国人涌入中国求职。聘用标准日趋严格，就连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外国人，也要经反复考查方有可能受聘。有个美国人就被冷冰冰地告知：“你在上海无法找到工作，你不会讲汉语，我不能把码头交给你管理……你现在开始学汉语也无济于事，你肯定年过50，就是40岁着手研究汉语尚不可能掌握……我给你的建议是别再来中国。你的最佳去处莫过于退休，要求享受每年的津贴。当然，你是我的老仆人了，正因为我们长期相处，我才在黄浦给你作了安排。那个地方居家不甚理想，但此处确无你的立锥之地。”

这封盛气凌人的信的作者叫赫德，他“个头矮小，身体孱弱，却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独裁者。”他是在1869年2月写的这封信。当时，他虽才34岁，竟已当了5年中国海关

总税务司。在华西方人中，就数他权高位重。他的一位朋友说：“赫德允许外国公使给海关推荐人才，却不准任何人从旁指手划脚。无论后台是谁，在决定录用与否问题上，都由他说了算。”他用这种办法保证了工作的独立性和工作人员的高标准。“总税务司”在他的领地内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创建了中国海关这个诚实、效率极高、由外国人担任职员，大赚其钱的行政机构，又是清廷新近组建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非正式顾问；他是躲在幕后的外交官，因而清廷官员一开始便称他为“我们的赫德”。他在中国一共呆了50年，在最后的30年间，他成了北京外国社交圈的中心人物。由于他一言九鼎，各国政府不得不在他面前讨好卖乖。“这个在穷乡僻壤长大的爱尔兰小伙子——伦敦对他就已够远了。然而他却名扬四海，实在是生活的奇迹。他死后并未落厝中国，而是埋在50年内仅仅回过两次的家乡，这就未免有些出人意外。”

1835年2月，赫德诞生在爱尔兰北部的一个小镇。他是赫德家族的长子，父亲是个虔诚的美以美会教徒，在小酒厂当经理，年收入不过几百磅。赫德从小聪明伶俐，学习刻苦用功，15岁就获得了贝尔法斯特大学的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的学位帽上缀有金头饰，十分惹人注目。学校盼望他们为另外的同学树立良好榜样，无论是个人钻研还是教室上课，都须表现杰出。”为了保证每年都享受这笔奖学金，赫德读书越加勤奋，他连体育活动都予以戒除，更不消说耽溺于其它享乐。所幸的是，当时新建的贝尔法斯

特大学，并无讲求武力的传统，学生大都来自穷苦人家，唯求仕途。因而也谈不上他错过了什么口福之乐，声色之娱。

在贝尔法斯特大学，赫德开始从新的视角考虑前程。他最初想当医生，接着想当律师，最后，在 17 岁那年，由于聆听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讲座，他打定主意当传教士。但是，事业之门对他这种背景的年轻人未免太窄了。所以，在获取了现代语言高级奖学金后，他回到贝尔法斯特，又读了一年研究生。就在那时，他对最崇敬的老师麦克戈什博士说：“你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不愿再回到我父亲的作坊，你能替我介绍一份与我的志向相宜的工作吗？”老师“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这份通知号召有志青年在唐宁街竞争去中国当领事。”这无疑志向远大的青年们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赫德抓住了时机。“当外交部要求学校推荐去中国作领事的人选时，我刚好 19 岁。此次的幸运儿一共 36 人，经过测试，校务委员会对我评价甚高，最后决定推荐我。”

这是一场赌博。他离开英格兰时，拥有的仅是憧憬和国务次长哈蒙德先生的忠告：“到了香港，千万记住要带伞才能走进阳光，若要去射鹅，必须穿齐大腿高的皮靴。”1854 年 5 月，赫德抵达香港，很快被派到宁波。他在那儿开始认真学习中文。他在宁波遇见了丁韪良神父，开始了两人长达 40 年的友谊。他在宁波担任英国领事馆的业余翻译生，从而给了他观察西方商人在中国经商的条件机会。1858 年秋，他被调到广州领事馆，与中国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成了广州道台的座上客。道台请他帮忙制订税

收规则，并监督实施。

赫德婉拒了这个请求，但主动提出给李泰国写信求助。李泰国时任中国新近在上海港建立的中国海关的负责人。这些信件往返带来的结果是赫德于1859年6月辞去英国领事馆的工作，接受了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之职。他再次抓住了令人眼馋的机遇。既然从爱尔兰跳到中国这个大跃进都顺利实现，那么从英国的公职进入中国的官场就简单多了。新建立的海关业务迅速扩展，活动天地日趋广阔，升迁的可能性也比在英国领事馆大得多。它使赫德能与李泰国结交，赫德以后翼振云霄，从中获益匪浅。

李泰国是英国驻厦门领事李太郭的大儿子。李泰国1832年生于伦敦，“待你读完了书，”其父在1843年给11岁的儿子写信道，“就来（中国）见我。我希望那时我还未奉召回国。”“中国”，他在一年后又说，“是个很好的国家，可使你找到一份又体面、又有钱的工作。”然而李太郭却在1846年猝然病逝，家道从此中落。李泰国还未完成学业，使被迫离开学校。李泰国的母亲认为，她的儿子应象其父一样在中国做事。她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帕默斯登勋爵的信中要求道：“如果阁下能把我的大儿（李泰国）推荐给德庇时勋爵，我相信，他定会给（我的儿子）安排职务的。遗憾的是，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使我无法从他们目前为生存所作的努力中获得收益。”帕默斯登签署了“应予推荐”几个字，但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上，却对“已故领事们的子女应享受公费完成学业”一议颇有微词。

1847年7月，15岁的李泰国和13岁的弟弟来到香港，在郭士礼博士的辅导下研习中文。郭士礼博士是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教师。李泰国17岁（此时赫德刚刚就读贝尔法斯特大学）时，便成了英国领事馆的见习翻译，穿梭往返香港广州。1854年，约翰·包令将李泰国提升为代理翻译，年薪500英镑。这一职务颇令（上海的外国）人眼红。包令提拔李泰国的理由是他的汉语在听说和书写上都有长足进步。紧接着，包令又任命李泰国为代理上海副领事，李泰国从此有机会同清朝当局打交道。也就在此时，他树立了第一批西方政敌。不满者戏称他为“娃娃领事”。

李泰国年轻气盛，精力充沛，虽然阮囊羞涩，但在中国人面前，还是装出一付高人一等的模样。他的汉语讲得非常流利，以致于有的中国人怀疑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李泰国精明能干，野心勃勃，异常自信。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我发觉，从小在中国或印度长大的欧洲人，由于很小就熟悉了东方语方，因而在对待东方人时，显得特别粗鲁，或者象某些人形容的‘财大气粗’。他们比在东方国家享有相同社会地位的英国人要野蛮得多。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读书的环境动乱频仍，造成他们的道德发展受阻。他们很小就学会了利用特权压制与他们有着迥异道德模式的东方国民。我的推断可能站不住脚，但无论多么荒诞不经，他们没有用好的方式与亚洲人打交道，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就在1854年，取名“小刀会”的中国秘密社团，接管

了上海的华人居住区。上海的领事们，在英国领事阿利国的首倡下，在上海港建立了临时关税管理委员会，以便履行对清政府的条约规定义务。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征收进入港口的外国商船的海关税。领事们提议3个人担任监察员（一英人、一法人、一美人）。清廷对这一动议无力阻止。中国人嫉妒他们的特权，认为他们的做法干涉了中国内部行政管理，但从钱上考虑，清政府又欢迎这样做。若清廷官员负责征收海关税，当地商人和官僚们便要层层截留，大部分税收并未送到北京。让西方人接手这项工作证明可行。因为上交北京的钱，远远多于人们的预料。

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任命监察员制度愤愤不已，决定自己挑选和任命海关人员，同时保留西方的工作程序，至少暂时不改变。于是，当英国监察员于1855年退休后，清朝官员拒绝了领事馆推荐的接替者，转而请李泰国出山。自1854年起，李泰国一直积极支持清廷。李泰国并非消极地等待机会找上门，当他嗅探出有这种可能时，便与当地清廷驻军统帅勾勾搭搭，此人果然施加压力，使李泰国如愿以偿。1855年6月1日，李泰国接受英国海关税务司之职。

李泰国走马上任使双方感到满意。中国人任命他首先是希望他能对中国而非西方表示忠诚；其次，他的上任意味着可保留西方的工作方式，从而给朝廷早已枯竭的国库，增加大量救急金钱；第三，便是所谓的“以夷制夷”政策的实现。他们是这样计划的，结果也令人满意。“英人李泰国，知洋商利弊。1855年冬，前巡抚吉尔杭阿，札飭李泰

国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并增给薪水，以酬其劳。该夷衔恩图报，严查偷漏等情。近年，课征夷商之关税，已为口岸开放之初的三、四倍。……务请发给札谕一道，交李泰国收执，飭令该英人帮办夷税。”

在李泰国看来，能进入中国官场真是三生有幸。他时年 23 岁，父亲早丧，甚至可以说没有祖国，没有显赫的背景，却挣来如此重大的权力，难免受宠若惊。正如包令一年后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没有哪个外国人具有你这样的好运，能象你一样享有高等华人的殊荣，当然也就不可能拥有你那样的自信。”此外，李泰国还须供养守寡的母亲和 3 个兄弟姐妹，工资从每年的 500 英镑（副领事级）拿到 1450 英镑（海关长级），对他至关重要。他靠奋斗达到自食其力，他没有不“始终勤慎、秉公办理”之理。

以后 3 年，李泰国在上海港着力创建模范海关。“诸如篡改帐目，行贿受贿，隐匿不报，漏税走私，还有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弄虚作假方式，无不予以揭露处置。考虑到他的下属经验不足，人手不多，尤缺训练有素、忠心耿耿的验关员；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考虑到被征外籍商人的敌意，职业走私犯的妄行，就能明白李泰国面临的任务多么艰巨。”他以坚定的信念，勤奋的工作，不畏自己同胞的打击，给自己又赢来一个美誉：“小霸王”。

正当李泰国抓紧时间使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正常化之时，他的祖国、法国和美国，与中国在思想和经济利益上爆发了冲突。西方列强不愿顺应中国的进贡制，以换取中

国给他们的“优惠”。他们坚持修改条约，坚持中国和西方在民族国家世界中应处于平等地位。这在以孔孟之道为立国之本的中国，是闻所未闻、无以比拟的事。西方列强要求在北京长驻公使，直接与清廷打交道，而不通过省级巡抚。他们还想把贸易权限扩大到其它口岸和内陆河道，尤其是长江一线。及至1856年，列强决定用武力来表明他们目标的“严肃性”。他们于1857年攻占广州，次年攻占大沽，接着推进天津。北京朝廷终于意识到危险，赶紧派出3大阁员桂良、花沙纳以及鸦片战争的谈判者耆英，去天津与夷人交涉。

1858年4月，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给李泰国写信：“倘若你能陪同我此次北上，我将感到分外满意。我认为，你熟悉中国海关工作程序，精通中文，一定能在这个重要关头，给我提供极大的具体帮助。”经上海道台批准，李泰国欣然应往。但他并未名列代表团正式成员，额尔金在介绍他时，只说“他在上海负责海关工作”。额尔金的确打算让李泰国身份不明，这样，李泰国就能不受干扰地利用他与中国人的特殊关系，充当代表团的特殊“消息灵通人士”。

李泰国在天津扮演着介乎于翻译和谈判者之间的角色。结果，他在（1858年6月6日——6月26日）谈判期间，发挥了大大超过其地位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使团成员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凡事只能倚重翻译。不过，李泰国也未充任决策者，根据额尔金的设计，他应“狡骜异常、大肆猖獗”，无疑是个打手。李泰国一如在海关那样得

心应手，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习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给了他无穷好处的中国恩主身上，甚至不惜以武力达到额尔金的目标。清廷的谈判对手这样描述他：“昨日，夷酋李泰国欲以武力相胁，足见其胆怯之至。”李泰国当然不会认同中国人的这些描述。

在6月6日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李泰国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清廷必须同意在北京常驻外国公使。当73岁的桂良绝望地哀告，接受这一条件只能意味着他本人身首异地时，25岁的李泰国回答道：“你将会明白，这项条件对你们和我们都大有好处，良药虽苦口，但后效甚佳。至于你是否掉脑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接受我们的条件。好象你为阻止我们向京城进军顶着的压力越大，你被免死的可能便越大。我的态度越强硬，就越能给你带来益处。”

李泰国还对中文秘书潘说：“如果他们想动武，那就打嘛。”

清廷谈判代表耆英于6月11日会见李泰国，遭遇稍好一点。据李泰国和另一位翻译盛妥玛说，耆英的谈话“一派恭维之词，充满道义情感和妥协恩赐意味。”我们注意到，他的口吻仍是满族人在与我们接触之初所持的“抚慰蛮夷”的态度。李泰国忽然拿出1844年耆英写给皇帝的奏章（英国人于1875年在广州截获）。耆英在奏章中使用诽谤性语言。描述与西方的关系：

以诚抚夷，不如以计谋制之。令夷照我谕行事，不
让其探究个中缘由。然夷性悍多疑，为消弭纠纷，适

时可予详示，使之不得轻举妄动。若待之宽大，示以诚信，则夷感激圣恩，尚属无碍。……夷人远僻，不知礼乐教化，不可一味讲求疏奏表文，文辞谦恭。晓之尊卑贵贱之详理。……夷人势必装聋作哑，助其傲慢……

到了此时，耆英早已泪流满面。清廷的其他代表也惭愧难言，然而两个“夷酋”越发肆无忌惮。清廷官员只能向皇帝奏道：“广州既落夷手，臣奴等置放叶名琛府弟之夷事文书，悉数为英夷掳去。所有羁縻之法，为夷尽知。臣等筹办无术，诸难措手。”

经过一番讹诈，无力的清廷官员不得不俯首就范（耆英回京即被革职查办）。6月25日，“夷酋李泰国携自拟五十六款条约草稿，压臣奴签字。其气焰之嚣张，世之罕见。夷酋不准臣奴辩理，扬言条约不得更改一字。夷之炮舰横陈，若让夷人失望而归，则臣等难保夷人不借机开战。因此之故，臣等只好在两三天内签约以臻谈判，聊为避重就轻之法。”额尔金聪明地启用了李泰国，从而使清廷谈判代表于万般无奈中签字画押，清帝也只好忍气吞声接受。

通过这些谈判以及后来举行的上海关税会议，双方同意将上海海关税务司的业务，扩大到其它通商口岸。新建立的海关机构，由中国人挑选外国人主理，札谕总税务司。1859年，英国全权特使布鲁斯报告说：“李泰国先生以在担任英国稽税帮办时的政绩，深得清廷信任，以南洋通商大臣帮办之名义，出任该机构之首脑，奉命稽察各通商口岸

贸易事宜，拥有募选外国人实施海关税则的权力。”这位曾粗暴地胁迫清廷代表接受天津条约的“夷酋”，再次为清廷卖命。事实上，就在他拼命为英国利益效劳之时，也未辞去在上海海关担任的要职。

李泰国究竟代表谁？或者说，他觉得他代表谁？毫无疑问，他从时局动乱，从他的独特才能（熟悉中国、精通汉语、了解经济形势）中获益匪浅。他是三名税务监督之一，较之总税务司，无论其地位或是工资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他的动机并非彻底自私。他似乎真诚地认为，在对英国有利的同时，也不应损害中国，那怕中国人极不愿看到这个事实。他扮演的角色包含了相互冲突的因素，作为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从小远离家乡，不得不主要在中国人的氛围中工作，接受中国官员指挥，他毫无疑问地体验到了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奉行的顺化外国人的那套做法的滋味。他也遭到自己同胞的猛烈抨击。在上海商人的眼中，李泰国不偏不倚地执行中国海关税则，俨然一付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架式。他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任何时候都强调自己的英国人身份，坚决抵制“归化”。1858年，机会终于降临他的身上。

在华任职期间，李泰国自视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至少是中、西方的媒介。由于他的地位如此特殊，不得不经常为自己辩解。在他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关头，他以下列方式阐释（夸大）他在1858~1861年期间的作用：

我一门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充任调解

人，因为我体察到了以新方式让中、西方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为调解和消除我们的公使们的嫉妒，我必须证明我是为了各方利益才忠实地施加我的影响的……。清朝政府是一支扶不起的苇竿，我殚思竭虑加以修补的权力结构的基础，只能人为地加以再造。我的立场是，我是一位受清朝政府聘用的外国人，我只为他们做事而不能受制于他们。我无需遵守这种观念，一位绅士的行动听命于“东夷”十分有害。我并非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外国顾问。我所以获得有影响力的高位，纯因我倍受信任和优待。

或许中国人对李泰国所处的奇特而又矛盾的地位，认识较为清楚，“该夷惧怕为同伙鄙视，故尔随往天津，言行猖狂，与夷沆瀣一气，以示其忠。及至回上海，卑顺甚于往昔，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

无论是哪种情形，甚至在他被任命新职的 1859 年 5 月之前，他对工作通常是全力以赴完成。在以后的两年，他把上海海关的制度，推广到根据天津条约而开放的其它口岸，他还在广州和汕头设立了办公室。然而，其它省份的中国官员的敌意，以及中国的动荡局势（清廷既有太平天国起义的内忧，又有西方列强入侵之外患），妨碍了他的进一步活动。

总而言之，李泰国是个能干的、有见识的管理者。他奠定了一个国际行政管理机构的基础，使之在 20 世纪也能有效地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他而非赫德，才是中国

海关的创始者。他开创了诚实、公正地征收关税的风气之先，虽然在他录用员工时比较偏重选择英国人，但终究还是审慎和老练的。他确定海关工作的目标是让中国获利。不过，李泰国的个性妨碍了他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不纳人善言，也不会授权，对威胁他的官位者，都要加以惩罚报复。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八方树敌，不善于在支持他的人当中激发更大的忠诚。这些个人局限，很快使他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到了1860年，李泰国已不再是英国和中国的宠儿。英国人第一次对这个年轻的、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翻译”表示厌腻，中国人则讨厌他的傲慢无礼。他们很快就把目光投到罗伯特·赫德身上。

1861年，心力交瘁、重病缠身的李泰国给额尔金勋爵写信：“恭亲王札谕我为海关总税务司，然而近来叛乱愈演愈烈，清廷似乎即将土崩瓦解。面对这种形势，加上我的健康状况，我只好请病假回国，今年亦不再回来。”他补充说，朝廷面临的危机是他的最大忧虑，“在未将（海关税则）推广以前，我以为静待事态发展不失为良策。根据目前的情况，清廷在本年内无力复兴便必垮无疑。假若明年大清吉星高照，则自有我活动的天地。如叛乱得逞，我无甚遗憾。我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国内解释外国机构的种种详情。”新建立的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允准李泰国告假，但饬令他先赴天津，接受总税务司的头衔，建立天津海关后，再踏上归程。这样做是因为1860年联军入侵北京，清廷急需银两支付赔款。此外，还需筹集镇压太平军和其他

起义军的军费开支。然而李泰国以其惯常的专横，立即乘船西去欧洲。“李泰国先生此时不愿亲赴北京，无疑是极大失策。”布鲁斯评论道：“他失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恭亲王及其同僚委他为总税务司，邀他赴京觐见，实乃一大荣幸。”罗伯特·赫德则认为：“李泰国此时返欧，表明他坚决拒绝了我和同事们的劝告。我们认为，我们的劝诫，对他和对刚刚建立的海关，都具有重大意义。”李泰国指示赫德（此人自1859年便担任中国海关广州副税务司）和另外一位同事，在各通商口岸负责关税征收，他通知北京，他指示赫德北上晋见恭亲王。

赫德6月5日抵达北京，次日先会见文祥，接着拜见恭亲王。赫德向中国主人表明，他有能力马上接管海关工作。赫德采用了与李泰国完全不同的方针，重视与中国人建立和睦亲善的私人关系，从而在新雇主那儿，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恭亲王表示了最大程度的友好和礼貌。”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报告道：“赫德先生以其忠诚和坦率，给他们留下了异常良好的印象，中国人敦促他留在北京，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恭亲王一口一个‘我们的赫德’，对于任何建议的最经常评价都是‘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就会接受’。可惜这些建议尽管很有道理，却极难施行。”

在李泰国离职的两年间，赫德与中国地方官员交往肤浅，却深得北京总理衙门的所有官员的宠爱，使他在两年间，顺利地以各种方式建立起全新的、中央集权的海关机构。及至1863年，他成功地把海关制度，推广到八个新口

岸，并在这些口岸，组建了主要由替各领事馆工作的年轻翻译为主体的职员队伍。他还以上海为模式，形成了统一的海关工作程序。与此同时，他在中国主人面前，迅速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有损于上司（李泰国）的程度。

远在英国的李泰国，无疑嗅到了这个危险。他利用帮中国购买舰队的往来信件，顺带谈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语气无礼，但却准确）：

虽然你并非有意，但我坚决相信，你把我们之间的地位打了个颠倒。你当上了总税务司，我成了你的下属。你要求我把属于中国政府的金钱移交给你，还把购买东西的所有权也交给你。我断断不会承认这种格局。不过我向你表示，我任何时候都未怀疑你对我的忠诚，尽管我认为你的成功已使你失去了对事情的正确判断力。至于说到“为使计划得以执行”一事，我以为你完全误解了我在5月9日那封信中表达的意思。你的来信盛气凌人，我不得不明言相告：关于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除你持反对意见外，其余人业已表示同意。

就在此时，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再次朝不利方向逆转。1862年宁波和汉口被太平军攻占。在这种情形下，以前提出的给中国购买舰队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清廷敦促赫德抓紧时间完成任务，以便让舰队尽快投入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1862年3月14日，赫德向伦敦的李泰国发信，委托他为清廷购买军舰。很明显，赫德老早就表

示，这些军舰可由西方海军军官操纵，但必须服从中国“高级官员”指挥。清廷当局之所以同意这样做，乃是受了戈登事例的启发——这是一种由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成功的盗格鲁中国联合行动。然而赫德在给自己的“上司”的信中，却未明确地表明这一观点。1863年1月，恭亲王再次喻令李泰国，扩大了他的活动权限。这一札喻的要点是，在采购和装备军舰，招募水勇、确定工资诸事上，李泰国可“酌情办理”。

这份札喻尚未寄到，李泰国早已自行其是。他发现自己的地位特殊。他离开祖国年方14，回来时已官居要津。此次是他15年来第一次脱离中国氛围，无需再去讨好奉承中国官员。没有任何人觉得他地位低下，他觉得自己权大无边。“请记住你与恭亲王的关系，亲爱的伙计”，他于1862年给赫德回信，“是我们指挥他，控制他，而不是相反。”他招聘名气很大的英国海军军官谢拉德·阿思本，指挥拟议中的中国舰队。他对阿思本说：“我希望我们的舰队，应成为最优秀、最先进的舰队，我们要么不干，要么就干出色。我听见你说：‘没问题！’我希望你和我精诚合作，干出任何条约都无法影响的成就来！明年就打开中国！”接着，他购买和装备了七艘火轮，一艘运输船。

在舰队启锚开赴中国之前，李泰国就控制舰队问题与阿思本舰长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的要点有两条：“阿思本按皇帝给李泰国的圣旨行事，对来自其它渠道的指令，阿思本可不予理会。李泰国方对于任何他不满意的指示，拒绝

充当中介。”李泰国进一步宣布，他准备将此舰队完全掌握在手，不去镇压太平天国，而去开发长江，驱逐海盗，节省英国在中国维持一支舰队的费用。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李泰国意在将这支舰队服务于英国对中国的进一步政策，而非清廷的驯服工具。

1863年5月，舰队尚未驶抵中国，李泰国已在中国露面，重新行使总税务司的职权。6月5日，他将他和阿思本达成的共识，递交中国人。对西夷和太平天国同样惧怕的清廷官员，发觉这些协议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主权。还有，这些协议还造成镇压太平天国战事的逆转，而这场战争，是由省级官员控制和指挥的。它们还会给创建中央控制的皇室海军一事带来极大障碍。更麻烦的是，美国公使蒲安臣报告说，李泰国“不但想把整个舰队独揽到手，而且还打算独吞海关税收。中国人愤怒抗议，指责他目中无人，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国内阁中捞个一官半职，他甚至提出，（海关税）的大部分收入应归他，这样他就可以在北京以王公自居，拥有一座王府。按照清廷惯例，只有皇亲国戚，才有资格住进府第。”

英国公使布鲁斯于1863年写道，怀疑李泰国企图独吞中国的全部关税收入，左右大清帝国的外交政策毫无根据。“他无非是急于想让政策得以执行，而这些政策，均由皇帝圣旨确定。（舰队和陆军）贯彻政策的花费，则应从关税收入中支出。”

李泰国在英国时，有恃无恐，妄自尊大，完全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在中国的实权。1863年9月，当阿思本率领舰队抵达中国时，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人反应强烈，李泰国不得不在人事和财务两大问题上向中国人妥协（他6月份便到北京，恭亲王拒绝见他）。然而阿思本坚持照协议办事。他向戈登将军写信道：“我将在北京全力鼓吹在中国服役的所有欧洲人，组成联合的海、陆军部队。向它们提供资金，如实报销，但决不受什么抚台、督台一类货色的干扰。”李泰国的错误判断和阿思本的固执，招致舰队被退回英国，着即解散。

恭亲王及其幕僚，早存革除李泰国之心，这一事件正好提供了借口。李泰国于1855年开始发迹，固然有个人努力，但主要还是被视为管理海关的干才。可是他的个性，尤其是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和1863年回到北京的恶劣表现，抵消了他作为一个技术人才的价值。中国统治者对于他的忠诚，不能不产生怀疑。从1861年起，清廷官员便开始与赫德接触。他们发现，赫德与李泰国大不相同，他既胜任海关工作，又能与中国主人建立和保持良好工作关系。

“任何人，即使是李泰国，只要表示彻底地不信任中国人，以为获得成功的唯一手段就是欺骗他们，固然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说明见解无误，”赫德于1864年年初评论道，“但是，这种霸道作风，只能在远离京畿的地方，在道台一类人身上得逞一时。倘若以为这种方法在北京的官员身上也行得通，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于现政府不应报

任何希望，因为它不可能立即把注意力转到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谈判获取外国贷款等事情上。希望中国从战胜国引进上述项目，我认为，既不合逻辑，又缺乏常识，因为他们对战胜者还是极端瞧不起。”

恭亲王早在 1861 年就指出：“纵然赫德是个外国人，当他接受审查时，还可被称为驯良服从，他说的话还比较有道理。此外，他贪婪地想获得总税务司那一笔高薪，使得他完全有可能代表我们的利益行使职权。”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后，清廷给了李泰国一笔工资（包括退职金）解除了他的职务。1864 年冬天，李泰国离开了中国。1869 年，他以业务推销员的身份再次来到，但只能作为赫德的“客人”了。

赫德继任。1865 年 8 月，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把办事机构从上海迁移北京。除了外出视察通商口岸，两次回家探亲，他一直住在北京，直至 1908 年退休。

赫德牢记李泰国的教训，立即确定海关工作目标。“我必须时刻牢记，”他写道，“海关管理委员会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着中国的平民和官员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反感。……希望每个领取俸禄的人都明白，他是中国的雇员，他至少在行事时，不得引起中国人的敏感，更不准引起中国人的嫉妒、怀疑和讨厌。……每个人都须首先记住，中国政府给他工资，让他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把工作做好是他的当务之急。”

在其它问题上，赫德则遵循李泰国在上海的工作模式。如有可能，则尽力仿照中国的习惯和方法。他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开初几年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将李泰国创制的海关系统，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海关管理委员会，不但向地方负责，更向北京负责。为组建这个组织，赫德将自己置于这个委员会首席。他在这个组织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指望中国工作人员有多大的能耐，这是他不同于李泰国之处。“他把实权全部握在手心，”他的一位下属回忆道，“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他的雇员都是过客，连秘书长也走马灯似地换——来一批去一批——谁都可能被请走。”他的一位朋友注意到，在总理衙门眼中，只要他忠心耿耿，只要海关工作有成效，“他在机关内的权威就不会受到挑战，他的任何行动都无需修正，庄严的（总理）衙门对他一百个放心。”

赫德对自己的计划以及经管海关机构的方法守口如瓶。赫德的朋友丁韪良这样叙述道：

中国海关有其特点，对一些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使一些人望而却步。这个特点是，任何人都不得长久地固定于某个港口，任何职务都无固定任期。这个“巡回”制，是从中国的行政机构移植而来的。海关官员便根据这个原则，在24个港口流动。其目的乃是避免与地方当局过从甚密，同时，还可让每个人，有均等机会去一些被视为富庶的地方工作。任何一名官员在上班第一天，便得作好调离准备，那怕他实际上

要在那个地方呆上三、五年。至于他会被调往何处，事前一无所知，因为巡回流动并不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甚至机关的最高首脑，也不一定心中有数。

尽管这一制度在运用中卓有成效，但在机关内外带来了并非全部正确的批评——尤其是当关税征收工作扩大到新的地区，工作量在没有赫德相当的授权的情况下猛增时，这些批评也就随之增强。出身寒微的赫德喜欢他的权力是肯定的。有人说：“他活象一个土耳其人，讨厌觊觎他王位的兄弟。”这些抨击深深刺痛了赫德，他反驳道：“总理衙门对我说，‘我们只承认你，你爱干什么都行。’有的人因为未被我派去完成某项任务，或者未被提升，便对我的这一回答表示怀疑。海关内的高级和低级职员都仇视我，讨厌我行使选择权（确切地说，选择是我的必要职责）。”

赫德似乎以直觉观察人，极善感情移入（当然，对象不得威胁其职权）。这种素质使他很好地理解了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使他能很好地挑选门下之士。在当总税务司的头几年，这或许是个大问题。他在北京设立中央机关，在各通商口岸派驻最高督察，只对他一人负责。督察之下为外勤（在港口进行监督、视察诸工作）和内勤（处理关税征收的技术事务）。在挑选外勤人员方面，赫德倾向于在上海和香港当过水手的人中募集，但内勤职工的雇用则要困难得多，不得不四处遴选人材。内勤的工资高，极易提升。例如 1864 年 6 月，赫德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信道：“倘若阁下能给我推荐 3 名美国年轻人，我将视为对我的极

大支持。这3名美国人的年纪应为18—22岁之间，且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应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刻苦，行为正派……在工作的头两年，他们将在北京学习汉语。……如果努力工作，能力出众，则可望在10年甚至8年间，升为督察。……在北京的第二年，本总税务司将把这几位绅士外放某个港口，以考验他们是否适应工作……。”

这种年轻人在中国过着极其令人羡慕的潇洒生活。北京的一位英国学生写道：

首先进来的是我的先生（教师）。他童颜鹤发，俨然仙风道骨。满头银丝扎成一根长辮，拖在脑后。我让出一间房间给他居住，每月付他20元（大约5英镑）的工资。接着进来的是我的男佣。他年约25岁，十分精明能干。他一人承担了洗衣工、勤杂工、搬运工等工作。还帮我钉纽扣，补衣服。他整日不离我的左右，随时都可以把他召到面前。他的月薪5美元。此外，我还雇了两个“苦力”打扫庭园，替我把浴缸放满水，待我洗完澡后，把我背上安乐椅。总之，他们干我吩咐的一切事。有了这些人，加上我的马夫和马匹，我的佣人队伍可谓“种类”齐全、洋洋大观。……伙夫包括食堂的管账先生是大家共同聘用的。我们每个月的花销不过18—20英镑，但能喝上好几种果酒、啤酒，吃上各色各样的蔬菜、肉食、鲜鱼、水果。这种异常优裕的生活，许多人闻所未闻，难以想象。中国确实是生活费低廉的国家。

中国到处招揽人才，加上优厚的物质条件的诱惑，当然有助于形成一支高效的、超国界的员工队伍。“在挑选人时，我遵循着过去6年在海关一直坚持的原则，”赫德在1867年写道，“即只根据需要聘用，而不管他们是哪国人。我只重个人才能，不搞名额分配，就是说并非让每一个签约国都有一名代表。海关税务司在基本体制和章程上，将继续超越国界。它受制于应完成的工作的规定，个人才能是决定聘用与否的根本条件；任命、提升乃至解雇，均不考虑国籍因素。”赫德还强调雇员必须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其根据是既然在替一个国家工作，却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未免滑稽。

依据官方要求，海关税务司中的工作人员，应是中外混合体，但中国人却只担任职员、会计、誊写员等低级职务。这或许是赫德的最大失策。尽管赫德乐意替中国创造一个模式，使之朝现代世界“进步”，但他却并不急于培训中国人，让他们最后管理海关税务司。赫德是个不讲感情的现实主义者，对于自己领导的海关税务机构的最后命运不报任何幻想。“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迟早都会完蛋，这一点须臾不可忘记。这个委员会可以盛极一时，可以成就辉煌，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为人称道，但是，一当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民族和自然力量觉醒，作好了准备，就会把我们在这种反常的职位上赶下台。”赫德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以平等的地位进入“现代世界”。他还认为，世界对于他一生的工作，将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关于海关税务司，他

最后下结论道：“当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海关管理机构出现，这个机构在忠诚性和效率上足以取代目前的机构时，海关税务司的使命就算完成。”

然而，赫德在其一生中，却未准备培训和建构这样一个忠诚的、效率高的海关管理机构。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在中国的利害关系越深；利害关系越深，他对自己在海关税务司的地位便越重视。1908年，当中国人一步步接近于接管海关税务工作时，赫德评论道：“我一直希望在我任职期间不出现任何变故。但中国人昨天说，他们急于想在我未消失之前，就获得对海关税务的有效控制。他们说，除了那些企图谋取我职位的人想我离开，其余的人一律欢迎我留下来。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永久地执掌大权，尽管如此，猝然离开所造成的组织解体以及其混乱还是应当避免。”

赫德的失策还在于未培养接班人。他取得的成就全凭个人努力，他对放弃努力持小心谨慎态度。“在我真正地分析自己的感觉时，”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十分惊奇地发现我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太多了。我更感惊奇的是，我的要求如此之小，但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居然如此之长。我真担心我不象辛辛那人那样，为农场犁头而放弃国家的犁头。现在，我的全部愿望，无非是想过一种清静的村野生活。”他以更坦率的心情补充道，“倘若我还有一次生命，我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手上掌握的东西太多，手指都不敷使用。积习难改，我担心我还会故伎重演。”他在1904年

时写道：“我已经竭尽所能，做了该做的事。我集中全力，设立了机关，扩大了它的基础，夯实了它的根基，为向上爬的人搭好了台阶，我该让他们青云直上——我欣赏这一职位所带来的一切——权力、庇护以及高薪等等——我是它的奴仆，工作最苦、自由最少。”

姑且不论赫德采用的是何种方法，他创建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属罕见的组织——一个国际性的海关税务管理机构。在他死时，外国的“内部职工”队伍，竟达如此规模：152名英国人、38名德国人，32名日本人，31名法国人，15名美国人，14名俄国人，9名意大利人，7名葡萄牙人，6名挪威人，6名丹麦人，5名荷兰人，5名比利时人，4名瑞典人，3名西班牙人，还有1名朝鲜人。他的海关税务司的业务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定范围。及至1898年，它为清朝政府提供的资金，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它还经管中国邮政，管理中国内陆通商口岸关税。

赫德本人远远不满足于当海关总税务司，他积极筹建“同文馆”，即翻译学校。同文馆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培训出第一批优秀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和第一批外交官。他在选派首批中国外交使团访欧一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还促成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7年以中国特使身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他在1867—1869年的阿礼国协约谈判中奔走游说，为防止中英1876年之战斡旋其间，为1885年中、法达成和解，努力从中调解。由于他的有效活动，清廷才在

灾难性的 1894—1895 年中日之战后，得到急需的货款。中国人觉得，正如他们常说的那样，他们真正做到了“以夷制夷”。

除掉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海关税务管理机构，赫德本人还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典范。丁韪良这样形容他的每日工作，“一年中无论哪一天，从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都可以发现他坐在办公室。短暂休息，仅是午餐后打个盹儿，而且不是非有不可。他从不休假，甚至足不出北京一步。他从未有过郊游，充其量遥望一下远山。他没有体育活动，只在花园散散步。他有时聆听音乐，阅读小说，调剂单调乏味的紧张工作。在他办公时，他还经常下令管弦乐队吹打弹奏，表明他的写字速度与音乐节奏合拍。一当他放下笔，拿起小提琴弓，管弦乐队的演奏便嘎然而止。”

这种拼命工作的倾向，是他当学生时养成的习惯，现在由于他不善于授权分事，从而把自己搞得更苦。他给海关税务司的定义如下：“我们管理的机关，叫做海关税务司，它的职责范围异常宽广，它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从各方面为中国效劳。”随着他的个人威望日益提高，他的中国家庭教师也在一系列与他的实际工作无关的事情上请他拿主意。赫德于 1883 年写道：

每周花两天时间处理英文公文，两天处理中文公文；还有两天时间料理半官方函件，再用一天时间完成杂务。倘若我不能按日、按周做完事情，那么我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紧张。同时要办的事堆积如山，无

数危机一块儿赫然耸现。公众挤在这道门听结果，（总理）衙门在那道门要我呈报。我的安全系于我有妙法。计谋的确是个神奇的东西，它使我去年有机会利用等待上茶点的时间阅读卢卡（西班牙诗人—译注）的巨著《法尔萨利亚》。今年我对留克利希阿斯（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译注）的作品津津有味。方法得当不仅使我每天有俩小时听大提琴和小提琴，而且还能按时完成任务。

时光催人老，繁重的工作榨干了赫德的精力，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1898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认：“我已对工作感到郁闷难耐。假若我有四个副总税务司，由他们分管关税、邮政、厘金、杂务，并且象我一样工作，我就相当满意了，我就有时间休息了。照现在这样干下去，我将被窒息闷死。”

虽然赫德对中国人富于同情，但他身上仍然浸透着19世纪英国人典型的关于进步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他希望中国能“进入一种改革进程，然后……逐步地开发资源，开办工业，获得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进步。”他希望海关税务司能为中国的前进创造某种模式，然而这种进步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仍屡遭失败。1870年，英国人拒绝认可阿礼国协约，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这都是他受到的挫折，他的疲劳感和失望感，以最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显现，他无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感到一阵阵灰心丧气。例如1870年，他在绝望中写道：“假如可能，我再也不想在这儿

多呆一天。除非这里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我认为为成功地做好工作计，这时已决无留下的价值。我热爱中国的条件是我应在中国做一个有用的人。但眼下他们又‘蹲下去了’——因此觉得中国形势未免太不明朗化，难以容纳任何真正的改革——作为一名纯粹的关税征收员，我已十分厌倦。”

在40年内，他好几次提出辞职，打算在乡村过宁静的生活，不然就回故乡养老。回爱尔兰的念头一出现在脑海，他便不能自己。故乡山河无时不激起他心潮澎湃。他向远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位朋友诉说衷肠：“当我写信时，我自己都觉得十分有趣。我离开祖国已40年，现在真想回来。我以为，凡是离乡背井去外国工作的人，都有这种情愫。我们一天也未忘记故乡。关于故乡的任何声音、任何气息、任何景色，都会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襁褓时代，故乡永远是那么亲切感人。一意识到我还将在这儿再呆一阵，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想想看，1889年我在北京时，只要回忆起1849年教士山（贝尔法斯特大学）的情形，仍然忍不住泪珠如线。虽然如此，它激起了人的追忆，让心灵受到震动，让人从‘年纪’这个冷冰冰的和世俗的状态中复苏过来，不失为大好事。”1888年，赫德沮丧地想，“我说不定该退休，就在此地度完余生。”以后，他担心死在中国的顾虑进一步加深，“我讨厌在中国孤独地死去这个念头，我离朋友们太远了。然而其他人都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又为何不能？我的命够长了，身体还很棒，日子过得舒心快意，我不能因

天意要收回我便与天堂争吵——假如我非走不可的话。不过，正如我以往说过的那样，我宁愿经由伦敦进天堂，而不愿直接从这儿上去。”

这类情绪使赫德的地位意义含混，也反映了他思想深处的模糊认识。就象他的前任李泰国，赫德同样面临着来自商人们甚至领事们的激烈批评。人们骂他利用海关税收帮助中国危害英国的利益。他同时还得顶住中国方面的怀疑与猜测，就连李鸿章，曾纪泽这类权高位重的大官也不喜欢他，甚至怀疑他。他被挤在两个文明的夹缝中，必须一次性地平衡双方，让两个方面都在自己的思想上占据合适的位置。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我们可以明白，他不断地嚷着要回家，显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有此心——这是为了确保自己身份的手段。赫德在中国干了54年，仅两次回国：第一次是1866年，他回国娶他家乡的一位医生的女儿为妻，假期不长；第二次是1878年，他作为赴巴黎博览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英国只住了两日，且全在伦敦。事实上，他对于英国还能盼望什么——这个英国给他升迁的机会少得可怜，他所以年纪轻轻便离开英国，乃是因为他这个爱尔兰小伙子，宁愿在一个未知天地赌博，也不愿在一个已知的、但机会少得可怜的地方奋斗。他所能期盼的，不过如他的传记作者魏尔特所说的那样，“与家人团聚，与几位久违的老友叙旧，在轰动一时中四处露面，借机炫耀于人，换来令人羡慕的荣光……远远地侧身观察他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是否很有趣，是令人怀疑的。”或许他的

老上司李泰国便是一个明证，他于 1898 年悄然去世，昔日威仪早已为人淡忘。

相比之下，中国给了他什么呢？他年未 30，中国人就授予他一言九鼎之权，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难望其项背。除了繁重的工作（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和一系列的挫折，中国给了他权力、影响、光荣和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使他在自己的故园获得了承认（相当多的欧洲国家也对他倍加器重），倘若他窝在爱尔兰，他休想享此殊荣。1885 年，赫德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我决未主动谋求过把我的职务，从中国的总税务司变为英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不是想到有可能做某些好事，不是为了在公使馆有一个光彩的结局，我宁肯继续当总税务司。”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总税务司。尽管他再三推辞，他还是被授予了爵位。此外，他在海关的至高无尚职权，使他有机会庇护朋友，惠顾亲戚。“我决没有，”他辩解道，“决没提拔过不称职的人。不过，假如两个人都具有获得提升的资格，而其中一位恰是我的骨肉，要对他忽视不理，自然说不过去。”

年复一年大权在手，地位亦随之水涨船高。他完全可以照自己的心愿安排生活方式。据他的侄女所述，“1879 年，中国人决定在北京的公使区赏给他一片土地。这样做既能集中外国人，又便于他们开展工作。他便从偏远的城郊搬进了相对开化之地——如我们所理解的——市区。”他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住宅，“一套单层平房。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反对修高楼，担心楼高超过宫殿。赫德

的宅第呈H型，与他的姓名的首字母H相吻合，同时，这种设计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太阳光的昭射和南风吹拂。这座建筑含两套客厅，一间弹子房和一间餐厅。西翼用作客房，全然西式装饰，东翼则为私人办公室和特别接待室。后者是彻底的中国风格——太师椅和八仙桌——以便款待中国客人。他的卧室也在这一方。”

房子周围是一块中式大花园。赫德将其私人管弦乐队安置在花园。他聘来一位葡萄牙指挥家，教授由20余名中国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西方音乐。此外，他还决定，（海关内）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果成绩卓著，或者有幸携眷同住，则宜移住北京。从此，总税务司的身边花团锦簇，一派轻歌曼舞。这一排场之大，足令在北京的10座公使馆黯然失色，自愧弗如。他的家成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聚会中心。他每周举办一次晚会，宴席之后就是舞会，且常此不衰。倘若其他人发来正式邀请，“总税务司的太太就坐上绿轿，由四个仆人抬着，浩浩荡荡而去。”

赫德在工作时不怒而威，下属和朋友无不对他畏惧三分，但他在私生活上却“表现羞怯。”一位批评家指出，“他在女性中取得的社交成就，远远大于男性，这一点用不着怀疑。可是，跟其他人一样，他同样笃信大男子主义，总认为女子不如男子聪明。他对知识女性无甚兴趣，他只希望他的女朋友个个年轻貌美——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尤物，还能在适当的时候，叫一声：您好！罗伯特爵爷。”赫德这样说道：“她们常来拜访。我对个中原委深知其详。她

们是来看北京的两大怪物：总税务司和他独一无二的乐队。”

不过，赫德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地位高，影响大，权力重，并不能抹掉“位置反常”这一事实。他是清廷的一个忠实支持者，他认定这是针对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唯一直接选择。他在上了年纪后，看到了中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在1894~1895中日之战后，日本首先确立了被称为“亚洲大国”的权利，赫德伤心地说：“日本的发展和表现，无疑是进化的一个最大奇迹，而且它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事物的进一步演变，日本人将更热爱工作，整个东方都将感到一只巨手在活动。”

他对自己支持的清政府，持“恨其不争”的态度。“可怜的中国官员，”他于1899年写道，“至今尚在昏睡，全然没有认识到真正变革的必要性。打击与高压，就可使他们屈服，放弃一切权利，然而却没有哪一个建议——哪一种警告——可以使他们觉悟，奋起强国脊骨，砥砺利爪。”不过，赫德也比任何一个在华的西方人更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惰性政府的后面，若干强大力量暗流涌动。欧洲以帝国主义手段分裂中国的每一个企图，又反过来扩大了这些势力。他这样概括道：

每个人都想剥削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只要逼迫中国让步妥协，一切便大功告成，他们就犹如上了月亮（欣喜若狂之意）。实际上，阳光照耀下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为何南海泡沫（18世纪初英国殖民公

司南海公司在南美进行的股票投机骗局——译注) 不该重演?在我看来,每一项计划的实质无非是两点,第一是向中国炫耀武力,蔑视中国,以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会屈服;第二是计划的设计者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会遭遇什么障碍,收买中国公众只是一种假想而非严肃的现实——因而我认定,所有这些计划,到头来只会以失败告终。

早在1894年,赫德就预见到,“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20余个世纪的思想训练弄得冷却凝固。但我坚信,这些重创总有一天会表现为最猛烈的怒火,到了那时,我们这些外国人都会被一古脑扫出北京。”1900年,“最猛烈的怒火”果然以“义和团”运动的形式出现。这场由中国秘密社团点燃的原始的民众起义,很快转为将进攻目标对准华北的外国人,首当其冲的是传教士。传教士们非死即伤,侥幸脱逃者至少被堵在北京的公使馆内两个多月不敢出来。赫德也在其中。直到1900年8月14日,外国讨伐军(包括日本在内共有12个国家的士兵参与)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一时间西方各国反华情绪高涨,中国人被视为“野蛮”,中国人被称为“黄祸”。1901年9月7日,这一事件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政府被迫签署“辛丑各国和约”,同意支付外国政府巨额赔偿,应允削平和捣毁大沽炮台(北京通向大海之间的若干处据点,也被外国军队占领),两年内不得进口和制造军火等等。

· 罗伯特·赫德比任何一个在华外国人更视“义和团”起

义为祸害。从个人利益讲，他大败亏输，几乎丢掉了一切。他的宅第被夷为平地，他的书信、日记以及一生积蓄全被扫荡一空。他在65岁之时，逢上的这场变乱，跟汤若望的遭遇一样。汤若望在明朝大厦倾覆之际滞留北京，备受煎熬。赫德40年的辛苦和忠诚毁于一旦，在他的眼中，他为之克尽厥职几十年的中国及其皇朝的命祚，较之他刚刚为之效劳之时更加危机四伏。“我被这场动乱刺伤了心，”他写道，“但它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我们只有勉力而行，以图减轻损失于万一。我觉得我对海关还有用处，对中国、对普遍利益还能做一些事。我坚信我还能发挥专长。在上述三个方面，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大有作为者舍我其谁？如其不然，我早就启锚扬帆，一走了之。”他象汤若望一样，面对动乱处之泰然，乱尘尚未落定，他便宣布说：“我享受了假期，8个星期啥事未做——对此一个人还能奢望什么？”他一头扎进《辛丑条约》的谈判事务中，试图游说西方放宽条件，积极地为把落水的清廷拉上岸助一臂之力。

赫德身处其西方朋友气势汹汹的“报仇雪恨”情绪中，面对中国遭受的巨大屈辱，他还能以同情的目光，清楚地看到事态的发展趋势，确实难能可贵。他评述道：“‘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官方煽起的，但却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想法，势必象燎原野火一样在举国上下迅速蔓延。简言之，它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宗旨是振兴中华——为中国而设计的。”他断言道：

如果正确的话，两千多万拳民、基于爱国热情，拿

起武器，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他们不但会使外国人在中国无立锥之地，而且还会把被外国人掠走的全部财富夺回来，让欠旧账的人还本付息。他们将把大旗和武装，插向和运到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预测不到的众多地方，从而在来来引发我们眼下无法逆料的动荡和灾难。在50年内，只要中国政府一声召唤，排成密集战斗队形的“义和团”团民的人数，将达到亿万计，这是不容怀疑的！

在评论中国和外国关系时，他说：

目前的事态，是过去作法的逻辑发展。欧洲对中国的待遇，并非一味吝啬，即便如此，也大大伤害了中国，如奉行其它灵活的、理性的和始终一贯的政策，极可能获得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形，外国人都不应奢望他们能永久地保持治外法权以及各种逼迫中国承认的商业条件。对于前途，必须承认，现实的中国人尚未表现出勇敢的斗士所具有的那种气质，但中国并不匮乏豪勇虎贲者，且数量日益增多。既然现在的中国人都敢于在6月19日义无反顾地向一打缔约国挑战，难道一百年后的中国还不可能这样做吗？当然，常识将阻止中国推行侵略政策和走向极端，但外国独裁总有一天会坍台，外国人总有一天会回老家。我们不可不将今日之情势，视为来日之端倪。一度人烟稠密的北京城，在外国军队占领的头几天，便一下变为空城，人们看到了诸多不应发生的事，有一

天，总会有人因这一切而懊悔。

困困领事馆事件结束后，赫德还在中国呆了8年。为了筹集巨额赔金，他的海关工作任务激增。他还得负起管理（中国）内陆海关以及沿海开放口岸税赋的新任务。在此期间，他的预言开始变为现实。他本人年事增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中国人（根据1906年的皇帝诏谕），逐步着手收回外国人控制的海关税务权。中国的一些新势力集团也渐成气候，他因年迈而无力夹居其间，到了1908年，他虽在技术上仍担任总税务司（他在此职位上一直呆到逝世），却不得不离开中国。“我记得他走的那天上午的情形，”他的侄女写道，“是时天气异常晴朗，总税务司的乐队奏起了‘美好的往日’一曲。总税务司在月台尽头下轿，脸上带着迷惘神情，但这个表情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他很快又恢复到盛气凌人的司令官模样，大声说：‘我准备好了！’然后步伐坚定地列队致敬的士兵面前走过。乐队高奏‘家园，美丽的家园’。他静静地向共事多年的中国官员道别，再转身朝熟识的欧洲人说再见。这些欧洲人一直深得他的关照，因而在说‘一路顺风’时，无不热泪盈眶……。最后，他离开人群，朝火车走去，一步一鞠躬。”

他走得正是时候。新世纪如日方升，唯有新一类的西方顾问，方可适应这个变化。赫德做西方在中国权力最大的顾问凡几十年，他所控制的机关几乎无法

触动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终日乾乾，全部努力毁于一场使中国备受屈辱的惨祸。“在我任职期间，”他沉思道，“居然还能在香港（英属）、澳门（葡属）、蒙自（云南）、龙州（广西）、重庆（四川）、汉城（朝鲜），现在又在西藏设立了海关，真是有趣。我们为使中国平静，为皇朝发达富裕助了一臂之力。我希望有所建树，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耗费在这件事上的心血永远也得不到报偿——心血换来成果，成果便是成功！我们度过的几十年已演化为历史之一部分，我们的工作已织入宇宙之网。”

1911年9月20日赫德去世。3周后，他支持的清廷一朝覆亡。

第五章

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

19世纪在华的西方顾问，虽然并无一个环环相扣、统一协调的工作计划，但其所作所为，却在20世纪中叶，被一些人尊奉为“援助不发达地区”。他们向执政政权提供军援镇压内部造反，倡导经济改革以求经济的进一步稳定，他们费尽心机改变教育结构，使年轻一代更易于向西方开放。

外国人要想打进中国的教育领域特别困难。中国人的观点是：教育是争取社会和睦和政治稳定的关键。两千多年来，年轻人在儒家思想中学的是恭顺、德行、礼貌。在研究古文的基础上，他们参加考试，求取功名。考试及第，则有官做，从而获得权力和财富。介绍新学科——例如西方哲学、外国语，或自然科学，实际上威胁中国国体基础的稳固，创新将不可避免地遭

到抵制。

阻力并未吓退西方人。把中国变成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形象的梦想，驱使着他们努力向前。在这批西方人当中，有个美国人尤其顽强，此人就是丁韪良。他于1827年4月诞生在美国印地安纳州，家中有10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八。他的父亲是长老会巡回传教士，用两个传教士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取了名（丁韪良的英文全名为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译注）依严格的加尔文派礼教将其培养成人，赞同他今后去当传教士。年轻的丁韪良一度对这个前途犹豫不决。他在印地安纳大学学习自然科学，思想波动很大。他在长老会神学院进修时，对这个边缘宗教的教义深为不安。但最终还是父母的意愿占了上风。丁韪良22岁那一年启程赴华，随身带去渊博的希腊文、修辞学、光学知识，当然也有加尔文派教义。

迎候场面委实叫人惧怕，但丁韪良临危不惧。“当我们从船上一步步踏上海岸，一大批抗议人群拥上来。他们嘴里叫道：‘蕃鬼！蕃鬼！砍头！砍头！’我开玩笑道：‘这就是人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文明么？我难道就是为这些人而离乡背井的么？’但是，我很快纠正了自己的看法，正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所以需要我来。”他沿着海岸进入宁波。长老会的先驱们已在这座城内设立了一个传教团，办了一所学校，还经管着一家印刷厂。丁韪良很快开始学讲宁波土话和汉语。

“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字典帮助，……我只好自己设计一个语言学习系统。我将德语，确切地说，是欧洲大陆各语言的元音，作为学讲汉语的基础。我把我的老师嘴里的发音，稍加变通记载下来，居然形成了音标。这种方法使我豁然开朗，我何不依同样方法教他学英语呢？……一两天后，我的老师果然也能写一些单词了。一周过去了，我收到他递来的一张字迹工整的纸条，邀请我去他家进午餐。纸条的意思清晰简洁，我不由为之欣喜万分。我炫耀似地将它置放在早餐桌上。……我永远不会忘记 1851 年 1 月的那一天，太阳尚未升起，我们便成立了一个团体，专意编制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定形系统。”

丁韪良开始设计一种可用于印刷“新文字”的刻版印刷体。征服复杂万分的汉字书写的愿望，激起了他的巨大热情，即使传教的决心，也没有大到这种程度。“中国人，”他评论道，“以惊奇的目光注意到他们的孩子，在几天内便学会了读书，而不象他们在学汉字时，要艰苦地奋斗好几年。70 岁的老妇人，目不识丁的仆人和下力者，在聆听布道时，也能用这种方法，以他们生下来就熟悉的语言，诵读上帝的大作。”

丁韪良用行动表明，他多才多艺，无所不通。半年内，他便可以用汉语向中国大众布道传教，一年半后，他居然可以用汉语吟咏诗词。丁韪良抵达宁波不久，便在一位中国教师的帮助下，研习中国文言文。他

花了5年时间，“读完了作为中国文学基础的‘四书’、‘五经’。倘不是因为还得休息娱乐，加上工作繁重，我肯定会在更短的时间内修完这几本书。”他还为中国人编著代数、地理、希腊罗马史教材，设立“天道书院”。他后来就这座书院评道：“我认为，正是这座书院，使得许多读书人皈依基督教。”他还创办了一所小学堂，试验他创制的拼音文字系统。

但在当时，他的传教工作成效不佳。他只从传教团的雇员中招收了几名教徒，而且这些人的动机，既有宗教的也有金钱的。他用拼音文字教中国人阅读汉语的实验，实际上当面贬损了中国人对他们的表意文字的尊敬。另外，传教团的生活呆板枯燥，局促紧张，与丁韪良观点一致的年轻人，无不对此厌倦透顶。早在1853年，他就开始寻找打开中国大门的新方法，使之接受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教育和基督教的上帝。太平天国起义，似乎是一个契机。“暴动发展迅猛，”他给纽约的传教团理事会写信道，“从目前局面看，它席卷整个帝国版图，不是不可能的。或许它将使清帝国的辽阔领土，都向福音传播者敞开。”丁韪良试图进入起义军首都南京的努力化为泡影后，他成了起义军的口头支持者。他眼中的起义者，都是“行动有节制，对事业忠贞不二，蔑视偶像崇拜的人，与放荡的、无神论的或偶像崇拜的帝国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丁韪良乐意接近中国文化，得罪了他的传教团上司，因为

上司们认为，他对中国文化“卑躬屈节”；丁韪良的传道方式也使得他的上司极为不满，因为他主要依靠知识手段，而不纯粹偏重精神方式。最后，在1858年，丁韪良打算在宁波郊区设立自己的传教点的申请被驳回，他愤而去美国驻华公使那儿当翻译。他急于想去北京，看看玉朝的都城。大清帝国的中心。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北京建立了他们的传教基地。

作为公使翻译，他的工作令人满意。在传教事业取得重要突破的当口，他成功地在中美条约中，加入了一条允许传教的条款。正如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他进入了北京，事实证实了他的猜测，北京的确是传教活动的理想基地。他向上司呼吁，准许他在中国首都建立传教团，但这项要求仍未被批准，他只好请假回美国，休息两年。

1862年他再度回到中国，留在北京的决心比过去更大。虽然他的传教团上司仍不同意，不过他使英、法公使，成为他的计划的后盾。1863年，他从朋友那儿借了一笔钱，在北京内城购置了住房，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和一所学校。但是，他企图大规模开展传教的计划仍然未实现——他每年只能招收六、七个信徒。一旦最初的好奇得到满足，除了最贫穷的人以外，一般的中国人就再也不进教堂。学校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愿意跟着外国入科学而放弃仕途之道。丁韪良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家境四壁如洗的穷

人子弟。他们从丁韪良那儿免费获得衣服和食物，聊以度日。

丁韪良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挫折给他的梦幻装上了飞升的翅膀。1866年，他乘骡车到了河南，在这次轧轧作响的缓慢旅途中，他写道：

清晨5点钟起床赶路，夜晚9点方才找到一家肮脏的驿店，一天的路程不过40英里，却使人脚痛如刀割，头痛如开裂。还有什么事比这种旅行更配称为实现梦想而做的准备工作呢？不可思议的幻想在你头上挥舞她的魔杖，过去的记忆与眼前现实融为一体。潜入耳廓的，不再是驱骡夫的吆喝和车轮的轧轧声，而是蒸汽机车的轰鸣，电报机的电键的答。车站简陋的房屋，一下变成一座庄严的车站——铺有地毯的雅致大客厅拥塞着来自各省的人群，票房挤满了焦急的旅客。你挤到前头，听见硬币丢在柜台，发出叮当的声响，好不容易你的手上才捏上了车票。……这时，报晓的公鸡惊醒了你的美梦，你刹时明白，痛苦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丁韪良这些人的心目中，西方的科学“进步”是与基督教紧密相连的。在城乡向穷人传教布道进展甚微，他必然得出结论，西方化必须先于基督教传教，才能导致皈依。西方化欲获成功，需要中国和西方加强联系：公开的外交往来，更多的科学教育，而且不能局限于教会学校，应推广至全国。但是，这种转变只能自上而下，丁韪良继承

了耶稣会教士的传统战略：利用学术在官场中立定脚跟。丁韪良仔细研究了利玛窦的韬略，总结道：“不犯上，貌宜恭，学术为纲。”

丁韪良在寻找自己的“纲”时，获得了罗伯特·赫德的热情支持。此人身居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之职，正在营建显赫的声名。赫德鼓励丁韪良全文翻译亨利·惠顿的《万国律例》。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这本书于1863年翻译完毕，上呈中国刚刚组建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翻译这本书，占用了丁韪良大量的传教时间，他为此颇感歉然。但他辩解道：“作为一名传教士，当其决意为他努力工作的国家寻找幸福时，这样做不是不合时宜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使这个无神论的政府，承认上帝及其永恒的意义。”

中国官员最初对这本书的价值表示怀疑。有人斥之曰：“该书文辞艰涩，一派胡言乱语，倘不当面解释，则茫茫然无从理喻其义。”恭亲王向皇帝奏道：“臣窃以为，丁韪良之目的者有二：其一，夸示外国亦有法度，其二，步利玛窦辈之后尘，俾能在天朝建功立名。”这是对丁韪良的整个意图的准确猜测。假如不是时来运转，他和他的书只会面临湮没无闻的命运。1864年，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依据《万国律例》中的原则，迫使普鲁士释放丁在中国领海捕获的一艘丹麦船。恭亲王承认道：“虽然此书所记之外国律例，与中国体制大不相同，仍不乏有用之处。”除此之外，恭亲王还强调说：“这本书尚有羁縻外国领事之法，可为我援用。”他下令，将此书印300册，分发各省官员。

这显然是传统的老话题——中国固有的“以夷制夷”之策，中国人就是依据这一设想，才延聘了华尔、戈登、李泰国和赫德。1865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是根据皇帝圣旨刚在北京建立的，意在培训翻译人才。丁韪良接受了任命。退掉了传教士应领的那份工资，成为中国政府雇员。他自信，他所译的《万国律例》“影响仅次于《圣经》”。英文教习是一个极能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的工作。

丁韪良的高兴未免太无道理。他所以能当上教习，乃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们在19世纪60年代认识到，他们必须同西方打交道。他们需要西方专家，但这些人必须忠心耿耿，恭顺服从，有益无害。丁韪良为人严谨，做事有热情，其译作被证明用途极大。同时，他又是赫德和美国公使蒲安臣的朋友。另外，他的教育观，颇令某些朝臣信服。著名学者冯桂芬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客居上海读书，就外国的学术成果作过一次全面调查。他指出，外国的宗教书“语焉不详，不值一提”。但西方的“算学、机械、光学、电学、化学等书含自然科学之要旨。地理则通列百余国家之山川、要地、习俗、土产，其详情均为我国民所不知。”冯桂芬补充道，那些混迹通商口岸的中国通事，基本上都是混饭吃的无赖和城市无业游民，为村上的人所不屑一顾。他们充当翻译，乃是因为他们缺乏谋生手段。这些人本性本拙，知识肤浅，德行尤差。他建议雇用西方人，教授精选出来的杰出的中国子弟学外语，鉴于“洋人制器，出于算学”，

因此数学必须列入课程。

曾国藩、李鸿章包括恭亲王这类执掌大权的官僚，十分欣赏这一见解。但是，一大群士大夫却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一改革势必会给社会的道德结构带来危害。“天文算学无裨实用，”士大夫驳斥道，“若由西洋人教授，学而习之，则为害更烈……。立国之道本礼义，而非强权。人心为重，而非技艺。”

面对这些敌对势力，要想办新学堂，唯一的办法是假装这些学堂全无新鲜东西。始建于18世纪的一所俄语学校，此时业已停办，但被证明大有可为。”这所俄语学校的无形财产，”丁韪良评价道，“乃是它的一系列先例和规则。后者可被不受限制地照搬，前者则可时时吁请。要想消除障碍，就得表明新的学校并无特殊之处。”

借助复旧，完全无助于丁韪良设想的那种突破。教了几个月的书后，丁韪良递了辞呈，“坦率地说，”他向其雇主报告道，“只照看10名学英文的学生，除此以外无所事事，就我来讲实在是一件太轻松的工作，我好象在白白浪费时间。”中国人劝他别辞职，保证扩大学校规模，还指出，他现在教的学生，明天就会当大官。中国人甚至向他表明了这种可能，说不定他的某个学生，今后会进宫去当皇帝的英文教师。丁韪良终于作出了理智的抉择，他写道：“这个前景令人欣慰。我人生第一个大目标，乃是建立永久的有力影响。我决意撤回辞呈，虽然我曾走得太远，自告奋勇去找一个接替者，甚至还向富善先生透露了这个意思。富

善先生婉拒了我的邀请，他说，当教习将会使他无法传教布道。我决定在同文馆呆下来，因为中国人保证开发一个远比我在北京路边的教堂更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追求这种难以理解的影响的欲念，导致了丁韪良割断他与传教工作的最后正式联系：1867年，他接受了同文馆授予他的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他将传教工作交卸给了接替者。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同文馆馆长，他正式向纽约的传教团理事会呈递了辞职书。

丁韪良决意办好同文馆。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资金短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付给西方人的薪俸已相当高，还要出钱资助办学就十分困难。丁韪良与罗伯特·赫德协商解决了这一难题。赫德每年从海关收入中拨一笔钱给丁韪良。用丁韪良的话说，“赫德供油，丁韪良点灯。”要点燃这盏灯，意味着丁韪良须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丁韪良先从物理、数学着手，随着员工日益增加，他又办起了化学、生理和医学诸科。学校制度严禁宗教教育。为此，丁韪良只能着眼于长期的传教努力。他相信，一旦中国的原始迷信被抛弃，通往基督教的道路才会畅通无阻。

为达到这个目标，他需要吸引才华出众的学生，并让他们走上仕途。然而，学生们却认为，丁韪良的课程设置不可能带来这一前景，因而不敢相应地投入精力。“他们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学英文，他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汉语上。”一位大为头疼的教师说。这是因为，只有掌握了汉语，“他们才能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

外语、地理和西方历史；第四、五学年学数学；第六学年学机械、微积分和航海术；第七学年研究天文、地质和矿物学；第八学年则了解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

黎明一步步来临。在丁韪良的私人信件中，他一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的夸张手法，严肃地说：“可以认为正在兴盛，”他告诉朋友道，“但正如中国的事情那样，总是慢吞吞的，依靠学校和教员一点点地增加。”相信中国人会信奉西方的先进之物，有时很难。电报教学班即为一例。丁韪良自己花钱，从美国购进两套电报装置。其中一部电台使用的还是摩尔斯电码系统。另一台则有一个字母标度盘，十分惹眼，极易学会。高级官员们正式同意前来观看这两套“巧器”。他们那天上午玩得真痛快。“发送钟声讯号。再把电线缠在钟上，断开或闭合电路，电线之间火花跳跃，钟摆不停摇动，他们高兴得哈哈大笑。”一旦玩够了，竟然无人对仪器的工作原理感兴趣。这些标志着新时代来临的机械装置，最后象“一堆烂木头”，扔在学校的保管室无人问津。

尽管如此，学生中的杰出之辈仍然在缓慢崛起。他们终于在“总理衙门”干上了额外的口译工作。有的人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在70年代后期，有的学生当上了小官，还有的人被派往海外，在中国的公使馆供职。丁韪良成了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其功劳获得了承认。1880年初，中国政府派他出访美国、欧洲和日本，考察这些国家的不同的教育制度。1885年，他被赐官三品。10年后擢升为二品。

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位忠诚的、负责的官员。

× × × ×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挫折，象丁魁良这样的人仍坚守在中国，颇有建树。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坚信从事的事业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但是，另有一类人，他们呆在中国，除了满足个人野心，并无其它目的，因而觉得，在中国生活犹如服苦役，令人失望。一门心思企图在中国发财求功名的傅兰雅，便是一例。

当他还在英格兰当孩子时，他便被父母讲的有关中国的故事，迷得神魂颠倒。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牧师，却对中国向西方开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每次有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商人举办有关中国的报告会，他必到场，全神贯注聆听。遇到这些场合，还总把傅兰雅捎上。“我的父亲，”傅兰雅回忆道，“倾其所有捐钱（资助在中国的传教士），我的母亲，则在一段时间，干脆以大米作为主食。”有其父必有其子，傅兰雅也做起了中国梦。“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上课写作文，我的题目总是与中国有关。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他进的那所学校，“学生均为社会最低层家庭的子女”。傅兰雅的家庭经济随时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他只好在空中建立自己的乐园。“我在布里维里·海德当僮仆，替别人

擦皮靴、洗刀叉，这时，我感到非学痛苦，我下定决心，非要抓住机遇，争取出人头地。清晨，当我揩洗台阶时，我就想，要把每一个谋到手的职务，都用作向上爬的垫脚石。”他终于得到一笔政府官员奖学金，从海德进入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

1860年他从该学院毕业，求到了一个职业：去香港一所教会小学当教员。这所学校培养的中国少年，长大后要作新教传教士。1861年，22岁的傅兰雅，满怀希望抵达香港。他和中国人初一接触，便觉得中国人跟他想象的情形相去甚远。“中国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他们不在乎感情缺乏。他们可以把愿意做的任何事情毫不留情地丢下，除非他们明白无误地看到，坚持干下去可以获得优厚的报酬。他们对不想弄明白的事，都装出一付极端蔑视的架式。”

在香港，傅兰雅开始认真学广东话，这是一种汉语方言。1863年，为了学会讲受过教育的官僚们操的那种官话，他来到北京，当上了同文馆英文教习。他不象丁韪良，他对北京的印象极差。两年后，他感觉商业城市上海的机遇更多。当时，上海已从太平军的包围中解脱。他决计去上海，在那里作“英华学堂”的教员，开始了“把每一个谋到手的职务，都用作向上爬的垫脚石”的徐图。可以肯定的是，教书绝非傅兰雅追求的事业——他把教书视为“单调无味的营生”。他说：“我讨厌教书。但我的父母希望我当教师。只是出于对他们意愿的遵从，我才选择了教书。在老百姓的眼中，学校校长也不过如此。向那些本已无缝的

小脑袋瓜死命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要想从中得到解脱，甚为困难。”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不啻是野心家的天堂。这个港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道长江的最大天然贸易中心，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长江流域的最大物资集散中心。上海被分成两大部分——外国租界和中国城区，因而成为两种文明的交汇点。它具有一切暴发中的城市的全部特点：邪恶、堕落、鸦片、赌博泛滥成灾，触目惊心。1864年，英国领事报告道，在外国租界内的每1万户中国人家，便有668家开妓院。上海还是房地产和商业投机倒把的中心，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大约有50万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市中区的地皮，1852年的售价为每英亩（合6.07市亩——译注）50英磅，及至1862年，其售价暴涨至1万英磅。为了赚钱，西方人甚至把他们万分珍视的跑道，也改建成房屋出租，当然，他们很快又修建了新的体育设施。

在上海，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照样可以闯天下。傅兰雅写道：“谁还有闲心调查你的出身？”西方人在上海，可以过上一种开放的、丰富的生活。傅兰雅拼命使自己的日子，与上海的生活节奏合拍。“我也要买一桶啤酒，每天喝上两杯。”他向他极可能万分担忧的父母写道：“上海治好了我的思乡病和喝茶癖。大量的体育活动和山珍海味，一天喝一杯果酒，两杯啤酒，外加牛排鸡蛋，对我好处最大。我还觉得，人必须经常吃一点开胃药。”他也卷入了投机热。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说：“现在，我的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下

个月，我准备寄价值 250 英镑的茶叶回家，让你拿去倒手。这桩生意可能会蚀本，但我还能赚回来。做生意不冒险休想发财。”但他的神经到底还是不够坚强，他最终把钱存入了银行。

在这种气氛中，在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 20 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基础英语，无疑是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傅兰雅从来把自己视为性急的年青人，殊不知掉进了泥塘。“我的运道已定，老得无法改变了。”他在 1867 年给他的堂兄苏塞的信中悲叹道，“尽管我才 28 岁，但我却老得象 38 岁的人。生活在这么多的中国人当中，我也养成了一些可笑的习惯。我讲的英语变得不伦不类。哪天回到英格兰，你听起来一定会大觉滑稽。人们会把我当成一个可笑的老怪物。”他说，“我极象一个老隐士。”头发谢顶，“不幸的胡须”开始“转为可怕的灰色，照这种速度下去，明年就会一片花白。在这个野蛮的国度，我已活够了。”“我的确与世隔绝。”他向一位朋友诉苦道，“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我过的是一种充满动荡的邪恶生活。我的父母对我唯一的安慰是，‘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但我觉得，我的苦未免吃得太多了。……我几乎没有闲暇，唯一的乐趣是散步。这就是我何以郁郁寡欢的原因。”“我太厌倦教英语了。”他在教学年度报告中，把一腔怒气，发泄到校长身了。“教学生活单调乏味，令人深恶痛绝。一月又一月苦不堪言，还见不着稍许可资安慰的成果。”

传教团对傅兰雅寄予厚望，以为他能耐心地向异教徒

传播福音。殊不知他对这些工作毫无热情。在英国时，他也曾想当一个象他父亲那样的传教士，到了中国，他却只满足于每天向学生念一段圣经。他认为“介绍基督教只能小心翼翼、循序渐进。只有这样，基督教才有可能被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受到欣赏。倘若一开始就急于求成，委员会考虑中的建设学校的方案，将会被中国人彻底误解。”汤若望、南怀仁和伯驾，也曾这样警告过。不过傅兰雅满怀希望地补充道，“利用间接方式传教所能取得的广度和深度，才会大大超过预期设想。”不过，傅兰雅似乎也不敢太自信。他对校长说，在任何情况下，他“目前都无直接或间接与传教团发生关系的愿望。”他好象准备减轻因这种态度引起的别人的忧虑，也好象打算彻底脱离传教事业，他说：“我对我所观察到的一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的这种权力不容置疑——当然，传教团不受此限制。我是多么地热爱和尊重它呀。我猜我很快就会四处漂泊，天知道我会到什么地方去。”

挫折使他分外怀念家乡。“在家乡寻一个安静的小村庄，找一个轻松的活计，拿一笔过得去的薪金，娶一个可爱的女人操持家务，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与我目前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他念叨着“玫瑰花和忍冬花”，盼望着“在乡村当绅士，娶一个有钱的太太。”他十分清楚，这不过是一幅臆造的图画，真正在家乡定居也不是那么快活，他眼下的地位对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要有利得多。他说：“倘若身体强健，意志坚定，就应出国闯荡天下，这样才能有所建

树。不过，这需要度过无数难关。象我这样在国外呆了6年的人，即使回国，也无异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我在中国养成的各种习惯，至少要两三年才能戒掉。长期滞留外国的人，回到英国是不会幸福的。”回国等于承认失败。

本能告诉他，必须在中国坚持下去，必须学好汉语，以便把握将来的机会——下一个向上爬的垫脚石。“我认为，我命该在中国呆下来，我已学了6年汉语，懂3种方言，了解了书写的一般规律，假如我把这一切扔掉，就等于我把时间白白抛弃了。另外，我在英国又能找到什么工作呢？而中国目前才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它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进步。两、三年之后，我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就将成为无价宝，人们会说我人才难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褒奖么？”

问题在于有没有时间和耐心。“许多来华的外国人，都以为他们一年就可以掌握汉语。他们请来教师，头一个星期或者头一个月，学习非常认真，接着便万分厌烦地不再学了。”相应地，他们犯下了可悲的错误，也抵消了他们平时的努力。傅兰雅告诉他的堂兄，他曾听见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上海的一位传教士在布道时向中国听众宣布：“耶稣基督也在此地。”此公语调含混，发音不清，结果使得惊奇万分的听众，把他的意思误解为：“上帝在里屋剃头。”如果我在位，任何传教士，不花5年时间与人民共同生活，弄清当地土话，休想向公众布道。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如若不信，就请看看基督教是怎样沦为传教对象的笑柄的吧。”傅兰雅认为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我的汉语水平，”他告诉

他的妹妹道，“以及人们传说的我掌握各种土话的超凡能力，还有我的文笔，我作为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的主编，理应使我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我在中国已经名闻遐迩，这恰好是不少比我能力强的人想得到而无缘得到的东西。”

这份“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是傅兰雅弓箭上的第二根弓弦。这份报纸名曰《教会新报》(Mission News)，是在1862年创刊的，在传教士中素享盛名。傅兰雅于1866年出任主编，他的志向甚高：“我意欲使该报获得成功，随着它的发行量进一步扩大，我将使它在启蒙中国的事业上建功立业，让万世景仰。我下决心一年内将其发行量翻一番。”1867年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报纸刊登的文章和社论中，他竭力使中国读者，对西方的事情，科学和教育感兴趣。他向清廷建议，清政府应让中国学生花3年功夫学外语，然后派他们到欧洲各大学留学。他的文章被广州和香港的报纸转载，他估计道：“至少有5千名中国士大夫读了我的文章，他们的妻儿子女，也会对我的看法感到新奇。”傅兰雅的确喜欢办报纸，他从中寻到了乐趣，也改造了自己。谁知1868年春，他忽然离开了报界。“官员们担心，倘若他们继续让我当一个颇有名望的政府雇员，同时又担任报纸主编，其后果难以逆料。……近来，这种压力又加到了我身上，不过附带了一个正式的条件。他们要我答应这桩交易。……我别无选择，只好无可奈何地辞职。”所谓的“政府”和“官员”，当然是暗指中国人。而傅兰雅

企望的机会终于来临。他很快辞去了“英华学堂”的教书之职。

中国人给傅兰雅的职位，是去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当科技翻译。傅兰雅欣然应允。江南制造局生产军火，同时还开办了一所翻译馆和一所外语学校，专习译书和培训译员。江南制造局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前夕，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力主创办的，同时也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这场运动，还导致了建立总理衙门和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还满怀希望地向北京提供外交武器。正如曾国藩1862年疏陈制造局情形所云：“若我国欲求自强之法，需以改革吏治及选拔聪颖子弟为急务，以可造炸药，火轮乃至其它制器之技艺为首要。倘若我国拥有此种技艺，则洋人恭顺，我亦有法还其惠，倘洋人逆凶，则我亦有法制之。”

曾的兴趣还扩大到译书上。“另主学馆，以习翻译。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字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李鸿章发挥了曾国藩的观点，指出日本因学制，故能强盛。他警告道：“倘若我无自强之法，则东洋人势必效法西洋，谋求与西方利益均沾。”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支持这些观点，表奏皇上：“当此之时，我南方各省之军力大增，西洋人乐意炫耀其技术之利，何不趁机研习西洋制器火器之术，以明其秘诀。……洋人对我友善好恶，均以中国国力强衰而定。”

这些论调基本上都言之有理：西方获取军事胜利的一

个关键，是拥有现代武器，翻译将导致对西方科技作深入了解。日本正在飞速崛起，成为中国的潜在威胁。同时，有一批类似傅兰雅这样的人，“乐意”帮助中国强盛。然而，一场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势必要求全面评估清廷的经济和教育体制，对此，清政府是不愿干的。相反，清政府把这件事交给地方官员，他们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却对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缺乏了解。

傅兰雅在 1867 年也曾被要求这样看待问题，但他未被说服：“冯桂芬这天上午与我谈了一小时，他的观点近乎荒唐。很明显，他本人对究竟要干什么也心中无数，因而也拿不出工作计划，他建议从‘道台’的学校调出 10 名学者，由我在制造局教他们蒸汽机原理。我指出这一建议全然不可行，他似乎很生气。他坚持要我去制造局调查一番，甚至提出，他宁愿把‘交椅’让我坐。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但是，中国人决定长期任用傅兰雅，毕竟使他受宠若惊，不再怀疑工作的可行性。长期被教室大门锁闭的天地豁然开朗。这无疑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挣脱了桎梏，象鸟儿钻出雀笼，翱翔天空。”他向其堂兄苏塞如此说。虽然他本人对科技知之甚少，但他还是象学汉语那样，一点一滴地下苦功钻研，而且乐此不疲。“我现在开始做我非常想做的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头开始。……上午，我研究煤炭及其开矿，下午则学化学，晚上学声学。”他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希望再次苏醒：“我觉得抛锚是一种乐事。

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实在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我的年薪是 800 英镑，凭此收入，我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我人生新纪元的开端。精益求精是我的格言，但我的追求远远不止这点。”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打算将这一职位，当作在中国谋求更高官衔的跳板。我的志向无边。我的职位完全是独立的——什么领事馆，海关，都无法管辖我。”

在未接受这个职务前，傅兰雅向西方作出了最后一次姿态。他给卫三畏主教写信道：“关于我在另外地方传教事宜，业已举行协商。但是，鉴于我到中国来的初衷是进行宗教活动，假如我有一个固定职位，就能把全部时间服务于耶稣基督的事业，让我从事纯世俗工作，总觉不相宜。”他表示他愿去内陆传教，而不仅仅局限于沿海通商口岸。

傅兰雅的主动表示未能引起重视。他以清醒的意识转而喜欢他的“纯世俗工作。”他在城郊租了一所漂亮的小院，和妻子安娜定居下来。每天，他高高兴兴地坐半小时轿子穿过田野去制造局上班，傍晚方才回家。他拿出一些收入购置天文望远镜，了望星空，自得其乐。他还承认用望远镜窥视过远处住家亮着灯光的窗户。得意之时，甚至去附近的尼姑庵吹拉弹奏。他与西方人断绝来往，“因为他们难以达到择友标准。”他与朋友共同负担车马费，开始在城里留下名片。“上海帮派风盛行，我也属于某个集团，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国人确实把傅兰雅

带上了世界舞台。

为了求得进一步高升，傅兰雅做事相当卖力。开初，他用强烈的屈尊俯就态度，看待与同事的关系，尽管他承认他钦佩这些人。“有个最年轻的中国人与我关系最好，他把我视为兄长，什么话都讲给我听，他无疑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中国人。相比之下，我在许多方面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子。我们有时可以就一个观点争论半夜。他教我如何上桌进餐不失风度，他的确是个好搭档。”那时，应付工作勿需花大气力，“我没有竞争者，原因很简单，谁也达不到我的水平。我真希望有那么一、二个人向我发起挑战，促使我振奋精神、克服散漫。有时，我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工作。官员们看起来更象小孩，而不是大人物。”

不过，他相信翻译书籍能给他提供巨大的机会。为安排另一个西方人到江南制造局工作，他甚至讨好说：“我以为传教团采用的各种方法都不可指责，尤其是它开辟的接近中国那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道路更是不可厚非。除了照传教团的方法行事，其余的途径均为死路一条。”1869年夏，他觉得江南制造局有希望帮助古老而衰弱的中国进步，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大进军”轨道……。“就我而言，我已是半个中国人了。在这儿住了8年，我已不再思恋故乡……。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他已与中国“荣辱与共”。

傅兰雅不愿做任何违忤中国的事，以免危及他的新职业。他的家庭不幸即为一例。1869年8月，妻子安娜生下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临盆时，安娜染伤寒，生命垂危。结果新生儿只活了8天半便夭亡。病体未愈的安娜，因儿子夭折极度悲伤（傅兰雅也悲痛万分），医生劝她出去旅游散心，傅兰雅不同意。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解释道：“医生叫她去海上旅行，我无法扔下工作陪伴她。”安娜只好搬到邻居家权且小住，那儿的空气稍许新鲜。她的健康恢复缓慢，且反复多次。傅兰雅依然不间断工作，他不敢向中国人提出请假几周的要求，他知道中国官员对丧婴司空见惯，他们更没有海上旅行康复身体的传统。他担心请假会引起中国人的不快，甚至怀疑或发火。

傅兰雅对1870年6月天津大屠杀的反应也令人惊讶。是时，法国领事枪杀了一名中国人，全城老百姓都被暴行激怒了。人们烧教堂、砸洋行，杀教士和修女。此前，一些反西方的中国作者，散发了不少煽动性的小册子，说牧师布道后，就与女信徒通奸，还有人在教堂内干鸡奸勾当。荒淫无耻的修女偷吃育婴堂的孤儿。大多数西方人未能看到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出现所带来的分解性效应，才是造成这场暴力事件的根源。他们骇得魂飞天外。丁韪良甚至写道，整个暴乱地区都应被夷为平地，把它没收过来，赔给法国人。然而傅兰雅却同情中国人的观点。他于1870年写信给他的兄弟道：“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个个怕得要死，他们急匆匆地组织卫队、操练、备战。其方式之荒唐、速度之快，足令中国人哂笑。实际上，商人们和领事们完全无需害怕，只有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人才危险，因为他们的所

作所为，实在让中国人反感。因此我断言，目前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形，并不奇怪。”

这种态度似乎很讨中国主人欢心，他们在疏远傅兰雅的西方同事之时，并未不分青红皂白，对傅兰雅有所歧视。同年，傅兰雅写道：“我在制造局的地位变得异常微妙。有不少人卷入其间，想避开这场争端非常困难。制造局共有10个西方人，他们把我当成叛徒，因为我在中国人中间有耳目，可以随心所欲说话做事。他们对我十分嫉妒。”傅兰雅仍然盼望获得提升，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捞个一官半职。他最希望“奉旨在伦敦办一所中国学院，”或者“至少率领一群年轻人，去欧洲详细考查我们的各种艺术和制器。”但是，中国当局并无委他重任、控制中国官吏之意图。

傅兰雅时常过高估计他在制造局的影响，以为他努力工作，定会带来令人称羨的奖赏。他给自己兄弟，描述了他和制造局官员的一次交谈：“今天，他们来找我，要求我给枪火帽和炮管制造氯酸盐。这不过是一天的工作。他们盯得很紧。完工后，我请他们试验，他们显得十分兴奋。”傅兰雅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他在中国当局眼中，不再是仅能制造“奇技淫巧”的匠人。同样地，当制造局组装的第一艘火轮成功地下水后，傅兰雅在信中夸口道：“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指曾国藩——译注），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道试航。”谁知，他望眼欲穿的请柬并未送来。

中国人没有提拔他，没有给他加薪，也没有给他分派

更重要的工作。他们只是让他完成聘用他时规定的任务。傅兰雅再也无法说他在白费光阴了。“我的工作日益繁重，”他于1870年底写信道，“我不得不加大我的研究工作量，才能与我必须翻译的书的知识保持同步。”以后10年，他在中国同事的协助下，共发表了至少34种译著。有9本专讲制造工艺，6本数学专著，6本军事史，4本航海术，3本测量工程；化学、物理书各1本，还有1本医书。从1880年至1896年，他又推出译著74本，不少是已涉及过的课题，但也有新学科，例如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他还编纂了一本技术术语词汇字典。

这些译著中，有的发行量至今可查。一般均在千册左右，基本上为受过教育的、或者有地位的中国人购去。傅兰雅承认，1879年所售书之总量——31111册——是个令人沮丧的数字。“迄今所卖出的书，虽然数量可谓不小，但与这个国家的众多人口相比，仍然低于当初设想。考虑到缺乏正常的交流手段、没有邮局和铁路帮助，没有中间商撮和、没有广告等宣传手段，书籍滞销还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著作毕竟译出来了，仅此一点就值得额手称庆。“翻译馆得以成立，并长期为政府支持，这件事本身便雄辩地证明中国有希望。无论她对自己古旧的文学传统多么自豪，无论她对西方列强的外交官多么憎恶，对传播外国宗教的传教士多么讨厌，她毕竟看到，科学是超越国界的。正因为如此，她甚至宁愿让‘蛮夷’教会她不懂的，然而对她至关重要的知识。”傅兰雅坚信：西方的知识有

“上瘾”的功能，“天朝的人只消喝一口，就欲罢不能，”因而他们对傅兰雅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大。

在寻求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中，傅兰雅不只把努力局限于译馆，他还想尽千方百计，把西方科学的全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于1876年开学。设立这个学术机构的目的，“是以最实际的方式，引进西方各国的科学，艺术和制造业成果，以引起中国人注意。”书院固定展览科学成就和机械仪器，开班设讲，逐渐成为一所技术图书馆。不过，书院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不少样品无钱推广应用。学生人数也少得可怜。《华北捷报》指出，书院“仅在一些陌生的访客中有名气。这些访客耳闻其在外名声，但脚步一跨进书院，却发现殿堂空空如也，到处呈现早期衰败迹象。”傅兰雅按照他在60年代办报纸的做法，设立了优秀论文奖。此举的目的在于“奖掖和鼓励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科学，为中国所用。”这个活动引起了积极响应，寄来的论文质量上乘。傅兰雅还编发了一份中文杂志《格致汇编》，专登科普文章，诸如介绍日本如何利用西方技术、电锯、牙科学；还介绍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诸公生平事迹。杂志颇受欢迎。在这份不定期刊物上，还开辟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读者通讯栏，意在表明它激起了读者的普遍兴趣。有一家西方报纸载文挖苦道：“把西方书籍中所写的知识，用轻松、免费的方式加以转载，仍只能使极少数中国人理解和感兴趣。”最后，傅兰雅还努力地使译文的科技术语标准化。他是通过“中国

教育协会”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890年，傅兰雅担任总编、经理委员会主席以及出版委员会秘书。他具体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印刷术、电镀工艺、化工仪器、哲学、铸造工艺、枪炮制造、造船工艺、开矿和土木工程等学科的名词规范化工作。”

很清楚，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欲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狂热、散漫无序的做法，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洋务运动”始终未能真正掀起，它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场试验、而非一次运动。付诸实施的那几个项目——创立江南制造局等几家军火厂，几家棉纺厂、造船厂、纸厂、煤矿，几条不太长的铁路、一家轮船公司，不过是一系列孤立现象。若要实现真正的产业突破，需要政府对各种项目加以有效协调，需要有胆识的企业家。企业家应有行动自由，资金来源有保障。而这些恰恰缺乏。清政府只允许几个人在“官办商管”的统一控制下活动。这意味着初露锋芒的企业家的成功与否，全赖地方官员的德性好坏。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传统的官僚组织手段，缺少资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丧失活力。

1896年，傅兰雅离开了中国，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当教授。当时，中国未能通过零星地吸收西方科技，把自己从外国侵略中解救出来，已是明显的事实。俄国在北方施加压力，英国插足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法国在南方启衅。更糟糕的是，中国于1894年和日本打了一场短暂的战争，结果大败亏输，受尽凌辱。中国

的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在表面拾取一点西方技术牙慧，远远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必须在更深层次挖掘原动力。正如年轻的改革家谭嗣同（此人因持破坏性观点于1898年被清廷处决）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云：“君之谓西洋名物，已为君所见，无非是电报、火车、枪炮、鱼雷、纺织机等。然君全然未料西洋之法制和宪政之美也……。君所言者仅西洋名物之枝叶，而非根本也。……迄今中国人之情感、习俗、政制，无一物可与西洋比美。”

傅兰雅为中国人辛苦工作了28年，仍处于臣仆地位。不用说，他接受加州大学教授之职，虽然也是一块“垫脚石”，然而难道不是承认他先前的努力，终归黄梁一枕？

中国耗去了他的最佳年华，并以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利用了他。作为酬谢，中国人付给了他可观的工资，赐给他三品顶戴。一旦最初的激情消逝，生活并不比当小学校长好多少。傅兰雅对其一生之总结，充溢悲愤凄凉之情：

翻译和编纂科技书，一度为外国人所从事的最枯燥、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加之制造局地处荒郊，更觉无味。中国的这片土地弥漫着压抑人的气氛，全靠神灵指引，认识到这项工作可使伟大的中国理性复苏、活力再现，方才咬牙挺住了这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

其实，真正使傅兰雅含辛茹苦的动力，是他满怀论功行赏、加官晋爵的希冀。傅兰雅于1870年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擢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

仍然低于我的设想。一位与之友善的中国官员深知其用心，赋诗一联，以旌其美：

电火亮荧虫，
声名盖南汤^①

惜乎南柯一梦：傅兰雅从 28 年的经验中顿悟：中国人不过在利用他，而不是相反。当他看清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后，便毅然离华。

与之对照的是，丁韪良要么未明白、要么对这一点毫不在乎。他美梦幻灭，依然盘桓中国。1894 年赫德警告他道：“我担心我们在修补一口裂了缝的锅。”那一年，中国被日本打败，东师大辱。1898 年，皇帝变法失败——本人被太后软禁，倡导变法之廷臣伏尸授首，或亡命他乡。这一切似乎印证了赫德的忧愤预言。至于“义和拳乱”更无人逆料。是时，西方的看客们，正被戏院上演的挖苦中国的节目，引得放声大笑：

中国岳弁，
手握纸扇。
三呼万岁，
誓日指天。
锣鼓齐鸣，
开赴前线。

义和团的口号是“保国、灭洋、杀教”。及至 1900 年，

① 即南怀仁、汤若望。译注。

义和团运动得到朝廷的公开支持。其原因是，它不堪忍受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越来越多的要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享有特权的要求。6月正值丁韪良来华50周年，但他却和死里逃生的外国人被包围在北京公使馆内。

他的最初感觉是羞愧万分，继而怒火冲天。他回忆道，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我在公使馆遇到赫德，我们相对无言。我们的脸因屈辱而变得通红。我们万没有料到，倾其一生为中国做出业绩，到头来得不到中国人的尊重。这位把中国的海关收入从年3百万两银子增至3千万两的人，中国人照样要取他的头。我教授了30年的国际法，他们理应懂得，外交使节的性命不应受到威胁。”随着围困形势日趋恶化，丁韪良觉得，确实值得采取果断措施了。他并不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以为中国人绝望地在用武力对抗武力，相反，他觉得西方人“成了异教狂热的牺牲品，那就让这个异教帝国，被基督教的西方列强分而治之吧。”

联军击溃了包围，义和拳民四处溃退。清政府屈辱求和，支付巨额赔金。丁韪良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他说，清廷侮辱人性，“把战争强加于坚持人类进步原则的人头上。它把自己置于文明的对立面，丧失了它先前在世界各国中享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鉴于中国人“注定应被外人统治”，因此最符合逻辑的步骤必然是允许英国和其它西方主要大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接受行政权。“中国的独立既不可能、又不可取。”美国应该接管南中国海岸外的海南岛。“我不赞成帝国主义这个辱骂性的名称，”丁韪良宣称，“但

自然扩张和增长实在是另一码事。……通过自然增长，我们的疆域会扩大到太平洋，从而能对中国和日本施加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仍然不明显。现在机会来了，上帝不允许我们坐失良机。”

然而，丁韪良在中国住得太久，以至他无法现在就抛弃它。他又开始收掇被打碎了的计划。他首先重组囊空无物的北京大学（他于1898年任该大学校长），直至中国政府决定把外国人从教职工中清洗出去。接着，他又受邀去武昌组建一所新大学，但这个计划也中途夭亡。最后，他重返北京的长老会传教团，支持丢弃若干年的从基层发展教徒的日常工作。

耄耋之年，他看到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就大声疾呼过的教育和吏治改革，终由清政府缓慢地开始实施。他固有的乐观主义又开始占上风。现在，中国必须有所动作。“所有的改革都离不开教育，中国的命运系于教育振兴。铁路、报纸、电报将给学校校长消弥偏僻之地的呆钝萧瑟之气助一臂之力。学校将给中国人开辟一个远比他们的村庄更广阔的天地，比他们的家庭更高级的观念。科学与真正的宗教，将激励中国的活力，不消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会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他后来患支气管肺炎，仍守北京，89岁而终。诚然，他未看到那种建设性的改革成功，但西方人和义和团民毕竟成就了一桩视之为当然的伟业：“走向新纪元之路业已开通，新世纪可望在20世纪崭露曙光。”但是，它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意义上的新时期，还须拭目以待。

第六章

被砍头的美国人和“耶鲁中国计划”

义和团暴动时期，美国耶鲁大学 1892 年毕业生、年轻传教士彼得经，被中国人斩首示众。他的一些同学，“决心以耶鲁人的行动，证明彼得经的血没有白流。”这些年轻人狂热地投入了 19 世纪末发生的校园内的大规模传教复苏运动。他们个个态度真诚，天真无邪，勇于献身。“回首当年，有两点叫人永志不忘，” 1898 年毕业的一位校友写道，“第一点，我们的自信达到顶峰。一群既无经验、又无背景的年轻人竟跑出校园，告诉世界面临危机；第二点，就是在这种极不适当的基础上获得的成果。”

他们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了 1902 年，共募得 17000 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取名为“耶鲁中国”的那个计划，就是由这个团体制订的。“独立管理，工作非教派化，”耶鲁大学校长在那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

说，“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中国的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为此目的，他们准备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这个团体自办的小册子则强调，传教团的目的“是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

传教团的组织者把目光投视在中国湖南省会长沙，决定将这个城市当作活动大本营。本来，诸如北京、上海这类城市更适合开展活动，因为传教士们办的教会学校，已在某种程度为中国人所接受。但耶鲁人不愿坐享其成。湖南排外倾向强烈，长沙更是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除了各种传单，”美国领事报告说，“还出现了用异常恶毒的语言书写的大标语。任何人看了都觉得俗不可耐的漫画，居然高贴墙上，必须搭梯子才能将其揭下来。”

煽起排外情绪的，通常是当地士绅。1870年天津大屠杀时期，当地人主要把传教士描述成荒淫无耻之徒，现在又增加了经济内容。“洋鬼子不分青红皂白掠夺国民的财富，他们要把我们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据为己有。因此我呼吁，凡听到我的号召的人，都应奋起斩杀洋鬼子和他们的官员，无论是洋学生还是洋崽子，通通格杀勿论。”

由于美国辛迪加在处理湖南铁路拥有权上采取了不道德行径，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反美情绪。湖南的反清运动也规模宏大，革命领袖黄兴认为，湖南的秘密社团，“犹如一枚装满炸药的炸弹，只消我们点燃引线，随时都可以轰然炸裂。”美国通过的禁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法案惹恼了中国人，美国货受到了大规模抵制。湖南总督张之洞甚至威胁

道，凡国人向洋人出售、转租财产，均以没收论处。美国总领事这样形容 1906 年的湖南形势：“这儿表面上犹如一幅夏日风景画，宁静而平和，但半小时后，倏忽刮来一阵龙卷风，灾难刹那间落在你的身上，而且没完没了。”

然而耶鲁传教团的成员们并不畏惧。他们坚信障碍必将被扫除。他们在寻找“具有未来重要性的领域”，那怕这样做意味着“跋山涉水好几年”，亦在所不辞。1902 年，义和团暴动被彻底全部平定，外国人获得了条约规定的在中国内陆旅行的权利。杨笃信——一位努力不懈的传教士——发出号召：“到长沙来吧！这儿大有可为。”传教士们闻风而动，积极响应，一窝蜂涌进长沙。

一位观察家写道：“那劲头活象冲向一块新发掘的钻石宝地。人们无视种种困难，纷纷表示愿在这块处女地耕耘。”由于来者甚众，以至于一位在华的耶鲁人警告道：“耶鲁传教团业已组成，中国的最后一块土地实际上已被划分。传教士的礼让精神势必成为我们深入的障碍。”可是，他的担心并无根据。1903 年 6 月，湖南传教士会议通过一条决议：“大会向耶鲁大学传教团发出诚挚的邀请，请他们莅临长沙建立中国教育中心。大会建议，在长沙工作的各团体，宜将其在科学、艺术、医学诸领域的高等教育工作，委托给（耶鲁）传教团。大会还建议，各团体应尽最大努力，推动小学教育，使之与耶鲁大学传教团的高等教育计划标准相吻合。”

1904 年，耶鲁大学传教团的首批人员抵达长沙。1906

年，他们开办了耶鲁中学，这是跨入“耶鲁中国大学”的预科。“尽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并不准备将基督教教义，强加于学生身上。”学校决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品德，教育学生忠君爱国。”学校对中、西学都一视同仁，但特别强调掌握英语这一现代教育的首要手段。同时，耶鲁传教团还拟定了建立医院和开办医学院的计划。他们延请耶鲁大学1897年毕业生、攻读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胡美担任主持。

当时，胡美正在印度从事鼠疫预防工作。印度是胡美的祖国，他父亲和祖父在印度当过多年的教师和传教士。开初，胡美并不乐意接受去中国的邀请。“印度是我的家，”他后来回忆道，“我喜欢为印度效劳。但耶鲁邀请信的内容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你将在中国开办并主持耶鲁大学医学院。’这正是我多年的夙愿。……印度没给我这种机会，它的主要省份的省会，都有官办的医学院。……我在印度工作一辈子已不可能。中国说不定是希望所在。经过几周考虑，我决定动身去中国。”

胡美于1905年抵达中国，时年25岁。他通过一年汉语强化学习，来到长沙组建医院，并以此为基础将其扩大为一所医学院。他面临诸多困难：暗中的排外情绪；随时可能遭到袭击；租不到地皮；城市的封闭和落后等等。胡美对“耶鲁中国计划”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掌握学生，掌握读书人，”胡美到任后不久写道，“中国就会成功。”成功，他解释道，按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宗教，意味着中国

人变为真正的世界公民；成功，不仅仅是取得技术进步，“还包括掌握更进步的知识，以基督教的教义，激励起道德的力量，奠定性格的基本成份。”毫无疑问，这必须经历一番苦斗，“人们需要教育，这是不可变更的事实；只要可能，他们会尽量避免从西方人那儿获得知识，同样是不可变更的事实。”然而，“耶鲁中国计划”的希望，恰恰存在于这种阻力之中。因为“人们的保守观念将不可避免地阻滞我们进步，虽然如此，却促使我们在出发前，把自己的立足点筑得更结实。”

与外面世界相比，长沙等于死水一潭。但在湖南人的眼中，它却是宇宙中心。这个有2千万人口省份的省会，因其学校林立、机会众多而名闻遐迩。“我一直想去长沙，这是一个大城市。”毛泽东在后来向采访他的人如此说。他回忆了他的童年，“人们告诉我，长沙是个大得很的城市，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学校，还有总督衙门。总之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梦寐以求想去长沙！”他果真去了，成百上千的心怀大志的青年学生云集长沙。

“耶鲁中国传教团”打算从中挑一批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医学，让他们向上帝靠拢。尽管福音传教士面前的道路条条畅通，但胡美则坚决认为“医疗工作……是向中国任何地区输入传教的最肯定、最有力的途径。”他决心遵循西方的最高标准行事。“这极可能是一大失误，”他在给耶鲁理事会秘书长的信中说道，“因为医疗工作只能按最科学的路线才能实施。对我们来说，这意

味着只能遵从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我们的医疗及其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最强大的教会影响，按照教育、科研的最高知识、最科学的标准进行。”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胡美也清楚这一点。他开办第一家医院，租用的竟是一间旧旅店，位于耶鲁中学对面。他们无一遗漏地遍洒杀虫药粉，粉刷墙壁，修阴沟，安门窗，迁走猪圈内的猪群。胡美带着两名未经培训的助手，作好了“耶鲁诊所”开张大吉的准备。1906年11月，在简单的开业典礼上，一位中国牧师向好奇的观众诵读了耶稣在贝塞斯达湖救灾救难的故事。”湖边躺着许多残疾的人，‘你想康复吗？’那人肯定地点头。耶稣说：‘站起来，收起你的床，往前走！’那个人立即肢体齐全。他收好床，果然能走动了。”

这是有力的、充满挑战意味的类比，夹杂着含义复杂的暗示。在圣经故事中，耶路撒冷的居民并未因耶稣基督救死扶伤而对他交口礼赞，相反，人们批评他命令病人在安息日扛床行走。如果胡美有意想避免中国人的敏感，他就应对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广博传统知识持小心谨慎态度。病人来得极少，即便来了，也是疑神疑鬼。对胡美来说，没有重病人反倒安全。一旦重病人死在诊所，那么全省人的愤慨都会降临在他头上。首例危重病人看来医治无望，被送回病家。但另一例终于一命呜呼。胡美及其助手，用双倍价钱替丧家买了一付棺材，方才免除了灾祸。来诊所就诊的第一位重要病人是一个政府官员，他怒气冲冲拂袖而

去，因为胡美只摸了他的右手脉，这显然与中医的作法大不相同。甚至那些投医无门的病人，一见胡美他们的这种作法，也不由退避三舍。有一次，胡美看见一位中国母亲替失去知觉的孩子招魂。有位中国朋友告诉胡美：“你必须弄明白，凡是哪位中国母亲把人事不省的孩子送进你的诊所，就证明好的招魂法业已失灵。她在回天乏术的情况下，才会求助洋医生。”

尽管如此，胡美他们的工作仍然取得进展。他们治好了兔唇、白内障和肿瘤，极大地消除了当地人的怀疑。他们逐渐开始收治重病人。胡美是个敏感人，从心眼里喜欢中国人，他费尽心机学习中医技艺，他经常承认，中医有时比西医更具神效。他尊重病人，相信自己对他们会逐步加深理解。胡美写道：“在中国，死神降临，如同其它事情一样，都是命运轮回的一环：昼夜交替，月盈月亏，寒来暑往，生死相随。办丧事不单单是一种夸耀，不是为了显示祭品丰富、嚎哭悲切，挽幛考究，而是对生命体的真正礼拜。人们千百年来信奉这个仪式，以冥明交替循环，向继续生存的美好与庄严表示敬意。”

胡美出诊的次数渐渐增多，诊疗对象主要是长沙的豪门大户人家。有时，还有人请他与中医一道会诊。1908年，一位在上海接受过美国长老会培训的中国人候医生加入了诊所，人们对诊所的信任感大增。两年后，又来了一位颜医生。颜医生的到来预示胡美盼了多年的生气勃勃的新中国的出现。颜医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医学院，又在英

国学习过诊治热带病，在巴黎、柏林、维也纳视察过现代医院。在这些中国人的帮助下，胡美避免了许多失误。

胡美觉得他终于挤入了复杂的中国社会。他的医术似乎超越了国界，扫除了敌意。他在当地商人、手艺人中广交朋友，与他们作彻夜长谈，他甚至通过行医，与这些人做成了盈利颇丰的生意。依靠多方面的接触和精湛的医术，他平安度过了1910年出现的可怕的排外骚乱。当时，长沙的外国人的财产均遭破坏，胡美及其同事们也被迫逃命，但当地居民却日夜照看着诊所房屋。胡美回来后，发觉诊所不仅皮毛未伤，连仪器、私产也无人染指。美国付领事为此评论说：“这是因为E·H·胡美博士受到人民普遍尊敬的缘故。”这位副领事说，政府军队对于骚乱未采取任何措施。“但当耶鲁传教团的人请求军队保护时，军队欣然应允。其它外国人无缘享此殊荣。”

当然，胡美有时也误会了他的中国朋友的友好姿态。当谭延闿邀他出席“文学社”座谈会时，他欣喜万分。他万万没料到，当时作为年轻政治活动家的谭延闿，正在从事让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活动。好几年后，胡美才知道，邀他出席会议，只是一种掩护。谭对他说，“你们洋人不知道，这些集会集中了全省的激进分子。待西方人离开，其他的与会者才开始谋划举事。”谭说，邀请西方人的目的在于消除当局的怀疑。

“举事日”——推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来临。中国革命家孙逸仙为推翻清王朝奋斗了

10年，他要把清朝统治者赶下王座，在中国建立共和制。为此，他发动了若干次起义，均遭失败。孙的革命党得到华侨最广泛和最有力的支持，中国的青年激进分子对他更是衷心拥护，甚至在清王朝军队的下级军官中，孙也不乏同情者。10月政变，实际上是对一次意外事故的成功的武装反应。当时，孙本人正在美国从事募捐活动。在武汉的革命起义者的总部内，有人不小心用烟头点燃了一枚炸弹引线，产生了爆炸。政府军队开来清查事件，士兵们先发制人，举行哗变，很快控制了全城。他们的成功引发了其它地方的兵变。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清王朝无法控制局势，军队也抛弃了他们，皇帝只好宣布逊位。孙逸仙旋即被提名为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总统。

这一急剧事变，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此时，胡美恰在美国为医院筹资。“机会来临，”他听到消息后写道，“1911年的选择为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敞开了大门。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从此将领导中国。中国将对西方的无私赠予表现前所未有的热情，对塑造完美的个性，教育，对任何种类的建设性援助持欢迎的态度。”胡美对前程所持的乐观态度，又因其耶鲁同学爱德华·哈克尼斯的慷慨解囊而如虎添翼。哈克尼斯是个百万富翁，他同意给“耶鲁中国计划”一所设备齐全的400个床位的医院。他还作出了如下许诺：“这所医院应办成医学教育中心，因为我首要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行医。它应成为长沙人民的家珍，他们管理它，支持它。这座医院必须修得坚固耐

用；一劳永逸，因为我不打算支付维修费。”有了这一笔意外收获，狂喜的胡美飞鸿颜医生：“当您看到医院的蓝图时，你一定会高兴得发疯，因为在中国，没有哪家医院可与之媲美。”

长沙耶鲁诊所，被革命赋予了新地位。它一跃成为湖南地区的红十字中心。接管了全省政权的谭延闿，看来也一步步在走旧军阀的老路。他杀死极端的革命分子，宣布湖南归入共和。为了表明他的政权的进步性，他指示耶鲁诊所开展禁烟工作和为防治鼠疫的中国学生体检，他延请颜医生担任公共卫生主任。胡美力劝颜医生赴任。胡美说：“那怕我们开始时一事无成，我们至低限度可以阻止政府不做坏事。如果我们辞不就职，那么从日本回来的狂热学生，也很可能把我们的整个计划搅得一团糟。”

1912年胡美从美返华。他立即着手与长沙市民委员会合作，铺开新医院的建设工作，这种作法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区内的摩擦。在这点上，他与中国医学传教团协会的观点一致。这个协会刚刚就下列一点取得了共同认识：“我们的目标和希望是，这些医学院将逐步由中国自己出人、出资和完全控制。”胡美在“耶鲁中国计划”的好几个同事，怀疑与湖南政府进行如此密切合作的可行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不明智和有害的解决办法。”他们警告说，“一旦形成非常固定的安排，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放弃进行宗教教育的想法。”西方的各种力量，在竞争中又一次产生分化。竞争使显示专业知识和取得长期精神目标分离。

胡美的意见暂居上风。1913年夏，省长谭延闿在湖南大多数士绅的支持下，与耶鲁传教团签订了协定。“耶鲁中国计划”负责修建、装备医院，并承担15个受西方培训的医生的薪金和杂项开支。湖南省政府则负责修建教学楼、征购土地、每年提供一笔津贴。医学院和医院取名，也体现了双方的和谐：用湖南的雅称“湘”和“雅礼”的第一个音节组合，构成一个新名“湘雅”。“湘雅”的管理机构是一个有20名成员的永久董事会，中美方各10人。当第一批学生进入护士学校和医学院预科时，胡美情不自禁愉快地写道：“教育的目标终于得到了承认。我们传教团中的医生，就是为此目的才来到中国的。与湖南市民的通力合作，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中国需要的事了，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湖南—美国的这一合作，在好几年间都富有成果，可谓珠连璧和。虽然北京政府决议取消这项协定，在纽黑文的“耶鲁中国计划”的领导机构又若干次出现人事变化，“湘雅”还是死里逃生。到了1917年2月，新医院终于竣工。“我们似乎置身于月亮的阴面，在冥冥之中等待计划中的大事出现的那一瞬间。”胡美夫人回忆道，“突然，好象有个伟大的原始声音在呼唤，医院刹时间大放光明。每扇窗户都透出了湖南人从未观赏过的电灯光。随着新希望之光的闪现，黝黑幽深的城市街道和我们的灯笼，一下被推入遥远的往昔。”

美好动听的言词，绚丽多彩的奇景，展示了一个西方

人对心目中的中国的渴望。然而幻想毕竟不同于现实。问题不在长沙是否被电灯光照亮，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问题在于，西方的电灯所照见的，是一个被多种政治势力撕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在这种局面下，西方人的努力就未免太不和时宜了。

中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第二任总统袁世凯，逼走了孙中山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他先嘲笑宪政程序，继而于1915年自称皇帝。但此人毕竟能在世界面前，凭借特权和手中武力保持中国某种程度上的统一。1916年，袁世凯一命归西，中国便被各自独立的军阀瓜分。这些军阀根据私人武器的强弱，有的割据一两个县城，有的霸占全省。他们在私家领地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更有甚者，竟预收了几十年后的苛捐杂税。兵连祸接，加上交通不畅，饥荒便成了解决不了的大问题。逃兵和饥民只好占山称王，落草为寇。

湖南自然不例外。从1911年至1920年，共有8个人先后治省。“每个人都象敌国领土上的占领军将领，猛刮地皮。”有人评论道，“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敲骨吸髓，残民自肥的机会。”至于匪患、溺婴、饿死及至吃人肉的消息，更是层出不穷，耳熟能详。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这样说：“市民们除了被轮流坐庄的各派军阀敲诈勒索，还得忍受司空见惯的抢劫、强奸及至战火之苦。”谭延闿曾被胡美热情地称为“我们敬爱的省长”，或许比其他军阀有所收敛，他至少比较诚实，“待人谦和，知书达礼”。他的三次执政期

(1912—1913, 1916—1917, 1920) 都很短。就在他坐镇长沙期间,也无法控制全省局势。湖南跟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完全成了战场,北方来的“宪政军”和南方来的“革命军”,都把湖南当作必争之地。

胡美就在这种形势下惨淡经营。“虽然秩序混乱,但我们仍在医院工作,我们竭尽全力不卷入政治,但政治有时会主动找上门来。许多地位朝强夕弱的官员,都是‘湘雅运动’的朋友。”医院因此成了失势者的避难所,新官上任,又叫西方医生为他们服务。“我们其实是各派将领的保健医生。”胡美承认道。大概正是依靠与军人们的这种奇特关系,才使得“耶鲁中国计划”不致于半途夭折。那怕是不关心政治的医生,也无法逃脱“强权政治”的干扰。

在这种氛围中管理医学院和中学的学生,自然是相当棘手的苦差。国家动荡不安,学术空气势必受影响。各种政治、文学期刊,摒弃了统治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的古文,用白话文给学生送来了有关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教育改革、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译入了易卜生、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震惊和幻灭,大战似乎表明西方的价值尺度业已破产。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协议更令中国人怒火填膺。中国人原以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会利用他的影响,让德国归还霸占的山东,然而德国的特权却被日本接管,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抗议怒潮。

当时,学生无处读书,无所适从。毛泽东就描述了他

在长沙时的感觉和行动。毛泽东那时才19岁。“我开始读报纸上登的广告。当时，许多新办的学校都采用这一媒介招揽学生。我对学校并无特定的判断标准，也不知自己究竟打算干什么。”他在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律学校、商校乃至一所中学都报了名。最后，他终于看穿了这些学校的虚伪宣传，去长沙图书馆工作了。“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世界地图。我谈了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读了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一本伦理学著作。我读了不少卢梭写的书，还读了斯宾塞的《逻辑》，甚至读了孟德斯鸠的一本法律著作。”就是这样的学生，坚决自觉地割断了与旧中国的联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略。当然，他们的政治观念还不十分清楚。毛泽东就说过：“那时，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奇怪组合。对‘19世纪民主’，乌托邦主义以及旧民主，都有一些热情。不过，我是坚决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

为了打开中国学生的眼界，为了向他们表示慷慨，“耶鲁中国计划”给了毛泽东大量的支持，他很快成为一位能干的激进派领袖。1919年，毛泽东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被省府查封，他担任了“耶鲁中国”的刊物《新湖南》的编辑。谁知这个期刊也很快遭禁。“耶鲁中国”租给他了3间房子，毛泽东办起了“文化书店”，并依托它开设了7家分店，出售马克思的著作和大量的刊物。他把赢利用于资助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和襁褓中的共产党（原文如此。

译注)。由于毛泽东在组织和宣传中表现的杰出才能，因此以湖南的两名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了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耶鲁中国”并不清楚威胁它的力量来自何方，仍然继续开展工作。及至1923年胡美荣任第一任校长时，该计划已包括了（耶鲁）中学、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并开始组建大学和医学院。然而扩大本身，不能证明其内在有力量，因为这些机构的变化速度，远远赶不上围绕它们的中国事态的变化速度。有一位替“耶鲁中国计划”工作的教师说：“当我窥视显微镜时，全然不知怎样才能证明无底的中国迷信的无价值。”他并非有意响应自强者的僵死教条。当一位耶鲁同事宣称“如果耶鲁教这些学生运动家道德和公平竞争理想，让他们明白荣誉感、责任感，那么中国实在无需再要别的礼物了。”他其实在欺骗自己，他所提到的德行，与饱受战火之苦的、穷困的、蒙受耻辱的、同时又是对抗的国家无缘。

1924年11月，胡美第一次遇到当校长以来最大的危机。事情是由一场足球赛引起的。“耶鲁中国队”失利，很快出现闹事。一位掴了学生耳光的教员，在学校的礼拜堂向被打者公开道歉，但学生们仍不罢休。他们在12月举行了一次大罢课，为此，140余名学生被撵出校门。在与长沙市政府官员们的正式会谈中，胡美同意减轻对一些学生的处罚。谁知又引发了不少教师辞职，理由是胡美随便让步。另外，教授们也表示对他不满。面对自己阵营内冒出的反

对情绪，胡美决定举行信任投票。投票结果表明，人们还是拥戴他。他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在雅礼这类学校中，事情闹到了要投信任票的地步，说明西方训练及其本能与东方背景之间，今后必须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我们将在以后，就如我们在上个月所做的那样，反复问问自己：我们最根本的贡献是什么？”他在当天写的信中再次补充道：“20年来，我从未象今天这样感到屈辱、无力，对前途从未象今天这样感到迷惘。”

长沙一片动荡，“耶鲁中国大学”也无一刻平静。惶惑不解和饱受欺凌的学校管理者，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实质。正如一位学校管理者说的那样：“不要认为中国学生忘恩负义，他们不过是阴险狡诈宣传的牺牲品。雅礼大学正在帮助他们用自己的眼光明辨事理。”胡美却觉得，事情决非如此简单，雅礼面对的远不止几个激进分子，而是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部力量相抗衡。他意识到西方人的作用有了变化，“中国不再服从‘外来者’的道德与态度规范。无论外来者打算干什么。”他发觉他的许多同事，“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知之甚少，”一味“持一种奇怪的不妥协态度”。胡美甚至对他作为校长的这所学校的存在价值也产生了动摇，觉得这所学校的作用微不足道。他大力支持中国教育委员会的提议，雅礼应与另一所教会学校合并，在武汉重新组建一所新学校，他还接受了这个委员会的另一项建议，把他千辛万苦建立起的湘雅医学院迁至上海，合并入另一所学院。但是，胡美的大多数同事，坦率地表示反

对这种做法。

胡美愈来愈不安，他接二连三给设在纽黑文的“耶鲁中国计划”的理事会写信，倾诉苦衷。1925年1月，他在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外国学校或一个外国人，不能象嫁接的枝条那样与活树的有机体融为一体，就会死去。我们现在必须想方设法，把我们自己嫁接入中国这棵活树。”同月，他在给一位耶鲁教授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

我们身居中国。这个国家的民族意识正在飞快觉醒。正在努力从外面引进信息，首先是外国的。我们这些外来者，不但没考虑过我们是入侵者，更没有去适应我们直面的那个种族的特点。……种族的特点！多么微妙、多么难以捉摸，多么难以理解的东西！不去寻求理解，换句话说，不把理解作为生存的必需，显然是把学校推向绝路。

中国人需要的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外国人”！

胡美觉得，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无可指责。“这如同一群印度人什么的，跑到美国来指手划脚，说我们的教育应这样那样，是同一回事。中国人受够了！”他又说，“在今天，只要他不为中国人所欢迎，他就无法发挥工作效率。我们毕竟是客人。”因此，雅礼必须顺应迎合。“如果我们的工作充满西方的象征主义，完全坚持西方的传统，对每一现象用西方的眼光加以判断，我们怎么不与现实格格不入呢？”在华的美国人必须改变，变得“更象中国人，才能有效工作，才会达到传教目的。”胡美这样暗示这个顺序，

“如果说有哪件事在这个冬天显露明显，就是这个顺序。我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人的思维了解得太少了。”

正当胡美思索这些问题时，校园又为两场危机所震撼。前一个事件使人难堪，但却是激进学生为西方教育家制造麻烦的极好事例。湖南学生会忽然宣布，不准教会学校学生参加于1925年4月在衡州举行的全省运动会。胡美立即洞悉这次排斥的微妙之处和真实含意。“假如我们的学生参加运动会，他们很可能受欺负，煽动者还会趁机挑起武斗，假如我们默不作声接受这个可恶的决定，那么更加霸道的事就会接踵而来。”胡美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根据“学生的成绩、体育技能和自我控制程度”，挑选6名学生组成雅礼代表团参加运动会。学联的答复是，只有在这些学生不佩戴任何教会学校徽记的条件下，才允许他们入场；如果他们要参加比赛，他们就必须宣布脱离教会学校，并且发誓永不回去。运动会主席和省长都不愿牵扯进这桩公案。最后的结局是，学生终于参加了运动会，但被排斥在比赛之外。虽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但教会学校都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

第二次危机简直是一场恶梦。1925年6月初，长沙学生知悉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国际租界中的英国警察，向示威的中国学生开枪射击，打死10人，打伤50人。雅礼大学的学生冲出校园，与其它大、中学学生一起上街游行。长沙一时间谣言四起：“学生们提出动议，一致赞同在拂晓时分，把长沙所有外国人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危机

一触即发，胡美连忙动员教职员工分班守卫校园。美国人的生命，看来只有靠省长颁布的戒严令才可能得到挽救。戒严令宣布：“造谣惑众者斩！赤化宣传者斩！颠覆破坏者斩！扰乱治安者斩！”在给省长的一封正式谢函中，雅礼理事会宣称说：“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中国的幸福康乐，并且期待省长阁下通过法治达到这个目标。”

理事会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但却不一定会通过他们公开赞扬的那条原则获得实现。譬如，现在就很难再向学生们讲授美国宪法的光辉业绩，因为学生已经看到在长沙和全省执行这种宪法的可怕后果。1916年宣布自治的湖南，于1922年拟定了自己的宪法（完全是美国加州宪法的翻版）。全省共分75个选区，选举省议会，再由议会推选省长。但是，“宪法的条款随时都遭到公开违反，”一位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尤其是税收和选举，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普选制确实施行了，但选票则是成千上万张地发给每个小选区的负责士绅。选民对士绅拿出的选票来者不拒。奉命填写人名。候选人购买的选票，多者达上千张。”

尽管省府官员愿在重大危机出现时保护外国人，以免国际舆论指责，但在1925年，他们还是和民众一道，愈来愈公开地表明排外情绪。有关警察和士兵喝令外国人跳下黄包车自己走路的报导越来越多。替外国人扛行李的中国人被学生毒打时，士兵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有的还把驳壳枪交给那些不负责的年轻人，鼓励他们采取狂暴行动”。军队朝美国牧师开枪，侮辱美国国旗，抢掠当地传教士。西

方人出门旅行变得寸步难行，做生意困难重重。“由于这些行为未受惩处，因而内地人对白人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湖南学生们公开宣称，“义和团”是他们的先锋。美国妇女走到街上要挨口水，小孩子也遭谩骂。中国学生变得害怕被教会学校录取。胡美写道：“那些进了教会学校的人，也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教师同行，因为过路人称他们为‘洋奴’”。

在这种情况下，要经营好“耶鲁中国大学”谈何容易。胡美的一位同事，这样总结 1926 年的学生状况：“中学生在大街游荡不上课，他们全然不懂那些理论，但却是那些理论的积极宣传者。他们在学校组织罢课，蔑视师长，甚至回家去煽动父母赞同他们的有害观点。倘若仔细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律和秩序可言。这在许多方面都应归咎于学潮。今日之大街，充满了可怕的敌意。”

胡美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每个人——他的雅礼学生、长沙激进分子、纽黑文的理事们——感到满意？1925 年，他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他把医学院的管理权，全部移交颜医生领导下的中方管理委员会。这一举动暂时减缓了对“耶鲁中国计划”的不满。医生告诉胡美，他的神经即将崩溃，医生说，他的病无药可治，“只有卸掉精神负担长期休养。”理事会恩准胡美病假半年，但他拒绝，理由是“在反传教运动的压力面前，我们对医学院的前途心中无底，我很难想象我会离开此地。”

中国学生再度掀起的学潮，使胡美变得愤愤不平。他

不是想骂中国人，而是指责理事会和自己的同事。好象长沙出现的每一件事，都令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认为耶鲁在给自己制造阻力。“我们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也没有许诺给中国人所有权；中国人认为，这种局面本来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他这样写道。1924年11月的风潮，进一步使他严厉指责自己同事的自欺行为：“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被从这里回去的人，在理事会面前吹得天花乱坠。现在大学觉悟了，我们与他们根本没有建立信任的同伴关系。我们玩忽职守，坐失良机，现在，大家都清醒了。”

他开始觉得，由理事会任命的许多美国人，并不胜任工作。他们要么不了解中国国情，要么不适应中国国情。还有的人本事太差。他强调：当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条件相同时，应优先考虑中国人。中国学生认为：有些“耶鲁学士”，即来长沙实习一、两年的耶鲁高年级学生，“既教不好书，又不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人对这些学生异常反感。胡美大声疾呼：“这些家伙尽量少来，理事会少叫耶鲁妈妈送孩子来，多叫耶鲁妈妈给点物质，这样才能把更多的中国人安插到教学和管理岗位上。”

对护士也应如此办理。“我要坦率地说，除非我们美国护士对中国学生表现仁慈之心，除非中国病人对过去5年以来某些人的过激做法的看法有所转变，我们最好少派护士来，多选点中国人。中国人当护士，可能技术稍差些，但她们更懂得中国病人的心理，更能对病人体贴入微。”当理

事会又派来一个“熟谙护理理论”，但全无在中国工作的经验的护士时，胡美大为光火。

胡美认为，远在纽黑文的理事们，全然不知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了解形势的严峻性。一如他之所说：“这类事在美国不会发生。”他在给秘书长的信中写道：“我应当把中国教育放到举足轻重的位置，与我们将面临的形势以及适应变化条件形成比例。转变态度，改善作法已成当务之急，无法回避。”当理事会要求他再找爱德华·哈克尼斯募捐，以保证医学院正常运转时，胡美严辞拒绝。“我的回答是，我认为问题出在道德方面，我不能再找哈克尼斯出钱拯救长沙医学院，除非我认为这样做对中国真有益处。”他的心思，放在1922年提出的、被理事会拒绝了合并建议上。停办“耶鲁中国大学”，中国人肯定乐意。然而理事会的一封电报，使胡美不敢越雷池一步：“理事会断然反对将医学院和文学院从湖南长沙撤出。”胡美被指责为悲观失望，但他据理反驳。“既然一个外国人的存在，已被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动乱之源，激起了强烈不满，他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1926年，胡美回美国，一方面病休，一方面同理事会面对面地论争。6月，在一系列会议之后，他提交了辞呈。“我明显地看到，我对教育、管理的若干情况的处理，与理事会存在严重分歧。”他希望他的辞职，将有助于加快挑选中国人担任“耶鲁中国大学”校长的工作。理事会接受了他的辞职。次年1月，他发出最后警告。他在给秘书长的

信中说：“真正的考验，存在于教会教育是否能在合作与建设性方面，为民族主义所利用。”

1926年末，学潮达到高峰。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朝北进军，以期统一中国。长沙成了左派同情者的堡垒。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已威胁到雅礼教育组织的生存，教职工投票决定关闭学校。1927年1月，美国副领事范宣德下令撤回所有的美国人。省长给刚从美国回来的胡美一节特别车厢，然而胡美发现，整个火车全由士兵挤占。他和他的家属，只好乘坐邮车，悄然离开长沙。

“雅礼”的教职工和理事会，不太可能因他们的校长受到的这一小小耻辱感到遗憾。胡美提出的问题太多。这些问题搅扰了“耶鲁中国大学”一定会办得极好的舒服的美梦。胡美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强调美国人只能起辅助性作用，他断然拒绝中国已无希望的说法。他只觉得，中国有必要继续提高道德水准。胡美的计划，被许多教职工描述为“是在无法控制的理想主义的操纵下情绪不稳定的产物。”理想主义与情绪，照它们的含义，意味着处理混乱。正如一群教员给纽黑文的理事会写的公开信所述：“胡美博士精力过人，热情无比，堪称人杰，但在执行政策时，却往往出现摇摆。”他们无法了解，正直的概念会因视角的不同面不同。换言之，中国人决不会依西方人看自己的视点，来观察西方人。

第七章

对中国最高当局产生过影响的人

“当我请他告诉我一些事实，一些名人佚事之类的东西，他咧开嘴笑一笑，耸耸肩。‘我诞生在冰天雪地’，他说，‘却在阳光下生活；对不对？所谓的事实又有何益处？’言不尽意并不令人吃惊，米海尔·马柯维奇·鲍罗廷本身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过去取名格鲁森堡，化名伯格，有时又自称基里尔。

1884年，他出生于一个俄裔犹太家庭，在拉特维亚长大，十几岁便参加了犹太社会民主同盟。快20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俄国革命时，他已小有名气。革命失败后，一纸逮捕令要捉拿他归案，他只好亡命美国。他在印地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短暂就学，娶了一位立陶宛移民之女为妻，定居芝加哥西区，并在那儿办了一所专供逃亡者的子女读书的学校。就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里，鲍罗廷

极大地丰富了对城市工人的了解，走上了激进的记者之路。1917年十月革命大功告成，鲍罗廷返回俄国。1981年，列宁派他作信使，送去了致美国工人的信。以后几年，鲍罗廷先后去西班牙、苏格兰（他曾在苏格兰坐牢半年）、荷兰、墨西哥，执行共产国际的任务。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建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革命进程。共产国际的敌人似乎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还有非共产党的渐进主义劳工组织。这种组织擅长于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视野。共产国际的惯用方法是在现存工会组织中建立共产党核心集团，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煽动农民造反，坚决支持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及至1921年，眼看在欧洲加快革命步伐的希望渺茫，共产国际便把自己结成一个强大的、纪律严密的机构。与此同时，欧洲的失败使苏俄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中东和亚洲。共产国际通过一项决议：在非资本主义地区建立“贫农专政”的苏维埃制度；它还决定，只要“民族革命运动”坚持反帝，共产党就应全力以赴给予支持。

共产国际的这些决议和中国直接相关。中国的孙中山，顶着军阀压力，在广州地区成功地组建了国民党。虽然列宁批评孙中山“无以伦比的——人们可以这样说——毫无瑕疵的天真，”但列宁的一些顾问们依然敏锐看出，孙中山的党很可能在某一天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列宁决定采取三头政策：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政策于1921年得以实现；苏俄政府放弃沙皇

在中国掠取的若干特权，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最后，外交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同时接近孙中山，督促他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援。

正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苦于无处获得援助以巩固刚刚统一的国民党的孙中山，对苏俄的主动表示反应热烈。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他的党。1923年，孙中山派出他的年轻参谋长蒋介石访问莫斯科，随身带去了给列宁、契切林和托洛斯基的信。“我派蒋介石访问莫斯科，”孙中山对一位俄国外交官说，“与那边的朋友们探讨用哪种方式帮助我在这个国家工作。”蒋介石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全面考察了苏联的军事技术。作为对应，俄国人派鲍罗廷到广州。他的职责未予明确界定，只是介绍他为“本党资历最长的一位党员，多年从事革命活动，他是苏联政府的长期的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业将稳步得以推进”这些意义含混的辞句，恰与其公务的秘密相映成趣：1923年10月抵达广州的鲍罗廷，对外身分是新闻记者。

鲍罗廷和孙中山一开始见面就相处融洽，几天后两人便一块儿散步，促膝谈心。鲍罗廷判断，广东的革命根据地至少需5年才能建立，于是便和孙中山重组国民党，安排海参崴向广州的定期军火运输。他恳请孙中山执行激进政策：宣布8小时工作制、规定工人工资的最低限额，给农民分田分地。孙中山未敢采纳后一项内容，不过赞成建立农会。孙中山请鲍罗廷担任重组国民党的那个委员会的顾问，以示对他器重。1924年1月，新组建的国民党召开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如下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和“联合农工”，这无疑大受鲍罗廷的影响。

鲍罗廷聪明地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把这位中国领袖的巨大权力，写进国民党的宪章，自己则退居幕后。孙中山认为新联盟对他十分有利，国民党需要苏俄的技术和军援。孙中山把鲍罗廷比喻成拉斐德侯爵。^① 他向一位朋友保证，他肯定采纳苏维埃制度的优点，扬弃其缺点。孙中山倡导民主集中制，制订了严格的党纪，根据鲍罗廷的解释，应将国民党按金字塔结构设计，从基层开始直至形成人数极少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另外，孙中山保留了他本人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政治口号。这是一个界线模糊的中国政治概念，孙中山为编织它耗费了10年心血。

鲍罗廷的使命微妙而复杂。他必须把国民党建成为强大到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组织，同时还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使之能顺利地把国民党掀起的民族革命，转移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他不得不腹背受夹：有的共产党人看到了与一个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党结盟的危险，而保守的国民党人也认为共产党是个危险的伙伴，在未成气候之前应予粉碎。鲍罗廷还须阻止孙中山贸然北伐，避免弄巧成拙。他更要劝说共产党不采取激进行动，疏远国民

^① 拉斐德侯爵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军人及政治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率法军协助美军作战——译者。

党。从1924年至1925年，鲍罗廷成功地在踩钢丝。尽管他的记者身分很快就暴露，但他使大多数人看到了苏联的诚意。1924年9月，广州有一份报纸这样评论他：“假如这位尊敬的先生今天在广州代表苏俄，建议孙总统在本地或其它地方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的政府就会在24小时内把他召回。”

鲍罗廷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最大一个优势是个人魅力，他拥有表现诚意和塑造温和形象的本领。他与我们想象的模样相去甚远。”一位记者描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高大匀称，大约五十岁。他讲话很慢、富有同情心，且动作潇洒优美。他的脸庞瘦削、刻满纹路，一对感情丰富的黑色大眼生气勃勃、熠熠有光。这双眼睛只能属于梦想家和发明家，不属于狂热的报复者和破坏者。他那沉重迟缓的步伐、随意的装束以及修得很短的英式胡髭，让人联想到从底层一路而上的英国劳工领袖，但此人身上，却蕴含长期从事政治斗争的涵养。”另一个记者则记得鲍罗廷“是个大好人，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得犹如一只装满文件的大柜子。”鲍罗廷不象一个革命家，倒象一个商人或工程师，连广州神学院院长香雅各，也觉得鲍罗廷“具有讨人喜欢的个性，严肃真诚，让人放心。……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为这个问题惊讶万分，思索一阵方说，他对这个问题不加考虑。”香雅各邀请鲍罗廷给他的学生作一次有关共产主义的报告，他拒绝说：他一般不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一话题。“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种理想，中国离它太远。”

鲍罗廷还告诉他，“中国落后于时代 100 年。摩天大楼与黄包车——多么鲜明的对照。”

谦恭之下的鲍罗廷，却是十分精明能干，费尽心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1924 年 7 月，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同时担任国民党的农业顾问。这个部门共产党人云集，其中包括毛泽东。毛泽东那时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鲍罗廷喜欢骑马，下棋，很快成为广州的名人。他和妻子范妮，带着两个孩子住进一幢宽敞的、光线幽暗的两层楼房。这幢楼背靠广州校场，面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部。鲍罗廷一家住上层。房间的家具破朽、十分寒冷。底楼则住他的秘书和翻译。他们每天都要把中外报纸发表的新闻向鲍罗廷汇报，剪下来的文章则放入严加保密的档案袋中，和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若干会议记录置放一起。鲍罗廷还指示 4 位俄国顾问，专门研究广东、广西的工农运动。这四人组成鲍罗廷的“智囊团”。他们并非都是政治上值得信赖的人物。有人在国內“过多地表现了批评精神”而被发配广州，通过亲身经历内战环境改造自己。

访问鲍罗廷的人络绎不绝，常客中有蒋介石、周恩来和谭延闿（胡美的老朋友，现为国民党权贵）。当鲍罗廷的周期性疟疾发作时，党的会议就在他的床畔举行。他的妻子担任机要秘书，在堆积如山的材料中找出鲍罗廷需要的文件。如果鲍罗廷觉得哪样东西不宜见天，就悄悄打个手势，她就会满屋乱翻，然后宣布文件“一时找不到了。”鲍

罗廷还有一个亲信，此人便是张太雷，时任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时常形影不离，”鲍罗廷的秘书回忆道，“有时甚至同住一间房。鲍罗廷绝对相信他的翻译的忠实性，一定要他陪伴方才出席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苏俄顾问面对中国现状，不能不收敛一点他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但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称得上舒适。“我们只偶而坐一次黄包车，就这样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还是颇为不安。”使团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开始我们加以拒绝，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矜持并不能给黄包车夫带来任何益处时，我们才同意他们拉我们一段短距离，我们不敢叫他们拼命奔跑，还付他们高于通常车票5倍的价钱。”看来晃悠悠地坐轿更舒适，“这种交通工具荒唐而又古旧，降低了人的身分，让人想起巴比伦和希巴女皇。不过坐起来勿需用力，不加晃动，不发噪音即可在空中运行，真的给人一种魔幻般的感觉。”

鲍罗廷有时去广州郊外的黄埔军校视事。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中心。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蒋介石出任校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学校专门培训国民党军队极需的青年军官。苏俄顾问在学校负责技术训练，经他们培训的黄埔士官生，在1925年取得了打败地方军阀的首次军事胜利。由黄埔军官充任骨干的军队，在蒋介石指挥的北伐中请缨前锋，当蒋与共产党决裂后，又形成他的力量核心。

鲍罗廷的对等人物是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瓦西里·布

廖赫尔。这位 35 岁的将军、在 1924 年派往中国之前，曾统率红军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打过一系列大胜仗。他化名“加伦”，他的顾问团共有 40 名军官、均为老战士和苏共党员。其中当然不乏来中国接受考验者。加伦的专业技术无疑加强了鲍罗廷在国民党领导阶层中的地位，证明苏俄的用心十分善良。加伦的名望也使在广州的俄国人大沾其光。加伦将军工人出身，年轻英俊，说话简洁。座车驰过广州大街，荷枪警卫吊站车门踏板，好不威风。蒋介石记忆中的加伦，对西方人毫不留情。他称加伦为“俄国一位杰出的将领，为人公正，堪称益友。”加伦回国时，蒋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伤感的分别。”谈到加伦的军事才能，他说此人是个严峻的军纪官，一丝不苟地坚持条例。他陪士官生一道参加战斗，不断地强调他在俄国创制的基本军事技巧：运动、奇袭、速攻、包围。在他的指挥下，黄埔军人成为中国南方最富战斗力的部队。

苏俄卷入广州的重要意义，逐步为人们所领悟。一位观察家注意到 1925 年来到广州的俄国军、文职人员的数量，评论道：“每个地方，连军事机器的最小齿牙上，都可看到俄国影响在和平地渗透。”他补充道：“第三国际派到广州的特使鲍罗廷，是这个阴谋之网的幕后恶人……他毫不吝惜地散发枪支和金钱。”国民党的保守派也持相同观点：“鲍罗廷和加伦名义上是顾问，实质上操纵军政大权。”他们坚决要求驱逐俄国人。

诚然，鲍罗廷的影响在迅速扩大，但这场交易的受益

方还是孙中山。他充分利用了顾问们的军事、政治技艺，把国民党组成了组织严密的政党，迅速扩大了它的基本军事基础。1924年5月，黄埔军官在部队中仅有960人，1925年1月便增至1500人，7月份达9000人，到了11月竟上升到30000人。孙中山历来不尚空谈，当1925年因患癌症临死之际，他宣布说：“有了黄埔，我可以放心地死了。”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很快控制了国民党。他在巩固广州势力时，鲍罗廷显然对他用处极大。蒋介石需要苏俄军援，理所当然地对批评鲍罗廷的人说，鲍罗廷任政治顾问，是孙中山的亲自安排：“孙总统指导我，‘凡是涉及政治问题，鲍罗廷的意见便是我的意见，必须采纳他的建议。……苏俄同志十分珍视与本党的友好关系。’你们怎么能说这是鲍罗廷的‘个人专制’？”鲍罗廷继续扮演他先前的角色，与蒋介石一道，努力在中国人思想上塑造已故领袖的激进形象。死后的孙中山，享有生前从未获得的殊荣：他的著作广为刊行，大受推崇；他的遗体得到保护，巨大的陵墓正在筹建；国民党政府的每一幢办公楼都悬挂他的遗像；每个人在讲话时都大量引用他的语录。孙中山的临终遗言《致苏俄遗书》——极可能出自鲍罗廷之手笔——得到广泛宣传。孙中山在遗书中称赞“不朽的列宁”，坚信中俄“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5年至1926年，广州工人举行反英大罢工，似乎证明鲍罗廷的政策成果辉煌。它体现了新兴的劳工组织的巨大力量和中国人反帝的决心。

可是，鲍罗廷与蒋介石的私交，却达不到他和孙中山

的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蒋介石冷酷无情、注重实际。他完全清楚中共的危险性，决意让他们无出头之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面控制共产党的，竟是鲍罗廷。蒋介石凭借纪律森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和黄埔军人力量，占据着共产党无法向其挑战的地位。深知这一险恶局势的鲍罗廷，以最严厉的方式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停地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烈焰浇泼冷水。他告诉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此时的中共只能“给国民党当苦力”。

1926年春季，鲍罗廷离开广州（加伦已于前段时间奉召回国），蒋介石闪电般地发动政变。他逮捕大批中共党员，解除了他们在国民党内担任的职务，还软禁其它俄国顾问。鲍罗廷的最初反应是打算采取强硬措施，但谨慎占了上风。在蒋介石示弱并限制一些右派，吁请鲍罗廷重返广州时，鲍罗廷也顺势让步。他急于回穗是十分明显的。正如他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的那样：“中国的未来系于广州。广州无疑在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尽管谣言耸人听闻，广州并无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它无非是在进行别的国家一个世纪前就搞过的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艰苦斗争而已。我认为这场斗争意义重大，很有希望，因此我决定留下来为之效力。”

蒋介石和鲍罗廷达成妥协：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必须登记，不许在国民党内建立秘密组织，不得批评孙中山，不能在各级执委会中占据超过1/3的席位。作为变换，鲍罗廷继续任国民党顾问。许多中共党员对这项协议感到震惊，

害怕从此不能顺利保存组织。然而鲍罗廷十分乐观，苏俄的正式反应也是否认广州发生政变，它说中国形势比过去更好。

1926年夏，蒋介石开始筹措酝酿已久的北伐。当时，他刚升任国民军总司令，拥有可资独裁的实力。鲍罗廷和其他俄国顾问担心军事失利将毁灭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坚决反对北伐。他们的意见遭到否决，鲍罗廷优雅地屈从。他着手全面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北伐出谋划策。他得出结论，太平军的失败在于同时打击清王朝、西方列强和资产阶级。倘若国民党进攻上海，占领这个西方列强与中国工业的据点，就会重蹈天国覆辙。国民党应挥戈武汉，武汉地处内陆，十分安全，且有强大的产业工人。

谁料蒋介石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鲍罗廷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所感到的忧虑，可从一位苏俄顾问在4月份拟就的报告中窥见一斑：

我们发觉蒋介石个性独特，是个怪人。其突出特点是追求荣誉和权力。他立志要当中国的英雄。他宣称他不仅代表中国国民革命，而且代表世界革命。不消说，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码事。……他脱离群众，一味按个人需要行事。当然，为了争得荣誉，这是他的根本目标，他有时也利用群众，利用中共，还利用我们。

1926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取得若干重大战果，对他的批评也随之暂告沉寂。国民军训练有素、后勤保障成功，利

用敌对军阀的分裂，加上农民的踊跃支援，几个月内便打到长江，接连拿下长沙、南昌和武汉。然而新胜利也给他们的列车带来新问题：国共两党的有效宣传，激发了工农给北伐最广泛的支持。工农奋起支援新军，使一直向前推进的军事行动，大大超过了革命的第一阶段规划。关键之点还在于：采取什么措施来直面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许多共产党人对农民自发打倒地主兴奋异常。毛泽东即为代表。“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到绅士头上了。”他写道，“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毛泽东看到了乡村暴力行动不可避免，为之大喝其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民的自发斗争是对中共的考验。毛又写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不过毛泽东的意见毕竟只代表少数，鲍罗廷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指示配合国民党，帮助其统一中国，赶走帝国主义。他的理由是：如果放任造反的农民打乱现有社会结构，则等于切断了大批有影响的国民党支持者的财源，就会影响目标的实现。他是国民党的顾问，而非平均地权者。彻底服从斯大林既平安又省事，为保正统可以不借一切。鲍

罗廷就是这样做的，他以主人的口吻发表申明，用抵赖问题存在的方式解决问题。“土地眼下不是问题，”1926年12月中共的指示这样说，“因为现阶段农民问题是由要求减租减息、自由结社、武装自卫、反对土豪劣绅和停止苛捐杂税等构成的。要引导农民离开为实现这些需求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使他们）把全部力量集中于只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停止斗争。”换言之，温和乃是战斗，暴力决非斗争。鲍罗廷严格限制遵循暴力路线的中共手脚，走上了一条微妙的道路。

在1926年12月举行的会议上，鲍罗廷和蒋介石赞成以下革命口号：“工农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消灭一切反革命集团。”但是，隐含的和谐连同这些口号本身，最终变得毫无意义。鲍罗廷和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国民党的许多激进分子，眼下都隐蔽在武汉，企图把武汉当作进行下一阶段北伐的大本营。蒋介石及其亲信则驻节南昌，准备沿长江东征上海。这个呼声甚高。1927年1月，连极少发火的鲍罗廷也按捺不住，公开斥责蒋介石，因为1月初，中国群众冲进汉口的英租界将其接管，这件事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已有力量与帝国主义抗衡。2月份，武汉的激进分子一致决定，把“老迈昏聩、平庸腐败分子从国民党驱逐出去”，他们要求重新调整国民党领导机构，削弱蒋介石的权势。

蒋介石也转而寻求那些与鲍罗廷相处不和的俄国顾问的支持。更要紧的是，他试图通过抛弃共产党、建立独立

政权来试探西方各国的反应。蒋介石的一个私人警卫莫里斯·科恩——此人因惯使双枪而获“双枪将”雅号——1927年拜访了广州的美国总领事。他说，蒋与鲍罗廷“分歧严重”，两人关系“多少出现了永久裂痕”。总领事宣称，科恩告诉他，“如果西方列强想把俄国人挤出中国”，就应在此时与蒋将军取得直接联系。他肯定蒋讨厌俄国人，与鲍罗廷的合作，仅仅因为广州军队极需俄国提供军火。

西方列强无意卷入，蒋介石和鲍罗廷也自觉尚未强大到可以最后决裂，于是整个1927年春季，并非稳固的联合依然保持。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从军阀手中夺回了城市，把它交给了蒋介石。工人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扔下枪枝，取消纠察，以免蒋介石生疑走开。蒋介石一旦把上海弄到手，便马上发起决定性的进攻。4月12日，蒋的军队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抓到立即枪毙。

上海政变对斯大林不啻是沉重一击。斯大林在几天前还说过：“我们听说蒋介石要反我们。我认为他不过想在我们面前玩弄阴谋诡计，但吃亏的只有他。我们会象挤柠檬汁一样把他压碎再扔掉。”不过斯大林是不认错的，尤其当托洛斯基等俄国批评派正在追问中国工人为何不建立苏维埃、土地革命为何未获鼓励的当口。为了回答这些批评，斯大林宣称，上海事件恰恰证明他为之负责的第三国际路线正确，表明国民党右派终于暴露出作为封建买办利益代表的真实面目。不过斯大林承认，反帝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

任务业已完成，现在是共产党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翼激进派结成联盟的时候了。“只有瞎子，”斯大林批驳托洛斯基道，“才会否认国民党左派是革命斗争力量，否认他们有在中国组织反对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应抛弃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冯玉祥。据信汪精卫是蒋介石的左倾政敌，北方军阀冯玉祥访问过莫斯科、与鲍罗廷会过面，素有“红色将领”之美誉。就这样，时在武汉的鲍罗廷开始编织新联盟，达成新妥协。由于武汉的国民党人士依赖地方军阀的财政支持，这意味着鲍罗廷还须发挥他的影响，限制工人农民。

鲍罗廷开始并未表现对新使命有何不安。他栖居豪华公馆。公馆房间宽大、窗帷紧闭、家具陈设富丽，还有中央供暖。他的工作班子庞大，除了俄国人，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个个精明强干、精力过人。鲍罗廷拜访西方列强代表，保证他将把城市经济生活导入正轨，平息西方因租界被占而生发的怒气。他继续与冯玉祥等军阀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与共产党携手并肩，完成北伐第二阶段之重任。他对在武汉的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执礼甚恭，甚至在一些农民被他的“盟友”抓捕处决后，仍不停止批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以欣赏的态度阅读辛克莱·刘易斯的《埃尔

默·甘特利》^①一书。他以其惯常的巧算下棋，他的行为举止还是那么镇定如常、优雅达观。“他对每件事都兴趣盎然，”武汉的一位记者报导说，“他用耐心的、幽默的和深思熟虑的豁达态度处理每一件事。就这点而言，他简直不象一个典型的革命家——从观山望景到系鞋带都忘不了阶级斗争的毫无情趣的狂热之徒。鲍罗廷的确具有列宁那种保持始终的秉赋，善于从最终意图的广度明察事物。”一度以“广州王”闻名于世的鲍罗廷，在当“红色武汉”的统治者时依然得心应手。

然、

A

”、

、

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去问鲍罗廷先生，此人深知其详。”还有人用污秽不堪的言词玷污共产主义运动。“妇女联合会提议五·一举行裸体大游行，以促进自由原则实现。”一份大字报故作正经地宣传道，“凡愿参加之女士，须经一次体检，惟有肌肤雪凝、乳房高耸者方够标准。”

在这样一个满城流言蜚语，行刑队枪声不绝于耳的城市，指导革命委实困难。到了6月，鲍罗廷已陷入深深的忧虑。6月1日，斯大林致电武汉，发布新指示，但他无力回天。指示要求中共没收土豪劣绅的田产，但不得触动与之“结盟”的那些军阀的土地；打倒不可靠的军阀，建立一支5万工农的新武装；向国民党的中执委输送激进的新鲜血液；设立革命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倘若中共拥有压倒对方的军事力量，并得到国民党激进派的通力合作，斯大林这些旨在推动革命进入另一个高潮的指示可谓切合实际，可惜当时武汉的形势完全是两样，斯大林的话便成一纸空文。执行这些指示，用中共领袖陈独秀的辛辣讽刺话说，“犹如在尿桶里洗澡。”为促使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采取激进行动，新近来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斯大林的电文附本。结果是灾难性的。汪精卫不但未受到鼓舞，反而大发脾气，指责共产党违背双方协议。他决定与蒋介石破镜重圆，消弥国民党内讧。鲍罗廷气恼之极，请求斯大林召回罗易。但局面已难挽回。6月底，“红色将领”冯玉祥与蒋介石握手言和，鲍罗廷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一位最后向鲍罗廷证实蒋一冯联合消息的丹麦记者，获准在深夜采访鲍罗廷。采访接近尾声，记者请这位精神颓丧的革命家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来中国的最初动机何在？当其政策业已失败，为何不迅速返回？

鲍罗廷身陷扶手椅，旁立一灯，照射着他身上那件质地很轻的热带外套，他未系衣带。他的脸色苍白。一团阴影驻留下颌，双眸和稀疏黑发亦难辨清。鲍罗廷沉吟良久，手指缓缓捻动胡须。最后，他用深沉、压抑的声调叙述道：“我来中国是为某种信念而战。解放东方人民，完成世界革命的理想把我带到中国。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社会问题繁芜，具有无限的包容性。这一切使我感到震惊，也征服了我。我的世界革命理想逐渐退居其后。在中国进行革命，为自由而战成了目的本身，再也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的任务是掌握形势，推动车轮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我也上了这辆车，成了这台巨大机器的一个齿牙。

这番话是诚恳的，体现了他的自知之明。中国成了鲍罗廷的主人。中国使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他和斯大林都无法控制的事情。中国革命在按自己的冲力前进。中共和国民党都从鲍罗廷的组织才能中讨到了经验，但他们最后还是离开了他。国民党在同共产党组盟时意识到暗藏的颠覆危险，共产党则因盲目服从莫斯科的指示，看到无数优秀儿女倒在血泊中这个教训。以后几年，虽有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活动，但中共已不受其左右。

鲍罗廷在阳光下的生活就此完结。7月初，他买了一辆汽车，略加装修，计划率领随员，经戈壁大沙漠返回俄国。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在北进途中，他还与若干中国将领会谈，试图为遭到打击的共产党寻找盟友作最后冲刺，然而毕竟心灰意冷。“如果还有中国将领朝拜莫斯科，高叫‘世界革命万岁！’”他对一位随从说，“最好的办法是将其交给秘密警察。他们的目的是骗取步枪！”鲍罗廷的那位随员不以为然，“刚才见到的那个人不是很友好么？”他十分热爱俄国。“因为他年轻，”鲍罗廷解释道，“当他们年轻时，个个都是好人。”

鲍罗廷在中国的使命一败涂地，殃及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回到俄国，他被分配去干微不足道的工作。先当英文教员，次作莫斯科一家小报的编辑。鲍罗廷在中国唯斯大林之命是从，斯大林满以为鲍罗廷能为俄国的利益同时操纵国、共两党。这本是斯大林的误算，然而斯大林向来不知何为认错，因此该鲍罗廷代人受过。

鲍罗廷对这个结局并不惊讶。他积与蒋、汪打交道之经验，深知循环的历史进程充满反讽。一如马克思在其论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鲍罗廷在永远离开武汉时，这条语录明显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当一位誓不罢休的记者非要他总结他在中国的革命经验时，鲍罗廷回答道：“我为革命所进行的4年苦斗和作出的牺牲已付之东流。历史再度重复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喜剧。革命扩展到了长江，假如派一位潜水员跳进这条黄色激流，他浮出水面时，手中只会捧一把破碎的美梦！”

第八章

用科学改变中国

1866年，丁韪良在中原大地领略黄河流水万马奔腾的壮观，不禁感叹道：“滔滔大河，波涌涛起，把我们的思绪不可阻拦地带向远方。它蔑视当地人的微小努力，期待西方工程师将其治服。”69年弹指而过，然而黄河仍未俯首就范。不过此时，来自美国密执安州的工程师 Q. J. 托德，却在为治河方案殚思竭虑：“中国的需要十分清楚，”他写道，“她必须吸取我们的工程知识和技术，把两条桀傲不驯的大河管住。保护人的生命不受水害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势必引起国际社会注意。”

这是一个宏伟目标，托德为之兴奋不已。他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对自己职业的挚爱，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认为：“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需要道德的、物质的、精神的异乎寻常的耐力。我们会碰见无穷多的可怕事情，解答

无穷多的谜。因此，它比任何一种职业更令人神往。”奥利佛·托德，是与约翰·里普策·弗里曼一道，于1919年来到中国的。在此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利佛·托德在法国担任工兵上尉。弗里曼则是名闻遐迩的工程师。由于他在蓄水和水力利用方面造诣颇深，被中国政府聘为黄河水灾控制顾问。弗里曼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古籍中有关治水的记载。他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水利科学和技术，在为人的生命和幸福所做的贡献方面，可与中国相比。”弗里曼提出了疏浚黄河、长江河床，加固河堤，加快水流的计划，同时还设计了一个大规模的垦荒方案。只是因缺乏资金和地方官员极端保守，这两项计划才告吹。弗里曼大失所望，怏怏回美。然而托德留了下来，决心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弗里曼的宏伟规划中涉及的诸多困难。

水灾和饥馑，是架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两把利刃，在20~30年代，这两个灾难不停地困扰中国。千百万人民死于非命，沦落为丐，更多的人拆房作薪，典物还债。许多西方政府担心中国政局和经济不稳，不愿大量投资帮忙中国赈灾。但是，西方的传教士、国际红十字会，还有不少诸如托德这样的个人，却乐意迎接挑战。他们在粮食和现金调济分配，组建农村合作社团、试验性农场、互助会，鼓励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设施，修筑道路等工作中，都发挥了技术专长。1921年中国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就是为了协调上述工作。

托德着手管理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山东省监督大约3

万5千名民工修建一条500英尺长的土公路，用于抗洪救灾。正当工程进展顺利之际，黄河却在利津附近把堤坝冲开了一条6千英尺长的大口子，淹毁了500多个村庄，25万人无家可归。这次灾难，给托德提供了与这条大河抗争的第一次机会。他从此迷上了这条大河。黄河——“中国的忧患”——在托德的眼中似乎很有灵性。它为它“随意修筑梯田的巨大力量”所折服，决心要它俯首称臣，“按照人的意愿在固定的河道流淌”。托德了解这条长达2700英里的河流的水质：直径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泥沙，以每秒8英尺的速度随波逐流。它们占河水重量的10%。流沙难以察觉地不断沉淀，河床逐渐增高，直到爬上费尽千辛万苦才堆垒起来的堤坝，最后轰然决口，席卷扫荡人们安身立命的田野村庄，导致千百万人葬身泽国。

托德觉得，只有西方工程师，才可能使黄河就范，向“拖着病躯的愁苦人民”揭示所谓的“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一定要用新技术来革除旧迷信”，托德写道，“我承认，作为一个工程师，我真心希望所有的河神都被打翻在地，遗臭万年。搬走立在河堤两岸的铜牛，停止演出向龙王曲意承欢的戏剧，用对水利工程科学的坚定信念取而代之。”

当地的一位中国将军建议，在河流迷乱的河床中央安置巨型铁爪，搅动泥沙，借水流冲走泥沙。托德否决了这个想法。1922年12月，托德开始设计自己的方案。把强大的河流挟制回初始的河道，就应把河床冲刷良田而形成的涡流沱的底部挖开。托德笔下的这项工程，堪称绝妙文字，

不可不读。它不止是一篇工程文献，还是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无畏战歌：

这项整治河流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是用木柱架修建填石堤坝。其方法与1907年美国在横跨科罗拉多河下游的一个断层处修筑的克拉克大坝相似。美国工程师运来大量俄勒冈松木和圆木桩，调来一架打桩机帮助工作。而在眼前的工程中，我们用4根木桩组成一排架，各桩之间距离为10英尺，一次插入。为了防水，共堆积了30万袋泥土。1万床5×8英尺大小的芦席，让河水挟带的淤泥在堤坝前的一个大塘内沉淀。我们在春季枯水期搭设栈桥，从上游120英里远的采石场，用木船运来5万立方码的石料。4月下旬和5月上旬，我们在栈桥上铺设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其上可对开两辆人力运料车。

8千余人参加施工。劳工们肩挑手推，至少搬运了100万立方码泥土。新堤宽40英尺，巨石作基脚。工程如期完成，费用只有预算之一半，体现了技术和中国劳动力的有机结合。

中国人终于目睹了工程师所起的巨大作用。托德说：“任何一位工程师，只能根据他在中国可以获得的材料设计方案，而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一旦由能干的和经验丰富的人调配指挥，每个劳工都会表现出最优秀的素质。”托德当然属于最最能干者，他的同事们并非戏谑地称他为“全能的上帝”。

托德的杰出才能崭露头角，深得人们信赖。1925年长江发大水，托德被召到湖北南部的石首堵水；1926年又奉命到山东西部与黄河作斗争。在那儿，他向美国读者概括了一个外国工程师在中国所能起的作用。首先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其次，迅速地进行周详计划的工程；第三，有效地处理资金、利用人力，“不允许趁机敲榨勒索和贿赂”。托德进一步解释了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有利因素：“中国的各军阀派系明争暗斗，因此一个与非政治的国际组织有关的外国人，可比他的中国同事享有更多的特权。凡在作战地区，中国同事几乎无法工作，也无力抵御要求征用物资、设备、人力，包括他们的手推车和船只的命令。但受国际组织指挥的外国人，却可以不吃那一套。”

1927年，托德又找到一个能证明这一看法正确无误的机会。当时，湖北河道管理委员会召唤他到汉口，帮助汉口抗洪。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共产党与地方军阀的关系日趋紧张，但筑坝工程却进展顺利。只是到了5月份，托德的计划受到来自“筑坝工人工会”增加工资要求的威胁。托德手头资金匮乏，无法满足工人提薪的要求。他请求鲍罗廷予以协助。经人介绍，他于5月24日会见鲍罗廷。托德这样描述了会谈情形，“我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筑坝工程的紧迫性，以及与当地民工之间出现的劳资纠纷。我问鲍罗廷能否想法阻止工人不要罢工。我说，工程是受政府支持的，关系重大。鲍罗廷说，工资当然应与生活指数同步，若食物价格上涨，工资就应相

应提高。我向他强调说，我们的资金有限，预算是根据开工前的2个月业已存在的工资基础作出的。我还说，时间的一致性保护工程师的必要条件。我提醒说，美国的大多数工会都实行条件协议。鲍罗廷说，他将考虑这一点。他还说，工程的确不能停，他一定调查此事。”工潮果然平息，3周后，工程按期竣工。

托德排除中国政治的干扰，继续与中国的江河作战。有的时候，他也十分犹豫。例如1935年，托德忧郁地注意到：“内战和争权夺利，在一些人的思想上远比治水更要紧。”但托德还是在1936年和1937年又上马新工程。1938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托德不得不离开。就在那一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人的攻势，居然炸开黄河堤坝。很自然，一旦战争结束，托德就会被重新请回中国。他将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部署的官员，去中国重新修补被人为破坏了的河堤。“于是，1945年12月，我来到上海，开始我的治水生涯中最困难的工程。”托德写道，“多年来，我作为一个长期与黄河打交道的工程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这次由联总出资的工程，因其规模宏大、意义深远，涉及面广和危险性大，堪称工程之最。”

托德的任务是指挥20万民工，引导黄河改道，使之回到以前朝北的河床。这项工程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共产党人也积极响应，同意深掘向北的河道。这次联合并非一帆风顺，国共两党时断时续的战斗经常使工程停工。共产党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必须设法安置在旧河道上定居

的人民。国民党不满意的是，这项工程干扰了他们向满洲增派部队的急务。托德不得不面对设备被炸、天气恶劣、随时停工、经常受气等重重困难。尽管如此，工程还是于1947年按时完工。托德简单地解释了他成功的原因：“我与中国人在许多地方的许多项工程中共事，我睡觉都得睁开一只眼，用他们教我的手段对付他们中的某些人。”

他所说的多项工程，并非全是治水。托德1919年来中国后，乘火车、汽车、轮船、黄包车、骑驴、坐滑竿、摇舢板、乃至步行，游历一年，行程25000英里。这次旅行与托德的第二大梦想有关：在中国修建高效率的公路网。修路与救灾关系密切。灾民们极可能因运不进粮食而活活饿死。但托德眼中的公路网，却是建设富裕的中国的远大理想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国未成为我所希望的那种邻邦——一个具有极高生活水准、能在很大程度上象我国一样对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之前，这项工作极端重要。要想从中国‘内部’提高生活水平，决非易事。”

为了实现这项任务，他从中蒙边界一直走到中越边界。他的目标是，能在有一天，百万人齐上阵，修建出条条标准公路。为此目的，他奔走游说于强大的军阀之间。他遍访驻防北京周围的吴佩孚，绥远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

虽然有国际组织背后撑腰，有能干的西方同行和年轻的、忠心耿耿的中国助手协助，但要促成这件事实现，决非朝夕之功。1927年下半年，托德从云南向贵州进发。他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这块艰难的土地居住？”

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崎岖山路直上绝壁，淌激流，跳飞涧，整整3周的旅程，使托德在莽莽群山中历尽千辛万苦。如果人们愿意住在这里，为何又不想法改善生活环境？“我经常对中国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托德在记叙此次旅行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是否是年复一年的刻板生活磨钝了意识，以至于连寻找新的食物供应方式也无动于衷？”当然，不可否认，这里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的郊外，托德便遇见7辆美国客车，这是贵州拥有的第一批美国汽车。中国工程师完成了托德前一年制订的计划，在贵阳城修筑了一条崭新的碎石公路。这条路并不长，只是方便儿童上学和军队调动。搬运工把汽车拆散，肩挑背驮，翻山越岭50天才运了进来。这毕竟是胜利的开端。贵州省长周志孙（音译）身穿白制服，腰挎佩剑，鞘柄嵌金，亲率万人仪仗队，参加剪彩仪式，管弦乐队高奏“红白兰三色旗”等乐曲。

路就这样一段一段地修了起来。按西方标准，它们不是高级公路，然而路面坚实，排水性好，坡度都限制在7度以下。根据设计要求，路面可跑汽车，木轮车不会在上面留下车辙。眼下汽车稀少，但托德希望某一天能看见卡车在上面穿梭奔驰，给贫困山区的人民送去粮食。官员和商贾也可利用这条路驾驶私车，提高办事效率。托德深知，欲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全面规划，“要提高整个地区的富裕程度，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建设性步骤，实行有利于涵养自然资源、保护民力的计划。武装冲突于此无补。中

“国的人力倘若能根据仔细计划的建设性路线加以利用，就会转化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力量资源，这个国家的希望系于此。”后来，内战愈演愈烈，搞得托德无法修路治水，只好回到北京寓所，研究从绿薄荷中提取高品位留兰香的机器。“我把这项研究作为取代桥牌和高尔夫球的业余爱好。因为我实在需要换换脑筋。”

托德在中国生活了 21 年，他对此毫不反悔：“我的工作具有什么永久价值？那就是它造福于人民。我们修的路尽管未铺沥青，但路面平顺，一旦条件成熟，就可在某些地段铺洒碎石。……我们修的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永久性的。在蒙古边界附近，土匪摧毁了一些设施，但这是孤立事件。只要局势稍稍稳定，一些大工程就可开工。近些年来，赈灾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我们将设法使更多的山脚土地变成水浇地。……1946~1947 年度的治黄工程绝对是一次成功，它经受住了洪水考验。”

托德为他的独立性感到自豪。“我是搞土木工程的，我决不插足军事。从政治关系看，我遵循的是一条中立路线。”他认为他的同事们也是如此。“我的西方同事们除了想把中国变成良好的技术活动的典范之外，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无甚兴趣。他们都不是社会或政治改革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人，为数也很少。”他的下属多是中国人，都在大学研习过美国的技术教材。托德用英语指导他们工作，坚持在每次大型工程中履行监督之责。他满意地得知，“他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专业选择，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具有国

际意识。”对于同代人，托德“给人力量，是这个世界中意志坚强者的代表，他能使车轮永远运转，事业永远发达。……这位皮肤红润、眼光深邃的美国工程师，十分让人放心。”

全面评价托德的业绩不是易事。他的成就不消说令人叹为观止。他在穷乡僻壤修路，脚踏重重困难，堪称英雄壮举。他抗御洪水，兴修水利，同样取得世人瞩目的业绩。但是，他在求得他急于帮助的中国人的大力支持方面，则是失败者。他未能建立起码的现代通讯网络，未能大规模地介绍引进西方的工程科学。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部分麻烦在于他缺少必要的资金和人力。例如，1935年，托德力求组建一个拥有20名西方和100名中国工程师的工程团，花50万美无把中国所有的洪涝灾害之源进行一次全面的初步调查。但他就是得不到这笔开支。此外，这项工作所以受阻，还在于当时的中国已被战乱搞得四分五裂。政治分歧干扰着中国做她最必需做的事。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努力，被视为是对某些人的独立王国的威胁：加强通讯联络意味着中央控制加强，铁路、公路固然能够运来粮食，但也可运送入侵的军队。

不过，横亘在他成功之路中央的最大障碍还在于他具有西方列强的代表身分，无论他怎样坚决否认这点，都无法改变人们的印象。只要西方还在中国内乱中兴风作浪，西方人就谈不上保持中立。托德痛苦地懂得了这个道理。托德本人并未遭到打击，早在1924年他就写道：“一定要洞

悉这个伟大国家的实质，怎样在西方的援助下使之处于受监护的地位。援助可能为中国人所欢迎，但外国监护则绝对碰壁，因为外国监护长得有牙齿。”就在托德请求鲍罗廷合作抗击汉口大水的那个月，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汉口，实际上八方受围困。一排排的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舰，向中国人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的要求提出了挑战。英、美、法诸国的海军士兵，在中国首都的大街上趾高气昂。这种屈辱使得国民政府非常苦恼。”尽管这可能是反帝的夸张之辞，但其中包含着真实却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共产党和许多军阀，都把“反帝”当作宣传法宝。无论托德怎样洁身自好，他总是在西方枪口的阴影下工作。

托德坚信，他的工作“会使中国和美国获得长期益处。”互惠是他的理想。但中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1936年，一位记者发现，“中国坚持自我解放——那怕意味着步伐缓慢——是南京政府与西方专家关系的显著特征。”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人，对美国人在西安兜售汽车，开发西藏市场，以及底特律表示要在中国建立“密执安”以培训中国工程师的兴趣，显得忧心忡忡。托德本人写道：“美国汽车正在被引入，行驶在这些公路上。美国的采矿机械以及其它商品也将纷至沓来。”但是，它们总归不是中国人想努力获得的东西。

× × × ×

1938年，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正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服务，经过一昼夜的工作，他在寒冷的凌晨，开始整理思绪，写下了他亲眼目睹的疾病与死亡情形：

坏疽，狡猾而又令人悚然的敌人。那个人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从技术上讲，他还有一口气。给他静脉滴注盐液。也许他身体内的细胞还有记忆。它们还记得热乎乎的带盐海水，记得它们祖先的家，记得它们首次吃食。有了一百万年的记忆，它们就会想起潮汐和其它海洋，想起在太阳的作用下在大海中诞生的生物。光和作用给了它们抬起疲倦而微小的头的力量。狠狠地喝一口，重新获得新生。它就具有这种神力。

还有那一位。他会在另一个收获季节，沿着毛驴身边的那条路，嘴里发出快乐的欢叫疾步奔跑吗？不行了，他跑不动了。那有靠一条脚奔跑的道理呢？他将干什么呢？啊，他只会坐在一边，瞧着其他孩子们奔跑。他会想什么呢？他会想你和我在想什么。怜悯有何用处？不要怜悯他！怜悯会抵消他的牺牲价值。他是为了保卫中华才作出牺牲的。帮助他。把他抬下手术台，用胳膊抱住他。啊，他的身体轻得象个小孩。是的，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此时，诺尔曼·白求恩已58岁。他太熟悉死亡了。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便是加拿大军队的一位担架兵，在战斗中受过重伤。他在加拿大和欧洲攻读医学，曾有过一阵不那么规矩的生活。最后，他在底特律私人开业行医，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谁都觉得他不久于世。他在疗养院的病房墙上作自画像：死亡天使将他紧紧拥抱在怀。他在画边题词：“我的小动作已完，令人厌倦的戏剧已落幕。”他猜测，假如他跟着疾病的辙道寸步不离，不作反抗，他早在1932年就魂归西天。“冥思苦索，”他给前妻的信中写道，“成了某种独特的行动。这儿没有哪个可能逃避变革、发现和进一步的自知。它们无疑是冥思苦索的产物。”自知给白求恩带来活下去的欲念。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当作新近研制出来的、被称为“人工气胸”的肺病压缩治疗法的试验对象。治疗相当成功。大病初愈，白求恩便进入麦吉尔大学医学系，担任胸腔外科医生。

他的自知之明给他带来新生。他在医学领域的新发现更是深刻地改变了生活内容。他开始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产生疑问，医生们财源滚滚，大萧条却使身居贫民窟的无数穷苦人民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穷人有穷人的肺病，富翁有富翁的肺病，”他评述道，“富翁康复而穷人丧亡。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经济与病理学的紧密联系。”他免收穷人诊费，调查社会化医疗制度的缺陷，还在公开场合为穷人的利益大声疾呼。他逐渐对俄国革命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他说：“创造不是，也决不可能是彬彬有礼的。它是粗鲁的、讲究暴力的革命。”1936年，“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员会”邀

请他率领一支加拿大医疗队赴马德里，帮助与佛朗哥浴血奋战的保皇党。他既困惑又激动，“去西班牙？上星期我才决定必须给我的孩子做手术。现在我则必须决定是否奔赴西班牙。我太吃惊了——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犹豫不定，我这个人合适吗？我作好了准备吗？昨天的答案似乎又为今天、明天准备了新问题——什么问题？时代要我们作出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决策！”

1936年11月，白求恩到达马德里。他在那儿呆了几个月，组织流动输血队，在靠近前线的地方为伤员做手术，还建立了血库。在马德里，他又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士兵战死沙场，无数的平民惨遭误伤。当西方民主国家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时，法西斯蒂的军队却步步逼近，白求恩怒不可遏。1937年夏，他趁回加拿大募捐之机参加了共产党。此时，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中国的消息。他密切注视这一事态。他说：“我决不愿生活在杀人越货、腐败横行的世界里；我一定要伸手阻止它！我决不饶恕贪婪成性的坏人发动的劫掠他人的战争罪行，决不顺从，决不旁观。……西班牙和中国进行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正义之举。我准备奔赴中国，因为我觉得那里更需要我，我在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938年1月，他来到座落在长江之滨的汉口，会见了国民党的官员。3月初，他抵达山西西部的霍县，医治军阀阎锡山的伤兵。他没有看见重伤员。有人告诉他，重伤员都死了。3月底，他随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补给队进入延安。

延安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由于1927年的那场大灾难，共产党要么在城市转入地下，要么潜往贫困的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30年代初，毛泽东就在江西的东南部，创建了这样的政府。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对这个根据地发动了数次残酷围剿，终于迫使共产党进行长征，撤入中国西北。1935年年初，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到了延安，毛泽东重组了战败后士气低落的部队。

为了激励民心，毛泽东呼出了“团结抗日”的口号。蒋介石也感觉，在日本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之时，要把他的追随者团拢在反共事业周围着实困难重重。于是在1937年年中，他和共产党再次结成了“统一战线”。这次联合并不比20年代初期的那次合作牢固，但毕竟在表面上相安无事。蒋勉强承认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意他们在晋察冀东北的敌占区打游击。共产党方面对刚刚经历的失败心怀余悸，因此乐意与他们根据地内的有钱农民修好关系。

他们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代替以往的分田分地，并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这种“延安共产主义”极大地吸引了少数进入陕西的西方观察家。他们眼前的共产党人刻苦耐劳。英勇无畏，情绪高昂、脚踏实地。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往西方，以飨急不可耐的读者。

白求恩欣喜若狂。他发现共产党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照：“在汉口，我只看见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延安行政界则充满信心，显得很有

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蔽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白求恩曾与毛有过一次长谈，毛泽东对内战中的西班牙保守党政治、军事领袖的渊博知识，令他惊讶无比。得知白求恩打算建立一个流动医院，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白求恩觉得毛泽东坚信人民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无论打多久，他们都会最终取得胜利。“他是一位伟人，”会见后，白求恩写道，“他是当代英豪。”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3周，收集物资，遴选人员，组建一支小型医疗队，然后去活跃在山西、河北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部队工作。白求恩被正式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学顾问”。他终于救治了第一批共产党军队的伤员。“伤员身上长满虱子。他们只有一套军服，穿上身就脱不下来，9个月的战斗，使他们浑身遍布征尘。绷带奇缺，只好靠换洗，最后便成了一条破纱布。有三个伤员甚至根本就没有衣服，只好用床单遮身。其中一位伤员因冻伤而生坏疽，无奈截去双脚。食物是小米粥——如此而已。许多伤员就是因败血症和饥饿而死去。肺病患者更众。”中国条件之艰苦，远甚于西班牙。然而白求恩却感到无比振奋，因为这儿就是他的目的地。“我站在战争的中心之中心。我怎样才能体验这种奇特的艰苦斗争的滋味呢？”

这就是游击战。一小队一小队的共产党军队，在农民的支持合作下，在整个华北地区搅得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他

们把日军挖掘出的战壕填平，切断敌人的电话线，颠覆火车，炸毁桥梁；他们孤立小股日军，围而歼之，缴获的武器又用来发展壮大新的游击队；有时，他们还出动营以上的部队，攻打日军据点，袭击日军小股部队。及至敌人扫荡，游击队就进入山区，民兵们则回到村庄，村子里地道纵横，如蛛网，四通八达。地道中还贮藏粮食，武器、弹药，甚至士兵。开始时，日本人的反应还比较迟钝，游击队的袭击便越发厉害——有的地区，日军需8个人才能守护1英里长的铁路线。日本人决定猖狂报复：他们烧光村庄，枪杀居民，或将居民强行迁进“安全区”。但是这一对策事与愿违。共产党的正规军还是一支教育工作队，他们办起学校，对村民进行政治教育。日本人的残暴，促使村民更信奉共产党的宣传。

白求恩就是在这种变幻无常、艰苦卓绝的战斗环境中，致力于医疗工作。他只有5名中国医生充任下属，且没有技术熟练的护士。他们的服务对象，竟是约10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战士，分布在好几百平方公里的山区。白求恩的办法是：同时处理一切问题。他们清扫和布置“现存的医院”（通常是荒凉凋蔽的旧庙寺，无任何设备），他教卫生员掌握医院卫生的基本原则，包括怎样使用战地急救包。他还向村民们示范怎样做夹板、担架、包扎绷带。他还给保育院和卫生学校编教材。他苦口婆心地宣传，身教重于言教，终于使当地农民愿意给急需手术的伤员输血。此后他组织了一支输血队。早先的那种激情，逐渐变成更深的满

意。“我尽管很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我是有能力的，我实现了我想做的事。请看我多么富有和充实！我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上。他们认为我十分有用——颇能满足我的布尔乔亚式的虚荣——他们需要我就是有力的明证。”

一旦基地医院处于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白求恩便抽身深入前线，施行他的流动医院计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11月，他总是跟随不断运动的共产党军队攻打日本据点，当日本人反攻时，他又随队转移。

白求恩的著名格言是：医生，到伤员身边去！别等伤员来找你！为此目的，他领导的小型医疗队，每次准备工作都做得万无一失。白求恩和他的队员们以马代步，用两匹骡子驮着可一次疗救100人的药品器械。他们把手术室通常设在距阵地3英里远的地方，只要房子遮风蔽日就行。设备当然十分简陋，但较这以前仍不可同日而语。麻醉药经常缺乏，许多手术都是在未麻醉的情况下施行的。倘若日军袭击流动医院，而警卫部队又抵挡不住的话，白求恩他们就在10分钟内收拾好一切东西撤退。无法走动的伤员，就地藏身。

医疗队无一日有暇。白求恩本人常常一天工作18小时。他对部下管理严格，几近残酷。他要求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发挥最高的技术水平。当八路军359旅在晋东北山区进攻一支沿广灵——灵丘公路来犯的敌军时，白求恩竟

在距前线75里远的地方，在40个小时内做了71人次的大小手术。1939年3月初的一次战斗中，他在39个小时内救治了115名伤员。战事平息后，他偷闲用抒情散文笔调，写下了这次战斗经历：

旧纱布沾满洗不尽的血痕。轻一点。剪开裤子，轻轻抬起大腿。天啊，这简直是一条袋子，一条长长的、松软的、沾满鲜血的长统袜。什么样的长统袜？圣诞老人的长统袜。那根骨头哪儿去了？碎成小片。用你的手指把它们钳出。啊，这些骨头又白又尖，象狗牙。用手触摸，探一探。是否拣尽了碎骨屑。啊，又找到一片。完了吗？是的。不对，这儿还有一块。肌肉僵硬了吗？拧一拧。不错，僵死无反应。把这块死肉割去。肌肉怎样才能恢复？这些曾经是强健的肌腱，怎么会在刹那间被撕得四分五裂、被蹂躏得如此惨不忍睹？它们还会恢复骄傲的弹性吗？拉。停。拉。停。多有趣？居然做完了。手术成功了。我们被毁灭了。我们自己怎么办？

1939年一年内，白求恩一步步地在操劳中走向死亡。他的名声和业绩，在华北山乡四处传诵。他的名字成了鼓舞人民英勇作战的口号，随着延安的共产党日益强大，其控制范围逐渐拓展，白求恩得到更多军民的拥护，他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59岁的白求恩，看起来已象七十老翁：白发苍苍，皮肤黝黑，牙齿松落。他时时出现晕眩，一只耳朵失聪。如果说他曾有一点消沉的话，他也将其全部掩盖

下来。他偶尔流露一点思乡怀旧之情。“还在著书立说吗？”他在一封给加拿大的信中问道，“音乐会还在演奏吗？你跳舞、喝咖啡、看电影吗？躺在软床，盖着干净的被单是个什么滋味？姑娘们是否还是喜欢被人爱？”

10月，他获得机会去美国和加拿大募捐，购买急需药品。他放弃了这次机会，而去了河北涞源。日军在那儿进行了一次大扫荡。11月初，他在一次匆忙的手术中，不小心割破手指。当时，日军正朝医院方向猛攻。尽管大家都平安转移，但他却几天都未想起治一治自己手指上的伤口。眼下，伤口已严重感染，但他坚持要给伤员做手术。病情因之急剧恶化，胳膊全都红肿。他知道自己染上了败血症。“我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世。”他在给聂将军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封信其实是他的遗言。他把自己的两双手套和皮鞋送给了将军，马靴以及裤子送给了一位师长。他将自己的手术器械，分给了朝夕相处的中国医生。他的警卫员则每人得到一张床单作为纪念。“最后的两年，”他总结道，“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我有时也感到孤单，但我却在最亲爱的同志们中间获得了最大满足。我已无力留下更多的话……，谨向您，向我的同志们，表示最深切的谢忱。”11月3日，当一抹晨曦染红天际之时，白求恩与世长辞。

白求恩感情充沛、性情急躁、才华出众、严于律己。但对强加给他的约束决不就范。他从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们那里获得了巨大力量，对资本主义深怀仇恨。这一点，可从

他在中国的一个冬天，在充满血腥味和氯仿气的医院所做的自问中窥见一斑：

人类的敌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额头上刻有符号吗？是否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会的。相反，他们也是可以获得尊重的人。也有人为他们喝彩。他们自称、也互称先生。多么滑稽的称谓！先生！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教派的骄傲！社会之精英。如果他们钱多得用不完，他们也支持个人和公家的慈善事业。他们也给大学捐款。他们对家人也是充满柔情蜜意。他们服从法律，他们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迹象上认清这些先生的。一旦有人要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内在中的那个野兽就会怒吼扑腾。他们就会变得冷酷无情，疯子一般的猖狂，刽子手一样毫无怜悯。只要人类坚持进步，这种人就必须被消灭。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这个世界就得不到一刻安宁。人类社会允许这些人存在的组织也应被摧毁。正是这些人让这个世界遍体鳞伤。

白求恩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权梦想世界没有伤痛。虽然他本人没有具体关心怎样才能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中国人对此心中有数，这就行了。世界的伤痛太多了，一千个白求恩都不够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还在排队等待受伤。很明显，他本人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出现的。他的工作才开始，就给自己招来死亡。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离开生活的方式表明，白求恩去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救治伤员，甚至

不完全是为了站在反抗法西斯或资本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他去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目的：赎洗他们那一代人的罪过，清除他身上的冷漠和无情的因子，丢弃他认为使之堕落的追名逐利。他的精湛技术，是进入这个世界的通行证，缺少这张通行证，他就会被拒之门外。他也跟其他西方顾问一样，利用中国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人乐意利用他。他与其他人不同在于：他是靠中国人，才实现了自己意义重大的死亡。

就在山西的那座草棚内，他怒斥过那些制造伤痛的恶人。他这样写道：“人体多么优美，器官多么精巧完善！它们的运动精确无误，非常驯服，非常自豪和强壮。当它们被撕碎时，它们一下变得十分可怕。生命的小火焰一点点地弱下去，最后闪烁一下，终于完全熄灭，就象蜡烛一样燃尽，无声的、轻轻的。它对剿灭生命的人进行了抗争，但它最终又屈服了。它呼叫过，但还是沉默了”。

第九章

美国人的雄心

克莱尔·李·陈纳德天生喜欢飞机，“我从开始就被它们迷住了——飞机横滚时，地平线在鼻尖下旋转，万花筒似的天空和地面起劲地打筋斗；倒飞时，你得紧紧地吊住安全带，手脚在操纵杆、方向舵、节流阀上绝对配合默契，人和机器变得浑然一体，成了只受一种指令控制的仪表，这太令人神往了。”陈纳德这个人，只有在空中独飞、河边垂钓，或在簇拥其路易斯安纳州的别墅周围的林中狩猎，方才感到心旷神怡。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离群者和冒险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脾气大得骇人，一贯不服管束。1937年春天，他加入美国空军，选择了流血生涯。他分外强调战斗机的作用，声色俱厉地抨击不护航轰炸战术，搞得他的上级直皱眉头，无人再乐意听取他的意见。他对紧密编队和特技飞行的新颖见解，不再为长官所赏识。他被内定为

退伍人员。就在此时，中国航空委员会与他签订了为期3个月的合同，请他调查中国空军状况。他的月薪1千美元，其它开支实报。陈纳德异常兴奋地接受了这些条件，马上退出了美国空军。时年47岁。

初步调查的结果令人沮丧。他发现在30年代末期主要由意大利教练培训出来的中国空军，缺少飞机和飞行员，飞行标准也低得可怜。中国空军共500架飞机，真正能正常飞行的不足1/5。陈纳德完成了调查，准备打点行装回家。谁知，他与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实际首脑蒋夫人的短暂会见，竟使他改变了主意。“委员长夫人比我预想的还年轻20岁，他以富有的南方人特有的慢吞吞的声调讲英语。这次会见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我完全着了迷。那一夜，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这是陈纳德效忠蒋夫人的开始，并很快扩展到她的丈夫——中国的国民党铁腕统治者——身上。陈纳德用忠心换来了在自己国家永远也不敢奢望的优厚报酬和巨大声望。

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北京附近的马可·波罗桥（即芦沟桥——泽注）开战。是时，陈纳德的调查任务尚未彻底结束。在此之前，中日军队还曾有过若干次交火，但这一次，战斗扩大了。日本军队很快拿下了北平，并于8月中旬进攻上海。在亚洲推行“道义与中立”政策的美国，一方面向中国表示同情，同时又继续向日本出口钢铁和石油。然而陈纳德的反应则是异常激烈，“我立即向委员长发报，愿以任何他觉得适当的方式为中国效劳。”蒋介石接受

了他的好意，命令他到南昌指导训练战斗机群。

陈纳德终于找到了“明主”。日本人的连连胜利，更为他出人头地创造了机会。他是这样描述他的角色转变过程的：“蒋夫人突然觉得，没有哪一个中国空军军官，懂得如何计划和实施任何规模的空战。她叫我去承担这项工作。”可是，陈纳德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手上掌握的材料太差。中国飞行员太缺乏经验，所有的轰炸路线都要算错，常常把炸弹扔到自己军队和平民头上。中国飞行员的错误实在惨不忍睹。陈纳德记下了某中队的飞机从上海战区返航的情形：“当飞机盘旋准备下降时，气象条件极好。然而第一架飞机进场过高，一下冲过跑道尽头落在田野里。第二架飞机一头栽下来，霎时变成一团熊熊烈火。第三架平安着陆，但第四架飞机却撞上了前去灭火的消防车。11架飞机在着陆时就毁了5架，4名飞行员死于非命。”1937年10月，陈纳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空军已走到了绳子的尽头。其飞行员“不过是靶场内不断涌出来的一队队鸭子。”

1937年底，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的精锐之师，在艰苦卓绝然而枉费心机的上海、南京保卫战中消耗殆尽。他被迫迁都重庆。在四川的穷乡僻壤，蒋介石远离华东地区的大城市和港口，先前的资产与力量的纽带被拦腰斩断。他只得依靠保守的当地军阀给予支持。他成了一个联合政府的首脑，而不是军队的总司令。日本人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控制了满洲、华北和华中的重工业聚集区。海岸线沦入敌手，蒋介石所需的援助，只能从空中，或从缅甸跋山涉水

运来。在他的北方，共产党人龙盘虎踞延安，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与之联合，但肯定不会全照他的旨意办事。不过，这一幅幅黑暗的图画并未使陈纳德产生动摇，他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蒋委员长的战车上。美国官方发出了警告，美国国民不应在“假如我是中国人”的口号下卷入中日战争。陈纳德对这一告诫置若罔闻，跟随蒋介石到了中国西部。

陈纳德在中国云南昆明建立了基地。他在那儿苦苦奋战了两年，“试图用美国模式组建一支中国新空军。这个任务看起来毫无希望完成。”陈纳德的助手，均为美国空军的预备役军官。“优秀的飞行员，满腹冤屈的牢骚客，还有危险人物，都围着一张扑克牌桌打转。”陈纳德这样形容他的下属，还说训练学校没有一日不出事。“头脑满是机械的美国人，去教一脑门子古文的中国人学飞行，两种文明中相互冲突的因素，就找到了大打出手的机会。这是令人神经震颤的分歧。”陈纳德教授中国飞行员重新掌握了基本飞行技巧，指导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进行空战，监督他们建设简易机场，并在机场设置了空袭警报系统。

然而中国人还是无法凑集足够的飞行员和战斗机，保护重庆免遭日机轰炸，或对日军机场和部队集结地实施报复。于是，蒋介石便派陈纳德重返美国，招募志愿人员，购买新式战斗机。是时，美国舆论已开始严厉谴责日本。陈纳德一到美国，便受到政府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国务卿赫尔的盛情迎接。1941年4月，美国决定给中国一笔5千5百万美元的贷款。5月，又批准一项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平等租

借协定。中国从美国购得了 100 架 P—40 战斗机。那些签订合同去中国的“美国志愿队”的军官被告知，他们将划入“非现役状态”，但军龄照算。

陆军和海军航空兵共有 101 名军人自愿去中国服役，接受陈纳德的指挥。这些军人的待遇为：工资每月 750 美元，报销全部差旅费，1 年享受 1 个月的领薪假期，每打下 1 架日本飞机，奖赏 500 美元。他们的合同有效期为 1 年。一百多年来，自华尔在几乎是相似的绝望形势下在上海的滨水区招募雇佣军后，还没有哪一群西方人，在西方军官的指挥下替中国人打过仗。中国人担心，这群人是否肯听调遣。陈纳德便在合同中详细规定，这些人“若因违抗命令而受到书面警告，习惯性吸毒或酗酒；染疾而无法执行公务，托病逃差，泄露军情等，一经查实，着即解雇。”

这些“飞虎队员”，是陌生土地上的美国探险家，他们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神秘人物。他们也把中国人当作惊甫未定的小孩，“以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一群来自大西洋彼岸，驾着奇妙的机器在天空飞来飞去的‘勇敢陌生人’。”这些“小孩”对他们似乎并无通常的怨恨。一位“飞虎队”的中队长认为，“中国人看上去挺喜欢我们这些高个圆眼野人。尽管我们开着吉普车撞进了昆明街头的商店，撞翻了手推车和黄包车，讥笑挑担的苦力，中国人还是喜欢我们。”陈纳德便是他们中的豪杰。“这位中年失意者，听力不爽，但面孔严峻，目光似剑，一生吃尽苦头，仍然矢志冒险。”传言还说，“飞行员个个身長 7 尺，讲起话来一串又一串。他

他们都是美国了不起的冒险家，无论打仗挣钱还是嚼花生都不含糊。”这些传说对于美国志愿人员来说，无异于大卫打杀歌利亚的古老故事在现代戏装下的重演。其实，有的美国人也是初步战场和生活的新手，“他们无非是驾着弹孔累累的战斗机，为中国人拼命而已。”

但是，正是这种天真纯朴，才一度换来了丰硕成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珍珠港，当时，飞虎队刚刚开始集训，然而半年之内，他们驾着陈旧的P-40战斗机，以陈纳德教他们的双机夹攻战术，在缅甸和华南上空，揍下了300余架日本飞机，自己不过只损失了50架，牺牲了9名飞行员。

这就是陈纳德的战争。他不光懂得怎样打，而且打得非常漂亮。问题很明显，就象官样文章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战术家，缜密无误的协调者，目光远大的司令官。一切都十分简单，凭着这么一点飞机和飞行员，他就使日本人大吃苦头，如果再给他一些飞机和飞行员，他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得望风披靡。他将从空中拯救中国。处于经济解体，军事失利双重压迫下的蒋介石，不得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陈纳德的悲剧在于，他以飞行员的简单化想象，实在无法窥穿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尽管他认为，战争可由他指挥的英勇战士取胜，但战争已在他的身边出现逆转。1942年3月，罗斯福总统任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兼中一缅一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飞临重

庆，陈纳德便成了史迪威的部下。同年4月，日本人切断了中缅公路，陈纳德只好依靠史迪威，从印度向中国空运为数不多的物资和零件。同年7月，美国志愿队易名为“中国空军特遣队”，仍由陈纳德指挥，是时，他已被任命为现役准将。这支空军部队，被划归于基地设在印度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只有5名陈纳德的飞虎队员，同意编入这支新部队，其余的人要么回国度假，要么重返他们的老单位。

日本军队在缅甸击溃了英国和中国军队，横扫东南亚大部，隔断了中国与西方盟国在陆路的全部联系。面对这种局势，陈纳德依然象往常一样，大力宣扬空战论。他告诉史迪威，只要拨给他100架新式战斗机，35架B-25中程轰炸机，他将负责取得下列战果：击落相当数量的日本飞机，摧毁日本的陆军和海军设施之大部，干扰和中止日本在海上和中国内陆河道的运输，打击日本空军的士气。史迪威并不反对空战，但他认为陈纳德的行动计划，忽略了后勤保障问题。他还觉得，当务之急是保卫联系中印的“喜马拉雅空中运输线”。史迪威感兴趣的是，英国和中国应同意在1943年春季，发动一次联合的陆路大反攻，重新打开中缅公路运输线。陈纳德和史迪威的计划相去甚远，如果陈纳德将通过喜马拉雅山运来的物资用于加强空军力量，史迪威就无法使中国军队有足够的物资进行缅甸反攻；如果史迪威集中力量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就无法让陈纳德获得足够的燃料，零配件和弹药。

蒋介石对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反应相当迅速。事发当天，他提出中、美、英及英联邦、荷兰、苏联，建立一个大联盟，保卫太平洋，共同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的联合行动方案并未被人采纳，因为重大行动的决策人不在重庆，而是在伦敦和华盛顿。不消说，伦敦和华盛顿当务之急的天平刻度，与蒋委员长不一样。例如丘吉尔认为，欧洲才是舞台的中心。他成功地使罗斯福同意了他的看法。“我告诉总统，美国舆论夸大了中国对这场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我说，我当然会帮助中国人，对他们绵无尽期的管理不善深表同情。但是，他们却无法企盼我接受我真正感到的完全不合时宜的价值标准。”英国或者美国军队，不在中国战区大规模卷入的决定，就这样拍板敲定。

时刻希望彻底打败日本人的蒋介石，意识到他要求执行联合作战的努力已付之东流，开始转向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为在战后在华北同共产党人对抗暗作准备——统一战线名存实亡。在以后的几年内，他奉行着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方针——就这场战争而言，即利用美国人打败日本人——而他自己，则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

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与时迪威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位脾气暴躁的参谋长一方面用令人尴尬的问题诘难中国的最高统帅，一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重组地面部队。这势必又会打乱蒋介石千方百计才设计出来的系统，让共产党人发挥极大的用处。据说，史迪威还曾当面向委员长提到了这件事。所幸的是，蒋极善玩弄以“西夷制东夷”的伎俩，陈

纳德又毫不掩饰他对委员长的敬佩。陈纳德向蒋表示，他可以很快为中国赢得战争，这既无需中国付出代价，又不会迫使蒋介石进行那怕某一项改革。

蒋介石直言不讳地宣布他赞同陈纳德的看法。陈纳德也趁机提出更广泛的要求。1942年末，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他可用105架战斗机和42架轰炸机，“使日本空军无法发挥作用，进而打败日本。”他将按这种顺序前进：首先摧毁日本在中国的空军，然而打乱其在西南太平洋的运输线。依靠从华东起飞的机群，轰炸并摧毁日本的重工业。他以胜利者的口吻总结道：“这样，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进攻，美国海军从太平洋出发，到时都会畅通无阻——达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不会很大……”。我的上述计划十分简单明了，这是我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我花了5年时间建立空中警报系统和无线电联络网，为的就是能用这种方式作一决战。我对成功充满信心。”罗斯福跟蒋介石不一样，他不想在中国战区投入浩大的资力，因而对陈纳德的建议十分赏识。他的亲密私人顾问诸如温德尔·威尔基、哈里·霍普金斯、劳奇林·柯雷，还有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也持同感。而史迪威则只好求助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的支持。

史迪威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43年1月初，蒋介石宣布，他不同意1943年春在缅甸发动攻势。史迪威评论道：“英国佬的运气太好了！他们早就求之不得。中国人不干了，只有该死的美国人还要继续干！陈纳德哇哩哇喇，搞得我

们骑虎难下。他大肆吹嘘美国人能包打天下，现在别人就叫我们兑现。”马歇尔告诉史迪威，国内新闻界舆论反应强烈，总统也对此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应该给陈纳德一个实现其主张的机会。史迪威勉强答应“坐坐冷板凳”。到了2月份，史迪威奉命组建一支单独的空军部队——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指挥。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到了4月，罗斯福把他们召回华盛顿述职。

陈纳德此行大出风头。据他回忆，当他把计划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总统“一拳捶在桌上，大声说：‘只要你能把他们的军舰击沉100万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史迪威则酸溜溜地评论道：‘除了我，谁都不愿意干建设地面部队这一单调无聊的工作。陈纳德发誓在半年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啥不给他足够的力量去干一干呢？这可是通向胜利的捷径呀。’”

史迪威反复警告道：“任何轰炸日本的企图，都会给地面召来迅速和猛烈的报复……假如这成为事实，那么我们会垮掉。”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无法有效地表明他的看法。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都觉得史迪威的描述有危言耸听之嫌。史迪威认为陈纳德不效忠他。他指责“陈纳德有意违抗他的命令，伙同中国的一些将领、官员和地方军阀大搞阴谋诡计。”史迪威的这种指责，连参加了会议的阿伯特·魏德迈将军也倍感惊讶。史迪威还把中国总统比喻成苦力阶级严加批判。他说“中国总统目中无人，毫无信义，完全无法与他相处。”然而陈纳德在那些听惯了谦恭之词，习

惯于让人尊敬和服从的人面前则如鱼得水。陈纳德描述了一次会议情形：

当时，史迪威正在大骂中国领导阶层的低劣素质。

罗斯福总统突然插话问史迪威：

“你觉得委员长这个人如何？”

“这个人优柔寡断，诡计多端，是个靠不住的老流氓。此人历来言而无信。”史迪威咆哮道。

“陈纳德，你的看法怎样？”总统打断了史迪威的话，转身问我。我当时坐在一个角落里。

“先生，我觉得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政治领袖之一。他从未在我面前食言。”我回答道。

陈纳德在率领“飞虎队”时就翘首以盼的好时光终于来到。他被任命为中国空军的参谋长，沾沾自喜于能直接接近委员长。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实践委员长的观点，连史迪威也奈何他不得。史迪威仍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他还在说：“发展中国军队应摆在第二位。如果空军把物质全拿走了，那么我们就会被扔进泥淖里孤立无援。可是，他们却要我们拿出力量来，保护这些一脑门子都是胡思乱想的伙计，他自己则在哗众取宠。”陈纳德遇到的麻烦是以简单方式提出了过多的要求，从而不得不兑现他根本无法做到的事。陈纳德的助手约瑟夫·艾尔索普告诉霍普金斯说，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如果不采取某种立即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计划来重振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士气，那么局势将一

发不可收拾。”他警告说，中国的抵抗极可能全线崩溃。与陈纳德试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的愿望相反，日本人让他连连失利。日本飞行员学会了陈纳德先前用来对付他们的谋略：假空袭，声东击西，打了就跑，以多制少，借以消耗陈纳德部队的宝贵的燃料，搞得美国飞行员疲于奔命。1943年夏季，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吃了一个大败仗。陈纳德将此次失利归于史迪威限制给他提供支援。他要求获得更多的飞机、燃料和弹药。

怀疑蒋介石可能利用陈纳德从美国政府获得尽可能多的无偿援助，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是陈纳德的性格。陈纳德从未把空战视为中国对日消极作战的计谋，他是认认真真将其看作为一场战争的。他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顾问。陈纳德坚信他在领导中国人化干戈为玉帛，不要纠缠于无聊小事，而应着眼于大节，在重大问题上才坚定立场，寸步不让。“这样做花去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许多美国人就是因此望而却步。但我觉得这样做十分值得，因为它有助于我完成我想完成的事。”他从来就认为中国人是大自然最机敏的儿子，“中国人不一定懂得内燃机的工作原理；”他写道，“但中国人能一眼看穿人，并能说出是什么东西促使这个人活动。他们具有几千年观察人的经验，是当之无愧的专家。”

1943年12月，蒋介石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大规模增加空运物资；还要求美国全部付清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新的B-29轰炸机基地所花的钱。这一作法的结果

适得其反。“他们简直是一群骗子，”财政部长摩根索大骂道，“用枪顶住我们的脑袋。”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等人经过广泛会谈，否决了蒋介石的要求。

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注视陈纳德。马歇尔将军注意到，陈纳德虽然是一名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问题知之甚少。多年来，他充当拿中国政府的钱，替中国政府效劳的角色，受着蒋委员长不适当的影响。”1944年2月，陈纳德提出组建一个能指挥所有空军部队的联合司令部，加强对中国的作战支援。阿诺德将军就此不无辛辣地写道：“这似乎是陈纳德的又一个与众不同的怪异设想，与总部的意见相去甚远。”陆军部长史汀生则认为“陈纳德无力阻止日本人。”这一年，日本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形势变得越来越糟。

忧心如焚的陈纳德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述说他的飞行员“处境可怜”。他说，“认真地讲，他们凭着手中那点可怜的东西，仍在东方创造了奇迹。”可惜这些奇迹对华盛顿已无甚意义。陈纳德的空军基地的供应物资大为减少。剧烈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财力，美国支援的许多东西又被官员们贪污私吞。东方的道路仅被利用了一小部分，能开动的汽车还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更令人恼火的是，第14航空队给日本人造成的破坏，的确出现了史迪威所预见的那种结果。自1938年以来，日本人第一次向中国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联合反攻，控制了湘—桂、平—汉—广铁路，从“地面摧毁了陈纳德的活动基地。”由于第

14 航空队未能查出日本人的进攻企图，或者未能达到陈纳德逾常的要求，陈纳德和史迪威的肚皮官司一下变成了公开的敌意。随着两人的交锋日趋激烈，史迪威得出结论，陈纳德目无上级，理应撤换。

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其他他们的幕僚眼中，中国只不过是边缘战区。1944 年中期出现的事件，更使中国成为无足轻重的战场。随着盟军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美国军队在太平洋的“逐岛争夺战”中连连得手，马歇尔告诉史迪威说：“决定业已作出……在中国和东南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支持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战事。不必在亚洲的大陆上发动一次重大攻势去击败日本，那怕日本只能依此方式才能被打败。”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特别备忘录中甚至说：“我们在具有强大的空中优势的战区对付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单靠空军是无法阻止训练有素和决意死战的敌人地面部队的活动的。”

陈纳德的天下就这样被有效地葬送了。尽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史迪威于 1944 年 10 月首先被召回国。对蒋委员长始终充满信心的陈纳德，仍与罗斯福总统保持着个人联系。总统亲切地给他复信，称赞他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下属，他建立公共关系的杰出技巧，使人们永远记住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创造家。把陈纳德当作绊脚石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军事将领。正如阿诺德将军向史迪威的继承者魏德迈将军直言不讳地宣称的那样：

陈纳德将军凭借极小的力量，在中国进行防御空战，已坚持相当长时间了。少量的供应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游击战必须转变为现代的、进攻性的空战。我坚决认为，实现你战区的空战类型转变的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撤换司令官。这样，空战才会由现代的进攻意识指挥，利用有效的策略和技巧。如果你能将陈纳德将军及早从中国战区召回，我将深表感激。他现在应利用体弱军官退休的优惠条件，赶快退役，保证自己工资免交所得税。

陈纳德的部属们在他们的陈旧的P—40飞机中倒还平安无事，这说明这些个人英雄，在新的世界中无足轻重。新世界是由柯蒂斯·李梅将军开创的。他采用低空夜袭战术，让重载的B—29机群向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扔杀伤炸弹和烧夷弹。最引人注目的战绩是1944年3月取得的。从关岛和塞班岛起飞的334架B—29轰炸机，烧毁了东京15.8平方公里的城区，东京共有83,793人死于此次空袭。第20航空队的公关官员称此次行动“蔚为壮观”。返航时，B—29的机尾炮手报告说，东京火光冲天，150英里外都可清晰地看到熊熊烈焰。陈纳德未参加此次战斗，由斯特迈尔将军这类冷静能干的设计者策划此次行动，效果显然更佳。

中国无疑给了陈纳德一次崭新的机会，他在中国也克尽职守。他与中国的感情纠葛持续时间太长，表现十分强烈。但对中国人，也对美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业务安排，一件未透露的合同，完成之后旋即被人遗忘。陈纳德

不再有用场了。陈纳德在听到召回他的消息后写道，“我飞回昆明时，心中万分凄楚。我回想起了我度过的那些残酷的岁月，看见了地平线上透出的第一线胜利曙光。我想到成千上万名美国飞行员只能呆在中国和印度，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而他们的将军却因此在肩章上缀上3颗金星。我也想到了斯特迈尔将军及其助手正按照一个方向突飞猛进。这一切令我感慨万端。”

× × × ×

约瑟夫·史迪威在1942年并不想去中国。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1920年至1923年间，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便对中国进行过透彻的研究。1935年至1939年，他在北平担任武官，由于他完全清楚国民党军队在30年代末期的表现，因此对中国军队被日本人打败是缺乏现代武器的说法深表怀疑。恰恰相反，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犯了基本军事错误，忽略了战略战术的根本原则。支援性武器使用不当，不重视军事情报，指挥和参谋程序应用无力，未能建立有效的通讯联络网络，未能将武器与车辆保持作战状态。”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时候，史迪威已是一位58岁的少将军官。担任驻节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那一军的司令官。他的军人生涯虽不引人注目，倒也一帆风顺。他盼望着退役，以便颐养天年。然而战事既发，退役之梦便成泡影。他被

召到华盛顿时，还以为是要去帮助策划盟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当可能被调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联合司令部的参谋长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时；史迪威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去你的吧！我才不愿意呢。他们记忆中的我，不过是一名到处都可以抓出一把来的微不足道的上校。他们看见我一脚泥浆，与苦力和士兵一道挤火车。”

中国人对于他们所需要的美国高级军官的资质，有着奇特的要求：“这位军官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相反，他（委员长）认为，让了解中国军队在军阀时代的情况的军人前来工作并无益处，因为这易于使他们把中国的国军，与军阀的军队混为一谈。”这就充分表明，中国人需要一个奉命唯谨的小人，此人决不可能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美国财政部和陆军部都对这一限制性条件持审慎态度。在此之前，中国人已提出过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需要的载重汽车，足可以压毁他们国内的公路；他们需要的半自动步枪，没有哪个士兵会使用；他们需要的13吨重的坦克，只会砸断他们的桥梁；他们需要的美国海军的俯冲轰炸机，国内却无人会驾驶。在美国专家的眼中，这些表明了一种指向，即中国人原则上只想获得最大和最好的武器装备，却不懂得机械化战争的复杂性。他们强索美国人将1941年许诺给予的贷款立即付清，已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火冒三丈，摩根索诅咒他们：“干脆去跳长江吧！”

很明显，中国人对于美国人是否真心实意帮助他们心存疑虑。因为早在1940年的大选时，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

这样的话：“当我同你们的父母对话时，我作出了这样的保证：您的孩子将不会被送到外国去打仗。我以前讲过这种话，我现在还想反复强调这一点。”美国的贷款以及外交支援，总的来说是相当吝啬的。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需要把中国当作与日本对抗的盟友，同时又要密切注意中国的一举一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迪威用于反证自己不行的论据——他以低级军官的身份在中国居住过，并与普通中国人为伍——却成了美国朝野赞成他去中国担任要职的有利条件。这些美国人认为，史迪威正是靠这种生活经验，才成了中国通。1942年1月中旬，史迪威奉命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家中开会。“当我走进他的官邸时，才发现我是唯一的客人。亨利与我就中国问题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一切迹象表明，他认为我就是去中国导演一出戏的合适角色。中国人会接受一个美国指挥官？我把自己的怀疑坦诚相告。然而他对此深信不疑。他问我感觉如何？我只好说服从命令。他说，‘命运之神的手指，无数次都点到了你。’”

史汀生对史迪威的印象颇佳，称赞他“才思敏捷，机警活跃”，决定派他去中国。史迪威奉命晋见马歇尔将军，在这次会谈中，史迪威明白了他在中国的使命将是“协调、开通并管理（缅甸）公路，将各派系组织起来，掌握领导权，一般性地给他们下达任务。代价不论。”1月底，事情被最后确定。史迪威从陆军部收到命令，“强化美国给中国政府用于战争的援助的有效性，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

能力。”

对于这一任命，史迪威不喜也不忧。他觉得“用‘山羊来换烧焦的祭品’的古老笑话，又附在我身上了。”接着，他去白宫晋见总统。罗斯福觉得史迪威“才高八斗、足智多谋，完全熟悉中国人，能操流利的汉语，且不谋私利。”但是，他们的情绪，都未达到相互感染的地步。“罗斯福这个人不错，只是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佳。”会见后，史迪威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讲了不少废话，我实在听厌了，憋不住打断他，问他有无话捎给蒋介石。他显然毫无准备，只好又海阔天空地漫谈了5分钟，好象要讲几句令世界震撼的话出来。他最后才想到了该说什么，‘告诉他，我们这件事要干到底，直至中国收复所有沦陷的国土。’”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对史迪威说：“我认为，你将去指挥军队。事实上，如果蒋介石任命你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实际上，没有哪个人清楚史迪威的职责，也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有多大。1942年3月，史迪威率领匆忙凑集的工作班子抵达重庆，他的职务是蒋委员长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指挥在缅甸、印度和中国的所有美军，还顶着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租借作战物资分配员诸名义。正如陈纳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无疑是战争期间所给予一位职业军人的最艰巨的任务。”美国一位军官，秘密约见蒋委员长的秘书，宣布了史迪威即将到来，但在会见中，他至少发现4名中国仆人躲在帷幕后面

偷听。这件事开始就未呈好兆头。

起初，似乎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蒋介石热烈欢迎史迪威，史迪威会见了陈纳德，晤谈甚欢。“与陈纳德一席谈，此人极不错。他手下的那一群飞行员，个个精强力壮。”在重庆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委员长决定让史迪威指挥中国的第5军和第6军，挡住日军在缅甸的挺进。史迪威对此很感激。他是这样总结与蒋介石会谈的：“他的谈话充满智慧。要让第一个外国人掌握好中国军队，他的态度好坏起很大作用。对于这支军队的印象也很重要，既可玉成我，也可毁掉我。必须朝前看。”陈纳德则描述了蒋夫人在与史迪威首次会谈后如何欣喜若狂。“她挽住我和史迪威的胳膊，领着我们来到会议室外的阳台上。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在阳台上来回踱步，蒋夫人对我们说，她心情非常愉快，中国终于获得了两位美国军事干才的鼎力相助。她说，我和史迪威应该通力合作，她对我们领导下的中美军事合作寄予无限希望。”

然而蜜月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日本人刚在3月份拿下仰光，史迪威就赶到缅甸。他发觉他对中国第5、第6军的指挥，并不包括让这两个军的人服从他的命令。“我不敢枪毙他们，”他在日记中写道，“也不能撤换他们。只靠说服又起不到一点作用。因而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别人干坏事，我当替罪羊。”他深信，蒋介石躲在他的背后捣鬼。“此人遥控指挥。他在离前线1600英里远的地方发号施令，用一个接一个的指示，命令部队做这做那。其依据无非是一些

支离破碎的情报和荒诞不经的战术。他自以为深懂人心，事实上，他自以为天下事全知。他忽东忽西，战斗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让他改变主意。”

史迪威又气又恼，立即飞回重庆。4月1日，他晋见蒋介石，请求解除职务。“这是一次非常坦率的会见。”他写道，“炸弹扔得震天响，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军长、师长不听我的命令，我也没有这份权力强迫他们服从。”蒋介石对此表示关切。他说，他一定要让第5军和第6军的高级将领们明白，史迪威就是他们的司令，对史迪威要有信心。史迪威息怒了，认为他的直言上告取得了成效。“我只想告诉他真相，然后就干我的事。”史迪威思索半晌，陈纳德已经来了5年，“如果我做不到他那一步，我就滚他妈的蛋，因为我甚至无力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群营营嗡嗡的马屁精们相竞争。”史迪威还承认，“公平地说，要让那些人在一个事关全局的战场上把两个军交给我这个该死的外国人指挥，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何况他们对那个外国人并不了解，缺乏信心。”

回到缅甸后，史迪威才明白他的胜利是何等微不足道。各支部队还是没有有一个统一的方案：英国人想溜，中国人欲守，史迪威决意反攻——中国高级指挥官们各自为政，谁也不听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决定惩戒一个中国将领，将另一名将领撤职查办，蒋委员长又不同意。4月中旬，扼守通往缅甸公路的要津腊戍城的中国师，被日本人击溃，逃进深山。增援部队未得到指示便擅自回军。史迪威计划在

腊戍坚决固守，但中国第6军军长却命令其手下的一个精锐师回撤中国，而史迪威事前并不知道这次撤退。几天后，第5军也开始撤退，史迪威仍蒙在鼓里。4月29日，腊戍为日军占领。史迪威只好决定在北缅的密支那城进行最后抵抗，然而那个城池也于5月8日沦为敌手。史迪威只好翻山越岭，钻过原始森林，于5月15日抵达印度。史迪威并未因这一连串的败绩受到官方的指责，蒋夫人说，她的丈夫依然对史迪威信心百倍。罗斯福则因史迪威对整个形势的处理“表示满意。”

谁知素以“醋罐子乔”而著称的史迪威，并不想对这一系列的灾难持文过饰非的态度。“我们被日军狠揍了一顿，受尽屈辱。我们应总结经验教训，报仇雪恨。”他在撤退途中写的日记，话说得更明确，透彻地认识到失败的诸种原因：“当地人的敌意；缺乏空中援助；日本人主动进击；装备落后……弹药不足；……运输落后；……没有供应基地；医疗设备简陋。指挥愚蠢，将帅怯阵；蒋介石干扰；英国人在铁路上造成混乱；通讯不灵；英国人的失败情绪；战术有误，必然失败。”

缅甸失利后，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变得强硬了。一如陈纳德一门心思坚持要求扩大空军力量一样，史迪威则强调以下三个基本点：首先必须在缅甸进行反击，重开缅甸通往中国的物资运输线；其次，除非中国人制定一项坚决作战的方针，否则中断给他们的援助；最后，中国军队必须彻底改组。

上述的每一点，都在当时美国人的意识中引起了共鸣。丘吉尔早就以惊奇的心情注意到，美国的参谋长们竟然会把打开缅甸公路视为“通往全面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摩根索在谈到给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贷款一事时说：“我希望这件事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我们找到某种供应他们的方法，使之能继续作战。我不赞成把3亿美元丢在路上，对他们说：‘伙计们，这笔钱属于你们了，拿走吧。’”美国大使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更为简洁，他报告说，史迪威缺乏“让中国人发起进攻的交换卡”。美国的其他军官也报告说，中国军队庞杂不精，难以控制，而且作战能力低下。1942年春，中国共有3,819,000名军人，组成316个师（估计大约只有1百万条枪），其中的30个师，据信只忠于蒋委员长个人。余下的部队分布在12个战区，隶属各自的司令官节制。这些将领都是“土皇帝”，竭力想在蒋委员长的结盟中分得利益。鉴于他们个人权力大小都以其掌握的部队的多寡而定，因此他们都不乐意与日本军队长期作战，以免消耗实力。

史迪威未能看出，压缩中国军队的某些师，有选择地分配军火和设备，清洗无能的指挥官，决非是单纯的军事改革，而是向蒋介石的权力结构核心猛砍了一刀，最后导致他下台。因为蒋介石的地位，完全依赖个人效忠与结盟之间的微妙平衡。史迪威深信，他是正确的，蒋介石错了，因此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美国人明明站在他的一边支持他，然而这个小笨蛋竟然让他的一生中的大机会白白溜

走。”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与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的、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仅靠外界影响无济于事。要么由敌人的进攻摧毁它，要么提出内部更新的方案，并立即实行之。”

史迪威不停地贬抑蒋介石，反映出他是何等的不安。1942年夏秋两季，史迪威一次又一次地上呈备忘录，提出了“若干条改善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建议”，然而蒋委员长连收到这些备忘录与否都懒得答复，遑论采纳实施。到了7月份，史迪威又说：“这儿十分同情纳粹，同样类型的政府，同样的观念，同样的强盗行径。”到了8月份，史迪威把蒋介石视为这样一个人，“他会忽然得出与想象中的某些以前经验一致的结论，他固执得不愿讨论问题。他几乎丧失了讨论问题的习惯，因为在他的周围，充斥着一群唯唯诺诺的人。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把不愉快的事实真相告诉他。”到了9月份，他开始把蒋介石称为“花生”，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花生出城了，”他给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妻子写道，“于是整个政府机器停止了运转。狗由一个人驯养是一条伟大的惯例，但一个人把持政府，则是另一码事了。那怕我勉强完成了任务，回到加默尔时，我会老得象八旬老头，你只能用轮椅推着我度完余生。”史迪威在一份标题为《花生独裁者的麻烦》的秘密文件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笨蛋不明白他的唯一希望是把那30个师，变成一支独立的、有效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呢？”

随着史迪威对中国领袖的评价日趋下降，蒋介石对美国的態度也渐渐强硬。当美国在印度或其它地方的飞机不再开往中国，却于1942年夏天转飞北非，帮助英国人打击隆美尔时，蒋介石勃然大怒。加上盟军的联合参谋部拒绝接受中国军官，蒋介石更是大发雷霆。缅甸既失，缅甸公路被切断，美国人就收回了那些本该送给中国的重要军事物资，蒋介石的不满进一步加深。另外，由于中国人帮助杜利特尔的飞行员空袭东京，日本人出于报复，开始向浙江进攻，并在一些地方登陆。蒋介石被这一战况搞得沮丧万分。6月底，蒋介石制定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维护中国战区战斗的三项最基本条件，要史迪威转交罗斯福总统。这三条要求是：1、美国应派3个师于8、9月间抵达印度，以便与中国军队通力合作，夺回通过缅甸的运输线。2、从8月初起，中国战区的空军至少应配备500架飞机，连续在前线作战……。3、从8月始，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物资，每月不得少于5000吨。提出这三项要求的目的，正如蒋夫人坦率提出的那样，是为了“得到对中国战区的必要性肯定或否定答复，从而使盟国考虑是否愿意加以支持。”

蒋委员长进一步暗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亲日情绪已十分强烈。他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援助，中国只好单独同日本媾和，丢下美国单独在太平洋作战。而史迪威与马歇尔竭力主张的则是另一面：假如中国不作出某种鲜明的合作表示，美国就不打算继续向它提供大规模的财政和物资援助。这场争执的结果是妥协：美国派到印度去的部队

由3个师减为1个师，至于500架飞机和每月运送5000吨物资的问题，中国不应确定最后期限。蒋介石的强硬立场，给罗斯福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统感觉史迪威可能把事情弄糟了。早已表态把战后中国扶植为“天国”的罗斯福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应偿付资助的原则。史迪威写道：“行啦，行啦，这事有个人企图。我们愚蠢地宣扬‘英勇的抵抗——五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等等，使蒋介石捞足了资本——他现在可以对我们说‘对不起，我们已达到了极限，如果不给帮助，我们只好停下来。’”

史迪威显然被激怒了，但他还是继续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中国云南训练中国军队（这些部队有可能在某一天组建成他的30个精锐师）。他也竭力与陈纳德合作，此人当时已成为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特遣队的长官，全力宣传和要求扩大空军在中国的力量。1943年3月，罗斯福总统送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马歇尔。总统在信中表明了他的观点，“史迪威的确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任何人都不得以粗鲁的口吻向他说话，或者要求作出我们从摩洛哥的苏丹那儿得到的同样的许诺。”这封信的某些段落，转发给了史迪威，他明白总统实际上亲自批评了他。

史迪威对中国人的不满，不再只局限于日记中，他打了一封电报给马歇尔，请求转呈总统。他说：

重庆的命令不能，也不愿意在这个地区（云南

省) 得到执行。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他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在美国继续宣传重庆的观点, 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 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 无薪饷, 未训练, 被轻视, 军队贪污腐化成性。我们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 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 使得蒋委员长认为, 他只消一坚持, 我们就会屈服。

史迪威深信, 陈纳德步步升级的空袭战, 只会导致日本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场实施报复性攻击。史迪威描述的那种国军必败无疑。

事情继续陷入僵局。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坚持要求获得经喜马拉雅山运进的军用物资的八分之五。陈纳德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军用机场建设计划, 史迪威则千方百计囤集训练军队所需的物资。尽管他的助手警告说, 不帮助陈纳德势必引起重庆加强反史迪威的政治压力, 他还是在每月只给陈纳德 1500 吨物资一事上寸步不让。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是有意拖他的后腿, “既然嘲笑(空军获得)新武器已成为史迪威辈的时髦, 史迪威持此看法就不足为奇了。史迪威之偏爱步兵, 较之我偏爱空军更甚。他接受飞机无非是将其用来作为私人交通工具, 再则是当他的部队因后勤计划不周而陷入困境时, 能用飞机向这些部队进行紧急空中补给。”

中国政府占据经喜马拉雅山运进的物资的相当部分后，两人的争执更趋复杂化。例如从1942~1943年的8个月间，运进物资的9%，竟是中国政府根据美国租借法案的份额而印制的纸币，以拯救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陈纳德的飞行员，有时将这些纸币，扔进原始丛林中，同时遭此厄运的，还包括史迪威的助手们所需的不太重要的办公用品。他们空出机舱，装运弹药、零件、香烟和威士忌。

冲突日益白热化。1943年3月，在史迪威60岁生日那天，他给妻子献上了一首题为《春之岭》的诗：

浪漫重庆，宜人春意；
满目青翠，独步林荫；
月华似水，阳光和煦；
花香袭人，醉我心脾。

（淤泥污土铺小巷通衢，
臭气弥漫涌山野洼地，
猪粪味虽浓，何值一提？）

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史迪威于4月飞回美国，与陈纳德辩个水落石出。然而陈纳德大获全胜。1943年夏，气恼不已的史迪威重返中国。“又回到了粪堆上！”他给妻子写信道，“蒋依然本性不改——还是那条贪婪无比、刚愎自用、忘恩负义的小小响尾蛇。”

1943年夏秋两季的大部分时间，史迪威不得不承认“响尾蛇的脾气好多了”。蒋夫人也称史迪威为“乔大叔”。

他写的某些备忘录，也有人料理了，有些问题也被提出来加以讨论。第二次缅甸战役的计划也在草拟中。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减轻了史迪威身上的某些负担。但是，冲突并未因此而减少。史迪威建议将西北的共产党军队派去对日本人实行牵制性进攻，防止日本人进攻陈纳德的日趋积极的机场。这一建议虽被冷冰冰地接受了，但蒋因此对罗斯福的一位使者说，他希望把史迪威召回去。更有谣言说，史迪威正准备废黜蒋介石，由他接管中国军队的领导权。当然，这个谣言被坚决地平息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事态都呈平静趋势。史迪威觉得，他必须做他应该做的事，至于中国人怎么办，那就由他们去。正如他对马歇尔和史汀生报告的那样，“有关第一批 30 个师的（训练）工作有所进展，准备工作既已开始，便不好要求再快。训练人员已深入到云南各部队中，有些单位业已开始训练。总统命令的每月从喜马拉雅山运进的 4700 吨物资的首批，已被空军要去，其结果是云南的部队失去了急需的武器和弹药……。重组部队的协议并未得到执行，结果只会导致各师减员。……道路维修进展顺利，卡车的情况待查。等等。我可以做的还有什么？”

本来已经沉默寡言的史迪威万没想到，他居然会被邀请陪同蒋介石参加 1943 年 11 月召开的开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英国、美国和中国将决定缅甸战役的最后细节。会议结果令人欣慰：与会各方一致同意，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都必须归还中国。在缅甸战役中，盟军将发动一

次水陆两栖作战行动，以便跨过孟加拉湾支援中国军队。在战后世界格局中，蒋介石的中国应成为“四大国”之一。蒋介石于11月26日离开开罗返华时，他的夫人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委员长希望我再次转告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当他与您告别时，他竟找不到适当的话表达他对您的感情，对于您的友谊，我们难以酬报。”

然而罗斯福并非如蒋所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样对中国行善积德，仗义疏财。当罗斯福与丘吉尔移驾德黑兰会见斯大林时，会谈自然就偏重到打击德国的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和丘吉尔对中国力量表示怀疑，竭力主张盟军全面合作，全力以赴跨过海峡，攻打德寇霸占的法国。丘吉尔觉得，缅甸可以等一等，“走进漫无边际的原始丛林打日本人，如同跳进大海打鲨鱼。”如果中国真有力量，让他们自个去证明就行了。斯大林接着说，待到打败德国，俄国就从东边进攻日本。罗斯福动身去开罗前，未来得及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商量，他收到的军事情报表明，日本人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他对这一看法印象深刻。此时，众人说服了他把中国的急务摆到次要的地位。至少在一年内，盟军将不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罗斯福请史迪威向蒋介石转告，他已改变了计划。

史迪威的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他企图通过与总统的会谈弄清罗斯福的中国计划的详情。是不是美国打算“把中国扶起来？”他问道。“是的，我们准备把她扶起来。”总统

回答道。如果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呢？“那么，我们就只好寻找另外的人或者集团，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史迪威以有力的语气最后说道：“我们需要对华政治方针的指导。”“不错。正如我说的那样，”总统回答道，“中国需要我们给她许多帮助，许多。”于是，史迪威记下了这次谈话内容。

马歇尔将军深知史迪威的处境极端不妙，建议他去另一个战区担任负责人。史迪威生性固执，婉拒了这一好意（或许他急于想看见蒋掉入窘境）。史迪威回到重庆，静观蒋如何应付压力。蒋介石在请求得到10亿美元的贷款时遇到了挫折，罗斯福总统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史迪威以及另外的人，两年来一直认为美国在对付来自中国的压力时立场软弱，这一次，总统一反常态。蒋介石真有点得寸进尺，坚持要求贷款的兑换率为20：1，而美国人都知道，黑市的兑换率，美元为240：1，而且还在上涨。此外，蒋介石还要求美国偿付在中国修建机场所花的全部费用。

史迪威直面的中国政局不稳，阴谋丛生，欺骗讹诈，巧取豪夺，深感难以应付。开罗会议的后果，搞得他精疲力竭。用他的话说，“这次插足国际政治的时间虽然很短。却证明我居然心甘情愿地开垃圾车。……与这些人打交道，如同一个舱面水手改行干起了叉干草的话计那样力不从心，尤其是一个舰艇上的舱面水手，对此更是摸不着头脑。”他的解脱方法是，钻进缅甸的丛林，领着中国军队去印度训练，伙同一些美国部队，联合一点英国军人在陆地上对日本人发动一次有限的反击。

史迪威置身丛林，与士兵为伍，从中国人和盟军总司令的幕僚那儿，获得了宁静。他在1944年1月写信给妻子：“丛林是一处避难所。我脱离了粪堆，回到了自己人身边。……我们都严格按定量饮食，或者喝中国人熬的稀粥。我们相机宿营。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浑身水湿，满脚泥浆，但我们睡得十分安稳。由于经常挨饿，所以饭菜的味道十分可口。”身为中将的史迪威将军，戴着阵旧的野战帽，脚蹬士兵靴，肩背帆布包，身穿皱巴巴的军装，仿佛一下变成了一名列兵。一位有心者这样描述他：“他的眉头不整，眼镜斜挂，走路一步三晃，模样逗人发笑，活象一个运气不佳的小菜贩子。”然而英国将军威廉·斯林姆觉得他“装腔作势。我时常进入史迪威的司令部，总感觉这种安排未免太无必要。……此人乐意表现一种粗旷的生活作风，他不带肩章，取下全部佩饰，意在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强硬的、敢打善拼的好战将领。”史迪威就在缅甸的泥泞地一直呆到春去夏来，有关中国和印度的重要决策，无时不在呼唤他的注意。

史迪威为何呆着不出未？“因为那是发生在他的战区内的第一场最简单的军事冒险。”陈纳德的一位飞行员评论道，“不消说，史迪威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却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陈纳德则说：“史迪威是一位步兵战术的最虔诚的信奉者，他的全部意识都集中在一下打垮敌人，然后进行冲锋的目标上。对于一位师长来说，这固然是最理想的气质，然而对一位战区司令官来说，就不是恰如其分的了。

人们常常把史迪威描述成‘陆军中一个最好的四星营长’，这话诚然刻薄，但不无道理。”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史迪威的工作，撇开其头衔不算，在于给蒋介石指挥战争出谋划策。他早就觉得，只有重庆打开缅甸公路，大力改组军队的结构、人员，加强地面部队的训练，中国才有希望获得新生。当蒋介石和罗斯福采纳了陈纳德提出的异常简单的，然而明显有利的方针，而否定了史迪威的见解后，他当然万分气愤。他认为陈纳德的计划肯定行不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计划也会随之失败。因此，在开罗会议之后，他的表现就是干脆让蒋介石和陈纳德自作自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采取这种措施轻而易举，然而史迪威这个人的脾气是，一旦他决定了，他就要干到底。“整个中国的事情一团糟，”他在1944年7月给妻子的信中说，“去华盛顿大吵大叫：‘我早就料到如此’固然舒心快意，我以为他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我在去年5月8就强调了这点，但我孤掌难鸣。空军的伙计们信心百倍，他们以为单凭那些我早就会抛进垃圾堆去的飞机，就可以把日本人撵出中国。他们自有他们的手段。现在，他们出纰漏了，但谁有办法呢？这又是一个可怜的‘没料到’。那些只知道诿过于人者，这次又将逃避批评和责任了。如果这场危机恰好能使‘花生’下台又不至于使全船触礁沉没，倒还值得，问题是我们办不到。”

危机是多方面的。首先，蒋委员长本人亲自向缅甸战事下命令，就象他在1942年的缅甸战役中做的那样，等于

取消了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一规劝他，他便说，“我希望我们不要给我们的朋友和部队召来不必要的损失。”——换言之，他不希望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及其将领们遭到失利。其次，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一方面坚持要派美军观察团去延安，另一方面责问蒋介石为何拒绝调遣云南部队跨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援助从北边开进的史迪威的部队。1944年4月，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将云南部队调上战场，要么中断租借法案。最后，新的证据表明，蒋介石扣发了那些抵抗日军进攻、极需后勤保障的部队的物资供应，那些放弃了重要据点，无心与日军恋战的部队，自然也未得到物资补充。

如果说这一切使史迪威感到一阵酸溜溜的满意，那么也被5月份发生在萨尔温江的战斗所冲淡。在史迪威的督导下，由美国人认真训练了一年之久的云南部队，完全抛弃了他们曾经接受了的劝告，付出了惨重伤亡。“敌军取守势；我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一位目睹萨尔温江战役开始的美国上校报告说，“因此美国联络官要求采取小股部队佯攻，大部队包围，在敌后切断退路的战术。谁知，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直接攻打敌人固守的据点。……时间浪费了几天，伤亡不堪重负。……部队仍不停地向敌人的阵地发起自杀性冲锋。不知是什么原因，支援火力与掩护火力奇缺……大多数人员伤亡都发生在士兵冲向机枪火力的交叉地带。战斗场面的确壮观，但除了表明英勇无畏，实在是得不偿失。……友邻或增援部队，看着一小队一小队士兵在

单独冲锋中被敌军搁倒而无所事事，接着，他们又在自己的阵地前重演了这一悲剧。”这种打法的唯一积极后果是，许多中国军官都明白了他们拒绝接受的劝告，原来还是极有价值的。“中美军官一起看到，伤亡人数日益增多，主要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战术和技术原则，从而一致认为，改善部队的训练实在必要。”另一位美军上校报告说，“这些中国军官还看到，有的部队依照美军的指点，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重要目标。这说明，美军联络队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代价惨重的教训，那些不在现场者会接受这个教训吗？只有天知道。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发展，马歇尔于1944年7月1日发了一封电报给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重振并实际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回答十分冷淡，他说，“救助中国的希望微乎其微，必须赶快采取激烈措施。蒋委员长必须把全权交给一个司令官。”回电是7月3日发出的。7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便给罗斯福总统呈交了一份推荐信。信由海军上将莱希署名，推荐信说：我们认为，给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援之全部，宜委托一人负责。此人须有能力以卓有成效的方式，指导抗击日本人的斗争。目前，中国政府或其军队中，尚无此种可能协调中国军事努力之人才，以对抗日本人之威胁。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个人能使中国军队有效地打击日本军队，此人就是史迪威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罗斯福“向蒋委员长发信，敦促他将史迪威将军置于领导中国军队的位置上，”并“将史迪威将军暂时晋

升为上将衔，这不仅是承认他克服了内外阻力以及地形、天气的不利因素，亲率一支部队英勇作战之功绩，而且还有利于他担任新职后，能顺利完成任务。”

7月8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给蒋的电报悉，还收到马歇尔的来电。他们已向蒋谈了我的事。罗斯福请蒋介石给我全权，提拔我为上将。”次日，史迪威回电马歇尔，他在这个关头，仍忍不住话带讥讽：“如果这一新任命实现，我将效尽犬马之劳。我对总统以及阁下的信任深感荣幸，永志不忘。我向总统和您保证，我将持续地和长期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不愉快，尽全力打好战争。我完全懂得我不能辜负您们的愿望。我觉得，这一重负对一个乡下人来说，也未免有不堪承担之虞。”史迪威被正式提升为上将，当时享有这一军阶的，仅有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等几人。

西方在华顾问夺权的全部图谋中，此一便可谓最野心勃勃和最目中无人。舞台就这样搭设起来了。这个主意不是史迪威出的，他不过与他的总统和他的国家内的其他高级军官持相同观点而已。任何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中国人是绝不愿意让一个西方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统率他们的全部武装部队的。这种做法只会导致蒋介石下台。然而史迪威则是另一番心情，陈纳德受挫，加之他领导的中国军队在缅甸表现出色，使他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他们为他们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胜利而深感自豪，因此这一步骤，当然是符合逻

辑的简单之举。

毫无疑问，蒋介石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有效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一方面提出，“中国的军队以及国内政治条件，决非象其它国家那样简单。此外，它们不可能象目前在缅甸作战的少量部队一样能轻而易举加以控制。”这一计划只宜缓步实施。”为使史迪威将军不受阻力地绝对掌握中国军队，必须要有一个准备过程。”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同意他提出的“派一个有影响的个人代表”来中国的要求。确定人选颇费周章。同时，罗斯福又忙于去檀香山与麦克阿瑟上将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讨论太平洋战略。因而这件事直至8月底方才最后落实，双方同意帕特里克·赫尔利担任总统特使，克日启程赴重庆。

赫尔利即将来到，史迪威尚在缅甸指挥攻打日本人固守的密支那。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反攻势头不减。8月8日，衡阳沦陷。翌日，史迪威探知，某些中国将领显然在策划一场倒蒋政变，他禁不住在日记中龙飞凤舞地写道：“好极了！”但他仍不准他的下属干涉中国内部政治。当陈纳德请求允许他向蒋介石不喜欢的部队空运物资时，史迪威警告说：“采取迁就措施的时刻已经过去。类似这样的礼物，肯定会延误作出重大决策的时间，让坏人捞好处。牌已摊在桌上了，只是还无最后结果。一旦有了结果，就让他们自己去着急。”蒋介石为接受史迪威的任职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只有共产党的军队同意听从重庆的命令，史迪

威才能直接指挥他们；史迪威的作用及其职权应予明确界定；蒋本人负责分配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最后一条显然不可能被美国人接受。在谈判这些条件时，又耽搁了不少时间。

赫尔利于9月6日抵达重庆。次日，他与史迪威共同谒蒋。中国军队正从萨尔温和衡阳前线溃退，但蒋介石的心情却好象十分轻松。他告诉赫尔利，他“准备给史迪威将军实际控制中国战区的所有军队的权力，并给予他享有运用这一指挥权必需的绝对信任。”

史迪威并未怀疑蒋介石的真诚，他回到办公室，制订出中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西方顾问的工作计划。他在一份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宣布，他的官衔应为“中国军队野战总司令”。蒋委员长应公开宣布：“中国的所有陆军、空军部队，都必须接受史迪威将军的指挥。”此外，“史迪威将军必须享有履行其职所必需的权力，即与中国法律不悖的奖惩权、撤职权、授命权。”史迪威还草拟了传阅电报，一旦蒋委员长正式宣布任命，他就将此电报，送给各战区和集团军司令传阅：

为完成这一使命，我竭诚希望诸位大力支持。或许你们中会有人问“这个外国人在这儿干什么？”我请求你们不要用这种眼光看待我。我在中国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足迹遍于各地，我尊重中国人，熟谙他们的性格。我目睹过中国士兵浴血奋战，我将永远与中国人及其战士携手并肩，共赴战场。我希望你们相信

我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现在，蒋委员长任命我统率中国军队，我深感荣幸。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因此函望诸众鼎力相助，多方合作，以尽职事。

为同样的梦幻世界所迷惑的赫尔利，也替蒋委员长拟出了发给史迪威的指示：

你将立即执行重组并调动中华民国的所有地面和空军部队之任务，并制定由中国战区所有盟军参加的反攻计划，夺回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为保证此任务得以完成，你被授权组建和装备部队，撤销旧建制；调动人员，调动部队，决定编制；这些权力将超越各战区司令官的权限，且不受各省区、战区界限之限制……你有权根据计划提高中华民国所有地面和空军部队将士的生活水平，使之与后方人民的生活水准相适应。

由于蒋委员长稳坐不动，史迪威不禁异常着急。9月中旬，史迪威巡视桂林，他感到这座城市很快会沦入敌手，通往昆明的大道将在日本人面前暴露无遗，日本人将毫不犹豫地卡断中国的最后补给线。史迪威于15日赶回重庆，与蒋介石谈了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全是些无人不晓的道理、愚蠢透顶的战术。他太无能了。”当天夜晚，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份长长的令人沮丧的报告，宣称蒋介石正计划把部队从萨尔温撤回。“我深信他视华南的大溃败为小事一桩，认为日本人不会在那个地方继续找他的麻烦。他觉得

可以在萨尔温江一侧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静候美国人结束战争的佳音。”16日，史迪威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坦率的会谈”。他的日记表明，除非他拥有自主权，否则不当总司令。假如连这个自由都没法获得，他只好让贤。“此人是谁尚难料定，但无论是谁，我都会向他表示同情，因为他不得不收拾一支被打得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军队，把这些装备低劣和素质低下的士卒，拼凑成一支敢于与第一流军事强国相抗衡的部队，是何等艰苦的工作。我希望蒋委员长不要误以为我真想自讨苦吃。我被耽搁了，蔑视了，受尽了欺骗。我的目的是想使中国人抬起头，重新获得自尊，但却被当作皮球踢了两年半。”

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转给了在魁北克与丘吉尔会谈的罗斯福。罗斯福很快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总统说：“在近几个月，我反复敦促您采取坚决措施抗御日益逼近中国和威胁您本人的灾难。……我确信，您目前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是让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地统率您的全部军队，并强令滞留萨尔温一带的部队立即进攻，阻止日本人在中国达到其战略目标。我请求您采取的这个行动，将有助于坚定我们决策的决心，使美国能不停地努力保持并增加对您的援助。”这是一份哀的美敦书，是罗斯福所能向蒋介石发出的最清楚无误的警告。蒋介石要么让史迪威上任，要么美国中止援助。

史迪威是在9月19日收到这封信的。他立即赶到蒋的官邸，公布了此信。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的生命日历的今天值得用红笔勾划。罗斯福终于，终于坦率地讲了话。他讲了许多，句句都象炮仗炸裂。“要么动手，要么拉倒。”这一根炮仗最响。我将这一包红辣椒递给了“花生”，然后坐下松了一口气。这支标枪正好投中这个流氓的太阳穴，刺了个正着。他虽然气得脸色发青，话都说不出来，但仍然处之泰然。他只是对我说：“我懂了”，接着坐下来，一只脚悠悠地晃荡……

我返回驻地。隔江一片通明，景色壮观，重庆的万家灯火亮了。

蒋介石永远不会原谅史迪威用这种方式交给他的那封信。他在给罗斯福的回信中宣称：他乐意接受一个美国人来当总司令，但决不要史迪威。史迪威必须滚蛋，他“根本就无心与我合作。他觉得他是前来对我发号施令的人”，罗斯福变了腔调，回答说：“自我提出建议后，中国的地面军事形势急剧恶化。现在，我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不宜以派出美国军官来指挥您的全部军队的方式承担责任。”

这个回答，半是妥协半是警告。但对蒋介石毫无作用，因为他已从呆在美国华盛顿的姻兄那儿听说，亨利·霍普金斯认为，罗斯福将召回史迪威。蒋介石就是根据这条若有若无的信息，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他在给罗斯福的一封长信中，将中国上年里的全部军事失利责任，推到史迪威身上。他坚持自己作为“国家元首和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利，“……要求您召回我已不再信任的那位军官。”

罗斯福冷冷地回复说，有关缅甸战事的重大决策，都是他、丘吉尔以及联合司令部共同作出的，决非史迪威个人作为。但他同意召回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将一分为二。至于在华美军司令的人选，他拟派魏德迈将军接任，如果蒋同意他担任自己的参谋长的话，“在目前形势下，他将不派任何美国军官，担任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作战任务之职。”

史迪威是10月19日收到召回命令的。他早就知道只有这一条出路。他给妻子写信道：“他们完全可能最后把我叫回去。‘花生’早已发了狂，罗斯福显然打算让我彻底倒台。如果老软蛋在此问题上屈服——他显然已经屈服——那么‘花生’就会从此失控。这是一场合适的失败。我的意识异常清醒。我完成了任务，并不颓丧，只是看到美国被出卖了。”这些话未免太露骨。其实史迪威报憾终生。他急于想把在那污渎中打斗而玷污了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在离开重庆时，在日记本中潦乱写道：“是否发表一项声明解释为何被召回？”“他们会允许我发表声明么？”陆军部果然不同意他和新闻界讨论中国事态。史迪威只好开始写传。1946年，史迪威溘然长逝，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十几份手稿，每一份都只开了一个头，便再也写不下去了。历来能说会道的史迪威，竟然第一次不知从何开口落笔。

× × × ×

1943年，阿伯特·魏德迈与史迪威首次晤面。史迪威

在后来评论道：“这个小伙子肯定不虚此生。”“这个小伙子”命定如此。1897年，魏德迈诞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1918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他淋漓尽致地发挥杰出参谋才能的机会，他在1941年还是一名少校，及至1943年秋，已官拜少将。破格提拔在战时司空见惯，但如此平步青云者实乃罕见。

魏德迈认为，他在和平时期“接受的对职业成就最有利的委派”，莫过于攻读德国陆军大学。他从1936年至1938年，一直呆在该学院。他在日记中叙述道，正是在那儿，他一直“浸泡在有关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宣传中。透过这些宣传，我了解了许多真相，懂得了共产党的目标、实践、及其策略。这些事情长期鲜为美国人所知，或者被他们忽略，至今才有所改观。我还站在与我的许多同辈不相同的视角，观察德国。这不是说我赞成纳粹政权或者宽恕他们的罪孽，我只是觉得，希特勒上台，实质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国的处罚所带来的后果。他之所以能困扰德国人民，就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德国人民急于想从魏玛共和国末年混乱的经济灾难中寻求出路的心理。不管我们怎样谴责希特勒的手段卑劣，德国人觉得，正是他才把德国从经济失控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却是事实。”

据魏德迈自述云，他一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对他的亲纳粹立场，进行了严格审查。但调查无果而终。

魏德迈依靠其杰出的计划才能崭露头角。他最懂得精确的价值。他还善于从全局把握某一具体任务应达到的目

标。为此，他利用前人理论，根据自己对纳粹德国的实地观察，建构了独特的“总体战略”理论。他给自己的理论下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动员全国力量，达到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魏德迈相信，缺乏这种战略说明美国只是在“未经探查的大海上随波逐流，希图不用罗盘，只靠星辰导航，就能驶抵命运的香格里拉（——即世外桃源、乌托邦之意——译注）。

计划大师和总体战略家魏德迈，是在史迪威奉召回国后于1944年10月受命去中国担任指挥官的。他觉得这项工作倒胃口。“假如倒回去一年，”他写道，“我说不定乐意去中国解决战区的诸多问题。但眼下，困难局势已难扭转。我无数次听说，中国是美国官员、军人和外交家的坟场。你拿中国人毫无办法，他们根本不会合作。他们会使你，你的政府和他们一起，进入死胡同等等。许多优秀的军官。就是在中国栽了大跟头的。”有一位助手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大获成功的外国军事顾问。例如“中国人”戈登，俄国的加伦，德国的冯·福肯豪森等，不都是功成名就吗？魏德迈对此说法嗤之以鼻。

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指示下得清楚无误：“1. 你与中国军队有关的首要任务，是充当蒋委员长的顾问，帮助他实施抗击日本人的军事行动。2. 你的涉及到由你指挥的美国在华作战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执行以中国为基地的空战。此外，你还应该帮助解决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作战、训练、以及后勤保障诸问题。3. 除非出于保护美国人的生

命及其财产安全之必需，你不得动用美国的力量弹压或介入中国的内部争端。”换句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斗争，是他们的内政，关于“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节，再也未提到，也未强调魏德迈担任中国军队的总指挥之职。

但是，魏德迈作为蒋介石的顾问，要回避这些微妙的问题，做好自己的工作，实在困难。他必须在日本人未攻占昆明，卡断中国性命攸关的补给线之前，将他们挡住。日本人的总体军事图谋必须加以判断，中国军队本身必须加强。然而“中国军队组织之混乱，计划之糟糕，”魏德迈告诉马歇尔，“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更使魏德迈吃惊的是，陆军、空军、后勤部队，英国人及其秘密情报机构，要么信不过，要么完全失控。必须加强内聚力，使之形成一个结构紧密的总体。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正如魏德迈于1944年12月向马歇尔报告的那样：“在上一封电报中，我曾说中国人的态度冷淡，这一状况至今未见有何转变。我现在觉得，委员长及其追随者已意识到局势万分危急，但他们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他们未达到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良好组织、训练程度，也无优良的装备。有的人忙于搞阴谋诡计，虚假傲慢；有的对他们领袖的诚实和动机产生怀疑，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未做好应付这种形势的准备。”

魏德迈记住了史迪威的教训，未敢在公开场合表露这种情绪。他一开始就处事小心，态度随和，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对陈纳德优礼有加。他并不成天唠叨贪污腐化和无

能是军队作战不力的原因。相反，他只批评地方机构膨胀，指出运输和贮藏保管措施不尽人意，计划有疏漏。他还批评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免服兵役的规定。这些人本来可以被培养成相当出色的下级军官。在考察中国军队的实力时，魏德迈发觉许多指挥官不愿让部队长途行军。原因何在？原来相当多的中国士兵，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长途行军只会造成全军覆灭。半饥饿的军队，是无法胜任长期作战的。只靠抓夫征兵，也无助于提高士气。为了扭转这些失误，魏德迈建议袭用美国的方法，启用美国人。给美国的后勤军官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和飞机，帮助运输和分发食品，还应建立一个政府控制的机械化运输备用物资贮备处，由美国军官按计划负责运输。

魏德迈象他的前任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到头来也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忽视了中国形势的复杂性。魏德迈的答案——以西方的技术手段解决中国军队的后勤和训练——用在美国和德国可能恰到好处。但在中国，他却无法回避政治，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他的每一项动议，实际上都把美国军官推向了中国的政治旋涡。他不知道——也没人教他知道——他所需要的那种效率，其实就是与蒋介石对抗，摧毁蒋达成的妥协之堡。把新人推上前排，就等于废黜蒋的心腹。他还未认清，蒋介石在美国打败日本之前，是不会把自己的兵力投入战斗的。魏德迈笃信技术经验，因此全然不觉自己已在犯错误。当他的技术专长在中国的条件下无

法推行时，他只想到中国被阻碍他的努力的那些美国人“扔”掉了，他根本没料到是中国人不愿采用他的那一套。当然，战后他看清了这一点。在战争还在继续时，他是尽其能力和理解的最大限度在开展顾问工作的。

然而战事的进展颇不顺利，许多人都看清了这点。随着日本人进攻密度加大，连重庆也似乎受到了威胁。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开始询问魏德迈是否能让他们搭乘飞机去美国避难保命。“这简直又好笑，又可悲。”魏德迈告诉马歇尔，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居然还有两名中国将军。1945年1月，日本人向设在水城的第14航空队基地发动进攻，薛岳将军被打败，机场被敌方占领，薛岳是一位有独立意识的军人，受蒋歧视，被排除在补充军火装备之外。与此同时，日本人向昆明以及蒋委员长的主要兵力集结地进攻的步伐放慢了。魏德迈大为疑惑，有关蒋介石与日本人已达成“某种谅解”的谣传，难道是事实？他直截了当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令人沮丧。“蒋委员长对此绝对不承担义务。没有任何迹象，无论是感情的还是别的什么因素，表明他否认或承认这一说法。他的本能反应是一阵干笑。”

魏德迈与史迪威一样，深知他的计划，极可能简单地被不合作彻底挫败。于是，他在1945年1月成功地结束了萨尔温战役后，把两个中国师，空运回中国。然后，他请求将驻防萨尔温的第53军、云南的第5军、西安的第57军，按照他的防护昆明的全盘战略加以调动。然而这些部

队根本就调不动。魏德迈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尽管时间很短，但足已使魏德迈大为恼火：“我感觉要当好您的参谋长几乎不可能，我非常焦急不安。因此，请求与您私下会谈。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立即作出决定，我们将失去完成（蒋所制定的）计划的若干机会。我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局面。我简直不想为中国干事了。”

这样，魏德迈便决意把精力集中于“巡视”驻防昆明周围的部队上。巡视工作的意义深远，它包括：“1. 作战，对此美国人非常接近于享有作战指挥权；2. 训练，对此美国人有权全面指导；3. 供应，对此美国人在每一层面予以支配。”制定这些计划远比实际执行要容易得多。魏德迈最早提出的一个建议是，美国政府每月给每个精锐师的中国士兵1美元的薪俸，而蒋则提出，美国政府把这笔钱直接拨给他要好得多。他将每月给每个中国士兵100元的中国纸币。由于当时的兑换率为500元中国纸币换1美元，而且每天都在上涨，因此这一建议未被美国人接受。魏德迈不愿遭挫折，他早就决心要使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他告诉马歇尔：“我与蒋委员长的直接友好的联系，牢不可破。”他说，“我坚信，他现在喜欢我，尊敬我。”在他的记忆中，“蒋介石非常敏感，象女人一样凭直觉办事。……我感觉，他在训练和经验方面都未做好准备，无法解决面前堆积如山的问题。”

鉴于魏德迈眼中的“堆积如山的问题”，均为军事困难面非政治难题，因此他决不怀疑美国人“作好了准备”，能

有效地弥补蒋委员长的不足。他认为，在每个参谋级都设置一个美国联络处，在中国军队的每一个团，都配备一名美军顾问，是当务之急。组建36个“训练有素、待遇上乘、指挥有方的精锐师”，应成为这件事的开头。中国人必须学会接受顾问给予的建议。正如魏德迈在1945年2月15日签发的作战指示说的那样：“任何中国指挥官，倘若拒不接受美军顾问的正确意见，该指挥官应被撤职，不然就把美军顾问从其所属部队撤出。”在25名军官和50名士兵组成的若干“战斗分队”中，大约有4千名美国军人被安插其间。美国联络组将就当地形势、训练、人员配备等，向上一级的中国指挥官以及中国战区总部提供精确的统计数字。到了3月份，美国人已办起了一所参谋和步兵学校，但却不见中国学生。问起为何无人前来受训，中国的将军们都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们的工作很忙，抽不出人来进修。他们说，只有4月份，才有可能派人来学习。很显然，他们并不急于想学美国的技术。

在等待中国军官们参加培训的时间，美国人试图培训一些普通中国士兵。这些士兵“浑身是病，仅仅还能走路。”一位美国军官叙述道，“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准备担架，把这些因病无力走动的士兵抬走。我们在路上常常看见饿殍或奄奄待毙者。……那些重病号，还得在毗邻厕所的厨房中给自己煮饭。大约3个病人合用1床军毯。死人便躺在快要咽气的人身边。”看来，美国的指导，远不能局限于作战。因为士兵的身体状况是作战的先决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美国人决定让每个士兵服多种维他命胶丸并吃搭配齐全的餐食。但麻烦在于美国人送来的维他命胶丸，常被中国军官视为“有毒之物”。魏德迈只好叫美军联络官，建立“食物服务组”，一直设到营级。表面上蒋委员长完全赞同美国人为部队制定的伙食标准。照此开销，每个士兵每月的伙食费要花2000元，但蒋只拨给每个士兵每月600元伙食费。余下的部分全无着落。于是美国人只好设立了6个“给养采购委员会”。这个机构一直在1945年夏季，仍给185,000名中国士兵添补粮食。

这种做法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供应线打开，新的任务进一步增加。美国人的作用日益扩大，援华人员数量也自然上升。1945年1月，援华美军人数已达3万3千人，及至6月，竟上升到5万9千人，而且还嫌不够。与此同时，财政矛盾也日益尖锐。4月份时，中国纸币兑换美元的比率为500：1，到了6月，便达到750：1，夏末则升为3000：1。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十分普遍。蒋委员长要魏德迈公开宣布，美国的供应未被乱用，魏德迈拒绝了这一要求，相反，他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处理租借物资分配。

魏德迈按照其反共的整体战略目标，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全部行为，调整到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方向上。尽管在1944年末，他曾向蒋委员长提出若干种扩大中共军队对日作战作用的建议——例如装备和组建中共军队的3个团，由美国军官担任指挥，或者派几千名美军技术员去延安，帮助提高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但他毕竟对这些建议热情

不高，也未采取行动使之得以实现。1945年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位上校，与中共进行直接谈判，探讨了装备2万5千名中国游击队员和建立爆破与通讯学校的可能性。会谈还涉及到给“人民民兵”10万支手枪，以便“在魏德迈的战略需要时，他们的65万军队和250万民兵，能给予全面的合作。”魏德迈本人对此竭力加以反对。他下令道：“中国战区的军官，未经总司令、美军、战区（即魏德迈本人）的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中国的政党、人士谈判，不得支援他们的活动，包括不得与未经批准的政党、活动和人士讨论拟议中的支持、假定中的利用美国物资援助的问题。”

这一命令，不仅限制了那些与共产党谈判的人，还限制了诸如陈纳德这些爱与地方军阀共事的人。陈纳德等认为，尽管地方军阀得不到蒋介石支持，但他们还是有助于对日作战。魏德迈还禁止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之持开放态度的选择权。“在中国，”魏德迈写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更清楚共产主义的威胁，勿需我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心理领域，公开地或闪烁其词地建议实施建设性的措施。美国在这个遥远的、然而十分重要的地区，站在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共产主义极可能是比纳粹更厉害的自由的敌人。不让它在中国成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言论是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很久以后，他才在回忆录中写出的。他在当时，却用不太激烈的语言，描述他的目标：“我所做的一切”，他在1945年7月对一位朋友说，“我相

信你也会这样做，无非是以正直的方式，导演这场戏而已。”

然而，当人人都不正直的时候，想用正直的方式行事纯属异想天开。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的克里米亚会谈，向斯大林作出重大的秘密让步：出租亚瑟港和大连港，恢复俄国对满洲铁路享有的“权利”，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划归俄国。作为交换，斯大林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立即站在盟国一边对日宣战。在中国，国共两党都在为战后的敌对行动作准备，而不是参加赫尔利所安排的那个联合政府。美国情报官员们强调指出，国民党的腐败衰弱，与共产党的强大和虎虎生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不同意魏德迈的估计，此人“认为中共的未来军事实力极其有限，蒋的中央政府只会遇到相对微小的抵抗，就可以将中国的反叛镇压下去。”

魏德迈计划发动一次跨越中国南方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战斗中锻炼中国军队。这一进攻将以1946年初攻打广州和香港为顶点。在德国投降后（魏德迈原猜测德国将于1945年5月投降），魏德迈希望得到巴顿将军、辛普森将军和特鲁斯各特将军的帮助。他打算把巴顿派到华北，直逼北平；特鲁斯各特顺长江南下上海；辛普森则当他的副总司令。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得到最高阶层的认可。魏德迈飞赴华盛顿，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提出了这一要求。参谋长联度会议表示同意，然而与总统的会谈却结果不佳。魏德迈后来描述了病魔缠身的总统，是怎样明显地无力理解共产党的威胁的：

我在总统的办公室与他单独共进午餐，试图同他讨论中国战区的诸多问题。我已有好几个月未见到总统了，他的身体之衰弱，令我震惊。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下巴萎垂。我感到很难向他汇报情况，因为他似乎在打瞌睡。我不得不好几次重复相同的一个话题，因为他的注意力好象无法集中……。我对总统说，共产党在眼下还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只要战争结束，他们肯定就会惹出麻烦。他好象完全不知我之所云。

魏德迈接到的指示很令他失望。上面的命令说，美国的短期目标是集中中国的一切力量打败日本，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目前不能武装共产党人，但若美国准备在中国沿海作战，则共产党人必须得到武装。命令说，美国希望的“统一的”中国，并非一定要受蒋介石的领导。

魏德迈回到中国，继续制订攻打广州的长期计划。形势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日本人新一轮攻势被中国军队遏制。中国人在战斗中使用了美国顾问所教的支援火力，信号和运输等技术。第14航空队取得了制空权。在4月的一天，美国军队在日本冲绳登陆。但中国战区仍被盟国的领袖们视为战争边缘区。魏德迈也不知道，马歇尔、史汀生和新总统杜鲁门，仍在至关重要的远东战区的决策上采取拖延等待，他们在等待首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斯大林通过在美国的间谍，也了解到美国的这一机密，他也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试验结果。一直到7月30日，马歇尔才告诉

魏德迈“日本投降后协调计划是一个迫切的需要”。马歇尔还补充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除了空战，他们无意卷入在中国大陆的战斗，尽管这样做大大有利于中国军队重新夺回被占领的领土。”这一说法表明，战争即将结束，但仍未给魏德迈一个能制订今后计划的准确的信息基础。他只好继续集中精力设计中国军队攻打广州的战役，并竭力鼓舞美国人日益下降的士气，因为美国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的努力，已是“强弩之末”。

在7月末和8月初，中国军队稳步进入战役的第一阶段。夺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雷州半岛的巴西尔堡（即我国广东湛江之西营一译注）。“战斗并不激烈，日本人决定撤退，然而秩序混乱，中国军队无意也没有理由与溃兵大战，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紧追其后。所谓的战斗，充其量是他们与日军的后卫交火，间或有一些日军分队固守，将中国军队的某些部队阻击了几天。”8月3日，中国军队距巴西尔堡仅20英里。他们在7年间，第一次准备打开这个堡垒，重组一条海上补给线。可是，就在他们打算最后大举进攻时，战争却宣告结束。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日本宣布暂时投降。8月14日，阿诺德将军作出了最后的大规模姿态，派遣了一千架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当飞机还在空中时，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

而对这一形势，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一个适当的计划。早在8月1日，魏德迈就提醒马歇尔，“如果和平将在几周后降临中国，我们都会因准备不周而手忙脚乱。作

为美国方面，我们可以料理单方面的人员与财产的利益，但我们许多行动，都与中国捆在一起了。如果和平突然降临，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面积的混乱和无序。中国人未做出恢复正常生活、防止传染病、恢复公用事业、重振经济、安置成千上万难民的通盘计划。”他感到美国人“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充任中国官员的顾问，一如他们目前在中国军队中起的作用一样。我相信，你将同意我们应帮助中国重新确定少许秩序和正常状态。”

但是，什么叫“少许秩序和正常状态”？是否意识着它的获得须雇用更多的西方专家、文官和军人？俄国人不会同意：他们系统地占领了满洲，正准备把所有重工业设备运回本国。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同意：他们已从北方基地开出，正开始收缴投降的日军的枪支弹药。蒋介石不会同意：他正与美国空运援助的飞机比速度，企图重新控制整个中国，他不满意魏德迈的劝阻，灾难性地大大延长了交通线。美国人不会同意：他们已在海外苦战了4年，正吵吵嚷嚷着复员。马歇尔本人也不会同意：他反对在中国进行军事卷入，竭力促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共联盟。

最后，或许最滑稽的是，魏德迈本人也不一定真正会同意：一位飞虎队员后来写道，“如在当时阻止赤色分子，本是最简单莫过的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描述1945年年底的形势时说，“蒋介石处于能应付形势的位置，他拥有39个美国人训练出来的精锐师，他掌握了精良的装备，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形势并不困难，重庆政府是我

们的盟友，我们在—场艰苦的战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然而，在1945年8月5日，魏德迈却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措词极其强硬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此报告所述的情况，必须由您亲自处理。这都是经过仔细核实的真实数据，我相信有助于我们解决各种复杂问题。”这是魏德迈一直避免使用的史迪威式的战术：对蒋介石猛击—掌，让他立即行动。这份报告把中国征兵方式（即抓壮丁）称之为“毁灭性的疾病”，—种极其腐朽的、邪恶的把人当作牲口的买卖。其牺牲品个个皮包骨头，衰弱无力，他们竟被要求去完成—个自由中国的公民的最重要的职责！他们成了中国官员收入的来源！”中国的军医院无非是病入膏肓的壮丁们的葬身地，可与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相比。这份报告最后指出，“—个—个来这个国家的人，都建议中国军队裁员，组建几个精锐师。但是，由于士兵们主要充当军官的收入来源，决定着将领们政治势力和影响，他们怎么会自拆台脚呢？……军队是赢得战争的工具，中国政府不想赢得战争吗？回答是：不是无条件的。胜利不得以把中国的问题委托给美军为代价；不得以引进民主为代价，因为这会控制政府及其官员们；不得以与共产党人联合为代价，因为他们有—套怎样打抗战的见解，他们不同意“坐等胜利”。

蒋委员长对此报告作何反应未被记载，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的反应都不会离题万里。如果他注意观察美国人的不同意见，敢于承担后果，那么美国将继续发挥顾问作用。但蒋并未这样办，中国不是美国，为中国而进行的战

斗，必须按中国的规矩打，这些规矩是按蒋的希望制订的。如果说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但毕竟是他的决定，他有足够的时间达到目的。无论美国有无罗盘，都不可能在中国找到美国的“香格里拉”。

第十章

美、苏在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不直接意味美国停止卷入中国事务。在美国的帮助下，50万国民党军队被运送到华东、华北的重要据点。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以及一些重要矿山和铁路枢纽。为了进一步阻挡共产党军队开进，美国统帅部还规定，侵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或其代表投降。于是在许多地方，日军继续抵抗共军，直至国军开到方才放下武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军事顾问又停止了训练国民党军队，美国军官无权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直接援助。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转为占领日本、解除其武装。它无意涉足中国的内战。

共产党在华北越战越强，苏联军队突入满洲，国民党日益腐败，士气低落，军队的后勤保障物资奇缺。魏德迈估计了这些因素，于1945年11月，就中国局势作了一个

新分析：“1. 蒋委员长有可能稳定中国南方，但他必须接受外国管理和技术援助，并通过启用诚实的、能干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2. 蒋委员长只有同中共达成一项满意的协定，并将上述建议付诸实际行动，否则在几个月乃至数年内，都无法实现华北局势的稳定。”杜鲁门总统对此分析深表赞同，他再度重申需要“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呼吁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建议蒋（介石）改变“一党政府”体制，容纳中国的“其它政治力量”。紧接着，他又伸出胡萝卜，“只要中国沿着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统一，美国将乐意以合适的方式援助国民政府，帮助它重建国家，振兴农业和工业，建设一支能与国内和国际责任相适应、维护和平与秩序的中国武装组织。”

根据这些总的指导方针，美国政府批准了援助中国的计划。乔治·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分来到中国，在敌对的国共双方进行调解，达成停火协议，以期组成联合政府。1947年，马歇尔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魏德迈接踵而至，竭力劝说蒋介石改组政府，不要一味凭借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美国还派出了由麦克卢尔将军率领的，大约有1千余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进入中国。从抗日战争胜利日至1948年上半年，美国共拿出5亿美元支援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军援。这笔数字，还不包括以“军队剩余物资”的名义廉价出售给中国的大量物品。1948年，美国国会又批准了“援华条例”，准备再给5亿美元。此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及后来的就业理事会，也给中国分

配了5亿美元，用于修水利、兴渔业、实现农业工业化，增设医药卫生机构，生产农业机械等项目。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腐朽，全国普遍存在的不满，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却是无法从外部加以治好的。相反，共产党人团结一心，士气高涨。他们的军队由经验丰富的将领统帅，通过缴获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主要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加强。1948年底，林彪在东北打败了国军；拥有10万国军的北平，也于1949年1月易手。紧接着，蒋介石宣告下野，将大量黄金储备和故宫的稀世珍宝、字画，包括他的精锐部队运送台湾。共产党的军队向南方长驱直入，4月攻南京，5月取上海，10月入广州，11月得重庆。中国遂成共产党的天下。

现在，该轮到苏俄顾问进入中国了。他们将弥补俄国人在19世纪的失败，为共产党做美国人替国民党未办到的事。涌入中国的俄国顾问人数可观，从50年代至60年代，共计1万1千之众。他们也在西方先行者的传统领域——科学研究、工程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军事组织——中大显身手。

毛泽东1950年初访问苏联以后，斯大林保证向中国的50个大型工业项目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到了1952年，援助项目扩大到141个。这些项目，乃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重要组成部分。3百余名苏联专家在南满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5百余名苏联顾问活跃在新疆开发石油，更多的人则在中国北方帮助建设铁路网、设计汽

车和拖拉机制造厂，安装石油精炼设备和水电站。1955年，苏联科学家开始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中国也派出了20名高级核物理学家去莫斯科附近的杜布纳原子联合研究院考察进修。苏联专家参加了诸如地质考察、桥梁构筑、国营农场规划，甚至北京医院的管理工作。

苏联专家在教育领域内也活动积极。50年代初，中国从俄国翻译了1393种教材，用于取代自己学校过时的教科书，苏联给中国大学的图书馆，送去了无数的图书杂志。也就在这个时候，至少有1千名中国科学家去俄国受训。苏联还帮助中国培养了大约3万7千名大学生和研究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全面修订了大学课程，重组了系科，建立了各种研究所。仅举一事为例。中国数学研究所的主任报告说，苏联在“函数理论、应用电子计算机解决技术和科学难题——空气动力学偏微分方程、毛细管偏微分方程、原子薄壳层偏微分方程等研究课题上，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在核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中，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尽管我们不知道苏联援华军事顾问的人数，但他们的影响之大，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共领导的军队，兵员大约有5百万人，但组织不甚紧凑，也缺乏强力的海、空军部队。然而就是这支军队，却在1949年打败了国民党。朝鲜战争结束后，这支军队焕然一新。他们组建了一所军事科学院。开办了一大批专业军事院校。中共军队的高级

将领被送到基辅的苏联参谋学院进修，解放军的装备实现了标准化。中国军队在组建工兵、防空兵、通信兵、装甲兵等兵种的工作中，都得到了苏联人的帮助。及至1955年，从游击战争时代沿袭下来的非正规化以及平均主义，都得到了克服。中国军队采用了14级军衔制，实行专业分工，军级工资等制度。军人穿礼服，佩勋标，戴徽章。海军和空军，也完成了相应的正规化建设。

但是，这些进步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毫无摩擦。这倒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要求过高，一如在北京工作的一位俄国化学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希望第一位俄国专家都是魔术师，能用一个正确的答案，解决所有不同种类的疑难”；也不仅仅是苏联人的条件太苛刻，要中国人用钱支付苏联给予的全部技术服务，迅速还清到期贷款，高价向中国推销某些产品。麻烦在于，中国人害怕，这些顾问们一旦取得了控制，就会提出相应的政治概述。在中国的历史上，当西方给中国以技术援助时，往往都是照此办理的。

毛泽东为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奋战了20余年。现在，国家终于实现了统一，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再度缓慢倾斜。他不愿让共产党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初期，费尽千辛万苦所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被丢弃到了1955年，许多中国人都明显地表现出他们过于依赖苏联技术的倾向。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抨击斯大林，这一作法似乎也附带批评了毛泽东，因为毛刚刚公开赞扬了斯大林。1958年，中国实行“大跃进”，苏联人对中国新出

现的人民公社，公开表示不赞成，这就给毛泽东的一个最值得珍视的政策，出了一道难题。1959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接会谈，宣告了苏—美和平共处新时代的滥觞。苏联的援助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弥补这些过失。1957年夏初，中共的主要发言人宣布：“我们要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大跃进遭受的挫折，使毛泽东担心军队和政府中的不满分子，会寻求与苏联结成更紧密的联系，苏联对这种主动联合的意向，决不会拒之门外。1959年下半年，中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被撤了职，据信他们就是试图争取更大规模苏援的人。林彪被召来重组军队，扩大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继续大规模组建民兵。

1960年夏季，在布加勒斯特、北京和河内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苏共和中共发言人的观点冲突公开化。出于明显的吓唬中国人的目的，俄国人立即撤出了所有援华的技术顾问，给中国人丢下了一大摊未竣工的工程。中国人的反应是召回其大部分留苏学生。中国人后来承认，“苏联人的行为，给中国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打乱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加剧了我们的困难。”分歧从1960年10月的莫斯科81国共产党大会开始，通过赫鲁晓夫1961年攻击阿尔巴尼亚，至中国1964年宣布自己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再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批判，苏中双方不但不让步，裂痕反而进一步扩大。

十年来，中国从苏联的技术援助中获得了巨大的益处。苏联在中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实现重组军队的计划中出了大力，而这一切恰恰是中国欲重建和保卫他们曾满目疮痍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当苏联于1960年撤走专家时，他们让一个重要的任务半途而废：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中国十分需要原子弹——这是西方技术文明的一个可怕的馈赠物，是最高级的也是最卑劣的、最意义不清又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科学突破。围绕着原子弹的争论，是中苏愈来愈烈的摩擦的一个重点。到了1955年，中共的领袖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核武器的意义。他们知道，苏联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中国要么自己制造原子弹，要么求助苏联的“核保护伞”庇护。俄国人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既不能拒绝中国盟友要求的尖端技术帮助，也不愿看见身边出现一个核邻居。他们最终采取的是一个折衷政策，结果双方的愿望都难以满足。

根据1957年10月达成的协议，苏联保证：“帮助中国掌握这一国防新技术。”中国人的理解是，苏联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同时让中国人得到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可是到了1959年，中国人终于明白，他们得不到这种实质性的、直接的核援助。俄国人只满足于帮助中国建立核反应堆和可用于生产核裂变材料的气体扩散工厂。尽管这已是生产核武器的两条主要途径，但俄国人似乎觉得，没有俄国人的继续指导，中国人仍然不能实现最后一次飞跃，制造出原子弹。他们告诉中国人，为这一指导付

出的代价将是，中国人应与苏联人合作建立远东司令部，接受苏联人的领导。中国人后来宣布，他们怀疑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

1960年，在苏联技术专家撤出中国之后，中国人决心自己干下去。他们在1961年还坚持说，他们与苏联的友谊，仍象“喜马拉雅山那样坚不可摧，象太平洋那样深不可测，象长江和伏尔加河那样源远流长”。虽然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中国人还是知道，苏联人已把达到核目标的手段，交到了他们的手上。俄国人没有办法收回他们已经给予的援助，除非打一场战争，否则俄国人将无法拆散核反应堆和气体扩散工厂。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的核试验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约翰逊总统称此为“一个粗糙的核装置，只会加剧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然而中国人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说，“这是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这颗原子弹大约2吨当量，相当于美国1945年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炸弹的爆炸力。尽管这颗原子弹还未使中国跻身于核大国之列，但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是否会乘胜前进，制造出更先进的装置。1965年5月，中国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当量与第一颗相似。1966年5月，中国的第三枚核武器炸响，这一枚核炸弹较之第一颗，爆炸当量大了10倍。还加进了热核材料。1966年10月，中国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这是一颗小型炸弹，然而却是中国首次用

导弹发射的。第五颗核弹是在两个月后试验的，爆炸当量达到了30万吨级。1967年6月17日，中国人首次成功地进行了热核试验。这枚氢弹至少为300万吨级，威力比摧毁广岛的那颗核弹，大了100倍！

激动万分的中国人民拥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齐声欢呼。西方分析家却在此时陷入深思。他们认为，中国人极可能掌握了“使铀分裂的气体离心法”。美国曾试图开发这一技术，最后不得不在几年后放弃。中国人在官方公报中，没有透露任何一点技术信息。他们只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人员发挥集体智慧，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紧密合作，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中国人说，这次试验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卫。他们的最终目标仍然是通过全面禁止核武器达到世界和平。这与他们自1964年以来历次声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在这次，他们还指出，他们的成功给了美苏沉重的一击，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他们说，核武器也罢，核裁军也罢，不再为西方所独占。中国必须加入最终的决策者行列。中国有其即定的政策，并有可资证明的力量去贯彻这一政策。中国人至少以自己称心快意的方式表明：中国完全依赖西方顾问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十一章

结 论

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时值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不是纯粹的巧合。在1966年8月8日颁布的文件中（此文件常被视为文革宪章），中国领导人强调指出，那些“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必须受到保护，红卫兵和其他团体不得骚扰他们。可是，这一技术成就的戏剧性实质，加上中国轧轧作响的对外政策；还有世界各国大学校园部分地以“毛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大量团体的涌现；以及无法从中国获得可信的工农业生产数据，使得中国拒绝西方贷款的决定似乎极有道理。在中国猛烈攻击西方的言论中，存在着相互背悖的敌意与宽慰的结合。如果说中国在某些领域内与西方并驾齐驱，但中国的道路充满障碍，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仍是事实。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奉行的孤立政策，

并未影响这个国家的接受能力。西方顾问所带入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为**中国**所吸收。日心说、历年说、外科学、经济计划学、工程学、现代大学、长距通讯、机械化战争说、核物理学，无一不被中国消化。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这种共同的自尊与共同的忧虑，成了连接若干代全然不同的人物的共同纽带。从反基督教的先驱明人沈德、清人杨光先，到 19 世纪的政治家林则徐、曾国藩，再到苦苦相斗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概莫能外。

只要我们竖看从 1620 年至 1960 年三百余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西方顾问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接近中国的。两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姿态：技术在握和道德正确感。西方顾问们深信，他们的目的高尚，他们的技术为中国人眼馋，以领主的架式君临中国理所当然。一旦中国人对他们的目的表示怀疑，或者拒绝接受他们的技术指导，西方顾问便火冒三丈。相当多的西方顾问，以不同的方式，与中国产生了感情纠葛。他们试图在中国人身上，获得比偿付他们的技术援助更多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是以正常的雇主和雇员那样契约性眼光，来对待双方关系的。中国人有权根据需要中止“合同”。无视或误解这一点，会带来严重灾难。以美国人为例，他们在蒋政权的后期，作为顾问可谓相当积极努力，但最终不是弹起了被出卖和“丢掉

了”中国的奇谈怪论么？其实，美国人并未被谁出卖，他们不过是重蹈复辙，丢掉了前人所丢掉的东西——金钱、希望——前功尽弃。中国决不是美国的囊中之物，一如罗马天主教之于欧洲，英国之于其殖民地，苏联之于其盟友一样。傅兰雅、戈登、赫德，不过是胡美、史迪威和托德的前车之鉴。

当西方顾问们依然对他们的文明沾沾自喜，对其道德的正确性自鸣得意，急于想“开发”他们视之为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低于他们的民族之时，上述顾问们的遭遇，不啻是一种教训和轰鸣警钟。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充分肯定这些顾问的品质给西方人带来了荣誉。傅兰雅和丁韪良的坚韧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和托德的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的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的精明；赫德和魏德迈的过人的组织能力；南怀仁和伯驾的独出心裁；华尔和陈纳德的个人勇气；白求恩的无私奉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一生中的重要时光（乃至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

总的说来，这些顾问们的事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历史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抵消积极作用的原因，倒不全是他们个人性格中的消极因素——他们表现的傲慢、烦躁、易怒、失策或者愚蠢，引得中国人民在相同的时候和不同的程度反对外国顾问。更深刻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问题不光涉及到在中国工作的这些顾问，还与在其它国度试图进行相同工作的另外的人有关。

这些人的根本动机何在？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的？他

们这种服务的个人代价是什么？他们凭什么到中国去？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之一是企图改善中国物质与精神的状态。我在本书中记述的那些顾问们，无论是自愿到中国，还是受邀到中国，或者被上级派往中国，似乎都怀有这一共同的愿望。帮助，意味着使中国更象西方，使之出现按定义说来是建设性的改变。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他们并不在乎他们搞的一系系列活动会产生什么效果，他们大多数行为的背后所蛰伏的动机，实际上相当复杂；他们更愿意从中大捞一把，而非帮助中国。许多西方顾问都有煽起危险、召唤激进措施的特点。这一特有形式，源于他们在国内所经历过的或害怕经历的挫败。中国似乎能给他们这种演练的自由，能使他们拥有用个人力量改变历史的机遇，从而显示他们的重要性。

不少顾问的确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但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相当高。虽然许多中国人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但他们还是经常遭到冷遇、欺骗、甚至敌意。每个顾问，都企图以某种方式控制中国的命运，但他们最后还是认识到，这实际上是痴心妄想，从而感到万分沮丧。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利用到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所利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于是乞灵于两种方法逃避这一痛苦的现实。要么拼命工作，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埋葬于引人入胜的目前时光；要么咒骂中国人不值得西方人帮助——中国人无能、自私、残忍。持前种态度者以其行动表明他们的野心有限，持后种态度者则以否认机会存在而掩盖其失

败之实。

回答第三个问题——他们凭什么到中国去——要困难得多。寻找答案的线索，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即这些顾问本身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充满信心，他们坚信，他们的文明，尽管有着种种缺陷，还是给了他们某些拿得出手的東西，某些中国人叹为观止的罕世之物。他们的权力在于他们有能力，信念和动力。他们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中国自然会随着他们变。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中国人要反对这种状况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去抗议潮汐涨落，日光月辉一样。

大多数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和目标的绝对笃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发生动摇，美国人自越战以来，也对此表示了严重的怀疑。但是，要说西方优越感已彻底消失，未免荒唐可笑。在70年代末期，西方人看到石油资源有限，认识到他们在核反应堆带来的灾难而前无能为力，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技术自信。相反，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当然，就此而断定中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容纳他们目前似乎欢迎的力量，还为时过早。不过，由于天平上互为相对的两个砝码都增加了新的自知之明，我们可以说，避免古老的错误观念重新出现的日子，毕竟来临了。